穿越时空的目光

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

编委会主任／高建民
主编／虞和平　孙丽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穿越时空的目光


ISBN 978-7-5004-8373-1

定价：45.00 元

穿越时空的目光

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

编委会主任/高建民
主编/虞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时空的目光：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虞和平、孙丽萍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04－8373－1

Ⅰ．穿…　Ⅱ．虞…　Ⅲ．徐继畬（1795～1873）—人物研究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Ⅳ．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710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379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编 委 会

序一

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当代价值

高建民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160年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在英国伦敦出版；同一年，一部由中国人全面客观介绍世界各国的著作《瀛环志略》在福州问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借鉴西方文化、将天朝大国融入世界体系并且积极主张晚清中国顺应潮流主动对外开放的优秀著作，是倡导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启蒙著作。我们研究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就是要从更深远的历史视角，为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积淀文化底蕴，充实精神财富，提供经验借鉴。对徐继畬开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重点和当代价值，我认为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要深入研究徐继畬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情怀，着力弘扬伟大深厚的民族精神。徐继畬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入侵中国的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渐加深，清朝政府愚昧无知，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正是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命运，徐继畬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思考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他的开放思想，开始了他的开放实践活动。毫无疑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徐继畬开放思想和实践的源头活水和强大支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民族的深情眷恋，对国家的深刻忧患，是徐继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最深层原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回应现代文明的两条相互交织的发展主线。徐

继畬清醒地把握了二者关系，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显示了开放和务实的作风。鸦片战争前，他积极主张严禁吸食贩卖毒品；鸦片战争开始，他力主抵抗，积极组织地方力量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准备。在反侵略斗争过程中，他认识到西方列强以其军事上的优势把世界卷入了弱肉强食的战争，以其经济上的优势把世界带入不断拓展市场、倾销商品的贸易战争，甚至不惜武力较量和殖民战争，任何国家无法回避。中国必须冲破闭关锁国的樊篱，勇敢地实施开放，坚持强国富民之路，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不仅要师人所长、弃己所短，更要发展实业，发展商贸，增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这里，徐继畬为我们诠释了宽广的爱国主义的含义，那就是：当国家面临外族侵略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英勇打击侵略是爱国的举动；和平时期，积极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维护国家地区间的和平友好环境，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样也是爱国主义。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日益加深，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深入研究徐继畬的爱国情怀，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得到启示和借鉴，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要深入研究徐继畬关注民生、清明廉洁的崇高品格，着力践行以人为本的光辉思想。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徐继畬从小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民为邦本、民为贵的观念深入其心，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老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体恤民情、关注民生与为官清廉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因而爱民的官肯定是清官。徐继畬作为清官，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他始终坚持了自身的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徐继畬作为当年的高官显贵，竟到了如此清贫的地步。像徐继畬这样清廉的官吏，当时非常少见。当前全国普遍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

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其本质和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我们党以人为本思想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有益成分。我们研究徐继畬的爱民品格，就要注重挖掘他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思想启示。

三是要深入研究徐继畬兼容并蓄、见贤思齐的宽广胸怀，着力建设多元共融的和谐文化。徐继畬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高官，之所以具有开放的思想和实践，还在于他有超越一般官员的良好文化心态。对于外来的文化、外来的事物，他不是故步自封，盲目排斥，而是以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拿来研究，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徐继畬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本源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思考。在经济方面，他透过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商贸为本的实质，认识到西方国家强盛的基础是发达的工商业。这种认识高度是对秦汉以来中国一以贯之的“以农为本”传统和“重农抑商”国策的积极反思。在民主政治方面，他对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表示了由衷的赞许，特别是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为美国民主政治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盛赞其“开疆万里”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对“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政治倍加颂扬。在美国特使蒲安臣赠送华盛顿像的仪式上，徐继畬致答谢辞，又这样评价华盛顿：“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徐继畬在文化上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正是他成为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先进人物的重要原因。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但是要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必须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同时要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当前，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看，建设和谐文化非常重要和紧迫，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世界和平秩序都迫切需要和谐文化为其创造良好条件。我们要通过对徐继畬开放思想和文化心态的研究，为我们建设多元

共融的和谐文化提供学理支撑和历史借鉴。

四是要深入研究徐继畬勤学好问、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着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之所以影响巨大，除了内容新颖之外，还在于内容的准确和科学。内容的准确和科学主要得益于作者勤奋学习、不耻下问、深入思考、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务实作风。作者为了编撰这部著作，公务之余，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在这本不足15万字、40多幅图的著作上。为了得到少而珍贵的中文资料，他广泛搜求；为了全面准确了解外面的情况，他同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医生、官员、商人们广泛接触，理智沟通；写作过程中，他运用自己在史地学方面的考证工夫和知识学养，时时对比，反复考证，几十次修改，力求准确完备。经过五年时间，才付梓刊行。从1848年《瀛环志略》第一次出版，到清朝光绪末年，国内先后再版九次，期间日本出版三次。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从中汲取了营养，为推动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进行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在社会快速发展、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信息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徐继畬勤学好问、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务实精神。

五是要深入研究徐继畬与时俱变、敢为人先的创新思维，着力营造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是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准。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和开放实践，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而且引领了时代潮流。他用与时俱变、敢为人先的胆略和勇气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他用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理念审视着中国和世界。他不仅向中国人展现了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世界，而且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首领楷模美国总统华盛顿。他不仅介绍了欧美近代化的政治制度，而且介绍了欧美近代工业、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状况。正如一位英国人所说，徐继畬“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徐继畬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把历史真相和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实际状况告诉国人。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思想、学说和行为必然被保守的社会和官场所不容，他的两次被贬，就都与此有关。当前，我国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关键时期，特别是我们山西思想解放的程度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改革开放比较滞后，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的严重制约，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鼓励人们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努力为推进山西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思想氛围、政策氛围、舆论氛围和文化氛围。徐继畬与时俱变、敢为人先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今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山西是徐继畬的故乡，我们有理由为山西产生过这样一位先进人物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弘扬他先进的思想和精神，为山西和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当然，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研究徐继畬，既要弘扬其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又要看到其局限和不足，在弘扬中继承，在借鉴中学习，提升改革开放的新思维和新形象，增强改革开放的自信心和主动性。

2008年9月

（高建民：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

序二

徐继畬研究的新进展

虞和平

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是2008年10月在太原举行的“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的论文集。据我所知，这次会议是有关徐继畬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于1991年在忻州举行，主题是“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二次于1995年在北京和忻州两地接续举行，主题是“纪念徐继畬诞辰200周年”；第三次于2002年在太原举行，主题是“纪念徐继畬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140周年研讨会”，主要研讨徐继畬在晚清同文馆建设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山西对徐继畬的研究十分重视，会议的主题亦与时俱进，步步推进徐继畬的研究。

与前三次研讨会相比，这次研讨会的规格更高，研讨更加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会议受到了省里领导的重视，在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高建民的指示下，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这标志着徐继畬研讨会议，已从忻州地方性的学术会议上升成省里带有省委和政府行为性质的学术会议，并且与山西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和地方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

第二，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学术档次比较高，研究范围比较广，有不少著名学者受邀赴会，也有一些非历史学的学者参加，而且提交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使研究的方法有所创新，研究的程度有所深化，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

第三，会议在山西省国宾馆——晋祠宾馆举行，这是一所设在山西著名名胜古迹——晋祠旁的五星级宾馆，既有现代化的先进设施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又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浓重的人文气息，使与会代表们在学术研

讨的同时感受到山西的地方历史文化。会后，代表们还前往徐继畬的故乡——五台县参观了徐继畬纪念馆、徐继畬故居和徐继畬墓，看到了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场景，增进了对徐继畬研究的兴趣。

从会议收到的论文和讨论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前进。学术研究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据本人所知，已有的关于徐继畬的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徐继畬生平经历和生活风格的研究；二是关于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版本的研究；三是关于《瀛环志略》写作过程和背景的研究；四是关于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的动机和出发点的研究；五是关于《瀛环志略》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六是关于《瀛环志略》与早期现代化思想启蒙的研究；七是关于《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以及同类著作相比较的研究；八是关于徐继畬与神光寺事件、同文馆等早期洋务活动的研究；九是关于徐继畬与林则徐关系的研究；十是关于徐继畬的诗文作品和文学造诣的研究。自1991年第一次徐继畬研讨会以来，这十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涉及。

这次会议既对上述已有一定研究的十个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研究，还在其他一些方面，特别是研究的视角方面有比较大的开拓和创新。1991年第一次徐继畬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时，阮芳纪先生写了一个序，其中讲到了以后的徐继畬研究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徐继畬为什么能写出《瀛环志略》，与他的职务、工作经历，在东南沿海的任职是不是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如果他还在山西，不去东南沿海地区，能不能写出这样的书来。这也就是关于《瀛环志略》的成因背景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徐继畬差不多同时在广东、福建当督抚、道台的，办过“夷务”的，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也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徐继畬写出了《瀛环志略》而别人没有写出来。这也就是关于徐继畬的个人学识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徐继畬与林则徐的关系问题，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认识差别，有什么个人恩怨，虽有所研究，但比较粗浅，有待深入。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次的讨论中不仅有所深化，而且更加具体化了，提出了新的见解。当然学术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只是比较深化了，这次会议上有文章对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的个人学识问题，以及徐继畬与林则徐的关系问题，做出了不少新的解释。

除此之外，在研究视角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创新之处。第一是显示了全

球史的视野。全球史是现在比较新颖的一种视野，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的领域里，尤其注重全球史的视野已有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问世。这次会议对《瀛环志略》的研究分析引进了全球史的概念，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瀛环志略》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瀛环志略》就具有一定全球史的雏形。通常所说的全球史的概念，主要是指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考察各种文明的交流和互动，最早是英美学者在20世纪下半叶正式提出，并运用于世界史研究的，而160年以前在中国问世的《瀛环志略》里已经有了全球史的某种意识了。《瀛环志略》里面既放弃了中国中心论，更没有西方中心论；不仅介绍西方文明，而且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旨在全面认识世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取长补短。这次会上的有些文章也带有一定的全球史的意识，使研究的视野有所开阔，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二是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研究，比如在区分中外之别方面，从“华夷”概念到“中西”概念之间的转变；在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和划分方面，从“畿服”概念到“瀛环”概念的跨越。徐继畬所处的时代是洋务运动开始初步兴起的时期，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转变是从“夷务”到“洋务”的转变。前不久我写过一篇《从夷务到洋务》的小文，简略考察了从“夷务”概念到“洋务”概念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个从“夷”到“泰西”再到“洋”的逐步转变过程。

从“夷”到“洋”的转变过程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所体现的某些对外概念的变化，在这个概念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中间过渡作用。这个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或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是从地域史的视角来研究。徐继畬在许多地方担任过职务，担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手里有一定的权力，也给地方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会和这个地方发生互动关系。如他在任职的地方做出了什么贡献，对这个地方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地方对他的思想形成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这次讨论会已经涉及了徐继畬与广东、福建、台湾，还有山西的互动关系。

第四是从比较史的角度来研究。对比较史的研究方法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只能是互相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才能进行比较研究，并将这

种比较研究称为影响比较，没有联系的事物则缺乏比较性。但是更多的学者主张平面比较，即有一定可比性的事物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这次会议中有较多的文章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而且影响比较和平面比较两者皆有，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关于《瀛环志略》不同版本的比较，如中国版本与日本版本的比较；同类著作的比较，如《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等书的比较；同类思想认识的比较，如将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论与其前后其他相关评论进行比较；人物之间的比较，从以往的徐继畬与林则徐、魏源的比较，扩展到徐继畬与容闳、梁启超、康有为之间的比较，比较的范围在扩大，比较的层次在深入。

还有一个方面是关于徐继畬的影响和评价。关于徐继畬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问题，尽管已有较多研究，仍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以往的相关研究又有新的开拓和深入。比如西方人士是如何评价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徐继畬一身兼有的开放性与传统性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及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和局限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两重性应该是徐继畬那个时代所有先进人士共有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忽略了他们的两重性，只注意了一个方面，就不免脱离历史事实。

关于徐继畬的历史定位，这次会议有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见解。以前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位是比较机械的，要么是主战派、革命派，要么是投降派、妥协派等等。这次会议上有文章提出，徐继畬不仅是启蒙思想家、政治家，还是外交家、地理学家、教育家，卓越的爱国者、著作家和诗人。文章虽然没有对徐继畬的这诸多“家”进行论述，但显示了徐继畬研究的诸多新领域。这诸多的“家”，也就是说徐继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仅仅从某一个方面的考察是不够的，应该是他有什么作用就说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地位就说什么地位，要从多角度对徐继畬进行考察和研究。不过，这诸多的“家”不可等量齐观，还应该有主次之别。当然从徐继畬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和作用来看，他的历史地位最主要还是一个中国近代开放改革的思想启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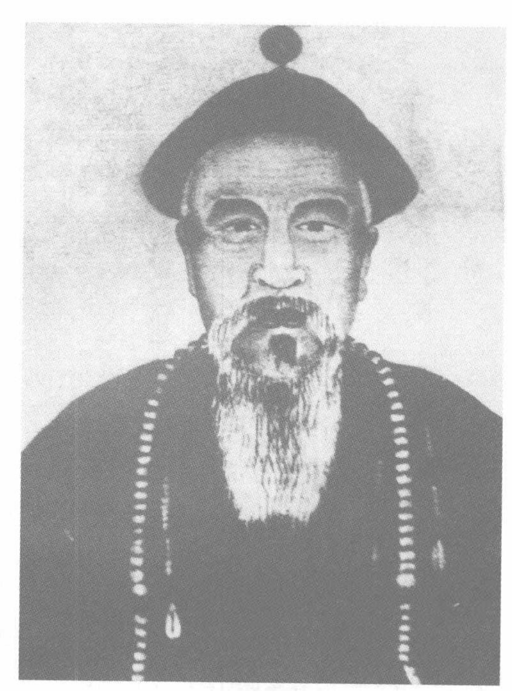
另外，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逐步前进的，不是一个人一步到位可以认识清楚的，对徐继畬及其著作，对中国人认知西方的思想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研究，不是单从徐继畬一个人的身上所能考察清楚的。实际上，这次会议已经涉及到了《瀛环志略》与《海国

图志》之间互相影响的问题，比如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时最初可能参考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初版本，魏源在后来修订《海国图志》时可能也参考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瀛环志略》再修订时可能又借鉴了《海国图志》。这些同类人物及其著作之间互相是有影响的，思想是逐渐推进的，通过互相吸收、互相推进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人的近代世界观。他们这样的互相影响和推进，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形式。我们现在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不可能一步到位，只有互相借鉴和吸收研究成果才能整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观点，对徐继畬研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既不可以片面地因为徐继畬个人有某些先进之见而过于抬高他的历史作用，同样也不要因其有某些缺陷而贬低他的历史地位，而是要把他放在一个时代整体之中进行考察，看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实际地位，这样可能更符合历史的事实。后来，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由总理衙门刻印，那就与其他同类著作不一样了，它成了官定教科书，也是官员的读本了。《瀛环志略》被作为官定读本以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徐继畬作为对近代中国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作为山西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著名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更是山西地方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拍摄一部徐继畬的电视剧，二是设立一个徐继畬的展览馆，三是修复徐继畬的故居，四是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徐继畬的研究。但愿这些建议能产生实际效果，使徐继畬研究工作进一步开拓，使山西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由两面旗帜变成三面旗帜。所谓两面旗帜，主要是指晋商研究和近代山西社会史研究，山西的这两方面研究，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是一面旗帜，祝愿山西的徐继畬研究也能成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影响的一面旗帜。

2009 年 9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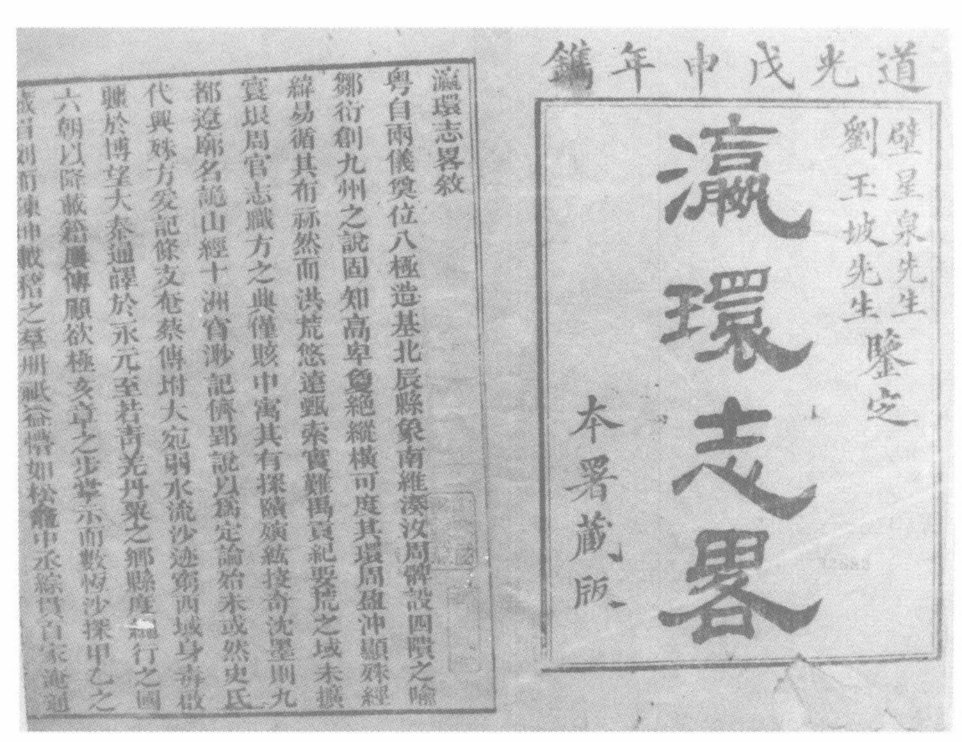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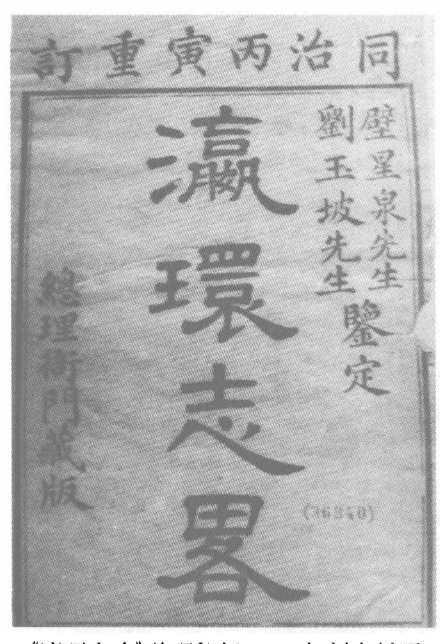
徐继畬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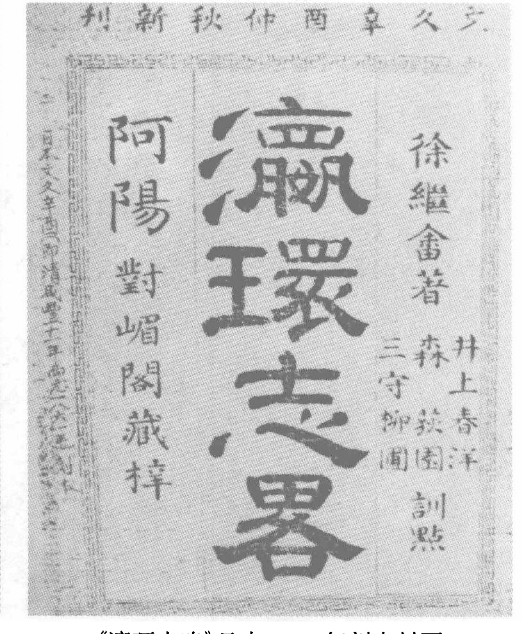
《瀛环志略》初刻本十卷六册封页(应为1848年刻本——编者注)


瀛環志畧敘
粵自兩儀奠位八極造基北辰懸象南維湊汝周髀設圓隅之喻
鄒衍創九州之說固知高卑敻絕縱橫可度其環周盘冲顯殊經
緯易循其布亦然而洪荒悠邈甄索實難禹貢紀要荒之域未擴
寰垠周官志職方之典僅賅中寓其有採賾[illegible]紘接奇沈墨則九
都遼廓名詭山經十洲窅渺記僑鄙說以爲定論殆未或然史氏
代興殊方爰記條支奄蔡傳埘大宛弱水流沙迹窮西域身毒啟
驃於博望大秦通譯於永元至若青羌丹粟之鄉縣度[illegible]行之國
六朝以降載籍屢傳願欲極亥章之步擊示而數恆沙探甲乙之
[illegible]

《瀛环志略》道光戊申年(1848)刻本封页



《瀛环志略》总理衙门 1866 年刻本封页



《瀛环志略》日本 1861 年刻本封页

目　　录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孙丽萍

徐继畬是清朝中晚期任职福建省的封疆大吏，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撰著出版了以平和的心态、宽广的视野、求真的方法、开放的思想，客观认识世界和正视世界发展变化的不朽著作《瀛环志略》。徐继畬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成为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并列的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早以付出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历史人物。本文将从其开放思想的形成、表现及其重要影响等方面，论述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及其启示。

一　博学多闻与仕宦粤闽的实践为徐继畬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思想打下基础

徐继畬开放思想的形成与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徐继畬，山西五台人。生于乾隆六十一年（1795），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生于官宦之家，曾从母亲、堂叔读书，惟影响他最大者仍属其父润第。父子皆进士登科，皆好读群书，博学多闻，皆治陆王之学、皆考注汉书、皆好傅青主学问，相同之处甚多。"① 父子俩人有如此多的相同处，比如皆治陆王之学，皆推崇"知行合一"的认识观和实践观，徐氏父子的处世态度和做人准则由此可知一斑。"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

---

① 陈存恭：《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信约束。在官廉谨。”[1] 从徐继畲的早年经历中，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读书、游学的轨迹。虽然出生偏僻之乡的五台山东冶镇，但青少年时代徐继畲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偏城一隅。出身官宦书香门第，少年聪慧颖悟，特别的求学经历，给了徐继畲独特的人生体验，而且养成用平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不凡气度。徐继畲 6 岁起在母亲续夫人教养下识字；10 岁跟随父亲徐润第进京读书，直到 18 岁应县试、州试，皆中第一。19 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徐继畲少年读书基本是在京城度过，他有着与普通乡里少年不同的读书经历和开阔的眼界。

从举人到进士，徐继畲用了漫长的 13 年。期间，徐继畲辗转河南、顺天、直隶等省求学，也是潜心读书、开阔视野、磨炼意志、丰富阅历的重要阶段，这是当时多数读书人基本没有可能具备的特殊条件。

22 岁时，徐继畲偕夫人随父至河南光州，治学四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堂叔徐寅第（东堂先生）任顺天西路同知，徐继畲随往顺天，这一年他 26 岁；道光二年（1822）冬，徐寅第调任河间知府，28 岁的徐继畲仍跟从读书。“先生勤政经史，不舍昼夜。东堂先生谓曰：汝殆昌黎所谓‘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者。可取周礼‘经牧田野’之义，亦字牧田。”[2] 31 岁时，徐寅第署直隶通永道办理运粮，徐继畲仍从其读书。道光六年（1826）徐继畲 32 岁，考中丙戌正科二甲八十名进士。本科朝考共 265 人，入馆选者 51 名，山西籍唯徐继畲一人。徐继畲各省求学游学的经历正式结束。

徐继畲早期学问偏重史地考略，他的知识结构对日后考证世界地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他在史地学领域建树非凡的重要原因。道光年间，徐继畲在籍丁忧，批注《后汉书》，作《尧都辨》和《晋国初封考》，后来还有《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这些大都属于史地考证的范围。考证功夫对他追根问底世界各国的事情，大有裨益。

“徐继畲是 1826 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过十年，深受安抚政策的主要拟订者穆彰阿的赏识。他在战争时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台，后来于 1842 年春被任命为广州按察使……徐继畲于 1843 年调回福建，因此利用与领事及传教士正式接触的机会而获得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3] 徐继畲

---

① 《徐继畲传》，《清史稿》第 422 卷。

②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9 页。

③ ［美］德雷克：《徐继畲 1848 年的地理学》，转引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3 页。

作为地方要员，是从道光十七年（1837）秋调升福建延建邵道员开始，此前他担任过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陕西道御史等职，有整肃吏治、政体崇简等奏章被当朝关注。徐继畬在任上做了大量清除盗匪、安定百姓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期间他与闽浙总督刘韵珂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刘中丞屡召晋省，多所垂询，亦有建议。”[①] 后来在福建巡抚任上，他搜求考证世界各国风物地志，探求西方文明的制度兴衰，也是基于这种考证兴趣、功力及其探究事物本源的个人禀赋。

徐继畬在福建沿海开始了生命中最光辉的一个时期。道光十九年七月，徐继畬调任福建汀漳龙道员。为防止英军进省，徐继畬督率漳州士民“采集大木排椿塞镇门各港口，调集民兵扼险固守，敌知有备，即行退去”[②]。后来徐继畬致乡人赵盘文等人信中称：“上年粤东查办烟土，焚其鸦片两万箱，遂启兵端……圣主意在怀柔，褫两督之职（两广总督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命琦相（琦善）赴粤查办。琦相为逆夷所愚弄，弛备求和。……又攻陷虎门，兵临省会，琦相逮问下狱……不料祸变之骤移于闽、浙。”[③]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邓廷桢、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问斩。七月英军攻陷厦门。此时，徐继畬身为汀漳龙道台，“自厦门失守以后，则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劳悴不堪言状。……逆夷叵测，事无了期，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以八字自坚，曰：‘竭力尽心，听天由命’，如是而已”[④]。言为心声，行为心迹。道光二十二年，徐继畬一年得到了三次升迁，上司赏识和朝廷的器重由此可见。在泉州兼任粮台事时，钦差怡良“待以国士，仍以清廉明达有守有为列之荐牍”[⑤]。五月，授广东按察使，九月再迁福建布政使。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出于在新口岸建立新秩序的需要，时为钦差大臣的宗室耆英为朝廷物色了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干的官吏，耆英选才的标准是：这些官吏既能博得朝廷的信任，也能得到外国人的信任；既能忠诚耆英个人，也能与地方势力合作共事。在厦门的新式人物选择了福建省布政使徐继畬。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继畬移驻厦门，

---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70 页。
② 同上书，第 72 页。
③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0 页。
④ 同上书，第 652 页。
⑤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81 页。

兼办通商事务，公事之余从事著述。这一年四月，刘韵珂任闽浙总督，徐继畬在闽理政抚民得心应手。第二年七月，他完成了《瀛环志略》的初期蓝本《瀛环考略》。

徐继畬是一位品行端方、学养深厚的学者型官员，也是那个时代对外事比较熟悉的清朝少数高官之一。他对世界的认识，他的开放思想，源于渊博的学识和他仕宦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的实践。鸦片战争以后，沿海的官员大多难以适应由于西方人的到来而正在变化的时局和复杂的环境。道光二十五年，福建巡抚频频易人，先是刘鸿翱在二月因病免职，由陕西巡抚惠吉接任；惠吉还未到任，四月又调至云南巡抚，云南巡抚吴其浚接任福建巡抚；八月，吴其浚任山西巡抚，由云南巡抚郑祖琛任福建巡抚。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徐继畬任广西巡抚，未及赴任，又调福建巡抚，郑祖琛改任广西。[①] 对徐继畬的改授，是出于沿海外事需要作出的一次人事调整，也是晚清朝廷的一次正确选择。在巡抚任上，徐继畬抗英的态度明确而坚决，对英人准备采购台湾鸡笼山煤炭以备火轮船之用一事，徐继畬坚决防堵私挖煤炭、与外国勾结的损害国家利益行为。

徐继畬多年在闽粤地区为官，还曾两度暂署闽浙总督，给他了解世界大势和各国情况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可能，当时广东、福建正处于19世纪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前沿。道光二十八年（1848），身为福建巡抚的徐继畬以系统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拓荒之作《瀛环志略》问世，此为徐继畬一生对中国近代化的最大贡献。

二　超越传统的羁绊和束缚，徐继畬以平和的心态客观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徐继畬无疑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人，其思想的开放程度，远远在当时的清朝官员之上。徐继畬对世界的了解熟悉程度，甚至使一些外国人感到吃惊。1845年12月至1846年1月访问福州的教会传教士协会的乔治·史密斯记述："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

①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5—176页。

要进步得多。”史密斯谈到了徐继畬对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熟悉程度：“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时的一位下属官员赠送的。”[①] 徐继畬开始突破只重技术层面的表象思考，向着社会制度文明体制的深度探索。也可以说，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并不局限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制夷”，他通过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介绍，让国人能够“知己知彼”，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世界，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世界文化文明，减少朝廷及国民在对外事务中的盲目性；他主张与各国之间进行平等贸易往来，主张民主政治，主张平等外交等等。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表现在他明确提出“以商制夷”的主张。道光三十年（1850），徐继畬在《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称：英国人远在六七万里之外，难于制伏；而我国有七千余里海疆，难于防守。但是，“彼以贸易为生……即使空我海滨数城，割而与之，彼亦不敢居不敢守也，而一绝其贸易，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以终日之势。”[②] 他看到了列强各国不断实施军事侵略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在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对外贸易，因此徐继畬开始主张“以商制夷”的策略，即用经济手段来制裁列强入侵者。当国人对西方人用简单方式驱逐之时，徐继畬认为：“该夷果有蠢动之意，即使虚张声势，亦必须调集兵船，香港距广州密迩，且有素不同心之花旗各国，信息易通，一得消息，应如何密谕洋商，停止贸易，以伐敌谋。”[③] 把开通或停止对外贸易视为克敌制胜之关键所在，无疑表现出徐继畬超凡的见地和过人的胆识。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表现在他破除了天朝中心的传统观念，客观地认识世界的变化。徐继畬与来华的各国外交官员、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各阶层人士频繁接触，“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

---

① 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伦敦1847。转引自［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②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7—118页。

③ 同上书，第119—120页。

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①] 可见《瀛环志略》是熔铸作者多年心血的著述，并非赶潮流之作。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谈到1840—1895年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时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因为徐继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他每天写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②]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某些方面超过了魏源，最明显的标志是《瀛环志略》除了个别地方引用他人之语外，基本不用“夷”字指向西方各国，这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够做得到，这一点也是许多学者褒扬徐继畬胜过魏源的地方，表明其主张平等外交、主动接受西方文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还表现在他一生保持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精神和开放热情。当许多清朝大员们麻木不仁深闭固拒的时候，只有极少数清醒的中国人，能够了解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徐继畬是其中的一人。同治二年（1863），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到北京同文馆任职，同治七年春，“同文馆刻印丁韪良介绍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格物入门》，徐继畬热情为此书作序。序中还回忆起当年与雅裨理的交往，说那时急于了解世界历史、地理，来不及学习自然科学。这次读了《格物入门》，知道书中讲的道理闻所未闻，都能见诸实事”[③]。徐继畬在70岁的高龄时，仍然对新的知识新的学科入迷。能否接受新鲜事物，也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开放程度的试金石。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亚、非、欧、美几大洲几十个国家的

---

① 徐继畬：《瀛环志略·自序》，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173页。

③ ［美］龙夫威：《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地理、历史概况，介绍西方史地人文的翔实方面有突出优点，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启蒙作用不容低估。他盛赞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创始人华盛顿"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略过人"，"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① 这些精辟的开放言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瀛环志略》出版后被多次翻刻，徐继畬的影响随着二三十年后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等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心事件而被人瞩目，徐继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引人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瀛环志略》除了有道光戊申（1848）年福建官署刻本之外，还有十种：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刻本，同治十二年（1873）掞云楼刻本，光绪六年（1880）楚南周鲲刻本，光绪十年（1884）京都琉璃厂会经堂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鸿宾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宝文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扫叶山房铅印本与新化三味书室校刊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有用书斋铅印本与京都博文斋石印本。② 更多人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从50卷扩展为100卷的过程中，吸收了《瀛环志略》的观点和资料。"在介绍美国的情况时，收录了《瀛环志略》的有关部分"③，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说过见《瀛环志略》地球图，方知万国之故和地球之理。梁启超也称："在沪始见《瀛环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④ 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初读《瀛环志略》，感到作者对外国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处，直到光绪二年（1876）出使英国，方才领悟到徐继畬思想的开放和对国人认识世界的超越之处："'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诸乎？'……松龛先生先机敏识，宏开风气，可称为维新先觉之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② 居蜜：《从山西到华盛顿》，2008年太原"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提交论文。

③ 章鸣九：《〈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7页。

士。"[①] 也就是说，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三 转型时期两种思维、两种方法的不同结局及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示

思维与方法的因果关系最为直接。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缺乏了解，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道光三十年（1850）发生的福州神光寺事件，引发了国人驱逐洋人出城的轩然大波，也成为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屡遭弹劾并相继离职的重要原因。徐继畬主张稳妥外交，主张与洋人交涉要镇静主事，张皇为戒，他在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奉谕密防英夷疏》献出福州城防"外松内紧"之计，奏章称："惟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办理一涉张皇，不特居民惊扰，且虑夷人猜疑，肇启衅端，反多未便，只可暗中筹划，外面仍寂然无事。"[②]《六月报英人租住神光寺并采买台湾煤炭疏》称："须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至令别生枝节。……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等语。"[③] 清朝军队在沿海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地方因列强入侵不断冲突，民情激愤，舆论哗然，广东、福建等地方官民大多采取了简单排斥和驱赶之策。林则徐等积极主战的朝廷大员成为民情的主宰，徐继畬等主张缓和外交的官员，则被视为妥协甚至是投降。在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待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态度截然不同。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历来存在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和为开展对华自由贸易两种不同的观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双重动因说，并指出前者是一段时间内起重大作用的直接因素，后者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是基本动因。在论及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的态度时，很长时间内一直有严禁派和弛禁派之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光皇帝始终主张严禁鸦片，清政府内部只

---

① 《张其昀序》，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5页。

③ 同上书，第125页。

有禁烟的策略之别，而无弛禁派和严禁派之分；统治集团中也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因此不应简单地把主张和谈视为投降，并以此划分抵抗派和投降派。[①] 但在当时，民情舆情对提倡缓和外交政策的官员十分不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这句话源自林则徐之口，对林、徐二人报效国家的态度同样适用。徐继畬与林则徐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两人的遭遇大不相同。对徐继畬来说，道光三十年是人生的分水岭。这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即位，朝廷人事问题变得更加诡谲复杂，他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可谓是因人失势，又因事失时。[②] 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震荡中，福建、广东等地处于两种制度两种文明激烈冲突的前沿地带，徐继畬本人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的支撑，同时也具有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宽广胸怀，他是廉官、清官、忠臣，但不是能臣、悍臣、权臣，简言之，徐继畬不是时代剧变时期那种呼风唤雨及时转向的人物。

徐继畬是一位真诚的学者型官员。徐继畬对外部世界极为关注，并且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目的在于反观中国所处的地位，知晓天下大势，应对世界可能的变局。他倡导变革，“因为他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③]。这种不幸，是徐继畬个人命运的不幸，也是泱泱中华清朝帝国的不幸。徐继畬处理与各国的事务没有附和当时的主政者，他被革职的深层次原因是朝廷对其在沿海继续任职不满意、不放心。尤其是《瀛环志略》出版后，“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但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所有，直为寰宇第一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④] 近代中国极有影响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致左宗棠信中称：“往时徐松龛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

---

① 王建朗、郦永庆：《中外关系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6—257 页。

② 在方闻先生为徐继畬所作年谱中，1850 年分量最重，年谱总页码 292 页，从 109 页到 183 页均为道光三十年，占《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的 1/4。

③ 《德雷克自序》，[美] 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

④ 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17 页。

归自上海，亦震诧之。”[①] 对于一些主张武力驱逐洋人出国门的人来说，徐继畬的革职返乡正是他们期望中的事情。

徐继畬走向世界舞台之际，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当时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做好了去职的思想准备。庚戌九月给本家兄长服先的信中称：“前所云外边客房，能于明年春天盖起最好（能盖五间为妙），平房即好，台基须高些，但以进深深些，有歇厂为妙（东西若能盖小房数间以为佃户长工停歇之所更妙）。其余一切诸事，吾兄酌度为之。”信中还说回乡后“至多停歇二年即赴介休设馆。（闻）义安村之十方院，现尚完好。以此为老学究藏拙之地，亦甚妙也。”[②] 这位中国近代开放思想的先驱人物，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咸丰元年十月十日，徐继畬致家人书：“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县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于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张贴，声势汹汹，几致酿成大事。……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玉坡制军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犬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③] 艰难之状，非寻常可比。“身为满清封疆大员的徐继畬其识见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他的种种观点不仅是对‘皇权神圣’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挑战标志着无论多么痛苦，中国人的世界观即将开始改变。”[④] 徐继畬个人的命运，也预示了清王朝未来几十年经历了大的内忧外患、终至覆灭的命运。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当先进的开放的思想缺乏实施基础时，只能是空想。从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看：一是徐继畬没有取得最高统治者的理解，他盛赞华盛顿开疆万里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他称赞美利坚合众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恰恰为封建政

① 《曾国藩全集》第21卷，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22页。
②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
③ 同上书，第705—706页。
④ 雷颐：《徐继畬的命运》，《经济观察报》2007年11月5日。

治体制无法包容，为封建官僚所不容。二是在同僚中徐继畬也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他没有得到同僚的援助，却有不少持不同政见者的冷嘲和反对，在神光寺事件中也只有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少数人支持，而刘韵珂也在关键时候，托病不出。徐继畬几乎是在孤身奋战，直到最后被迫退出政坛，返乡设帐教书，在这场变革观念的认识世界过程中付出了宝贵的政治生命。三是徐继畬与当时的民众几乎无法沟通，两位英人入住福州神光寺，有违当地的舆情民意。中国跨入近代社会后便处于屈辱的地位，使得人们对列强的侵略、对清朝官员的妥协自然地产生出憎恨情绪，而当时一点儿小事情也会激起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大波澜。徐继畬的开缺，就是政治波澜中先驱者的牺牲。

启示二：历史人物的际遇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幸与不幸，而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幸与不幸。徐继畬的个人命运，与清朝统治集团的人事更迭关系极大。道光年间，徐继畬由道员至巡抚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他被赏识重用，仕途上平步青云。咸丰初年，徐继畬失去了朝廷的信任。在重大人事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徐继畬恰恰就是朝廷人事关系调整中一个受害很深很重的悲剧人物。结果是徐继畬的政治理想人为地被迫中断。徐继畬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也仅仅止于与外国领事、传教士、医生等人的接触、介绍，或者是由他们带来的外国书籍、杂志或地图，而没有自己亲身感受西方文明大环境的经历，从这一点来看，徐继畬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变革的认识深度上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①

启示三：社会变革时期，应该允许多种思维方法多种视角看待事物，才能更加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徐继畬的经历和遭遇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爱国的形式不局限于一种模式，而为国效力的途径和办法也有多种。“如与林则徐同样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徐继畬，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和林则徐都想驱逐英人出城，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徐就被视为

---

①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56 页。

投降派人物，这是不公正的。”[①] 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采取非白即黑的简单定式思维于事无补，于国无益，这也是社会变革转型时期需要借鉴的。开放的思想对于一个人客观认识自我认识世界非常重要，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包容开放的风气、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同样重要。

（孙丽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① 王建朗、郦永庆：《中外关系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①]

熊月之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是人所熟知的。为了讨论的方便，我这里还是有必要将他的评论引录如下：

>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②]

这段话见于徐继畬《瀛寰志略》的稿本《瀛寰考略》（1844）。日后《瀛寰志略》成书时，保留了这段话，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徐继畬还在另外一处写道：

>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③]

---

① 学术界关于华盛顿在近代中国的研究成果有：艾周昌的《华盛顿与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俞旦初的《美国独立史在近代中国的介绍与影响》，《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杨玉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也有所述及。

② 徐继畬：《瀛寰考略》卷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第210页。

③ 徐继畬：《瀛寰志略》第9卷，《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这两段话后来被美国传教士拼接在一起，刻在石碑上，砌入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

这两段话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徐继畬的华盛顿论。

先看徐继畬之前的华盛顿论。

对华盛顿进行评价，不自徐继畬始。

美国在1776年成立，八年以后，中美两国有了民间交往。1784年美国轮船“中国皇后”号来华，是为中美民间交往的开始。以后，中国政府和有关人士开始注意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家。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美国来华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并谈到美国没有国主，头人四年一换：“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①] 这是迄今所见中文资料中，中国官员第一次注意到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但是，没有提到华盛顿的名字。

1819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所写的《地理便童略传》中，对美国政体有所介绍，内称“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②]。书中也没有提到华盛顿名字。

1820年至1821年间，英国传教士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全地万国纪略》，介绍了美国的情况：“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为十三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国设政，而不肯再服英国。”这个国家虽为新国，但土地广袤，其民人年年繁殖加增，“日后此国谅必为亚默利加全地之最大者。盖其人有智有力，其今所有之地为宽大，好为耕织，又盛产各物，又其海边之港为多”[③]。这份杂志还是没有提到华盛顿。

直到1830年代，华盛顿的名字才开始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

1837年，由传教士郭实腊等人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杂志，第一次明确述及华盛顿。道光丁酉年五月（1837年6月），杂志在一篇题为《论》的论说中，介绍美国情况，称其国行宽政，以仁义建国，民人富

---

① 《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 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1819年版，第17页。

③ 《论亚默利加列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7卷《致瑞五园廉访书》，道光元年。

庶，国势强盛，“教授振举国者之君子，称华盛屯。此英杰怀尧舜之德，领国兵攻敌，令国民雍睦，尽心竭力，致救其民也。自从拯援国释放民者，不弄权而归庄安生矣”①。文中将华盛顿译为“华盛屯”，赞誉他有尧舜之德，能解救人民，不贪恋权位。

第二次，道光戊戌年正月（1838 年 2 月），杂志刊载一篇题为《华盛顿言行最略》的文字，九百多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华盛顿的事功、道德与历史地位。内称“经纶济世之才，宽仁清德遍施，忠义两全之烈士中，华盛顿独立无比”。文章介绍华盛顿少年时，虽学问未出人头上，然见识历练，才能高大，最有胆量，雄烈过人。在独立战争中，华盛顿“不干民之誉，而真推民之兴，不自贪俸禄，宁收清贫，并无害人利己矣”。美国建国后，华盛顿“虽势浩大，威震天下，弄权在掌握之中，为所得为，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竭心忠诚，昼夜专务。良民知华盛顿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故立之为国之首领主。华虽愿避静潜修，悦听民之声，在位八年，治国如运于掌，政情利达，百姓动履亨嘉，其名声高著，流芳百世”②。

1838 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署名“高理文”）在新加坡用中文出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各方面的情况，是鸦片战争以前最为系统介绍美国的中文著作。书中对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作了比较具体而详细的介绍，言及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但述而不论：

> 时国泰民安，必须立首领，设国法，使领邦知而不正视，群庶畏而勉恪遵，此要务也。故乾隆五十三年春，有各省衿耆至费拉地费议其事，共推华盛顿为首。议四月毕，及散归，各执所议之条款回省，告于省内之人，再议一年，复至费拉地费再议，然后定。国法虽定，尚未有文武员弁，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文武各员，亦议定焉。首领之名由是而起。

---

① 《论亚默利加列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五月（语句颇不通顺，原文如此）。

② 《华盛顿言行最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正月（“最”疑为“撮”之误，原文如此）。

道光二十四年（1844），梁廷枏主要根据《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写的《合省国说》，述及华盛顿史迹，特别赞赏华盛顿的品德："为人公正自矢志，不事威福，不辞劳瘁。既罢，常以暇日率官绅人士与农并力耕作，国中人传为美谈。卒之日，举国伤悼，思其保障功，群尊之曰国父。"①

这些就是徐继畬之前中文出版物中关于华盛顿评价的主要内容。

以徐继畬的评价，与这些介绍、评论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徐继畬是将华盛顿的事功品德置于中国文化评价系统中，既重视其私德即个人素质，盛称其勇、雄，将其与陈胜、吴广、曹操、刘备相比，更突出其公德即对国家与历史的贡献，盛称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开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将其与尧舜相提并论，即所谓三代之遗意；既重视华盛顿的武功，也强调其文治，所谓治国崇让善俗。这样，内圣外王，华盛顿成为雄绝千古的圣人。徐继畬从世界范围与人类历史两个维度，从事功与道德两个方面，予华盛顿以无比崇高的评价。其实，这样的圣人，不只是西方，就是在中国，也只有传说中的三代尧舜庶几近之，其他历代所谓圣君仁帝，无一能及。但是，徐继畬还是笔下留有余地，将其限制在西方范围之内，说是"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以徐继畬的华盛顿与上述诸人对华盛顿的评论相比较，可以看出，《华盛顿言行最略》一文对华盛顿的评价，与徐继畬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从徐继畬写《瀛寰考略》所用"兀兴腾"，到《瀛寰志略》定名"华盛顿"，可以推测，他在写《瀛寰考略》时，并没有见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载的《华盛顿言行最略》。"兀兴腾"的读音，比较接近用北方官话读 Washington 的声音，而"华盛顿"则接近用广东话读 Washington 的声音，但"华盛顿"从字面上看比"兀兴腾"更为雅致，日后"华盛顿"成为定译，这是译名雅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是他在无所依傍、无所继承、无所参考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这反映了他的高见卓识。

再看徐继畬之后的华盛顿论。

徐继畬之后，中国不断有人评论华盛顿，有的继承、演绎了徐的评论，有的发展、深化了徐的评论。

稍后于徐继畬，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绝口称赞华盛顿开创

---

① 梁廷枏：《合省国说》，《海国四说》，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80 页。

的美国民主制度：

>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①

魏源还称赞美国在处理与英、法关系方面的“智”，在经济方面的“富”，对华关系上的“谊”。魏源认为，仅设统领、不设国王、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垂奕世而无弊”。魏源的评论，所谓武、智、公、周、富、谊，较之徐继畬的评论更为细致一些，但总体上没有超出徐继畬的范围。

稍后于魏源，上海文人蒋敦复写过一篇《华盛顿传》，称颂华盛顿：

> （合众国成）华盛顿复慨然辞众，谢兵权，归田里。各部酋长、诸将校军士、百姓咸免冠额首而前曰：大王功德巍巍，群臣愿奉大王为吾国主。乃大诰于众曰：有国而传子孙，私也；权重而久居之，乱之基也。其罢帝号，勿传世，勿终身执国柄，分建列邦。邦之百姓，推择一人统其众，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称）。众伯勒格斯中推择一人为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然必与众会议乃成，一人不能独占威福，四载一易。大众请留，更历四载，必易。既及英平，思与民休息，乃下令曰：继自今以往，如有贪利忘义，削民膏、残民命者，与吾民共诛殛之毋赦。当是时，人和年丰，化行俗美，华盛顿名赫赫，至今称道弗衰云。②

以蒋敦复的议论，与徐继畬、魏源相比，除了文字上的不同，意思完

---

① 魏源：《海国图志》（100 卷本），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 卷。

② 蒋敦复：《华盛顿传》，《啸古堂文集》第 5 卷，同治十年刊本，第 6—7 页。

全一样。

1874 年，李善兰为日本人所译《米利坚志》作序，基本上是演绎徐继畬的评价：

> 夫米利坚州者，昔荆榛遍地，野蛮杂处，今者文物声名，冠于地球，谁之功也？自科伦布创觅新地，西班亚英法诸国之人继之，西州之人来者日众，疆土日辟，分为数十邦，大半为英之属地。既而苦英之虐政，于是十三邦会议自立，不奉英命。英以兵来，则共推华盛顿到大帅以拒之，连战数年，英与之和，国乃立公会，议立大统领，所谓伯理玺天德者也。定例四年一易，传贤不传子，令通国公举其人，群推华盛顿。四年期满，欲避位，举国共留之，又四年，卒让副统领而去，遂为永制，至今百余年未有传子者。呜呼，华盛顿可谓非常之人矣！……华盛顿勘定大乱，勋绩甚伟，而不自满假能，一遵公议，首先避位，以为永法，使米国长享太平，日盛日强，西州诸大国俱惮而重之。呜呼，此真非常之人始能成此非常之功也。试考地球万国，自古及今，除中国尧舜之外，有能行此者乎？[①]

《瀛寰志略》问世以后，影响不断扩大，蒋敦复、李善兰等人很可能都读过《瀛寰志略》。

1879 年 5 月 17 日《万国公报》第 539 卷载文《华盛顿肇立美国》，称“美国有民主以顿为始”。

1881 年，上海出版的《画图新报》第 4 期，载华盛顿画像与《华盛顿小传》，小传内容采自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文末有简短评论：“呜呼！华盛顿勘定大乱，厥功甚伟，而不自满，首先避位，使美国常享太平，各大国皆惮而敬之，顿亦人杰。”

1886 年，黎汝谦与蔡国昭合译的《华盛顿全传》出版[②]。书凡 8 卷，

---

① 格坚勃斯原本，冈千仞、河野通之同译：《米利坚志》，明治六年光启社、博闻社刊行。

② 黎汝谦（1852—1909），字受生，贵州遵义人，著名外交家黎庶昌之侄子。出身世代书香之家，幼时酷爱读书，光绪元年举人。1882 年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充神户领事。1884 年回国，寓上海，与李经方交游，情谊至厚。1887 年随驻日本使黎庶昌再次出使日本，任横滨领事。三年后任满回国，以知府分发广东，任财务提调等职。使日期间，他与蔡国昭合译了《华盛顿全传》，是早期介绍华盛顿生平最为翔实的著作。

原作者洱汾（欧文）·华盛顿（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是美国著名作家，有“美国文学之父”之誉，《华盛顿全传》（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是他在长期调查研究基础上精心撰写的力作，110 多万字，皇皇巨著，1859 年出版[①]。黎汝谦在日本神户担任领事期间，读到《华盛顿全传》，很为佩服，乃嘱领事馆译员蔡国昭将其翻译出来，并亲为润色。此书出版以后，很受学界重视，对于传播华盛顿生平事迹，影响很大。戊戌维新期间，时务报馆又将其排印重版，名《华盛顿传》。但是，黎汝谦与蔡国昭对华盛顿没有发表自己的评论。

1890 年 11 月，《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

1892 年 6 月 6 日，《申报》刊载《美利坚国考略》，内对华盛顿历史功绩有所评价，称“华盛顿既得国，不欲私为己有，乃自立为民主之国，称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每四年满任，任满或可再留，然亦不得过八年之限。其选举总统也，令民人各举乡里之有声望者，书其姓名，纳诸柜，阅日启柜出之，立所举最多者”。

1895 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述及华盛顿，对华盛顿为何不称帝而实行民主制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世谓华盛顿创西国民主之局，非也。”他列举欧洲历史上希腊雅典民主等事例，说明民主制度并非华盛顿首创。在华盛顿之前 1700 年，屋大维已有“十年让位”之定例。即使是美人叛英自立之议，也不是华盛顿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宋恕强调，“纵观西国英雄，如法之拿破仑，英之格朗空（即克伦威尔——引者），其初皆起于民主党，及功成名立，仍谋世袭，独华盛顿坚拒诸将奉为皇帝世袭之请，异矣”[②]。宋恕仍对华盛顿表示崇高的敬意。1896 年，他在上海以《华盛顿颂》为题，命学生作文。[③]

1897 年，章太炎在一篇文章里，称赞华盛顿“于不毛之地，剪除榛薄，始奠天地，其功若女娲、燧人，杀黑龙而积芦灰也。当斯时，民非斯

① 此书有新译本，为李瑞林、宋勃生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 年版，书名也是《华盛顿全传》。唯译者在后记中称此书“一直没有中译本”，当系不知道一百多年前已有中译本问世。

② 宋恕：《六字课斋津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75 页。

③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689 页。

人固无所戴矣。斯人者出而令而创民主，民固无所竞矣"①。

1897 年出版的《万国分类时务大成》，介绍各国国君之后，按语中写到华盛顿，并比较华盛顿与其他美国名人之历史地位：

> 美自自主以来，其总统之著名者惟华盛顿、临良、格兰脱三人，华盛顿为创业之君，其功尤大，临良、格兰脱为中兴之主，救平南北花旗之乱，其功在北花旗。又闻当南北花旗争战时，南花旗之主谋者为爹矮士，其才足与临良、格兰脱颉颃，惜粮饷不充，致势不敌，未可以成败论人也。②

1898 年，福建人黄乃裳为美国人编的《大美国史略》作序，特别强调华盛顿创立的制度在全世界的意义，认为："一时所立国制，下令人民共商可否而后行，此固天下万国所无，而美国独有也。于是以征伐得天下之风先于南北美洲绝其迹，而步美国后尘者，或立为民主，或改为民主，计美欧两洲今已二十余国，且变君主为君民共主，遍欧、非、澳皆是，要皆华盛顿之体天立极，有以树厥风声耳。"黄乃裳认为，华盛顿开创的民主制度，不光对于美国、美洲，对于欧洲，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

> 然则天生华盛顿非为英生一劲敌，实为美洲数千万生灵，及如许族类土人黑人，生一仁明英武之主，并为欧、亚、非、澳诸洲，生一出类拔萃者，挽回万国运会，以复于唐虞揖让之天，使人人各得其自主之乐，而不再闻苛政暴敛之苦！不然，何以在位仅八年，举地球为之震动耶！且继君美之二十三主，何以皆能仰体其德意，百年之间，拓地至四十五邦，俾其国蒸蒸日上，自政俗、学校、制造、矿化诸大端，度越欧洲，而震今烁古耶！③

---

① 章太炎：《变法箴言》，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1 页。

② 《万国分类时务大成》第 8 卷《各国国君》。《万国分类时务大成》由金匮钱丰（字颐仙）选辑，长安高味中云翘参订，武陵谢晋封校字，黄自元署，前有丹徒张蕴玉序言（序言作于光绪二十三年秋七月），光绪二十三年申江袖海山房石印。

③ 黄乃裳：《大美国史略序》，转引自蔚利高《大美国史略》，福州美华书局 1899 年版。

1902年编就的甘韩《经世文新编续集》，收有一篇《华盛顿布伦士维廉合论》，将华盛顿事功与普鲁士的布伦士维廉相比，认为华盛顿的成功条件尤为困难，“华盛顿者资兼文武，发于畎亩之中，初举度地官，终为大统领，与英血战八年，备尝艰苦，终致美为自主之国”。华盛顿面临的形势是强英日侵，将帅多叛，但最后立伟勋、开大业，全国富强，四邻震羡，“华盛顿不诚旷世之伟人哉！”

1902年，华盛顿事迹被写入小学教科书：

> 华盛顿者，美利坚之总统也。美立国至今才百年，百年以前，美为英国属地，英待其民，甚为暴虐，华盛顿创离英独立之说，举兵与英人抗，英不能敌，许其独立。华盛顿既为美君，不传位于己子，而使国人公举才能之士，三年任满，则复举而代之，名曰总统，又曰民主。①

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日本学者福山义春著、中国学者汤济沧翻译的《华盛顿传》，将华盛顿评价推到一个新的境界。其特点，一是将华盛顿放在更加全世界的范围内来评论，特别是将华盛顿与拿破仑相比，远在拿破仑之上；二是突出华盛顿个人素质中的过人之处，有些近于神话：

> 拿破仑与华盛顿，皆近世史中之大伟人，一则牺牲己身，而造美国千载之基础；一则席卷欧洲之天地，而唱霸于一时；一则功成名遂而退，一则身败名裂，死于一荒岛之中，而为世人所痛惜。盖二人之成败虽不同，而为绝世之事业则一而已。……虽然，以华盛顿与拿破仑较，则其境遇、其性质，皆绝然不同。拿破仑则乘风云之际会，顺时势之潮流，而希己之光荣。华盛顿独反对此定例之潮流，立于逆境，而尊重所以为国家为人类之正义公道以成事，未尝顾一身之光荣，故一以气魄之大称，一以正义博爱之大称，一如风雨之摇山谷，海波澎湃，浩无边际，一如春日和煦，天地清明，群羊嬉嬉而食春草，孰大孰小，又岂容判其径庭哉！
>
> 翻阅古今东西之历史，按所谓英雄豪杰之生涯，其成就大业，名

① 《文话便读》，见《便蒙丛书初二集》，苏州开智书室1902年版，第一百课。

辉千载者，不仅才学识量胆略之非凡也，必其富于天真烂漫，有不欺己不欺人之性格，则一朝焕发其至诚之灵气，可奋然蹶然以从事矣。彼华盛顿者，惟见其皇天赋与我成就伟业之能力，则不敢放失，举世托我于成就伟业之大任，则不敢有负，夙夜孜孜，无或少懈。……是故世所谓英雄豪杰之士，成就大业，垂名竹帛者，必不仅才学识量胆略之非凡也，必其天真烂漫、不欺己不欺人之性质，灼灼于胸中，有恻隐之心念，有献身之精神，始可制活机而成绝世之事业。征之史册，昭昭然矣。故彼一生中最啧啧于人口者，在公正之目的，纯洁之手段而已。至于政治家之诡计，彼未尝一为之也。①

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论》中的《华盛顿论》，将近代中国华盛顿论推到顶峰，将华盛顿与近代诸多英雄豪杰相比，并将其美德与中国古代名人相比，认为华盛顿不但在海外是第一流人物，远远超过拿破仑、彼得大帝、格兰特、俾斯麦，与中国古代名人行事相比也很杰出：

尝阅佐治华盛顿传，不禁为之踌躇满志、慷慨击节曰：如华盛顿者，殆海外之第一流人乎？何气度之远、仁爱之深，与我古名人相似！今人之谈海外豪杰者，若拿坡仑、若大彼得、若格兰脱、若必士麻克，皆啧啧人口，传诵勿稍衰，然大都鹰瞵虎视，强忍悍鸷，奋发有余，涵养不足，求其和平温厚，能泽我中土诗书之气者，盖百不获一。然则华盛顿者，非海外之第一流人乎！华盛顿之才之学，战功之懋，见机之决，俱高出当代诸人之上，而其气度之远，仁爱之深，则又非大彼得辈所能梦见者矣。猜忌之私，非甚盛德，不能无也，而华盛顿与毕辣笃该利吾辈，终不忍以私嫌误国事，其殆相如廉颇乎！惜二将之非其人也，以杀示威，制军阃者类然。华盛顿时以生民为念，其与我白起、庞涓之流，仁暴盖悬殊矣，直曹彬之亚也。身经三十七战，论功行赏，常若歉然，殆大树将军邪！不然，何念之下也。虽有挫折，不损其气，卒以转败而为功，殆孟明霸西戎、范蠡报会稽矣！其在军也，遍览名胜图画自娱，大敌当前，好整以暇，其犹有缓带轻

① ［日］福山义春著，汤济沧译：《华盛顿传》，开明书店光绪二十九年版。封面作《华盛顿》，正文作《华盛顿传》。

裘、雅歌投壶之遗致哉！迨至再辞总统，逊位殷勤，名立功成，急流勇退，则揆诸隐菅菟裘，目夷避位，殆又过之。呜呼，气度如此，仁爱如此，夫岂彼得、拿坡仑、格兰脱、必士麻克诸人所能同年语哉！为海外第一流人，所以与我古名人之行事往往相似云。[①]

华盛顿是彪炳史册的一代伟人，也是一个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由不同人群、按不同需要反复解读的文化符号。反对压迫，反对苛政，追求自由，开创民主，不恋权位，废除专制，英勇果敢，坚强不屈，宽厚待民，诚恳待人，严于律己，艺术情操，爱好劳动……这些气质、美德与历史功勋，都能满足释读者的某一方面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一千个释读者，就有一千个华盛顿。

徐继畬之后的中国，随着世界知识的丰富，随着社会现实需要多样化的出现，也随着对华盛顿生平事功了解的增多，对华盛顿的评价比徐继畬那个时代确实丰富得多了。但是，无论怎么丰富，其大框架依然是事功与道德，其主要方面，依然是开创民主制度与个人高风亮节，这两点，都是徐继畬开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

徐继畬编著《瀛寰志略》的时代，中华民族危机尚不迫切，自由民权之类的思想尚未在中国传开，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也还未兴起，徐继畬能从公器付之公论、不传子孙的角度，评价华盛顿，实属识见过人，大音稀声。当然，这类思想，可以从儒家原典中找到一些资源，诸如尧舜禅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也可以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获得一些启发。但是，这类思想在宋代以后并非占主流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重视这类思想的人也极罕见。从这个意义说，徐继畬不光有识，而且有勇。套用徐继畬评价华盛顿的话，"异人也"，"一何奇也"。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陈伯龙：《华盛顿传》，载《地球英雄论》，光绪三十年上海新民书局藏本。

被动对外开放与徐继畬的学术转向

杨国桢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福州刊刻出版。这是在鸦片战争后被动对外开放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国海疆接触、交流的产物”。一个自幼在内地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人，“一个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北方人，来到有海洋意识的福建”①，是如何实现学术的转向，理解、运用沿海传统的海洋文化观念和话语，来接受西方的世界观念和地理知识，并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的，是解读《瀛环志略》的一个重要角度，本文试图就此略加申述。

一

《瀛环志略》是鸦片战争后被动对外开放，沿海地方官员为办理通商事务而了解西方的产物。“与徐继畬差不多同时在广东、福建当督抚、道台的，办过‘夷务’的，和外国人有接触的，也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徐继畬写出《瀛环志略》，而别人没有写出来?”②

传统的解释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徐继畬入觐时，“宣宗询及海外形势，各国风土，公具以对，遂命纂书进呈。”③ 也就是说，他是得到道光帝的授权而写作的。

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徐继畬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二十四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② 《阮芳纪序》，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③ 杨笃：《松龛先生传》。山西地方志、《清史稿》和一些研究论著采纳了这一说法。

日，在福建“奉［四月二十八日］部文，蒙恩授广东按察使。旋阅邸报，乃知四月十七日已先授广东盐运使”。五月二十七日上疏谢恩，奏请陛见。[①] 七月十五日，道光帝收到此折，批示“著来见”。是年十月，徐继畬“在京恭聆圣训”[②]。但道光帝谈话的内容，未见诸官方档案记载，徐继畬报告到广州上任的奏折，仅说“叠蒙召见，仰荷圣训周详，无微不至”[③]。对外也“未尝以语人”，不知持此说者从何得知？说者又云：“书成……未表进而宣宗升遐。”事实上，《瀛环志略》定稿于二十八年（1848）八月，道光帝崩于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如果是道光帝授权，何以“未表进”而擅自在福建巡抚衙门内公然开雕版呢？出版后，何以吴文镕还要“瞩令再加修饰，钞缮进呈”呢？

有论者说，“继畬能‘奏对甚悉’，应已从事译著，尚未成书而已。”[④] 其实，徐继畬在此次陛见之前，并无掌握海外形势、各国风土的条件。

徐继畬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抵福建延建邵道任。但他接触海洋和涉外事务，则始于二十年（1840）七月。时因闽浙总督邓廷桢、福建巡抚吴文镕的推荐，从闽北“调署汀漳，驰驱海壖”[⑤]。甫抵漳州，适值英军进犯厦门，“此时形势，其危迫甚于泉州，海澄固在虎口之中，郡城亦争呼吸之际”[⑥]，他奔波于漳州与海澄之间筹划防守。二十一年（1841）三月，首次至厦门，谒见闽浙总督颜伯焘。六月，再至厦门，留旬日。他自称“一年以来，驰驱海岸，日不暇给”[⑦]。七月，厦门失守，“其后寇氛益亟，庄年（兴泉永道刘耀椿）在同安，余数以军事往会”[⑧]。二十二年（1842）正月，怡良任闽浙总督，令徐继畬兼任粮台，驻泉州。六月，离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2721—033；徐继畬：《上颜鲁舆制军书》，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2 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03—2732— 021。

③ 同上，03—2728— 052。

④ 陈存恭：《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 页。

⑤ 徐继畬：《谢刘次白中丞保荐书》，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4 页。

⑥ 徐继畬：《致某方伯书》，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8 页。

⑦ 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0 页。

⑧ 徐继畬：《别刘庄年观察序》，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6 页。

泉州。这段时间，自称“本书迂，安知兵事”的徐继畬，处理的还是海防急务，他感受到英军“非大挫其锋，其势未有所止，而水战非我之所长，仓卒无制胜之术”，“逆夷船坚炮利，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即在海岸安炮与之对击，亦是下下之策”。而“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地为码头，岂能听之耶?”苦无良策，只好“竭力尽心，听天由命”，随时准备与此土共安危，“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劳悴不堪言状”[①]。哪有心情和精力去探访海外形势和各国风土呢?

二十三年（1843）正月二十三日，徐继畬抵广州[②]，但“甫及三月”，便于四月二十六日奉两广总督祁𡎴行知，[四月初二日] 命调福建布政使，五月初一日奏请进京陛见[③]，但未获批准。他与黄恩彤、梁廷枏、潘仕成交往，或许感到有了解外情的需要，但职位的变动，不容他有著书立说的想法。徐继畬于闰七月初二日抵福州，接任福建布政使。九月十一日，厦门开市。十月二十三日，道光帝谕命他驰往厦门经办通商事务。[④] 是时，他对外部世界还是陌生的，而“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恰巧十二月初八日（1844 年 1 月 27 日），在厦门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 Gribble）商谈开口事宜时，英方译员、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 Abeel）“能作闽语”，即闽南话，询问外国问题，多能解答，是一个“西土淹博之士”。遂请其提供资料，雅裨理随即送上地图册子和其他书籍，引起徐继畬的兴趣，“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详之，粗知各国之名”[⑤]。和雅裨理的相遇，成了他决心著书立说的直接诱因。而雅裨理乐意提供资料和咨询，是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这是同一时期管辖五口通商的其他督抚、道台没有遇到的机遇。

其次，厦门是明清之际兴起的对外贸易港。郑成功时代，以厦门为根据地，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竞逐海上，掌控东西洋贸易。虽受禁海迁界的破坏，清初以来，仍是福建通洋口岸，继续与南洋贸易，移民台湾和

---

① 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0 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03—2728—052。

③ 同上，03—2732—021。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7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9 页。

⑤ 徐继畬：《瀛环考略》，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5 年版（手稿影印本）。

南洋不断，成为海外知识和情报的重要来源地。著名的海洋图书，如《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台湾外纪》等均出自厦门附近地区人士的手笔，利用方便。外国地图和外国人所写汉字杂书，也在此地流通，易于搜集。这两类海洋图书是从内陆到沿海的官员了解西方历史地理新知识的桥梁。所以，徐继畬“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汉字杂书数种”之时，《海国闻见录》等已是案上备用之书。[①] 此外，厦门航海人员很多，到过南洋的不少，可供海洋知识和南洋知识的咨询。这三个客观条件，当时其他通商口岸难以具备。获得外国地图和书籍更为方便的广州，要寻找福建海洋图书和到过外洋的航海人员，也并不太容易。

第三，徐继畬有舆地考证的学术根底和兴趣，有助克服学术转向所遇到的阻力。“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用的是考证方法，本已驾轻就熟，故能“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正如陈庆偕在《瀛环志略·跋》中所说：“得泰西人所绘地图，反复询译，参以史录所纪，订其舛误”，“而公之不惮旁搜博采，积岁月以成此书者，非公之好奇，正公之精于穷理也。”这种学术功力和毅力，恰巧是同时期办理通商的其他督抚、道台所缺的。故有心人如鹿泽长，“曩尝监司浙东，历沿海诸郡邑。近复奉檄来闽，因得从先生之后，勷理通商事务。时与泰西诸国人相往来，亦欲有所采择，成一家之言，而才有未逮，靡所取裁。”

二

徐继畬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初再至厦门，已有写作《舆图考略》的计划，从外国地图册中摹出草图，与雅裨理“暇日引与晤谈”。每张图后作《图说》，记录雅裨理意见，摘抄中国图书有关西域和南洋地理资料，相互对校。“三月间赴厦门……因米利坚国夷船有赴天津之信，故自厦等候，相机劝阻。驻厦两旬……于四月十九日回省接印。”[②] 和雅裨理

---

① 《瀛环志略》，（本文下面引本书者不再注出）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徐继畬：《致服先堂兄书》，载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0 页。

又作长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五月，兼署福建盐法道。六月底交卸。七月，写成初稿二卷，2.8万字，地图28幅。识云：“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其中除《西域闻见录》外，都是近人所著海洋图书。所谓泰西人《高厚蒙求》一书，即嘉庆十二年（1807）至道光九年（1829），江南云间徐氏刊刻、徐朝俊纂辑的《高厚蒙求》初集至五集。此书二集《海城大观》介绍世界地理，采辑泰西之学如艾儒略《职方外纪》等成编，并非泰西人所著。从上述书目可知，徐继畬的研究门径主要是以中国海洋图书与雅裨理的口述相对接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十七日，因刘鸿翱病免，徐继畬接署福建巡抚。二十六年（1846）五月回布政使任。公余仍继续搜求增补。十一月初七日，接旨调广西巡抚，奏请觐见。旋束装北上迎折。二十七年（1847）正月初七日，在杭州接旨调福建巡抚。二月初一日在延平府接任，初六日到省。六月十三日，因刘韵珂病假，接署闽浙总督。秋，回福建巡抚任。至次年（1848），书稿经数十次修改终告完成，定名《瀛环志略》，正文近15万字，地图38幅。“陈兹圃方伯、鹿春如观察，见之以为可存，为其删订其舛误，分为十卷。”八月，作序付梓。

《瀛环志略》以图为纲领，专详域外。本书突出的特点，正如凡例所述：一是“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凑合而敷衍成文”。二是“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两地，言之较详。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纪载。然地名国号，展转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转不如近时闽粤人游南洋者所纪录为可据。此书于南洋诸岛国，皆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其沿革于后”。近人研究兴趣专注于前者，对后者略而不究。其实，后者反映徐继畬的舆地考证从西北到东南、从陆地到海洋的转向，是他尝试贯通中外历史地理、介绍海外新知识的连接点。

鸦片战争失败，来自海洋的威胁对士大夫的震动还只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被动对外开放，促使他们关注中国海洋的命运，记述清代传统海洋活动和海外知识的图书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蕴

香编刻《域外丛书》，二十三年（1843）郑光祖编刻《舟车所至》的举动。徐继畬在写作《瀛环志略》的五年间，参考了26种中国官私文献。他认为“史籍官书，半由采辑，仅可志其沿革，不能据为典要”，进而从中国人走向世界形成的海外知识中发掘资料。称引的私家文献，面向海洋的居多，有《海国闻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泛海小录》、《方广十洲记》、《中山志》、《海岛逸志》、《海录》、《安南纪程》、《吕宋纪略》、《薄海番域录》、《台湾外纪》等。

利用这些海洋图书，首先是选择译名的需要。“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历史上中国人出洋贸易和移民海外，以闽粤人为主，两省方言各异，以汉文书写外国地名、史事，便有广东话或闽南话音译的不同。其中一些约定俗成的译名，如埔头，系英文 port 的闽南语译词，在华侨社会中通行，被闽粤沿海民众和官方所接受，就不轻易更改。国家或地区译名不同，即“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如宋卡，引《海录》注：“一作宋脚，闽音谓脚为卡，读如克上声。”又如孟买，注：“一作网买，粤东称为港脚。”“东南洋诸岛，陈资斋《海国闻见录》言之最详。……漳人王柳谷所著《海岛逸志》，言噶罗巴事甚悉，诸岛地名，与《海国闻见录》多不同……尝令雅裨理译出地名，则与陈、王两书又不相合。盖以闽音书番语已多恍惚，而欧罗巴人又多随意命名，不尽系各岛本名。今就两书参互考之，得其大略，然难保其无舛误也。”如吕宋较南一岛，“《海国闻见录》称为网巾礁脑，似即欧人所云民答那峨，《海岛逸志》称为涧仔低者，究亦未知其是否也。”

其次，是以中国海洋经验验证西方知识的需要。中国海洋图书对东亚、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叙述十分丰富，虽有不少耳食之谈，但其中亲历者的记述，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加以引用，并作出考证。如卷一《亚细亚东洋二国》对日本的叙述，“节采《海国闻见录》”，因作者“泉州陈资斋提军（伦炯）少时尝附商舶游日本，言其风土甚悉”。而“西洋人海图，将日本三岛列朝鲜以北，系属错误。彼市舶罕到东洋，就所传闻者，以意为之耳，兹据《海国闻见录》更正之”。琉球自明初为中国属国，从福建入贡，成化以来历次册封使均由福州开洋赴琉球，留下记录，而西方与琉球尚未接触。所以书中引用乾隆二十一年

（1756）册封副使周煌（海山）在琉球收集资料写成的《中山志》（即《琉球国志略》），述其沿革，并以“明初入贡，太祖赐以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修贡职甚谨，封舟频往”，万历间日本萨摩藩入侵，虏去中山王尚宁，“王被执不屈，倭送还复国。由是复修职贡如常期”的往事，发表评论：“其国比之南澳、平潭差大，而不及台湾之半，盖沧海之一粟耳。然累世效贡职，受正朔，遂为东海藩臣，比于朝鲜、交趾。国贵自立，岂不信哉！”卷二《亚细亚南洋各岛》：“南洋各岛，泰西人所绘图最为审细，而其说不甚详，讳见地名，亦多舛异。历考诸家杂说，各有短长。陈伦炯（资斋）《海国闻见录》得其大致，而方向界址大半迷误。其所云水程更数，亦多舛错。王大海（柳谷）《海岛逸志》言噶罗巴事最详，彼侨寓其地者十余年，躬所履览，自不诬也。其余半涉影响，惟谢清高《海录》，于暹罗诸属国暨婆罗洲、苏门答腊两大岛，缕悉言之，确凿可据，盖曾游览其地者。其余各岛，则有乖有合。……今就泰西人原图，博采诸家之说，又询之泰西人，及厦门曾历南洋之老舵师，参互考订，约略言之，不能保其必无舛午也。”

清代闽粤人游南洋所记录的海洋图书，融合了中国文化大传统（农业文化）和小传统（海洋文化）的观念和话语，贴近沿海人民的社会心理，比外国人的汉字杂书用语更易于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徐继畬加以吸收和发挥，使他的著作突破了翻译西书的范畴，把海外的史地知识与中国沿海地区传统的海洋表述衔接起来，从而“在无意中缩短了中国和外部世界在文化上的距离，缓解了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尖锐程度”[①]。这是《瀛环志略》写作时得到福建官员的支持，最终为中国社会接受，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原因。

三

徐继畬在办理通商事务、研究世界史地的实践中，重新“发现”中国的海洋史，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构建中国的话语权。这是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的“副产品”，在当时和过去的一百年间，并不为人们所看重。在主动对外开放三十年的今天，重读这本书，不能不令人

① 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感受到徐继畬的舆地考证从西北到东南、从陆地到海洋转向的智慧之光。

中国人向海洋发展的历史悠久。徐继畬指出："华人入倭，自徐福始，其遗民年久繁衍，遂散布于通国。""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纪载。""西北之耀武功，始前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为唐人。然唐时之番舶，亦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岛国。王涯之胡椒八百斛，故南洋产也。""南海诸番之通中国自汉始，而岭南之榷番税自唐始。唐以前之通番，不过求珍异之货，夸王享之仪，其重在贡。而唐以后，则榷其货税以益国用，其重在市。"明确地描述了中国对外交流通道即"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转变。

从南宋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的传统海洋时代。卷一至卷四，多处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指出："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明成祖好勤远略，特遣诏使，遍历各番岛开读。于是诸番岛喁喁内向，效共球者数十族。"他把这段历史与刚学到的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相比较，认为中国海上活动的范围仅至"小西洋"（印度洋），宋元"盛称波斯胡。波斯即今之包社，在印度之西，中土统谓之小西洋"。"明初，郑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称为西洋尽处。彼盖由印度洋驶入红海，遂以为海尽于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所谓大西洋也。"所以，"虽云盛事，抑未免夸而滥矣。"他的海洋视野从传统的东西洋扩大到全球，从而得到前人所未阐发的新认识。

他没有也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人走向海洋的原因，用"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来理解和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指出："由唐至明中叶，闽广之所谓番舶者，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岛国，非今日欧罗巴之番舶，亦无所谓鸦片毒物也。然南宋时已有钱币漏泄之忧，前明时已有奸民假冒之弊，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欤?"他把前人指责海洋贸易的弊端视为"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给予宽容，可知他已从固有的陆地思维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徐继畬观察到"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是"古今一大变局"。明代"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航海东来，蓄谋袭夺，番族愚懦不能与较，于是吕宋群岛遂为西班牙所据，而苏门答腊以东大小数十岛，处处有荷兰埔头。万历后，诸番国朝贡之舟无复抵香山澳者，以为远人之日

久寝疏，而不知其流离琐尾，地已为他族有也。自泰西据南洋诸岛，城池坚壮，楼阁华美，市廛繁富，舟楫精良，与前此番族之荒陋，气象固殊，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昔之南洋，为侏缡之窟宅，今之南洋，为欧罗之逆旅。履霜冰至，岂伊朝夕？事势之积渐，盖三百年于兹矣”。

西方向亚洲扩张，而明清王朝却从海洋退缩，中国人的海洋活动优势渐失，但也并非无可记之功。他从海洋图书中发掘材料，在书中予以阐扬，并借鉴历史，反思当前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两大亮点。

（一）叙述了闽粤人下南洋的史实和贡献。明中叶以后，“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在吕宋，“华人贩吕宋既伙，留居涧内，名压冬，积至数万人。”虽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其后留者复成聚落。到清代，“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噶罗巴，“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闽广之人留寓者生齿日繁”。“闽广之海船，大小西洋之夹板，每岁往来以千百计……闽广之民流寓其地者，以数万计。荷兰择其贤能者为甲必丹，专理华人词讼。” “漳泉之人最多，有数世不回中华者……其寄居未久，及时往来者，服食语言仍华俗。……为甲必丹者，皆漳泉人。”北胶浪，“南北限以栅，华人萃处其中，俗呼为八芝兰。”新加坡，“嘉庆二十三年，英吉利有之。……闽粤贩洋之船……亦时至。……闽广流寓万余人”。槟榔屿，“居民五万四千，闽广人居五分之一”。道光十五年（1835），蔡廷兰从金门渡海回澎湖，遭飓风飘至安南之广义，次年从陆路归国，“自广义至谅山，历安南十四省。所至之地，必有闽粤人聚处，各有庸长司其事。闽则晋江、同安人最多，盖不下十余万也”。海外移民是国力的延伸，西方海洋势力来到南洋，不能不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和贸易网络。徐继畬评价说：“南洋者，亦七鲲、珠厓之余，而欧罗巴之东道主也。”可惜他们没有得到明清官府的支持和保护，而且当作非法活动加以禁止，以致“今南洋、印度诸岛国，皆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地则犹是也，而主者非其旧矣”。

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南洋华侨华人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还是有利的。他指出“当台湾未开之前，吕宋之米时时接济闽中。近厦门通商，吕宋之米复至，较之珍奇玩好，其为利益也大矣”，就是一个实例。他同情海外移民的处境，希望他们能闯出新天地，如“近年粤之

嘉应州人，入［婆罗洲息力］内山开矿，屯聚日多，遂成土著……近已逾数万人。择长老为公司理事，谓之客长”。即嘉应人罗芳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建立华人自治的“兰芳公司”。他表示赞赏：“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

二、颂扬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击败荷兰的功绩。“荷兰航海东来，至中国之东南洋，据爪哇海口（即噶罗巴），迤东迤北各岛国皆建设埔头，通东西七万里之海市……明季，尝以兵船扰闽浙，垦台湾而据之，后为郑氏所逐。”崇祯六年（1633）九月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东渡收复台湾，是中国海洋史的光辉篇章。徐继畲把这段史实写入卷六《欧罗巴荷兰国》，指出：“成功悉锐渡海，夺鹿耳，据安平，相持一年，荷兰大困，成功乃纵之去。由此绝意中国，不敢复觊片土。先是郑芝龙受抚后，尝以小舟焚荷兰三艘，厥后成功扼之于台湾，几致片帆不返。以彼横肆如鲸鲵，遇郑氏父子而弱焉，亦足为远夷侵凌中国之炯戒矣。”

他特别重视郑芝龙火焚荷兰船的经验，认为可供当前抵御外侮的借鉴：“郑芝龙焚荷兰船，见闽人所著《台湾外纪》。其书虽小说，而事多实录，非尽荒唐。……他书言火攻者纷纷，有谓用千百木筏积薪，顺风潮而纵之者，有谓锁千百小舟积薪，舣港面而围之者，大约皆江河火攻旧说。否则，攻海盗旧说，施之夹板，凿枘甚矣。海面宽阔，夹板皆相地散泊，近者相隔一二里，远者三四里，木筏小舟虽多，岂能塞满汪洋，如墙而进？又岂能引针拾芥，无端使之相著？此自焚舟，何与彼事？不如芝龙之钉船，事虽难，而尚有实际耳。”

这是颇具洞察力的见解，现在已得到荷兰原始档案的佐证，是中国海战史上成功的案例。这一见解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对俗传各种火攻“奇策”加以考证，并向水师官兵查询后得出的结论：

卷一《亚细亚南洋滨海各国》：“俗传红毛船最畏安南，不敢涉其境。其人善于泅水，遇红毛夹板，则遣数百人背竹筒，携细缕，没水钉于船底，从远处登小舟牵曳之。俟其搁浅，乃火焚而取其货。又或谓安南人造小舟，名曰轧船，能攻夹板船底，故红毛畏之。以今考之，皆不甚确。……商船入安南内港，土人皆用小船系绳牵引，乃虑其搁触礁浅，藉为向导，即中国各港之引水船。反用之以碎敌船，理或有之，惟没水而钉船底，则事涉杳茫矣。至轧船之制，曾有绘图仿造者，施之海面，仍无异

常船。耳食之谈，施之实事，往往凿枘，正不独此一事也。”

卷七《欧罗巴佛郎西国》：“凿舟之说，自来以为奇策……尝以询之窦升堂（振彪）提军。提军云，‘此技余少时尝学之未成也，而知其梗概。凡人入海水必闭目，否则为咸水所侵，目且盲；必闭气，否则流随吸入，转瞬而腹彭亨。年少力壮者闭气稍久，亦断无逾刻许者。其能不浮不沉，恃手足之运动，运动少停则随波涌出水面，断无在水中尚能施力运斧之理。且海水波浪最劲，愈深愈劲，能浮江河之水者入海水则败，能浮内港之水者入大洋则败。善水之人，在大洋落水得片板可不死，若徒手浮沉大浪中，力尽气微亦未有不死者。此技即使至精，断不能化身为鱼鳖。世俗所传大半得之耳食，资谈柄则奇创可喜，竟欲施之实事则愚矣。’又守备吴金魁（水师勇士，杀海贼无算，为贼伤毙，得旨优恤）亦尝习此技。余问之，亦云然。”

徐继畬关注海外移民和颂扬郑芝龙、郑成功，是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他在书中表达出来，含有冀望中国在海洋突围再起的深意。

这两大亮点，反映了徐继畬海洋意识的感悟。这种认识，是他在内地（包括闽北）生活时绝对体会不到的，也是不接受海洋图书启蒙的沿海官吏体会不到的。不过，他的海洋史论述是不完备的，甚至出现失误。把明代嘉靖年间在闽浙出没的葡萄牙人视为荷兰人，是一大败笔。在卷六《欧罗巴荷兰国》中，他说：“胜国季年，闽浙两洋，时见侵轶。尝踞舟山（定海道头地方，尚有红毛码头之名），毁普陀（普陀岩有万历年间宫塑佛像，荷兰以巨炮摧之，收其宝藏而去），鼓棹月港（即海澄县，从前海港深通，大船可抵城下，荷兰船时来游弋。后港渐淤浅，乃移市舶于海门，海门又淤，乃移于厦门），寄迹澎湖（崇祯三年，荷兰据澎湖，闽抚南居益以楼船航海击之，荷兰遁去），卒乃据台湾而有之，彼时概称为红毛，即荷兰也。”把荷兰“寄迹澎湖”前葡萄牙的侵扰闽浙，归于荷兰名下，是对历史的误读。又如，在卷七《欧罗巴葡萄牙国》中评论说：“粤东之居夷，自葡萄牙之居澳门始。……当事利其居积货宝，便于供办。又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一枝暂借，无足重轻，非必贪其五百金之利也。……诸夷之浸谣狎熟于粤东，则由澳门为之权舆也。林富一代名臣，而谋国之疏若此。语云‘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可不慎哉！”林富在嘉靖八年（1529）任广东巡抚时上通市舶疏，主张“凡舶之来，出于《祖训》、《会典》之所载者，密询其真，许其照旧驻劄

（札）；《祖训》、《会典》之所不载者，如佛朗机者，即驱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军擒捕”①。林富的开海主张是把佛朗机即葡萄牙排除在外的，不会造成葡萄牙入居澳门的后果。徐继畬的评论似乎是把荷兰视为佛朗机，把葡萄牙归于“许其照旧驻劄”一类，因而产生误判。这是初涉海洋史领域，搜集阅读闽粤海洋图书不够所致，在近代开眼看世界初期难以避免，并不影响徐继畬重新“发现”中国海洋史的历史贡献。

《瀛环志略》以介绍外国史地、探求新知奠定了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这一结果是与徐继畬从陆地到海洋的学术转向分不开的。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间，许多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也经历过这种转向，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接，完成外国文化话语中国式的表述，赋予新的内涵。研究徐继畬从陆地到海洋的学术转向，不仅为《瀛环志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破解现代变革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所遇到的中外文化摩擦、文化冲突，建设中国与世界互补的和谐文化，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也是纪念《瀛环志略》出版160年的现实意义。

（杨国桢：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① 黄佐：《明代巡抚通市舶疏》，《泰泉集》第12卷。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

——《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王先明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①] 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于这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这显然与基于"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同，区分了两种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特征。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蕴涵着极其复杂的各种利益、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而正是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发现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一　从"华夷之辨"到"利权之争":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转型

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当以1901年为历史

① 从三个方面获得一个基本理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文化功能"（F. 盖尔纳:《今天的民族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古奇表述得最具体，他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仰。"（G. P. 古奇:《民族主义》，纽约，1920年版，第5页。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5月油印本。）

界标，明确标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民众抗英活动开始，以及其后持续几年的反入城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属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1901年后以“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民族斗争为主体内容，则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

从表现形式上看，两大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世纪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即从组织力量上看，无论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社学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坛”“拳”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机制。他们借以动员民众的手段是传统社会中的揭帖、告白、歌谣、俚语等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性的载体。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反美爱国运动，还是收回利权运动，其组织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学生会以及渗入其中的革命党人组织等等。新世纪民族运动的动员手段已经主要是报刊、电报、公告以及特刊，甚至还有各种公开的演讲、报告等，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性、公开性的载体。

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所依据的主要精神武器及其文化内涵，是我们判别其时代特征的主要依据。可以说，1901年后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武器发生了时代性变化，正是这种历史性变化决定了民族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华夷”分辨向“主权”认同的转变。19世纪的民族抗争运动从三元里到义和团，民众动员的精神力量是“华夷之辨”。虽然鸦片战争后有列强割地赔款、通商谋利等一系列攫取利益的问题，但借以动员民众抗争的主要理由却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种注重文化异同的成分远大于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认同为出发点的“华夷”观念。因此，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乃至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形成以“华夷之辨”，“人禽之辨”，“正邪之辨”的文化认同，来抵拒“西夷”的入侵。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斗争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价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却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显为时代性价值。所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沈葆桢语）“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李东沅语）因此，19世纪中国民众主要通过

反洋教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这恰与此时西方列强“对传教一事远不及对通商重视”的选择全然不同。

20世纪勃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立足于民族—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而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① 的民族危亡意识。具体路权集中体现的是“国权”，即“故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②。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在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③。“路权即国权”的认识构成了新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

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转变。就世界秩序而言，鸦片战争后一再而起的民族抗争运动，始终坚持着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朝”观念。“天朝”与“蛮夷”的对立构成绅民反抗外来侵略力量的天然道理。在《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天朝”一词的使用超过十处，并且是以“天朝”与“属国”的概念表达整个生存世界。这一观念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因而，19世纪一直延续于民族抗争运动中“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④ 的“天朝“意识与20世纪收回利权运动中所揭示的“财产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民有者，为名义上之分别，而于事实上究不必强分离”⑤ 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价值。

其三，从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就民众自身称谓而言，在19

---

① 大悲：《呜呼腾越铁路之命运》，《云南杂志选辑》，第406页。

② 《东方杂志》第3年，第1号，《交通》。

③ 《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奏稿要录》，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4页。

④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53页。

⑤ 《申报》宣统三年五月五日。

世纪的告白、揭帖中更多地以“臣民”、“义民”，“子民”① 相称，这是与“天朝”相匹配的传统民族意识概念。然而，进入20世纪初期，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世纪“国民”概念取代传统“臣民”概念的历史趋向。1902年《大公报》一篇《论演说》中说：“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有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②《顺天时报》中更多地以“国民”、“权利”话语取代了传统的“子民”、“臣民”和“华夷”话语。“是以各强国之民族，人人有国家思想，有政法思想，有权利义务思想，其收效于演说者良多。而演说之关系于国家人民，非浅鲜也！”③ 1905年，天齐庙宣讲所就附设一个专门机构，向人民劝募“国民捐”④。从社会舆论和民众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民众运动层面上展示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家学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梁启超在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揭橥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梁文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⑤ 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⑥。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思想”或“公民权利”思想也构成梁启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应有之义。“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制度下的臣

---

① 《延平民人告白》，《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第159页；《仇教记》，《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第4卷，第8—11页；《宁波众义民公启》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65页；《义和团告白》，《拳时上谕》，《杂录》，第116页。

② 《大公报》1902年11月5日、6日。

③ 《论中国宜普兴演说会》，《顺天时报》1906年6月8日。

④ 《大公报》1906年3月4日。

⑤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⑥ 同上书，第193页。

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①

此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如果不是过分拘泥于细琐末节的历史表象，我们则可以从历史演变的大势中分辨出近代中国民众抗争运动所具有的时代性界标。因为无论从其组织形式还是从其精神内容来看，1901年义和团运动之失败，成为截然分划两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即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分界。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抗争实践运动中，而且也是近代思想家和社会思潮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成果。这是我们认识《瀛寰志略》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的历史大背景。

二 《瀛寰志略》时代的“华夷”话语

对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知，由“华夷”到“中西”话语模式的转变，显然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基本前提。放弃“华夷”的表达不仅仅是“话语”的转变，而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问题在于，《瀛寰志略》面对的却是一个完全的“华夷”话语的时代。对此，当时身临其境的外国人的感触是深刻而具体的：“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了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蒙昧的。”② 其时，中英之间的很多纠纷和争执，都与此相关。如1834年8月间，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与中国官员（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

---

① 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② 杜赫尔德编：《中华帝国全志》第1卷，伦敦1783年版，第237页，转引自［美］M. G. C. 马森著，杨德山译《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页

台）会晤，关于双方的座次排列有过一番争执：中国方面在英国商馆的客厅里的布置是“将北面的上座完全留给中国官员，行商们则坐在东边，即旁座的上席；而把英国监督们——包括律劳卑男爵在内——的座位都放在西边，这不但是边座的下席，而且是背着英王的肖像”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座位安放问题，至少英方看来，是“把他和一切外夷比作是天朝皇帝所任命的官宪脚下的尘埃”② 的一种鄙视。所以，作为英方商务监督的律劳卑坚持更改座位布置，他采用了一张会议桌，将“自己放在主人的席位上，把三个上宾的席位留给那三位中国官员，第四席位留给监督处的一位同僚，并将秘书阿斯迭的席位放在长桌的末端，行商们的座位则未加更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一种唯一可能的或合理的布置”。“但在当时则被视为一种太过分的平等权主张”③。

鸦片战争之后，“确认英、中两国以及他们的官吏和代表身份上的平等，是当中最主要的，并且几乎是惟一的一点。……所以条约就被写成这样的形式并且还包括有这样的规定，以便把英国撤出进贡国之列并且把英国君主和她的官员置放在同中国君主和官员互相平等的地位上。民族的平等是以条约的形式确认的。”④ 但是，英国人的这项要求并没有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反而在鸦片战争后广泛而激烈的民族冲突中，朝野上下更加强化和突出了“华夷”话语。这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共同表达：

朝廷：对于列强仍然坚持“夷”的认定。1850 年 6 月，由皇帝对英巴麦尊全权公使送致白河的抗议信，下发谕旨说：“迩者夷人在天津之行径，实属桀骜侮谩已极，乃竟恬不知耻，径自投函枢臣。……况礼有常规，凡国家官吏，均不得交通夷人，着该军机大臣等，即勿予以置复，以免轻启该夷僭越无礼之渐。”⑤ 如何冲破“华夷之辨”的障碍，至少在正式的中国官方表达中剔除“夷”的字眼，也成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一种持久不息的努力。从 1834 年到 1860 年，西方国家作了各种努力以保持其对于“天朝”的“国家地位”，要求“各式公文中不得再把外国人叫做‘夷’

①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52 页。

② 同上书，第 53 页。

③ 同上书，第 152 页。

④ 同上书，第 349 页。

⑤ 同上书，第 449 页。



人”[①]。“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②]

民间：鸦片战争后，广州民众抵制英人入城的社会运动持久不绝，用以动员民众的揭帖将“华夷之辨”发挥到极端：“查英夷素习，豺狼成性……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仪。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③] 1849 年 3 月号《澳门月报》刊发的广州绅民的告示也宣称：“该蛮夷一有举动，即在各地响起警钟，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杀尽叛夷，寸草不留，不容蔓延。”[④] 可以说，整个 19 世纪在民间涌动的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资源，都局限在“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意识层面。

士大夫：“（同文馆）选翰林及部员科甲出身、年三十及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⑤] 1853 年，对西学已经颇有体悟的王韬，在日记中也还不免“华夷之辨”的意识：“然夷性无常，一旦见利所在，不能不保其败盟也（指英法缔约——引者）。”[⑥] 须知，当时的王韬早已在上海英国教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而且也时与西方学者如伟烈亚力接触交流，对于西方知识已有一定了解。但是，置身于举国皆言“华夷”的时代，真正面对客观的世界大势，放弃“夷”的认知仍然是十分艰难的选择。即使在表达上不用“华夷”而用中西或中外，但深植于心底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优越意识仍然溢于言表。通过 1859 年 5 月 6 日王韬与西人伟烈亚力的一番争论，或可体悟到当时士人的思想与心境：

> 王韬说：“西国政之大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体也。”

---

① 《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

②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96 页。

③ 《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 4 册，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第 18 页。

④ 《澳门月报》1849 年 3 月号。

⑤ 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2 页，并《越缦堂国事日记》第 8 册，同治六年七月三日，函二，第 81 页。

⑥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21 页。

伟烈亚力答称：“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商足而国富，先欲与万民共利，而财用无不裕焉。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而无捐输之敝。今日中国政事壅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而不民不得预知……”

王韬辩对说：“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中国所重者，礼仪廉耻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复于太古之风耳。奇技淫巧凿破其天者，摒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①

从话语形式上看，王韬此处已明确地用“中国”和“泰西”取代了“华”与“夷”，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不免“文化优越论”的“华夷”意识。

19世纪60年代后，围绕着开设算学馆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进行了更激烈的论争，从而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公然触及到“华夷”问题，并将之推升为关涉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文化论争。反对西学的倭仁提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② 对倭仁提出反驳的奕䜣则以守为攻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③ 令人特别关注的是，双方立场不仅仅是内容的反差，而且话语反差也是惊人的：针对同一事物，使用两种不同的话语，倭仁自始至终用“夷”，即“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䜣则一以贯之的用“外国”，即“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同为朝廷大员，可以由此概见由“华夷”与“中西”映照的民族意识之时代差别。我们可以判明倭仁的守旧和保守的品性，但我们却无法否认其基本的“民族”立场——尽管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意识。对于洋务派的努力，我们当然也不能怀疑其追求国家“自强”的民族立场——但这种民族意识又全然不同于传统的

①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3页。

②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967年3月20日）大学士倭仁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

③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1867年4月6日）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8卷。

“华夷之辨”，而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涵——即以近代民族—国家主权利益为主体内容的新的民族意识。如果认真地加以分辨的话，倭仁与奕䜣之争的核心，并不直接体现为民族主义与否的问题，而是体现为传统狭隘的民族意识即“华夷之辨”与近代新生的民族观念的冲突。

这场论争之后，社会上开始更多地逐渐用“洋务”代替“夷务”，这一走向说明了时代观念的更新。“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辨‘夷’与‘洋’。用‘夷’来泛指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夷与夏（或华）相对峙，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夷’的使用才受到限制，这是洋和夷替代的交接点。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① “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②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早期“师夷制夷”的权宜之策，到洋务时“中体西用”的文化原则，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转变。

这一历史进程也同时提示着，此前在《瀛寰志略》时代，整个朝野上下却基本上都还处于“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狭隘的传统民族意识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这是我们借以认识和评判《瀛寰志略》的基本历史前提。

三　比较中的发现:《瀛寰志略》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

然而，就是在“华夷”话语充斥朝野的时代，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以下简称《志略》）却特立独行地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我们发现，《志略》全书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对于西方各国的“夷”的表述。

首先，在几百字的《自序》中，它称“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

---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6 页。
② 同上书，第 107 页。

海"[①]，在涉及国外民族和国家时，它通常用"泰西人"、"域外诸国"等来表述。在《志略》的《凡例》千余字中，对于西方各国称谓是"泰西诸国"、"泰西人"、"外国"，或直接称为"英吉利"、"英人"、"花旗国"、"葡萄牙"[②] 等等。

其次，全书用"夷"字者仅仅可数几处：卷七《葡萄牙国》，"按"中说："粤东之居夷"、"南洋诸夷"、"澳门之夷"[③]。对西方国家治下属地有用"夷"称者，如卷四《欧罗巴》"所传畏冷者乃黑夷，黑夷皆印度或南洋各岛人"[④]；卷六《意大利亚列国》"适有夷族自东北来侵"。[⑤] 这里的"夷"并不用于国家民族指称，而只是相对于土著者的一种表述。

再次，《志略》中的"夷"是在引述他人言论时所用，如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有至部者不行跪礼，朝见欲位先诸夷"，嘉靖中，"私舶杂诸夷中"[⑥] 等。

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志略》率先超越了"华夷"话语。重要的是，比起同时代人的思想认识和境界，《志略》远远出乎其上！它所具有的卓识远见，成为此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指示器！为此，我们可以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志略》作一比较。《海国图志》虽然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思想"之滥觞，但《图志》对于中西关系却也始终坚持着"华夷"话语。

第一，仅在万字左右的《筹海篇一·议守上》中，所用"夷"字就达139处[⑦]。一些篇章中可谓处处皆"夷"，如"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⑧]，如《筹海篇三·议战》中之"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⑨] 等。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代表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经典表达也是如此，即"攻夷之策二：曰调

---

① 《瀛寰志略》，《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
③ 同上书，第224页。
④ 同上书，第113页。
⑤ 同上书，第188页。
⑥ 同上书，第210页。
⑦ 《魏源全集》第4册，《海国图志》第1卷，《筹海篇一·议守上》，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15页。
⑧ 同上书，第13页。
⑨ 同上书，第25页。

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①。在短短40多字的表述中竟用“夷”字7个。这真是一个无“夷”不成文，无“夷”不思想的时代。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光绪元年（1875）时，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对于“师夷长技”同样思想的表述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对“夷”的剔除：“……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纷至，西通于中，战争日亟。……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② 显见的话语差别，其实就是一个时代认识的差别。

第二，与《志略》不同的是，《海图图志》对于西方国家和民族直接用“夷”来指称。如《海国图志》卷十一《东南洋》下有“吕宋夷所属岛屿一”③。但徐氏的《志略》卷二记载同样内容的《南洋各岛》项下，却始终无一“夷”称；而在论及此地为西班牙占据时，说“是时吕宋已为西班牙所据”④，亦只作客观叙述，无用夷字。《海图图志》称西方国家为“夷”者所在多处，如记述意大利时称“为天主教之宗国”，“故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⑤《海国图志》卷十三《东南洋》海岛之国，题为“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⑥。关于荷、法所属地《海图图志》记述是“荷佛二夷所属美洛居岛”⑦，而《志略》则无有夷称。

第三，以“夷”指称西方，是魏源的主观选定。作为地志类图书大量内容属于辑录，而辑录内容当受原著者表述的限制。此在《志略》中也不免。但魏源《海图图志》撰述部分则完全体现其主观选择的思想立场。如在其所撰《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有历表两年为例，以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九年己亥与西夷千八百三十八、三十九年为对照，西历各日，均以

① 《魏源全集》第4册，《海国图志》第1卷，《筹海篇一·议守上》，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魏源全集》第7册，《海国图志》附录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255页。

③ 《魏源全集》第7册，《海国图志》第11卷，《东南洋》下，第469页。此内容后注［1］称：魏源受某些不正确的记载影响，误以为“吕宋”是西班牙本名……本卷的篇名就是在这种颠倒的概念下写出来的。

④ 《瀛寰志略》，《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⑤ 《魏源全集》第7册，《海国图志》第37卷《大西洋》，《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第1077页。

⑥ 《魏源全集》第5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13页。

⑦ 同上书，第563页。

西夷某月某日对应[①]。

显然，"华夷"话语背后是基于传统礼仪文化的一套规范，是以等级尊卑、内华外夷为世界秩序的认知体系。所以，魏源对于"外夷"的认同，也是基于所谓的"礼教"标准，如魏源在述及意大利与英国时说："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②]"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③] 将英视之为"夷"是因为英"专谋利"而"不务行教"，可见"礼仪教化"仍为魏源判定是否为"夷"的基本标准。由此可知，在《志略》时代，即使如魏源之开明和开放，也未能摆脱这套传统的话语体系。

19 世纪 60 年代后，经过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和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又经过朝野上下"中学西学"论争后形成的"中体西用"文化原则的相对认可，强固的"华夷之辨"的话语模式逐步开始消解，并一度出现"夷"、"洋"或"夷"、"西"并行局面。这种情形突出体现在冯桂芬使用的话语中。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完成于 1861 年，全书 40 篇，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有 4 篇文论与西方国家或西学相关（《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重专对议》），而在此 4 篇议论中，虽然题目中"洋""夷"并用，"西""夷"同行，但在具体内容的阐释中，冯桂芬基本上还是坚持"华夷"话语。一方面，在《制洋器议》约 3000 字的篇章，用夷字 34 处；《善驭夷议》1500 字，用夷字 27 处；《采西学》约 2000 字，用夷字 8 处；《重专对议》800 多字，用夷字 5 处。[④] 另一方面，《校邠庐抗议》其余谈内政事，偶有用夷字处，如"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夷书动言鸦片害人"[⑤]，"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⑥]；而代表冯氏变法思想的名言，"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⑦] 的思想表达，也几乎是一"夷"到底。尽管，在事后和世

---

① 《魏源全集》第 5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794—1798 页。
② 同上书，第 1078 页。
③ 同上。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 2002 年版，第 48—51 页。
⑤ 《筹国用议》，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 2002 年版，第 32 页。
⑥ 同上书，第 61 页。
⑦ 同上书，第 75 页。

后的境况下，人们可以体会到思想先行者们努力的不易，诚如王韬所评："一代大儒，千秋硕学"，"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①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客观地指出，当时，激愤于冯氏内心世界的恰恰是"华夷"优越地位倒错引发的不平，即"堂堂礼仪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②！

四 《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孕育

摒弃"华夷之辨"是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意识转型的历史前提。鸦片战争以后进步的思想家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探索和不少的代价。被社会所认可的进步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其间产生的社会冲突、思想碰撞和内砺外铄，注定成为我们认知和体悟历史真知的基石。思想史演变的进程表明，鸦片战争后即使是学习西方的各种"师夷"之策，也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在"华夷"话语中运行着，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才得以改观。60年代之际，王韬在与伟烈亚力论争中西差别时，还不时以"夷"指称西方，而到80年代时，王韬却专门撰写了驳斥持此言论的文章——《华夷辨》。王文说："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③

王韬自己的思想演变，其实也是时代思潮嬗变的历史缩影。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很快获得社会的认同，从而，制约人们走向近代的"华夷之辨"就被时代的进步所扬弃了。1896年秋间，曾是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在一封信中对"不悖正道，兼启新法，收礼失求诸野之近效，峻用夷变夏之大防"的论调也作了批判，而批判所据竟也与王韬所论同出一

---

① 王韬：《校邠庐抗议·跋》，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76页。

③ 《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辙："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周时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皆中国近边朝贡之蕃，且有杂处中土者。蛮夷僭窃，故《春秋》内中国，外夷狄。……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自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① 显然，这意味着近代民族主义即将成为新时代的主导力量，而传统的"华夷之辨"行将成为历史陈迹。然此时，却已是即将告别19世纪而要进入20世纪的年代了。因此，站在近代民族主义演进的时代高点上，回视历史，我们又怎能不慨叹徐继畬《志略》中超越时代的卓见！——还是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首先，《志略》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认知，置放在具有对等或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以抛弃"华夷"话语，构建了从传统观念的"天下"到近代意义的"世界"的新的认知体系。这种浸透在"世界地理"知识建构中的思想认识，对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触动和影响，比之于地理知识本身影响而言，更为持久而深远。当时人们对它的关注并不在地理知识本身，而更多地集中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因此，史策先写道："立论多有不得体处……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弹劾之。"② 李慈铭日记中斥责："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③ 由此反证出《志略》思想史的意义与价值，超越了它的地理学知识本身。

其次，《志略》将学习西方的思想从"夷技"层面隐约扩展到更深广的层面，为近代变革思想的提升、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当时社会上涌动的进步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这一思想的起点仍是"华夷"话语，即使更进一步的冯桂芬，也同样坚持着"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原则。它的逻辑前提是中国礼教远超乎西方之上，而只是"技术"（或"治法"——如冯氏思想）层面落后于西方；而"礼教"恰恰是划分"华夷"的标准。所以，所可"师"者"夷技"而已。但是，《志略》对于西

① 《答牛蔼如》，《桐城吴先生尺牍》第1卷，第143—145页。

②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③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482页。

方世界的描述和评价，已经突破了“技艺”和“治法”所限。关于西方文教，其言巴黎“为欧洲都会第一，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游学之士许住院借读”[①]。“佛郎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其制宰相一人，别立五爵公所，又于绅士中择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②] 尤其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表达出渴慕之情，评述英国之议会民主制度，于国计民生之事由“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而且“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③]。那番对于美国民主制的评述，更是具有久远的思想意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④]

固然，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徐氏并没有就鸦片战后中国之对策提出直接方案，没有形成如魏源“师夷长技”之策，也没有冯桂芬之《采西学》、《制洋器议》的专对之论。但是，谁又能否认《志略》中蕴涵于字里行间那种超越同代人“华夷”之见之上的远略之见呢——这是比单纯的“夷技”和“洋器”以及“西治”更为本质的一种久远的思想识见。它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型和凝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石和历史资源。

（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瀛寰志略》，《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③ 同上书，第235页。

④ 同上书，第291页。

重新认识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与“和”

——兼评徐继畬的“和”、“战”思想与外交活动

徐松荣

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先进人物，是极少数，且仍然有时代的局限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人物，没有不受时人的压制、打击，只是后来人才把他们捧上历史的神龛。为什么？因为千百年来，在中国这个保守的国度里，生活着保守的国民，做着保守的梦，读着保守的书，唱着保守的歌，习惯于向后看，向祖宗看齐，照祖宗说的去做；习惯于向内看，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周都是夷狄蛮邦，只能朝贡，不能平起平坐，且不屑一顾；习惯于向上看，唯帝王是瞻，唯圣人是听，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罪该万死。

19世纪初中期——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处于十字路口，成为“古今一大变局”①。这是由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际关系决定的。“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②。从国内而言，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清朝统治危机四起，“更法”改革思潮应时而生。从国际而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外交、贸易、鸦片等手段力图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失败以后，开始以战争强行撞开中国大门。中西方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战争不可避免了。如何应对动荡时局、中外战争，一批开始醒悟的官僚士子，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畬为代表，形成经世派。本文重点探讨徐继畬在鸦片战争时期如何应对中外战争、处理中外关系的活动与思想，同时涉及林则徐等人物和其他事件。

---

① 徐继畬：《瀛环志略·凡例》，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

② 龚自珍：《定庵文集·平均篇》，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一 战——战时的一致行动

鸦片战争以前，经过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殖民战争迅速崛起的英国，为了叩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朝野上下进行了长久活动。本已“衰弊陵夷”的清王朝却虚骄自大，神经过敏，“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①]。于是构筑一堵墙隔绝中外，做起阿Q式的美梦。英国先是派出使团，清朝君臣却自欺欺人地当作“朝贡”事件，十分重视“朝贡”的礼节：三跪九叩。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费了许多周折，让英国使臣“曲一膝以为礼”[②]，总算完成了觐见仪式。事后，君臣们踌躇满志，乾隆帝兴奋起来，当廷赋诗一首，自比“圣王”。到嘉庆、道光、咸丰朝，一点儿灵活也没有了，根本不让这些使臣们进京，让地方官去“处理”他们。地方官们只能秉承朝廷的旨意，按照“春秋大义”、“夷夏之防”的传统思维方式，强硬加愚昧地处理对外事务。咸丰朝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这种人物，结果引来了大祸。林则徐比较明智，却也个别地方“处置不当”，出了差错，徐继畬打破“常规”，处理妥当，却招来打击。

受过多次侮辱的英国当然盛怒不已，不可能就此罢休。随后，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等，积极展开对华贸易，仍然无所收获。因为“天朝”皇帝有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③] 急不可奈的英国臣民见“货物贸易”不行，那就用“鸦片贸易”冲击中国的大门。其危害之烈也就引起清朝君臣、士大夫的极大恐慌和愤怒，中英之间直接冲突不可避免地展开，战争也就箭在弦上，不可能不发生。

战争是否一定发生，是否可以通过外交斗争加以避免，或延缓时日，对于“禁烟”与“战争”，徐继畬、林则徐的主张与行动有没有共同点，徐继畬有哪些活动？这是本节必要讨论的问题。

---

① 《鲁迅全集》第1卷，转引自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② 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卷中，第17页。

③ 《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二世的信函》，转引自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由于中英之间矛盾冲突的长期积累，双方妥协的余地很小。从英国方面说，打开中国大门，打进东方市场，蓄谋已久，志在必得，外交、贸易、鸦片等一系列举措失败后，必然把战争提上日程。从清朝方面说，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君臣上下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衰败，仍然陶醉在前朝“十全武功”的胜利之中，对外部世界形势茫然无知，尤其是对“英夷”的崛起、强大不屑一顾，既不审时，亦不度势，愚昧无知加上不适时宜的傲慢与强硬，战火终于点燃了。

通过各种灵活多变的外交活动和有理、有节、有度的外交斗争，有时强硬是必要的，在另一个时候妥协也是必须的。但是，清廷的君臣上下在虚骄心理的支配下，在强硬派一时得势的左右下，引发了英军好战、求战和主动出战。林则徐 1839 年领导的虎门销烟斗争，是正义的，爱国的，是反侵略斗争的重大胜利，不容置疑。但是，如何善后，通过多种外交活动，即使妥协退让一步，只要不再激化矛盾，导致战争，也就成为当局的头等大事。事实并非如此，被胜利与激情冲昏头脑的道光帝及林则徐等一线官员一味地强硬。林则徐正是按照道光帝的意志，在事后的许多问题上“处置失当”，让英国抓住时机发动战争。处于第一线、身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对此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但英雄仍有缺陷和历史的局限性。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整顿海防、组织团练、水勇，积极备战，击败英军的武装挑衅，都是有效的，使英军在广东一时不能得逞。对此历史多作记载，这里不作赘述。

鸦片战争期间，还有以耆英、琦善、伊里布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曾把他们斥为投降派。本人认为欠妥，应该说是主和派人物，或者说是妥协派人物，有必要再研究探讨。当然，他们是秉承旨意办事，又私下“处置失当”更多，在“战”与“和”的交替之中，没有他们是不行的，皇帝老子是当不下去的。一味妥协主和，选择时机不当主和，都是不对的。但一提主和就全是错，那就是形而上学（极“左”时期，“爱”不能“乱谈”，“和”不能“乱提”，主和人物都戴上了大帽子，好沉重。建议以后的史学研究不要划派，更不要给历史人物戴帽子，尤其是政治帽子。极“左”年代的帮派政治应该休矣。虽然后遗症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一时很难根除）。一般说来，军事斗争的目标是“战胜”，外交斗争的目标是“谈和”，国家、社会不管采取哪种斗争手段，都是为了求得和平安定，不允许也不可能永远“斗”下去，永远“战”下去。无论是战胜，或是战败，

最终还是要回到外交谈判——“谈和”上来。

战时的徐继畬属于哪号人物？禁烟斗争与鸦片战争爆发期间，徐继畬任职于福建、广东。1837年任延建邵道，1840年任汀漳龙道，1842年调任广东，先后任盐运使、按察使。他是禁烟与抗英斗争的积极支持者。

1841年徐继畬撰文《禁鸦片论》，提出严禁主张和独到见解。针对“先杜来源，次绝兴贩”的主张，提出“严吸食”，严厉惩办吸食鸦片的人，具体说，惩办吸食者，“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徐继畬的主张和林则徐、黄爵滋是一致的，其具体办法有所差异。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当局为了加强福建沿海防御，把徐继畬调到漳州，任汀漳龙道。刚到任，英军进攻厦门，告急。徐继畬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采集大木为排桩，堵塞镇门各港口，同时调集兵勇扼险固守。英军知道厦门有备，没有发动进攻，随即北上，防区幸得安全。抗英战争前后持续两年，徐继畬在漳州、厦门尽忠职守，积极整顿和加强防务，毫不放松而无懈可击。

徐继畬作为抵抗派的一员，始终站在战争的第一线。他认为：战争已经打响，就应该与敌人战斗到底，争取胜利。为此在三个方面作出了表率。其一，整顿、加强海防，提高军队战斗力。他针对清军缺少训练、素质低下、缺少战斗力，强化士兵训练，采取汰弱留强的办法，裁去老弱残兵800人，将这部分人的报酬增发给留下的士兵，以激发他们的战斗力。其二，以身作则，与守土共存亡。他奔走于澄海、漳州之间，每天登城墙，与守陴者一起防守。厦门失陷后，海漳告急。他“督兵勇尽夜防守，志在与城存亡”，而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其三，反对妥协，坚持抵抗。徐继畬对于琦善在广州弃战求和，对于奕山在广州战败，订立城下盟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无异于“以薪救火，祸不旋踵”。对于裕谦在定海、镇海的英勇抵抗而殉难，直呼：“豪杰之士，以灭贼自任，力竭而死，天下悲哉。”①

徐继畬的言行，表明他是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派、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与林则徐等人一起，在战时处于同一立场，采取了一致行动，捍卫了国家

① 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见《松龛先生全集·文集》第3卷，民国四年晋版铅印本，第6页。

的主权与尊严。

二　对西方的探索——重新认识、观念转变

矛盾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终究会以解决矛盾的最高方式——战争来实施。战争已经发生，就要坚决打下去，即使是弱者（不管自我认识了没有）也要打下去，打了再说。问题是战败了如何总结教训，认识战胜者对方，如何善后，不再重蹈覆辙。本人认为徐继畬在战后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对战争作了深刻总结，对国内外形势作了重新认识和评估，战后的主张和对外事务的处置是正确的，尤其是对西方的认识，促成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中国对外开放和近代化，以及对外政策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鸦片战争中，徐继畬作为抵抗派的一员，对于战败感到十分痛心。“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① 经过这次战争，他认识到中国积弱已久，敌国船坚炮利，要再打下去中国是很难取胜的。认为在中国国力没有强盛起来之时，唯有保持民夷相安，中外和好，避免引发新的争端与战争。道光帝也开始醒悟，力求补救，一再告诫徐继畬等海疆督抚大臣：“夷务尤当细心妥办”，“不可轻开边衅”。②

战后不久，徐继畬相继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巡抚。前后9年，他遵循道光帝的旨意，坚持“内定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上慰圣怀”③。他在任内认真办理中外事件，保证了民夷相安，中外和好局面。1846年3月（道光二十六年二月），福州接连发生英国人欺侮民人，英人、夷人互相斗殴事件。徐继畬在处置这一案件时坚持不偏袒的原则，同时要求地方官禁止百姓欺凌远人，也向英国驻福州领事阿利国提出严重交涉：必须严行管束夷众，以免激发众怒，不可收拾。1850年11月（道光三十年十月），既发生瑞典人被抢劫杀害的案件，也发生葡萄牙人行凶杀人案件，徐继畬即按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惯

① 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第107页。

② 徐继畬：《报接任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第14页；《谢政归里祭主文》，《松龛全集·奏疏》第4卷，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5页。

③ 徐继畬：《复官绅意见不合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第37页。

例，“分别照例处理”[1]。同年，又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医生租住神光寺事件。徐继畬坚持按上述原则办理，却引来了大祸，引发了一场大案，留给下文再作述论。

鸦片战争的炮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标志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无法推行下去，尽管封建统治者包括清朝当局、传统文人士子，以及无知小民仍在极力“关门”、“锁关”，但终究不可能了。二是唤醒了长期沉浸在“天朝大国”迷梦中的部分官僚士大夫，把他们推向重新认识世界、改造国家的道路。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以经世派为主体大力推行“更法”改革，以拯救腐朽的清朝统治；二是形成一股睁眼看世界，了解和探究西方世界的风气、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开眼看世界，研究了解西方，撰写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谢清高的《海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王柳谷的《海岛逸志》、潘飞声的《西海纪行》，到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林则徐的《四州志》、姚莹的《康輶纪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夏燮的《中西纪事》等，达 20 多种。其中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影响最大。这些著作对于打开中国人的眼界，打破陈腐的历史偏见，更新世界观念，推动国人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继畬撰著《瀛环志略》有偶然因素和适当条件，那就是他任职福建，“近水楼台先得月”，“春江水暖鸭先知”，能与西方传教士、医生、领事和商人有较多的接触，能够吸收更多的外界信息资料。尤其是道光二十三年底在办理厦门通商事务时，结识了美国译员雅裨理，向他“寻根究底”，“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并获得一批世界各国的图册与文字资料，引起他的很大兴趣。最根本的是他的动机。经过鸦片战争，他深知清朝国力衰弱，远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手，西方国家到底在哪些方面强盛？很有探究的必要。中西方的交往，无论是通商贸易、外交谈判、文化交流乃至战争，还会继续，必须知己知彼。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徐继畬花了整整 5 年时间，“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2] 该书记叙比较全面，

---

① 徐继畬：《交涉华夷命案疏》，参见《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132—133 页。

② 《瀛环志略・自序》，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

符合实情，在今天看来，当然也有不少地方错漏缺失，但没有损害他那时著书的初衷。

徐继畬著书的目的，就在于探求世界各国兴衰强弱之理，探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和强盛的原因，为清朝当局提供挽救衰亡提供各方面的借鉴。书中的按语很多，都是在叙述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气、历史沿革之后所发，就在于提醒国人尤其是当局者吸取各国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发愤图强。正如维新改革宣传家王韬评论的：“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中丞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① 阎锡山在为徐继畬全集出版所作的序文，对《瀛环志略》亦作了评说：“先生莅闽久，务得其强弱胜负之所以然，而不为旦夕功，曲意恣方，随事访维，大要不轻启衅端，亦之无间可入以服其心，而屈其计，而深识远虑。”②

《瀛环志略》一方面对英、法、美、俄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盛况与原因作了较多的介绍，如叙述英国的议会政治，赞美“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赞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与列国争雄。尤其是叙述了美国民主政治，赞美民主制度创始人之一、开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他认为美国“创古今未有之局”，华盛顿应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③ 在介绍这些国家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政策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预感到中国面临着严重危机，应保持着高度警惕和防范心理。与那些“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瀛环志略》另一方面对非洲、美洲，特别是印度和东西亚各地的沦亡史作了详细记述。如卷三《五印度》、卷七《英吉利》是这样叙述的：“欧罗巴各国之居印度，始于前明中叶，倡立者葡萄牙，继之者荷兰、佛郎西、英吉利，皆以重赀购其海滨片土，营立埔头。蛮人愦愦，不察萌

---

① 王韬：《瀛环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4 页。

② 阎锡山：《松龛先生全集·叙》。

③ 《瀛环志略》第 5 卷、第 9 卷，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

芽。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戍兵，养锐蓄谋，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于拉朽折枯，于是五印度诸部夷灭者十之八九，哀哉！"[①] 这在于警醒国人：印度的沦亡是为中国的前车之鉴，如果麻木不仁，等闲视之，不免要重蹈印度的覆辙。

他又以北欧瑞典为例，说："瑞国处穷发之北，在欧罗巴诸国中最为贫瘠，而能发奋自保，不为强邻所兼。"对此，他发出感慨："安乐者祸之萌，忧患者福之基，虽荒裔亦如是也。"[②]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轰动，既受到保守官僚及腐儒们的抨击斥责，说他"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③]，也得到经世派官员、维新改革者的赞颂，成为他们的启蒙教材；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赞扬和高度评价，认为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④]；"徐巡抚的研究，将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充分论据摆在他的国人面前"[⑤]，"将驱散中国统治者和学者们之中存在的夜郎自大和愚昧无知思想"[⑥]。

徐继畬通过对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著述，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探索，给予了重新认识，促成了他观念的转变、治国安邦政策的转变。他开始"突破"华夷之变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中央之国"，只是地球四大洲中的一国。认识到中国的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变朝贡制度为朝贡与条约并行的双轨制，让华夷关系、宗属关系转化为平等关系与平行外交。也认识到发展工商业可致国家富强的道理，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开始探究西方的民主政治，表达了某种向往之情。《瀛环志略》从根本上打破了虚骄气躁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摒弃了传统的"攘夷之道"。指出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一个崭新世界，世界是多元

---

① 《瀛环志略》第3卷，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第18页。

② 《瀛环志略》第4卷，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第33页。

③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82页。

④ 《中国丛报》第20卷，第169—194页。

⑤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映》，第42页，转引自［美］龙夫威《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4页。

⑥ 《中国丛报》第20卷，第192页。

的，世界各国是平等的。徐第一个指出“变局论”（“此古今一大变局”），发出“世变”的警示，他强烈希望国人，尤其是清朝当局卧薪尝胆，奋发自强，更法改革，共谋御侮，并提出备战和戎，平等外交的主张。这也是战后徐继畬的基本主张，在贯彻实行中却经历了崎岖曲折的道路。

三　和——战后的不同主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体面”地结束了。为什么“体面”？因为朝廷认为英国军队没有打进北京城，英国的使臣没有跑进北京城里吵吵闹闹，由几个地方官把他们“打发”走了，虽然赔了点儿小款，割让了一个荒岛，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天朝的“面子”保住了，没什么损害。

战后，受了点惊吓的道光皇帝总算从梦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战前战时的决策与举措，检讨外交方略——与外国人打交道，是否还应该一切照旧，照老祖宗的传统去办。面对现实，他终于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对内支持经世派官僚的“更法”改革主张，除弊、兴利、救时，以拯救清朝统治危机。包括兴农限田，养民救灾，改革财政、赋税制度，整治三大政即治河、漕运、盐务，改良武备，增强海防、边防力量等。对外推行“和戎”的政策，因为鸦片战争“教训”了他，中外力量悬殊，清朝一时是无法战胜英国的，必须改变强硬政策，以“和戎”维持中外和好相安的局面。于是他起用主和派人物，摒弃和压制主战派、强硬派的主张。虽然是被迫的，并不甘心妥协屈服。作为清朝皇帝，从维护清朝统治，维持和平安定局面，无疑是适时的，必要的。难道要让祖宗打下的江山毁在自己手中，或被“乱民”夺去，或被“蛮夷”抢走？道光帝的后期，正因为贯彻上述对外政策，才中外相安，没有捅出大乱子。而咸丰帝一上台，就改变这一政策，结果招致天下大乱，内外交困，几乎把清朝引入灭亡的境地。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徐继畬，作为道光帝亲信的臣僚，也是道光帝一手提拔的地方巡抚，主宰一方的安危，处理中外关系让其和平发展，关系到中国的大局和整体利益，当然任重事艰。在道光帝的最后数年间，徐继畬不折不扣、坚决执行皇上的旨意，内紧外松，既加紧战备，又极力安抚夷人，避免轻启衅端，极力化解矛盾，严防冲突再起，维护地方上的民夷相安、中外和好局面，是尽心尽责的，无可挑剔。也不应该因为他与强硬派的主张不同、处

理方式不同，而责难他，倒是要讨论强硬派在战后的主张和一系列措置是否妥当，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徐继畬身处海防第一线，亲临处置中外事件，目睹西方列强的力量，比起紫禁城里不知“世外桃源”的皇帝、北京城里大言不惭的言官、地方上摇唇鼓舌的士绅，要清醒得多。从鸦片战争的爆发与结局，他惊呼这是“古今一大变局”，“天下从此多事矣”①。这种清醒认识是难能可贵的，比起那些昏睡在“天朝大国”、“乾嘉盛世”美梦中的大僚士绅们的狂呼鼓噪，要宝贵得多。在一定的历史环境里，“战”是爱国的，“和”也是爱国的。徐继畬战时支持、参与抵抗英军的侵略，是爱国的；战后，转向“和”，也是爱国的。这基于他对形势清醒的认识，正确的评估，也是秉承道光帝的旨意办事。

和平时期（即使是战争年代），朝廷内外，大小官僚，还是多一些“和事佬”好。徐继畬的“和”，不是无原则的对外“求和”，而是在有备无患、无损国威国权的前提下“谈和”。“备战和戎”是他的基本方针。其原则首先是：“夷情浮动之际，巡防堵御固家讲求，而驾驭笼络，亦应参酌”，“总以制夷而足以服夷，自不致生事为要”；“外交德意，阴加钳制”；“积极暗中筹划，外面仍寂然无事”②。其次，遵约通商以“制夷”、“抚夷”。遵守签订的条约，按条约办事，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只能通过外交斗争、谈判加以修改。这是普行的国际准则。徐继畬紧守这一准则是无可非议的。他不像那些顽劣的官僚士大夫，把条约看成一张废纸，毫无约束之力，为此中外的矛盾冲突加剧。徐继畬坚守这一原则，也同样招来“群起而攻之”，祸由是起。由此不得不提及林则徐和神光寺事件。

林则徐是中世纪迈向近代的一个转型人物，新知识与旧观念并蓄，新世界与旧传统共存，交织于他的意识之中。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只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开眼”一阵子，战后，他“闭眼”了，回到“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旧轨道上来。这是他的潜意识，根深蒂固，很难转变过来。这时候，林已进入暮年，观念已经僵化，要焕发开放意识，接受新思想，是很难的。更不会调整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其实，林“开

---

① 《瀛环志略》卷下，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昧书室版。

② 徐继畬：《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再奉谕密防夷情疏》，见《松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下，民国四年晋版铅印本。

眼”见过世界，但他与清朝绝大多数官僚一样具有虚骄之气，并“不悉外情”，处理外交事务不是他的长处。加上他被免职，离开了广东与东南地区，到了大西北，西北风把他吹回中世纪、旧传统。因为他的免职与主和派人物有些关联，而耿耿于怀，随时准备反击。所以他战时主张“战”，战后坚持“斗”。所以他坚持要把侵略者与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重新关起大门。战时与战后，林则徐“开眼”又“闭眼”，“开门”又“关门”，很值得深思，也是晚清多次演绎过的故事。所以他支持广州的反入城斗争和福州驱赶外国人的行动。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谁也不会认为是错。但把外国人（传教士、医生、商人、外交官等）与侵略者等同，把他们赶出中国，那就错了。

“广州反入城斗争”持续了数年，被当作反帝爱国斗争长久传颂，尤其是把“白马图”一类荒诞无稽的传说大歌大颂（极“左”时期的各种著作、读物都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今天再来思考探索这场反入城斗争，总觉得有些不对味儿，不令人信服。应该说，这场斗争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而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称其是爱国斗争，没有错，不过是传统的、狭隘的爱国。称其消极影响大，其一，反入城斗争就是坚守闭关锁国政策，阻止对外开放，中外交流，不让中国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大家庭。其二，把外国人等同于侵略者，把国际友人一起推向侵略者一边，表现为盲目的、极端的排外主义。其三，违反国际法准则，破坏了中国在国际的形象。《南京条约》及稍后订立的善后条款都规定：“准许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往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①] 让英国人（领事、商人、传教士、医生等）进城，不是让侵略者（军队武装一类）进城，有何不可？上海等四口无论城内外，“听其往来”，“听其游处”，那里的人民、官员就不“爱国”了？倒是这些地方中外相安、安定祥和，为什么硬要去挑起新的矛盾冲突？其四，外国人进不了城，连广东各地的商人、买办（中外经济贸易交流的媒介，不应作其他解释），也望广州城而却步，跑到上海等口岸去了。为什么进入近代以后，上海的开放、发展那么快，广州相对落后，这个中原因，有必要深究。徐继畬没有“学习”广州的斗争方式，也不支持林则徐的主张。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册，第 35 页。



“和”，是战后徐继畬等人（包括道光帝）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与林则徐坚持“战”、“斗”到底的主张，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突出表现在福州神光寺事件。

1850年7月（道光三十年六月），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代替两名英国人（一传教士、一医生）租住乌石山下的神光寺，并获得侯官县令兴廉的批准、盖印。徐继畬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兴廉办理错误严加申斥。兴廉即向金执尔交涉，嘱令其搬出。金执尔声言候香港总督文翰批准后办理。徐继畬同意从缓搬迁。并为防止夷民冲突，采取了应对措施。通过外交途径和一定的程序办理事件，没有什么不妥。闽浙总督刘韵珂完全同意徐的处置方案。可为此引发了一场大案。首先是福州绅士造势驱赶英人，并扬言“某日定取夷人首级”。

恰在这时，林则徐转入了这一事件。他还在归乡途中暂住南昌时，就轻信无稽之谈：“英夷在福州乌石山下拆神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者无算。”为此大动肝火：“卧榻之旁有人鼾睡”①，岂能漠然置之？这年5月，他抵达福州。两个月后发生英人租住神光寺事件。林立即串联当地士绅书写公启质问兴廉，又联名上书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调兵演炮募勇，强行驱逐神光寺及福州城内外的所有英人。徐继畬以条约所载，有碍邦交，不宜造次，主张“按约理论”，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未接受林的建议。一不做二不休，林再次联络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发起“京控”，奏责刘韵珂、徐继畬。其中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工科给事中林扬祖，湖广道御使何冠英。参奏接二连三，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

恰在此时，道光帝“驾崩”了，事态急转直下。道光帝坚守“夷夏之防”，支持地方士绅驱逐外国人，拒见外国使团，试图重新关起国门，并且仍然按传统由地方官去处理外交事务，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地方官岂能代表中央政府，代表整个国家办理外交，又有几个地方官能够办好。而继位的咸丰帝和他起用的一批又臭又硬的“地方外交官”（如叶名琛之流），更是把冲突推向极端。

在上下连续的参奏下，咸丰帝即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查办刘、徐及神光寺事件。而徐广缙在未收到查探实情的委员禀复，就先入为主，肆意参奏刘、徐，甚至以谣言为实据，奏请惩办刘、徐二人。虽然后来得到实情，

---

① 林则徐：《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93页。

加上新任闽浙总督裕泰上奏查明实况，刘、徐没有措置失宜之处，但刘韵珂已经辞职，徐继畬仍然被免职，已无济于事。

咸丰帝上台后，为了雪耻，从京城到地方，几乎把主和派官僚全部驱赶下台。既强硬又昏瞶无知的叶名琛之流上台执政后，“耻”没有“雪”，反倒招来更大的耻辱。广州反入城斗争，神光寺事件，地方官办外交，外交使团拒进北京城，视条约为废纸，拒谈改订条约（1842 年《南京条约》规定 12 年后谈判改订条约，遭到清廷上下拒绝），已经使中外冲突不断加剧，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由自视清高、对外界茫然无知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处理外交、通商事务，以“不见、不谈、不和、不战”应对西方的索求，更是激化了矛盾。殊不知西方列强再次以侵略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叶名琛战败被俘，流放到印度加尔各答。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咸丰帝也在忧愤中死去，历史又轮回到一个新起点，揭开“同治中兴”的新局面。其标志是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天下重归“太平”，中外战争结束，与西方国家重归“和好”。关键在于从中央到地方起用大批新人物，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由他们主政推行“内须改革，外须和戎”的内外政策，洋务新政应时而发，中外交流广泛展开。1863 年（同治二年），徐继畬重入政坛，先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主持京师同文馆。参与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历史对他的肯定性评价。以“战”打天下，以“和”治天下，历史就这样在反复交替中前进，历史人物也就在历史活动中展现他的真实面貌。

（徐松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从“畿服”到“瀛环”

——晚清对世界地理空间认识的转变

王尚义　张慧芝

人类所推行的制度文化与其对地理空间及其存在形式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文明进程就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天下观”休戚相关。先秦时期，中国人形成了天下由“九州”组成，而中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认识，这一认识与按照空间距离以“五服”为等级划分的社会空间秩序相结合，就形成了以“畿服”理论为核心的地理认识，“畿服”结构是历史上支配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结构的主导理论。与之相应，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一直带有“以天下为一家”的浓烈主观色彩。其直接后果是，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九州”、“畿服”等地理空间认识上的错误，成为清政府抗拒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依据，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19世纪末，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继畬在所著《瀛环志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瀛环”一词①，首次把整个世界描述为“大海所环绕的陆地”，标志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论到近代地理学的转变，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领域的近代化进程。

一　传统“畿服”理论对世界空间的认识及其影响

1. “九州”、“五服”等传统“畿服”理论的主要内容

《尚书·禹贡》托名为大禹所作，从内容分析应为战国后期作品，书

① “瀛环”一词，可能为徐继畬最先使用，参见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日]《中国研究》，1996年元月号，卷首。

中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范围大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地理内容更为广泛。因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关于九州的其他提法，如《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和《吕氏春秋·有始览》等，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如《尔雅·释地》有幽、营州而无青、梁州；《周礼·职方》有幽、并州而无徐、梁州。“九州”后成为中国人对“中国”疆域范围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等均取此意。

此外还有“大九州”一说，中国是其中之一州。战国时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谓“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①]。《淮南子·地形训》进一步解释为：“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沛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②] 杨树达以为所举九州，自正中冀州与《禹贡》九州之冀州偶同外，余皆名号差异；其称东南神州，与邹衍所称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者相合；疑该篇乃取自邹衍之书，所举九州之名即邹衍所称之九州。[③]“大九州”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后被借用来泛指天下，成为整个世界的代名词。

“畿服”理论则是对“天下”这一空间的填充和划分，认为空间不是均匀分布在世界表面的，而是分等级的由内向外、由中心向边缘的延伸，相关论述见诸《尚书·酒诰》、《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等文献中。如在《尚书·禹贡》在“九州”划定后，又列“五服”于后，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由于“九州”与“五服”的建立，于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此外，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有“四海、九州”之说。汉代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据唐代训诂学家

① 《史记》第74卷《孟子荀卿列传》。

② 《淮南子》第4卷《地形训》。

③ 杨树达：《邹衍九州考》，参见《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

颜师古解释："八荒，乃八方荒芜极远之地也。"那么，四海呢？《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有人认为，"四海"是围绕"九州"四面的海。《礼记·祭义》则具体提到了"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为"四海"，只是没有明确海域。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则说"四海一也"，认为"四海"是连为一体的。"四海"环绕"九州"，而中国则居"九州"之中。

中国古代"九州"、"五服"、"四海"等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之前。

2. 传统"畿服"理论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天下"概念，之所以成为最大的空间单位，是把"外部"包容在"天下"空间之内的结果，这里的"外部"，不是指"天下"之外的外部，而是指"天下"之中的外部，即与中心相对的边缘部分。对此，北宋石介有段著名的论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①] 意即中国居天下之中（内），四夷居天下之偏（外）。《礼记·礼运》篇明确表述为为"以天下为一家"的观点。"畿服"理论所蕴涵的中国与四夷"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思想[②]，最终形成了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整体格局[③]。

"畿服"理论最终确立了"中国"和"夷蛮戎狄"按照地理距离体现出的亲疏关系、等级秩序图谱，它所包含着"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夷夏"等级思想，即使到了清朝这种空间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如《清文献通考》的总按语中称："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

"以天下为一家"，而中国处于"天下之中"，这种出于臆想、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地理空间概念，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对"中国等于天下"错误认识的荒谬解释，因其消解了"外部空间"的地理

---

①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卷，第116页。

② 《荀子》第10卷《议兵》，《四库全书》电子版。

③ 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概念，也就意味着消除了“地理空间”的危机意识，因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秦汉以来的中国几乎都是采取内向型发展模式，处于一种类似“夜郎自大”的妄自菲薄状态中。在19世纪以来，“九州”、“畿服”等地理空间认识上的错误，更成为清政府抗拒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依据，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二　近代“瀛环”思想所体现的世界地理空间概念的先进性

体现中国传统社会对世界空间认识的“畿服”理论，一直为中国政府、人民所信奉，直到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绘的世界地图进入中国，为了与中国原有的天下概念相区别，利玛窦将自己的世界地图称为《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以地球为一圆球，把东、西方两个已知世界汇编在同一幅地图上，引进了南极洲、南北美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理概念，并且第一次在中文地图上，使用了赤道、回归线、极圈、南极、北极等名词，又以赤道、回归线、极圈分地球为5个气候带，把地球纬度和气候的密切关系，也标示于图上。这张原本可以为封闭的中国人打开一扇观察世界之窗的地图，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只在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流通，普通百姓并不知晓；此外，社会上层也多对中国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在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也不得不将中国改置于世界中央。所以，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世界概念，并未能使中国人走出“天下之中”的臆想。

直到晚清在内外危机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在一批接受西学的爱国知识分子，诸如魏源、徐继畬等推动下，中国传统地理学才开始发生缓慢的嬗变，近代科学地理学思想才开始逐步为国人接纳，地理学所蕴藏的社会文化启蒙功能才开始警醒国人。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是其间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空间整体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也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继畬的地理、历史、政治等思想主要体现在《瀛环志略》一书

中。其中“瀛环”一词，可能为徐继畬最先使用①。按照《康熙字典》的解释：“瀛”，“海也”；“环”，“绕也”，“回绕也”；“志”，“记也，与誌同。或作识”，“识，记其事也”；“略，约要也。不详也”。简而言之《瀛环志略》的字面含义就是“对大海所环绕的陆地的简单记述”。

徐继畬首次把整个世界描述为“大海所环绕的陆地”，《瀛环志略》这一命名深刻地体现了晚清时期一部分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地理空间认识的飞跃、质变。它标志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论到近代地理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领域的近代化进程。

《瀛环志略》共10卷，约14.5万余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这部著作中，徐继畬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该书把整个世界描述为“大海所环绕的陆地”，而中国只是占据了陆地之中一块普通地理空间等认识。《瀛环志略》一书中所蕴涵的先进思想，对国人睁开眼睛来看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徐继畬知道地球上是水多地少，大地如同浮在水面的岛屿一样，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全世界也。“瀛环”自被徐继畬用以表示世界的概念以来，在晚清盛行了很长时间，至世纪之交才为“世界”一词所替代。“世界”原是佛教语，后被用来翻译world，才赋以现代的意义。《瀛环志略》的命名标志了中国人走出“天下”禁锢的开始。

2. 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瀛环志略》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徐继畬首次使用“瀛环”一词，把整个世界描述为“大海所环绕的陆地”，而中国只是占据了陆地之中一块普通地理空间等先进认识，不仅对国人睁开眼睛来看世

①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日]《中国研究》1996年元月号卷首。

界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其更为显著的作用，是改变了中国人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的传统模式。

《海国图志》既是以海国视四夷，自然在书中不提中国，视中国在海国之上。而《瀛环志略》既是以瀛环为世界，自然要把中国摆在其中，因此徐继畲很自然地把皇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之后。在当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昭示着对“天朝大国”地位的变更，所以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甚至包括一些已经接纳近代思想的先进学者。

当时著名学者张穆，是徐继畲好友，专擅西北史地，也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但是，当徐继畲把该书刻好的头三卷送给张穆后，张穆一方面十分称赞《瀛环志略》，同时却把徐继畲置中国地图于亚洲总图之下的做法看得很严重，“上纲上线”到春秋大义的原则问题上去，张穆说：“本朝舆图必应那（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尊说不必更动，即已吻合。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防。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至周孔之教不宜重译，正如心之精神不淆于脏腑，倘有邪气攻心，则卢扁为之色变。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而负谤至今。”[①] 劝徐继畲把中国地图放在亚洲地图前面。既然张穆都这样看，其他人的观点，特别是保守派的观点只会更加偏激，于是徐继畲只好违心地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亚洲全图之前，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版本。今天再读张穆的信，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要走出“天下之中”的观念有多么难，而徐继畲的思想在当时是如何地走在其他先进的中国人的前面、并起着启蒙作用，又是怎样地难能可贵。

3. 中国人开始走出“天下之中”的盲目自大

在徐继畲如实描绘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诸如“天朝上国”等根深蒂固的并非理性的社会性观念亦被轻而易举地打破。尽管书中也有“坤舆大地以中国主”等话语，但从徐氏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置亚细亚图之后，可以看出徐氏对中国真实的地理位置已有相当认识。

---

① 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㞐斋文集》第3卷，《山右丛书初编》第11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中国既非“天朝上国”、“世界之中”，那么地球上的其他国家自然也就不是对中国俯首称臣的“畿服”之地，那么又该如何对待西方列国，尤其是如何看待英国呢？

《海国图志》则比较简单，一个“夷”字蔽之，这也是沿袭数千年的思想。《瀛环志略》既是世界地理图志，徐继畬在书中就努力恪守了以下原则：必须视各国为平等，不能有华夷之别；不但如此，还必须客观地描述各国的地理情势，而不能以自己的喜好随意褒贬。《瀛环志略》除了个别地方引用他人之语外，徐继畬本人所写不用夷字，当时距鸦片战争之败仅五六年，面对国家的大敌英国，他亦然客观地称为英吉利，而不称英夷，英国领事，他称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这在当时几乎无人做得到。徐继畬的做法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是会被扣上“张大外夷”、“张大英夷”等帽子，受到国人谴责的，更不用说接受了。事实上，“张大外夷”等罪名不但当时，而且在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套在徐继畬的头上，《瀛环志略》也被宣布为禁书。尽管如此，徐继畬所提出的先进思想，依然如春风开始慢慢冲破坚冰、带来近代的信息。

三 结语

鸦片战争的屈辱，使得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痛定思变，中国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其间以徐继畬为代表的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其冷静与客观的态度来认识世界，而且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了中国自身。《瀛环志略》不但是他对世界地理空间的重新认识，而且反映了他走出禁锢的中国国门、进入整个世界空间的心路历程，也是近代中国启蒙学者内心深处凤凰涅槃的过程。所以，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最伟大历史功绩，是教会了国人如何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身。

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自己原来认为《瀛环志略》对伦敦繁华的描写肯定言过其实，实地一看才知道果真如此，并感叹徐氏从未到过西方，但“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王韬、康有为都不止一次谈到《瀛环志略》对自己了解世界、研究“西学”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直言自己 17 岁时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此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将此书列为重要的

必读“西学”书籍。他后来写道：“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书介绍的西方或曰现代地理知识“颠覆”了传统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与在日本却大受欢迎、被多次翻刻并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恰恰相反，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著作，在国内发行伊始就遭遇到批判、抵制。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瀛环志略》书中所蕴涵的先进思想才为国人接纳、重视，总理衙门才重刊此书作为同文馆教材，开始宣传其进步思想。

总之，这部启蒙之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也即启蒙思想在中国曲折命运的一个缩影。

（王尚义：太原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张慧芝：太原师范学院副教授）

开放与传统

——徐继畬的二重性

雒春普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之一，徐继畬具有开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世界观，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关注，以及他为《格物入门》一书所作的序和他在“赠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辩”等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士子，徐继畬的身上又打着不可磨灭的传统的烙印，他忠君、他推崇八股文、他为了子嗣而纳妾……。开放与传统的二重性，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它与徐继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不无关系。

一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官广东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太仆寺少卿、同文馆总管事务大臣。是与魏源、林则徐同时代的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之一，他所著的《瀛环志略》是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史地著作，并成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追求新知、力图自强的重要启蒙读本之一，对促进国人开阔视野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有强烈开放意识的徐继畬。

1. 世界观里看世界

徐继畬生于1795年12月4日，就在他诞生的前两年，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开展中英贸易的要求，关紧了本来可以打开的大门，然而这扇大门却又不得不在半个世纪之后，在一种屈辱的情势下被迫打

开。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那扇厚重大门的被迫打破，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出现了。但是由于观念的长期禁锢，使得这些先进人物的大多数不能不带着主观意识看世界。“他们的眼睛是睁开了，但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一个比过去大大扩展了的新‘天下’，而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新天下里，四夷被推向全球，而中国仍被当成是主宰天下的天朝大国。”①

在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里，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甚至模糊不清，连汪洋大海，都成了中国疆域的护城河。清时更甚。“利玛窦来时，就发现中国人不知道有地球，而自以为居中，他带来中文版《山海舆地图》，想奉献给万历皇帝，又怕皇上嫌地图上‘大明’不大。可出乎意料，皇上竟然格外赏识，还命其复制，赏赐太子。清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又退回到了《中国论》和《华夷图》时代，在天下观里自得其乐，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路行来，并未走出天下观和《华夷图》的视野。”②

徐继畬则不同，他在办理通商的实践中，逐渐使自己的敌忾之情平息下来，冷静地观察外部世界，从而得以突破“华夷之辨”的藩篱，走出传统的“天下观”，把中国放进世界之中，开始平静地看世界，客观地把世界地理知识贡献给国人，试图使国人能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己的国家，从而发奋图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完成，10卷本，洋洋15万言。在这之前的1841年他仍称英国为“逆夷③”，在《瀛环志略》的过渡本《瀛环考略》中，他仍用“夷”称西洋各国，而《瀛环志略》则全部删除“夷”字，代以“洋”、“西洋”。这反映出徐氏是较早跳出传统“华夷观”，理性看待外域的先觉者④。从这个意义上讲，《瀛环志略》就成为徐继畬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徐继畬的世界观则集中体现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上。

---

①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日]《中国研究》杂志1996年元月号卷首。

② 李冬君：《儒脉斜阳》，《领导者》2007年第4期。

③ 转引自[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④ 冯天瑜：《〈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中华文史网。

首先，他既不用“天下”，也不用“海国”，而是用“瀛环”，为其书命名。“瀛环”是个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也不属于“王土”。用天下观来看，这真是见所未见，匪夷所思的事情。可“世界”就是如此。

其次，他基本接受了西方地理学说将世界分为四大洲的理论，即以四大洲和五大海来划分当时的世界，这在地理学方面比他同时代的魏源前进了一步。魏源的《海国图志》仍是坚持佛教中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的说法，而且认为美洲就是西牛贺洲等。[①] 而《瀛环志略》在介绍世界时则明确说：“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一作利未亚）。此三土相连，在即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除介绍世界各洲的情况外，徐继畬还分卷阐述了每个洲的若干区域的若干国家的具体情况，并且附有地图，各个国家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陆、海军规模都用数字来说明。这是近代区域地理学说的具体运用，比当时普通的地理著作更科学。另外，对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当时的世界强国给予了客观的介绍和评说。在介绍英国、法国时开篇分别即写英吉利、佛郎西“欧罗巴强大之国也”[②]。在介绍俄罗斯时称“外夷第一大国也”[③]。在介绍美国时说：“米利坚，亚墨利加大国也。”“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④] 更为可贵的是，他从政治地理的视角出发，指出了日本国是中国的一个隐患，指出了中国海域和内陆边疆可能发生的其他危险。可见，徐继畬已经注意到了世界是由许多强弱不同的国家构成的，是多元的，中国属世界中之一国。

2. 关注西方民主制度

经历了漫漫两千年的封建体制，在跨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徐继畬是一位先行者。

“在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之初，林、魏和徐继畬都是睁眼看世界的代表

---

① 铁建晓：《谁人为解绿丝绦——谈徐继畬及〈瀛环志略〉》，《书屋》2004 年第 12 期。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6、244 页。

③ 同上书，第 121 页。

④ 同上书，第 298、319 页。

人物，徐在《瀛环志略》中介绍西方史地人文的翔实方面还有其突出的优点，有很大的启蒙意义，但它没有直接地回答中国面对这样的世界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它没有如林、魏那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①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结论就不同了。林、魏及其《海国图志》特别注重和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其着眼点只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徐继畬看问题则更深一层，他不但看到了中西方技术上的差距，而且把目光投向制度层面，在《瀛环志略》中，他在介绍西方国家时，几乎无一不谈它们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这些介绍，对19世纪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与肯定。

对于英国，他着重介绍了议会制度，"英国之制……都城有公会所（即议会——引者）。内分两所，一曰爵房（贵族院），一曰乡绅房（即平民院——引者）。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②

在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时，他着重介绍了选举制度：联邦之中"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副统领有一员者，有数员者）。以四年为任满（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另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即州）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③。

《瀛环志略》不仅特别注重介绍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且明确

---

① 《王庆成序》，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③ 同上书，第300—301页。

表示了对这些制度的认同和赞美，认为欧美“公器付之公论”的政治制度是高尚而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使欧美等国走上富裕之路的重要原因。他称赞首创美国选举制度的华盛顿：“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于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① 他称颂美国的选举制度：“使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②

在与其同时代的大多数士人还徘徊在“天下观”里的时候，徐继畬已经把对西方的关注由物质层面进一步转向制度层面，并从中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其开放的眼光，更深层次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如张其昀先生为《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所写的序文所指出的：“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③“惟松龛先生所异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各名臣者，即由于博学卓识，志愿宏伟，深谋远虑，洞达世界列国之国情，慨然知新时代之趋势，与我国立国之要道。”④

3.《格物入门》序和“赠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辩”

同治四年（1865），在遭受贬黜13年之后，徐继畬奉旨扶病到京，两宫皇太后慰劳，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补太仆寺卿，然后又被安排到一个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职务上——担任了新设立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19页。

② 同上书，第301、318页。

③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初版。

④ 同上。

之同文馆的总管事务大臣。

如果把同文馆比作中国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大学的话，那么徐继畬就是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同治六年（1867）正月，徐继畬担任同文馆总管大臣后即着手对同文馆的教学进行改革：一是确定了同文馆的办学方针：兼容并包，智周无外。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滥觞，这一胸怀博大的方针可以看作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先声。第二是聘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把这所单纯培养外国翻译人才的学馆，演变成为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多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综合性学校。这两件事情被认为是“奠定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也成为学生必读的教材。

同治七年（1868），徐继畬为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作序，称：“泰西之学，始于利马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说，未之详也。余顷戴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余暇辄引与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粗知大略，至于格物之学，未暇及也……《格物入门》一书……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且一一可以见之实事，与他人之驰骛元虚，其语不可穷究者，盖判然矣。”①

同年10月21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将一幅华盛顿的画像赠送给徐继畬，并且热情洋溢地致辞：“在将近二十年前，你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国界之外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你大量的劳动，正确的判断，以及你们国家了不起的学问。你通过考察你记载的各个国家的伟大的人物，从而把华盛顿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不仅如此，你还把华盛顿置于你们自己国家所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首，并且宣称，它复活了放射光明达四千余年的三代的清澈德行。这些话语，已经被充满感激之情的华盛顿的国民们所翻译和引用。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并且越过陆地和海洋，送到你的手中。……今天，我以美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殷切地希望，今后你和你的同胞，在看到这件有价值的纪念品的时候，永远能够回忆起美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永久的友谊，

① 转引自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以及对你的热爱和尊敬。”①

徐继畬的答词毫不隐瞒自己对华盛顿的赞美之情：“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②

徐继畬的答词表明他接受并同意蒲安臣的观点和说法。“他为丁韪良《格物入门》作的序，和美国驻华公使向他赠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辩，表明他在历经挫折后，晚年的思想仍居当时中国思想界前列，具有全球性眼光和历史的宏观角度。”③

徐继畬并不是一个说教者，他只是平静地把客观的世界地理知识贡献给国人，试图使国人能通过认识世界来认识自己的国家，从而发愤图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自己是由研究地理出发进而具有民主思想，他的《瀛环志略》也使不止一代的士子走上同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不但魏源无法与他相比，一些比魏源更加出色的人物也难于与他比肩。所以，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之一，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成长，成为晚清风起云涌的近代学术思潮的启蒙著作之一。

二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士子，徐继畬的身上又打着不可磨灭的传统的烙印。

1. 推崇八股文，恪守儒家理学

美国的德雷克曾指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曾经探讨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制度，令人费解的是，八股文却是他的真正的爱好，而这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167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③ 任复兴：《同文馆事件：中国近代化的严重挫折——兼谈徐继畬在其中的角色》，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种文体在后来的维新者们看来却是声名狼藉的。正如日本早期维新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一样，徐继畬也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他公开地攻击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在行为上仍有守旧性。”①

清朝道、咸、同三朝，八股取仕之风仍很盛行。八股文亦称时文，毋庸置疑，徐继畬对此是相当精通的。其理由：一是他的父亲徐润第身后所留时文二百八十篇，由尚在闽抚任上的徐继畬编辑雕板题为《敦艮斋时文》问世，而且他深知其父在介休教八股文的“布局分股之法”。二是徐继畬困于礼闱十三年，精研了八股文写法。他为了使学生尽快掌握时文的精髓与技法，创造性地运用了三个方法：其一，命题后和生徒同时作文，然后将自己所作时文交给学生比较研究，从中获得教益；其二，从明清两朝时文中选出自以为精粹的三十二篇，分为机法、理境、笔路、议论四编，每编各八篇，题为《举隅集》雕板印刷，以使学生能够“举一隅而三隅反”；其三，对卷帙浩繁的八股文集《小题明文》择选加以评注，供生徒阅览。为使自己的学生尽快成才，考取功名，不惜将从不示人、毕生批注的《后汉书》借给生徒阅读。

罢官后的徐继畬，更是把忠君爱国的热忱毫无保留地用之于教授生徒。“十年间，他也确实造就了一些举人、秀才。他虽在教学方法上有所革新，但教学内容却是陈旧的。”②

同治八年（1869）三月，徐继畬以老病“乞致仕”，重返故里五台县东冶镇。

当时举业尚盛，许多人闻名来执弟子礼。同治九年（1870）春天，五台县请他为崇实书院的明伦台书写楹联。所书联语是：学以明人伦也，若为功名富贵而来，发足便已错了；道在求放心耳，徒工语言文字之末，到头成个什么。此为其父徐润第知施南府时为书院所撰。徐继畬重书联语，表明他“恪守家风”的夙志不改。联语中表现的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徐继畬一生信守并践履的。这也正如他写给继子徐树的《训嗣子树》中所说：“读书专为明理，世乃视为科名之计，误矣。读书而不明理，纵使中得举人、进士，考其存心行事，乃不如乡党自好而目不识丁之人。出而为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142页。

② 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吏则但知要钱，吏治民生全然不顾，名节廉耻全然不顾。国家开科取士，要此等读书人何用？”

2. 忠君爱国，竭力报效皇恩

徐继畬的一生，是廉吏、学者、爱国者的一生。

徐继畬的爱国思想是和他的忠君思想融为一体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中爱国者们（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共同特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悲剧命运之根源所在。他们的爱国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爱国与忠君发生矛盾时，他们服从忠君（这种服从常常表现的特别真诚），而不得已放弃爱国行动。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陶冶，儒学中“君为臣纲”等糟粕部分，窒息了他们爱国思想的发挥和发展。

徐继畬是道光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对道光帝的知遇之恩，他感激涕零：“十年之中，由知府擢任封圻，方虑材轻任重，陨越堪虞。……以孱弱之才，骤膺艰巨之任，臣惟有殚竭血诚，力图挽补，尽其心之所能尽，为其力之所能为，断不敢畏难苟安，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①] 因此，他对道光皇帝唯命是听。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主战，他竭力尽心，“捐縻图报”。

徐继畬在闽任职后期，对“外夷”由主战转而倾向主抚，这个转变基本与道光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转变是一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清朝皇帝带来了严峻的心理阴影，从道光帝到咸丰帝，他们总是期望“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这样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他们总是在民与夷之间走钢丝。徐继畬由主战转而主抚，在神光寺事件上矛盾重重，无法走出困境，这一切与此都不无关系。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以焦头烂额之地，值山穷水尽之时，并以抚局既定，奉命专办通商事务，困心棘手，不可名言。继畬谨守先训，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力图补救。”[②] 显而易见，这是他进退维谷尴尬处境的自我剖白。

---

① 徐继畬：《奏谢恩调福建巡抚新任并遵旨返回赴任折》，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 页。

② 徐继畬：《谢政归里祭主文》，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9 页。

3. “不孝有三”，传宗接代为重

徐继畬十七岁时与崞县西坡头村续锐之的女儿续戴月结婚。续戴月是继畬之母续夫人的娘家侄女，二人的结合俗称姑舅亲。婚后，续戴月在连生二女都相继夭折之后再没有生育。为传宗接代，徐继畬曾先后纳二妾。一妾在汀漳龙道任上生一女，取名漳生，不幸夭折。罢官归里后妾又生一女，取名松芽。在闽抚任上，续氏殁后徐继畬即同堂兄服先商谈是否续弦，有家书云，“弟已定退局，遭此一事，更无疑义，将来弟回时，带伊（指元配续戴月）灵柩同回，亦所谓白首同归矣。至弟以后之事，甚觉为难，若欲续弦，在宦场中甚易，然在以官为家者则可；弟已定引退之局，南中妇女岂能过吾乡日子？若在家乡续弦，则吾乡风俗，谁肯以室女婚五十以外之翁，即使有之，而头童齿豁，乃薙须作新郎，岂非笑话。最宜者青年后婚，既能生育，又可持家。而二品大员万无娶再醮之例，且弟痛念亡妻，此位亦不欲使他人再占。既不续弦，则惟有买妾，燕姬人固平善，苦于蠢蠢无知，生育尚可望，断不能使执爨，必须在家乡物色一能学习家计之人方妥。此事甚为不易，貌好者易得，性良者难得，吾乡贫薄小户之女，亦不肯与人为妾，倘竟有之，则最为合式，乞吾兄一留意焉。以家道而论，无嫡则无主脑，后事可危。弟此时总以子嗣为第一要义，嫡庶之难处，已深知其味，不如纳妾之事权在我，不至有许多牵制耳。”①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使徐继畬非常不安，“处揣凉德，未能早生子息以绵血嗣，诚无以仰对先灵”。于是，查阅《徐氏宗谱》，择选徐氏各支人丁。得知其三叔祖的孙子徐继壎与自己同辈，壎有二子，次子年甫五岁，“筹思再三，惟过继此子实恰中心之愿”。宗族人等经商议，接受他立嗣的意见，并写立继约，遂命名继子曰徐树。②

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时，表现出的独立见解和坚强意志，使他从晚清颟顸的官僚群体中脱俗而出。他“不惜以个人遭受谴责为代价引进西方知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过，徐继畬并不是中国传统的

① 徐继畬：《致服先堂兄书》（附），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1—702 页。

② 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 页。



叛逆者”[①]。为“传宗接代”而纳妾、过继嗣子，确是徐继畬这位“睁眼看世界”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宿命。

三

美国历史学家德雷克教授在《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一书的结论中说：“徐继畬由于履行公职之故开始面向大海，而正是从这大海之上，吹来了信息与思想的新风。”[②] 徐继畬“开放”的一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之于他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任职经历。

徐继畬任职广东、福建时，恰值东南海疆多事之秋。为了深入了解外部世界，他在广东时结识第一个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福建更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甘明，英国博物学家、首任驻福州领事李泰国及夫人，继任领事阿礼国及夫人，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等有所接触，逐步“了然于世界大势”。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应属雅裨理。徐继畬后来追忆：“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③] 雅裨理则这样评价徐继畬：“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④]

另一传教士乔治·史密斯称徐继畬“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时的一位下属官员赠送的”[⑤]。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任职通商口岸的经历和办理“夷务”的实践，就不会有“开放”的徐继畬。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0 页。

② 同上书，第 149 页。

③ 《瀛环志略·自序》，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 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6 页。

⑤ 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伦敦，1847）。

另一方面，徐继畬的成长过程，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他所处的大环境，又使他不可能彻底突破传统，真正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

徐继畬始祖才甫，明洪武年间由马邑县（今山西朔州）迁居五台县滹沱河南岸的建安村，开垦为生；九世祖腾芳，顺治五年武举，卢州府守备，封明威将军；祖敬儒，乾隆乙卯举人，官至九江府同知；父润第，字德夫，号广轩，乾隆乙卯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典籍、储济仓监督、施南府同知，与《红楼梦》续者高鹗同榜，且有深交。徐润第平生鄙弃学究训诂，学问渊精，且崇尚经世致用，其承继传统又别树一帜的学识自然给幼年的徐继畬相当的影响。

此外，徐继畬母系崞县（今山西原平）西社村庠生续昶之女，知书识理，“是徐公的启蒙老师”。徐继畬“幼年还受教于他的爱好桐城派、反对训诂派的堂舅续克家。十一岁至十五岁，在京受教于其父与进士王月潭，研讨《史记》、《汉书》，与唐宋八大家古文，兼学八股文。十八岁应县试、州试，均名列榜首。十九岁应乡试中举人。后又随父在河南光州，随堂叔寅第在河间府勤攻经史十年，三十二岁中二甲第八十名进士，朝考第一，名曰朝元，朝考文题为《政在养民论》，阐述了内圣外王，以德治民的传统儒家思想”[①]。

徐继畬出身于这样一个耕读兼官宦之家，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影响无疑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徐继畬所处的晚清道咸同年间，正值“西学东渐”，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社会处于大变革前夜。“徐继畬集对中国的防卫和生存的忧患意识，和承认全世界各种知识的理性和心理的结构于一身，他就能把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自己的中学根底融合到一起。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他向中国的维新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②] 于是，徐继畬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瀛环志略》。

与此同时，正如德雷克在《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一书中所指那样，“在向北京的奏疏中却显示出他仍然能强烈感觉到西方的威胁。1848年底或1849年初徐继畬与刘韵珂会衔上奏的奏章中，控诉了‘汉奸’和夷人的勾结，并一再重复‘夷性犬羊’的陈词滥调。显然，书斋中徐继畬

---

① 徐士瑚：《放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畬》，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70 页。

②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0 页。

认定的客观事实，与官场中徐继畬担任的角色是不相统一的。为了官场中做事方便，他只能使用一些当今莫名其妙的说法。”[①]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集“开放”与“传统”于一身的徐继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兼收并蓄地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向中国的维新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屈从于传统，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社会的主流意识。

以《瀛环志略》为例：

正是出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徐继畬主观上没有赋予《瀛环志略》过多的治理社会、匡扶时世的使命，而是用一种“微言大义”式的思想意象来认识世界，介绍世界，因而全书给人一种相对真实可信、公正平允的感觉。比徐稍晚的郭嵩焘在出使英国后曾叹服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②] 由此而论，《瀛环志略》的科学价值远远高于同时代同类之作。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纸上谈兵”，更由于其自身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所以《瀛环志略》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对新世界作出准确无误的把握，有时反而会附会事实，回归传统。这种创新与恋旧集于一身的特色其实是中国近代化整体进程中一种鲜明、独特的色调。

不可否认，《瀛环志略》对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仍然有很大的不足，这主要不是指它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或其他状况的描述中出现的差误，而是指它在吸收近代科学知识方面所表现出的保守和胆怯。例如他明明已经了解到“亚细亚以中国为主”，[③] 但在正式定稿时一定要将之改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④]”，等等。

1847 年《瀛环志略》书稿完成前，徐继畬将已定稿的前三卷寄给张穆[⑤]，并致函，请予指教。函称：“……海国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记，得即摘录。其书皆俚而不成文，而事迹颇有可采。每与夷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 页。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③ 徐继畬：《瀛环考略》，转引自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2 页。

④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⑤ 张穆（1805—1849），山西平定州人，舆地学家，著有《蒙古游牧记》等。

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新闻。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巨观，惟其中舛误亦不少，如以北海西岸之瑞典与日耳曼南面的瑞士相混，大者如此，著述之难精，盖可知矣。”信中舛误不可观的“前稿”，就是《瀛环志略》最初的手稿——《舆图考略》。[①]

张穆在收到徐继畬所送手稿与函札后即复信称：“松龕先生阁下：腊杪得手书，深戢注存，感谢感谢。示读大著《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据之精，文辞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近数十年来，惟徐星翁《西域水记》有此赡博，拙著《蒙古游牧记》非其伦也。第三卷述印度及印度以西各国，摭实证虚，一一精辨。……再就肤末之事而言，本朝舆图，必应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尊说不必更动，即已吻合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至周孔之教不宣重译，正如心之精神不淆于藏府，倘有邪气攻心，则卢扁为之色变。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尔负谤至今。”[②]

一语惊醒梦中人，正是缘于张穆在复信中“最严内外之词”，“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尔负谤至今”的警示，《瀛环志略》在1848年付梓时，“亚细亚以中国为主[③]”就变成了“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

尽管如此，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一个是开放革新还是因循守旧的历史选择中，徐继畬仍然不失为一位目光深邃的佼佼者。今天，我们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和残存的体制积弊，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先驱所具有的超前的历史视野和宏观性的全球目光。徐继畬及其传世经典《瀛环志略》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雒春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室主任、研究员）

---

① 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② 《山右丛书初编》，转引自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③ 徐继畬：《瀛环考略》，转引自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郑大华

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清政府的腐败和妥协，最后以中国失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而结束。洋洋中华帝国，竟被一个远道而来的“岛夷”打败，这就不能不使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们“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①]。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会被打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②]。于是，他们发愤著书，以介绍海外情事为己任，成了晚清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之多。[③]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借用19世纪著名思想家王韬的话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④] 而且这两部书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海国图志》的50卷本（1842）和60卷本（1847）出在《瀛寰志略》之前，而《瀛寰志略》（1848）又出在《海国图志》的100卷本（1852）之前。据日本学者大谷敏夫研究，徐继畬是通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2页。

② 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第8卷，《中复堂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集（52号），第770页。

③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④ 王韬：《〈瀛寰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第9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页。

过《海国图志》50 卷本“而了解东南洋的记载的”[1]，《海国图志》的 100 卷本又大量摘录过《瀛寰志略》的内容。比较研究法是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对《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作一比较研究。

一 如何评价《海国图志》的“博”和《瀛寰志略》的“精”

王韬曾对《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的特点作过评价，认为“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应该说，王韬的评价十分中肯，是至理名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海国图志》的“博”和《瀛寰志略》的“精”呢？有一些研究者，在比较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时，往往厚此薄彼，或肯定《海国图志》的广博，或肯定《瀛寰志略》的精专。实际上，无论是《海国图志》的博，还是《瀛寰志略》的精，都是由作者的编撰动机决定的。

就写作动机来看，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海国图志》的鲜明特色。在其序言中，魏源开宗明义便揭示了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接着，他又写道：“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可见，魏源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亦即反抗外国侵略。而《瀛寰志略》主要是对世界各国的客观介绍，其经世意识远不如《海国图志》那样强烈。在《瀛寰考略》的序言中，徐继畬叙述其动机说：“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这就是说，徐继畬只是把它当作一本客观的知识手册，在主观上并

① 大谷敏夫：《〈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中国近代的始创启蒙地理书》，载《求索》1985 年第 5 期。

② 主要成果有：章鸣九《〈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洪九来《〈瀛寰志略〉的特色——与〈海国图志〉的比较》，以上两文见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大谷敏夫《〈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中国近代的始创启蒙地理书》，载《求索》1985 年第 5 期。

没有希望它能发挥如同魏源所希望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能。

写作动机的不同，就决定了两书内容的取舍。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亦即反抗外国侵略。而要“制夷”，首先必须了解敌情，了解得要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凡是当时能收集到的有关书籍，都被他纳入到了《海国图志》之中。据有的学者研究，《海国图志》征引的书籍近百种。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中国学者所著书，二是外国学者所著书。和一般的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书不同，《海国图志》除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外，还特设《筹海篇》2 卷、《筹海总论》4 卷，并将《筹海篇》置于全书之首，以为全书总纲。而《筹海篇》的内容，是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如何“制夷”的战略与策略。同时，为了满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需要，魏源又以 12 卷的篇幅（84 至 95 卷），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夷之长技”——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原理、制法和用法。概而言之，《海国图志》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二是如何“攻夷”、“款夷”尤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三是“夷之长技”。而《瀛寰志略》的内容则单纯得多，除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外，基本上没有涉及如何“攻夷”、“款夷”、“师夷”之方略以及“夷之长技”方面的内容。

由于征引的书籍太多，涉及的内容太广，加上成书的时间较为仓促（1841 年 7 月，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翻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他以《四洲志》为基础编一部世界历史地理书，第二年《海国图志》50 卷即编成），魏源没有对征引的资料加以认真考证、筛选，基本上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海国图志》因而存在着博而不精的问题，其中还有不少错误，有时人甚至评说它“大半臆说”。这当然是过激之论。与此相反，由于《瀛寰志略》所涉内容不如《海国图志》广泛，加上徐继畬编撰该书的态度又非常认真，对所采用的资料下过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研究考证工夫。其“自序”称：“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城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

日辍也。”所以《瀛寰志略》虽不博但精，其资料的准确性和叙述的科学性都比较高，是一部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历史地理书。

由上可见，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如果就资料的准确性和叙述的科学性而言，《瀛寰志略》当然要胜《海国图志》一筹，但要是从思想史的意义着眼，《海国图志》提出了“制夷”的主张并就如何“制夷”进行了探讨，这自然是《瀛寰志略》无法比拟的。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清初、乾嘉和道咸以降这三个时期的学术特点。《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的区别，也有些类似于“国初之学”与“乾嘉之学”的区别，人们很难笼统地说“大”好还是“精”好，因为它们属于不同层次的学术问题。《海国图志》是一部以思想性见长的著作，虽然我们也能从它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但那是服从和服务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思想的；而《瀛寰志略》是一部以知识性见长的著作，虽然我们也能从它那里得到一些思想的启迪，但那是读者通过阅读它所介绍的有关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知识后得出的引申义。

二 《瀛寰志略》之长在“睁眼看世界”

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魏源、徐继畬在他们的各自著作《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①] 就他们对世界大势的介绍来看，《瀛寰志略》在三个方面要优胜于《海国图志》：

第一，是对传统华夷观念的突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早在先秦时代，在中原黄河流域即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在当时的中华文明中居于中心或主导地位，而周边的诸族、诸国则处于相对落后的

---

①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参见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局面。久而久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便形成了一种“华尊夷卑”的观念，认为华夏民族（汉代以后称之为汉民族）文明程度最高，中国是“天朝上国”，而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落后民族，并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称他们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中国的士大夫眼里，不知礼仪与禽兽无别。所以，中国古书中，每当写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族名时，往往要加上一个“犭”字旁，以表示这些少数民族还没有达到为“人”的资格。中国士大夫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以夏变夷”，用礼仪来教化周边的少数民族，使他们接受华夏文明（或汉族文明）。中西交通后，这种传统的“华尊夷卑”观念又被用来外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认为这些国家和古代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相类似，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比中国落后，故此称它们为“夷”，其船艘称之为“夷船”，其商人称之“夷商”，其商馆称之为“夷馆”，其语言称之为“夷语”，与西方国家有关系的事物称之为“夷务”。称西方为“夷”，不能仅仅看做是语言上的习惯，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以上朝自居、轻蔑外邦的文化心态。

《海国图志》仍把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称之为“夷”，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魏源对中国古代的“夷”和新近来自西方的“夷”作过区别，在《海国图志·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中他写道：“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虽然为了顺从习惯，我们仍将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不同，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上之良友”，但在魏源内心深处，传统的“华夷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天朝上国”的观念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所以在《海国图志》中，一方面他对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的情况以及西方国家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但另一方面又多处违背地理实情，力图证明中国的地势气候都比其他国家优越，冠绝世界，是世界的中心。

《瀛寰志略》一定程度上则突破了传统的“华夷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天朝上国”的观念，称西方国家时就没有继续使用“夷”这一叫法，基本上把西方与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是“基本上”而非“完全”一词，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瀛寰

志略》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华夷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天朝上国”观念的思想束缚。

第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瀛寰志略》有一大特色，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如卷七《英吉利国》对英国国会制度的介绍：英国的首都设有“公会所”（即议会）。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上议院——引者注），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引者注）。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辗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以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①] 卷九《米利坚合众国》介绍美国的选官制度：美国的首领（总统），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尤需指出的是，《瀛寰志略》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时，对这种制度持的是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如推许美国“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②]！它尤其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赞赏有加，称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是“人杰”，“异人”。因为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③]。并称赞“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④]

《海国图志》的50卷本和60卷本，基本上没有涉及西方的民主制度。1852年扩充为100卷本时，则摘录了《瀛寰志略》中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关内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国图志》对《瀛寰志略》中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关内容大多作了摘录，但却没有摘录上引《瀛寰志略》

---

① 《瀛寰志略》第7卷，“英吉利国”，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35页。
② 《瀛寰志略》第9卷，“米利坚合众国”，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
③ 同上书，第277页。
④ 《瀛寰志略》第5卷，“瑞士国”，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57、161页。

称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那段话。这是为什么？值得讨论。

第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之重要地位的认识。《瀛寰志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进行了介绍，并初步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会取得物质文明的原因：一是海外扩张，进行殖民掠夺。如英国作为岛国，“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于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进行殖民掠夺的结果。[①] 二是重视商业利益，以商立国。“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②] 英国的苏格兰“其民习勤耐苦，善于谋生，俗俭啬不妄费，经商遍四海，积资多在数万里外，故地虽寒瘠而多素封”[③]。荷兰也因“通东西上万里之海市，故国虽小，而富甲于西土”[④]。《瀛寰志略》还通过俄国与英法的比较，说明后者因商立国而致富的道理：俄国虽以疆土广大而号为强国，但“较之英佛诸国，总觉土满。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又远逊于诸国，逐鹿海隅，往往瞠其乎后”，无法与英法等国相提并论。[⑤]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瀛寰志略》敢于肯定重视商业利益、以工商立国的西方各国，充分认识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的一种批评或否定。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徐继畬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也要像西方各国那样，兴工育商以图富强，“但是他已看到，也将使别人看到工商致富的事实，这必将启迪后人去寻求工商致富的道路”[⑥]。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国图志》也分析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会取得物质文明的原因，但它着眼的主要是西方各国的殖民扩张，而对西方的工商立国则着墨不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① 《瀛寰志略》第7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② 《瀛寰志略》第4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15页。
③ 《瀛寰志略》第7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34页。
④ 《瀛寰志略》第6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93页。
⑤ 《瀛寰志略》第4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28页。
⑥ 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三 《海国图志》之长在“师夷长技”

魏源在《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对“夷之长技”进行了介绍，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这是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50卷本时的认识。后来随着他对《海国图志》的两次修订和扩充，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扩大。在编写50卷本时（1842年完稿），书中对“夷之长技”介绍不多，仅将福建监生丁拱辰撰写的《铸造洋炮图说》、奕山的《进呈演炮图说疏》以及西洋器艺杂述一组文章作为《附录》放在最后1卷。当50卷本扩充为60卷本时（1847年完稿），专门用于介绍“夷之长技”的篇幅从原50卷本的最后1卷变成了8卷，即第53卷至第60卷，并删去了“附录”二字，内容从原来的只介绍洋炮，扩展为对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的介绍，并且附有更多的插图，以方便人们了解、仿造和使用。其中主要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插图6幅）、黄冕的《地雷图说》（插图2幅）、潘仕成的《攻船水雷图说》（插图30幅）以及《作远镜法说略》、《西洋用炮测量说》等。再到60卷本扩充为100卷本时（1852年完稿），介绍“夷之长技”的篇幅又从60卷本的8卷变成了12卷，即第84至95卷，内容也比60卷本更为丰富。如卷84收录的《仿造战舰议》，介绍了战舰的动力问题——蒸汽机：“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理，乃是火蒸水气，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可用为推船推车，至大之工，不借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为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为，甚为可奇赞。”卷90收录的丁拱辰的《西洋炮台说》，这是自明末徐光启《台铳事宜疏》、《移工部揭帖》、孙元化《西法神机》、汤若望《则克录》等书简单介绍西方“永备筑城工事”以来，再次将西洋炮台先进性介绍给国人，其中“典折炮台式”、“圆炮台式”、“润土炮台”都很有新意，绘制的图样也比较清晰。卷91收录的户部主事、机械专家丁守存撰写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介绍了“螺旋转嵌火石”，即简化了装弹和击发过程的机械燧发装置，同时又介绍了更先进的“自来火药”即“雷银”，用制雷管。卷94的

① 魏源：《海国图志》第2卷，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西洋器艺杂述》，根据多种资料介绍了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指南针、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千斤秤、显微镜、自来火、自转碓、乐柜（管风琴）等，他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意大利伏打电池、静电仪、避雷针等。[①]

《海国图志》还提出了一套"师夷长技"的具体方案：在广东虎门外的沙角、大角这两处地方，设一所造船厂和一所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夷目一二人"，带上他们的工具，专司建造船械，同时聘请西洋舵师，负责传授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和攻击。这两家兵工厂除制造船械、火器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成之。"同时允许中国沿海商民兴办厂局，制造船械，其产品"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并且相信，只要"师夷之长技"，实现这套方案，中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崭新局面。[②]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对人们的桎梏，开启了晚清学习西方的新潮流。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念之基础上的。因为根据"华尊夷卑"观念，四周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夷狄"。既然四周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夷狄"，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强调"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只主张"以夏变夷"，亦即用汉民族的传统礼仪来教化周边的少数民族，并使之同化于汉族，接受华夏文明，而反对"以夷变夏"，亦即反对汉民族向周边少数民族学习，被少数民族所同化。千百年来，这种观念一直桎梏着人们的头脑，使中国无法主动地融入到世界之中，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这也是造成中国逐渐从先进变为落后的重要原因。这正如郭廷以先生在《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

① 参见许康《论〈海国图志〉对西方科技的介绍》，《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2—285 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第 2 卷，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31 页。

地理的环境，中国所接触的四邻，甚少可供吸收效法的高度文化。尽管它们有时可凭其武力威胁中国，甚或夺得中国治权，但它们并不能撼动中国文化，它们亦承认在文化上不及中国，自愿接受，终至于同化。因之加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以至于自大感，以为中国的文化为至高至善的文化，只要坚守不渝，可以处常，可以处变。12世纪以后的理学家，更是抱定这种观念，墨守成规，以为不变求人。"[①] 然而现在魏源不仅承认"夷"有"长技"，而且还主张学习"夷之长技"。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轻视科技的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它表现在价值观上，便是崇尚"义理"，鄙视"技艺"，认为"义理"是"本"，是"道"，而"技艺"是"末"，是"器"，不管它如何有益于国计民生，都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君子不器"，这是传统士大夫对待"技艺"的根本态度，这也是导致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只有"格致之学"而无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的这种轻视科技的价值观念，同样也影响着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接纳，在鸦片战争之前，人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都是以"奇技淫技"视之。然而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将西方的"战舰"、"火器"这些科学技术称之为"夷之长技"，主张中国学习，并对那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又说："指南针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②] 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奇技"，但不是"淫巧"，作为"有用之物"，它利国利民，与"圣人之道"相符合。所以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翻译西书的热潮。一些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出版了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

---

① 郭廷以：《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释中国》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1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第2卷，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0—31页。

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在内的一些科学技术著作，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瀛寰志略》则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更没有像《海国图志》那样，在100卷本用12卷的篇幅来介绍“夷之长技”西方的科学技术。

四 如何评价《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与现代人相比提出了什么新的思想，作出了什么新的贡献，而是看他与同时代人相比提出了什么新的思想，作出了什么新的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从一个先进、富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落后、贫弱的国家，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远道而来的“岛夷”打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因此，中国要改变落后、贫弱的局面，就必须打开国门，向已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各国学习。学习西方，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的时代主题或历史潮流。

要学习西方，首先就必须“开眼看世界”，了解和认识西方。因为，只有“开眼看世界”，在了解和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发现自己的落后，也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才有可能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但“开眼看世界”，了解和认识西方，只是提供了认识自己的落后、从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可能性，并没有提供认识自己的落后、从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睁眼看世界”的人，并不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梁廷枏。梁廷枏于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先后撰成《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等四书，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记叙，特别是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记叙尤多，是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正是他，于《海国图志》问世后，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说什么“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他还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说成是中国古代早有的东西，认为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反

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①。梁廷枏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批评说明：传统的“天朝上国”、“夏尊夷卑”观念犹如“恢恢法网”，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何等的严密。

就徐继畬而言，作为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在《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无论是资料的准确性，还是叙述的科学性，在当时所有的中国人编撰的世界历史地理书中，都无出《瀛寰志略》之右者，这当然也包括魏源的《海国图志》。换言之，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历史地理书是《瀛寰志略》。《瀛寰志略》的历史地位也就在于此。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和当时其他绝大多数中国人编撰的世界历史地理书一样，《瀛寰志略》只是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而《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不同，魏源的《海国图志》对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介绍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错误，无论是资料的准确性，还是叙述的科学性，都无法与《瀛寰志略》相提并论，但它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然而在那个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尽管《海国图志》所要学习的“夷之长技”，不外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但它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冲破了“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之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长期桎梏，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几十年之久。王韬就曾说过，“师长一说，（《海国图志》）实倡先声。”② 尽管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夷之长技”之内容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在甲午战争之前，先是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养兵练兵之法比中国先进，再又认识到西方的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以及机器制造和经营管理也比中国先进，于是有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到了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班人认识到，“要救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外国”，学日本，并把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72 页。

②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2 页。

学外国、学日本的内容锁定在“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上，据此搞了场变法运动；再到了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一班人同样认识到，“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而他们所认识的“外人的长处”，除船坚炮利、西艺西学外，也不外是西方的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和维新派不同的是，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而他们则主张民主共和，并据此搞了辛亥革命。但无论洋务派也好，康、梁维新派也好，孙中山革命派也好，他们对“夷之长技”的认识，都不过是对《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继承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影响。《海国图志》从1844年初刊行50卷本到1902年，不到六十年间连续刊刻九次，一直是广大爱国人士喜好的读物。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左宗棠、曾国藩、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阅读过该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虽然对《海国图志》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主张提出了尖锐批评，说那不过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之言，但对《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则评价甚高，认为“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他本人也在继承和发展《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学”的主张。就是到了1924年，梁启超在谈到《海国图志》时还写道：“魏书不纯属地理，卷首有《筹海篇》，卷末有《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火器条议》、《器艺货币》等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①] 此为精当之论。

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而向西方学习是鸦片战争以降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其历史地位要在《瀛寰志略》之上。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23页。

简论《瀛环志略》的开拓创新

——纪念《瀛环志略》问世160周年

张海瀛

《瀛环志略》徐继畬辑著，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福建刻板问世，全书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三是关于地球和亚洲的介绍，卷一的开篇是《地球图》，接下来是《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其后就是关于亚洲以及亚洲各国的介绍；卷四至卷七，是关于欧洲以及欧洲各国的介绍；卷八，是关于非洲以及非洲各国的介绍，卷九、卷十，是关于美洲以及南北美洲各国的介绍，另有总分地图42幅。全书立足全球，放眼世界；以图为纲，专详域外；谋篇布局，别具匠心；结构谨严，层次分明；内容丰富，审核精细。从自然到社会，从地理到历史，横排竖写，由远及近，由表及里，通过大量的具体数据和历史事实，将一个被国人严重误解的西方世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有史以来破天荒的惊人壮举，在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划时代的伟大里程碑。开拓创新，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是全书的灵魂和核心。今年是《瀛环志略》问世160周年，兹就《瀛环志略》的开拓创新问题谈点意见，以资纪念。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冲破天朝帝国罗网，立足全球，放眼世界，是框架结构的开拓创新

瀛即瀛海，环即寰宇，是地球的水陆总称。《瀛环志略》，顾名思义，就是世界地理志。在我国，地理志起源很早。秦始皇统一后，就将全国划分为36郡，推行了加强行政管理的郡县制度。《汉书·地理志》具体记载了全国的行政区划，并将各个郡县的建置沿革、山脉河流、地理环境、交

通状况、风土人情、文物古迹、户口统计、物产特产等等，全都记录了下来。尽管比较简略，但却相当全面。《汉书·地理志》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地理志的形成。其后，全国的地方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环宇记》等相继问世，记载行政区划的地理志，日益完善。但在我国古代地理志中对于西方世界的记载，则十分肤浅，而且往往停留在对一些肤浅的外表形态的记述上。明代前期，郑和七下西洋、行踪遍及亚非三十余国后，尽管极大地增强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但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记述，依然没有改变。譬如《明史·外国传》在记述西方的荷兰时，仍然写道："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其人深目长鼻，发须眉皆赤，足长尺二寸"[①]。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才使朝野人士大吃一惊，才发现原来西方世界也有不可小看的地方。在国家经历了多次丧权辱国的磨难以后，一些士大夫才开始从理性高度来认识西方世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就是士大夫阶层从理性高度认识西方世界的代表作。

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虽说源于道光皇帝向他询问域外各国的风土形势，但他对于世界地理和历史的研究，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厦门结识雅裨理牧师并获得绘刻极细的世界地图后开始的。关于这一情况，徐继畬在他的自序中有明确记载：

"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道光癸卯（二十三年，公元1843——引者注），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引者注），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

---

① 《明史》第325卷，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434页。

消遣，未尝一日辍也。"①

徐继畬的这段记述说明：

第一，徐继畬研究西方地理是从泰西人绘制的地图入手的，是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结识通晓泰西形势的雅裨理牧师开始的。泰西人所绘地图"独为可据"，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雅裨理牧师（祖籍荷兰阿姆斯特丹，1804年出生于美国。鸦片战争后，1842年2月到达厦门鼓浪屿，1843年由鼓浪屿移居厦门），因通晓华文、华语以及闽南方言，是"西国多闻之士"，所以就成了徐继畬研究泰西各国的向导和翻译。

第二，徐继畬是在广泛搜集有关西方多种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各国地理和历史的。他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以及商人过程中，寻机询问，核实考证。除雅裨理外，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明，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以及李太郭的后任者阿礼国及其夫人，都是徐继畬的询问对象。即便是《瀛环志略》完稿后，一旦发现新的研究成果，他都要及时进行修改或增补。

从上述两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瀛环志略》是一部高起点、高品位的著作。例如，卷一《地球图》一节，采用的就是近代地理学的最新成就——地球学说，该节开宗明义就说："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划之。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②

16世纪中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用他创立的"日心说"（即"地动说"）否定了统治西方一千多年的"地心说"，彻底推翻了封建的神权统治。1519年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率领他的船队从西班牙出发，成功地实现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第一次证实了大地是圆球形的，从根本上澄清了人们对大地的种种误解，从而确立了近代地理学的最新成就——地球学说。

又如，关于世界的划分，《瀛环志略》采用的就是泰西人的"四土"、"五海"说，明确指出："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四大土之名，乃泰西人所立。本不足为典要，今就泰西人海图立说，姑仍

① 《瀛环志略》第1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其旧。”记述五大海时又说：“曰大洋海，曰大西洋海，曰印度海，曰北冰海，曰南冰海。”[①] 这种划分世界的方法，较之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国人以东洋和西洋来划分世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再如，关于世界各大洲以及各国的介绍，都是首叙一洲概貌，然后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又将一洲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之下再按国排序，分别介绍。这种记述方法，就是近代地理学的最新成就——分区记述法。而这种分区记述法在《瀛环志略》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

另外，《瀛环志略·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此书以图为纲”，第二条明确规定“此书专详域外”。[②]

由此可见，立足全球、放眼世界，以图为纲、专详域外，高起点、高品位，就是《瀛环志略》在选题立论、谋篇布局方面的重大开拓创新。

二 关注发展变革，揭露英国骤富，赞誉美国民主，代表了记述内容的开拓创新

徐继畬经过五易寒暑，数十易其稿，《瀛环志略》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极大关注。不管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跟随《瀛环志略》的记载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外部世界。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③] 清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赞叹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④]《瀛环志略》关于西方各国的记述，对于国人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关注发展变革，揭露英国骤富，赞誉美国民主，集中体现了作者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突出代表了记述内容的开拓创新。

《瀛环志略》在介绍西方各国过程中，对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变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例如，作者在综述欧洲概况时指出，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

① 《瀛环志略》第1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41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24页。
④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

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①] 在这里，作者虽说肯定了"火器创自中国"，但突出强调的则是"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的发展进步。其用意就是要国人猛醒，要国人看到中国与欧洲诸国的差距，要国人奋起直追。

"重农抑商"是中国的传统国策，商人在中国历来没有地位。而近代欧洲各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对于这种情况作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确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②] 在这里，作者业已意识到"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是欧罗巴诸国国内经济的共同特点，"以商为本"是它们的"国计所在"，是它们的生命线。所以这些国家都要千方百计地"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在这里，作者不仅注意到了这些国家"以商为本"的国内经济，而且试图从"以商为本"的国内经济来说明这些国家"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铺头"的原因。这里蕴藏了一种十分深刻的思想——从国内的经济结构来说明它的对外政策。

《瀛环志略》在记述俄国时，突出强调了俄罗斯近世之强大是从彼得罗（即彼得大帝）变法图强开始的，指出："招致英贤，与国图事，躬教士卒骑射，兼习火器，悉为劲旅，由是政令令更新国俗为之一变。境内既平，乃巡行边界，开通海口。尝以俄人不善驶船，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瑞典战，胜之。"接着，又在波罗的海岸建立新都，名曰彼得堡。这样，就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战胜攻取，疆土愈辟，俄罗斯近世之强大，实自彼得罗始也。"[③] 由此可见，《瀛环志略》完全是站在同情、支持和赞颂的立场上，记述并评价彼得大帝变法图强的历史功绩的。

在记述侵略中国的英国时，作者认为，英国骤富沾满了被侵略国家的鲜血，完全是侵略掠夺他国的结果。指出："按，英吉利邈然三岛，不过西洋一拳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

① 《瀛环志略》第4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5页。
② 同上书，第312页。
③ 同上书，第321页。

力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之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接着又陈述了英国征服五印度的过程，强调指出：“五印度在中国西南，即所谓天竺佛国。英人于康熙年间在孟加拉购片土，造屋宇，立埔头。乾隆二十年（1755）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诸部散弱不能抗，遂大半为其所役属。其地产棉花，又产鸦片烟土。自中国盛行之后，利市十倍。英人所收税饷，五印度居其大半。”① 这样就深刻地揭露了英国对外侵略掠夺的狰狞面目，作者对于英国侵略本质的认识，可谓是入木三分。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对于英国牧师的处置，完全是从外交斗争策略出发的。但有些人却对徐继畬交章弹劾，把妥协、投降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徐继畬头上，造成千古奇冤！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必须平反昭雪，正本清源。

对于美国，《瀛环志略》除详述其疆域、山川、气候、物产、人口、财经、教育、风尚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会等内容外，又用赞赏的语气记述了美国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奋起抗英并取得独立的经过。赞颂华盛顿是“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略过人”。作者以按语的形式，称赞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最后，在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时又称赞说：“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 作者对于华盛顿和美利坚合众国民主政治的赞颂，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鞭挞和否定，就是在启迪国人觉醒，其意义十分深远。

总而言之，《瀛环志略》通过关注发展变革，揭露英国骤富，赞誉美国民主等记述，就把国人的着眼点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注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民主制度方面，把国人引向了更高的理性层次。这就是《瀛环志略》在记述内容方面的开拓创新。

---

① 《瀛环志略》第7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4—605页。

② 《瀛环志略》第9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5—696、734—735页。

三 方志体与史书体混合运用，得心应手，融为一体，是编修体例的开拓创新

《瀛环志略》关于世界各国的记述，包括了疆域、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兵力强弱、兼并征伐、海外扩展等等，无所不包，可谓是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从记述的广泛性、重点以及横排竖写来看，《瀛环志略》是按照志书体例编修的。但从其对于许多史实的记述以及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来看，则又属于史书体例。

综观志书体例与史书体例的不同，主要有三：1. 编写方法与重点不同。史体注重论述，作者可以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重点是记述过去，要求"详古略今"；志体则要求"详今略古"，主要记述当代，以资料翔实取胜，要寓评于事，作者不可以站出来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2. 广泛程度不同。史体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中心，志体则将该地的疆域、沿革、山川、矿产、动物、植物、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和社会现象，都列入记述范围。3. 内容详略、体例结构不同。志贵详细，偏于横剖，横分门类，以类系事；史存大体，以时为序，以时类事，纵述历史。徐继畬对于这两种体例的特点以及二者的区别，都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既有修志的理论，又有修志的实践，是一位杰出的方志学家。他在《致武芝田观察论县名及县志书》一文中就突出强调了史志体例的区别，主张修志必须"寓论于叙事之中"，不赞成作者站出来直接进行评论。他认为闽省《宁化志》中作者的直接评论，"止可以奇文赏之，非志乘之正体也"①。徐继畬不仅对如何修志有自己的理论，而且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总结康、乾年间旧《五台县志》的基础上，于同治四年（1865）编修成《五台新志》三卷，后来交给了侄孙弟子耘田，并说第四卷尚缺。② 其后由郑增耀、徐耘田、刘升瑛、张映环补修，光绪十年（1884）刻本印刷。后人对徐继畬编修的前三卷评价极高，徐继畬亦以编修《五台新志》闻名于世。

徐继畬对于史书体例，更是行家里手。他为其父徐润第整理的《敦艮

---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271页。

斋遗书》，采用的就是史书体例。史书体例的典型代表——《史记》和《汉书》，更是他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是他推崇和效仿的典范。他读《后汉书》的批语，多达10余万字。

正因为徐继畬对志书体例与史书体例都非常熟悉，并且有很深的研究和很高造诣，所以他在撰写志书时就会根据内容需要插入一些史书体的记述。例如，他在《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中，记述幽、并、凉三州地名，均用志书体客观介绍，而对于不同记载的考证，则在“按”的形式下，采用史书体例进行考证。所以读起来，一目了然，论据确凿。①

《瀛环志略》与《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瀛环志略》是徐继畬怀着浓厚的变法图强的爱国激情写成的，他在“按”的形式下，大段大段地采用史书体评论人物和事件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催人奋进的紧迫感和拍案而起的救国情，因而，《瀛环志略》的“按语”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号召力和说服力。而在《瀛环志略》一书中，“按语”就占去了很多很大的篇幅。例如，关于俄罗斯国的记述，共有26页，而在“按”的形式下进行的叙述和评论就占了6页；关于意大里亚列国的记述，共有21页，而在“按”的形式下进行的叙述和评论就占了13页；关于法兰西国的记述，共有24页，而在“按”的形式下进行的叙述和评论就占了7页；关于英吉利国的记述，共有33页，而在“按”的形式下进行的叙述和评论就占了10页；关于荷兰国的记述，共有11页，而在“按”的形式下进行的叙述和评论就占了4页；关于米利坚合众国，作者热情洋溢地叙述了美国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奋起抗英并取得独立的经过。对于华盛顿和美国民主制度的赞誉，都是在按语中抒发的，所以特别具有感染力。

总而言之，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将志书体与史书体混合运用达到了十分娴熟的地步，从而树立了史志两体混合运用的典范。这是《瀛环志略》在编修体例方面的重大开拓创新。

综上所述，《瀛环志略》的框架结构、记述内容以及编修体例，全部是开拓创新的。正是这三方面的开拓创新，将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活生生地展现在了国人面前，成为催人奋进、变法图强的启蒙宣言和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必读之书。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失败

---

① 《松龛全集》，见《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册。

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瀛环志略》全面学习西方的影响下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徐继畬的同乡阎锡山，对徐继畬十分崇拜。由他主编的《山右丛书初编》第14册就有《松龛全集》。阎锡山还亲自写有序言，并以锡山晚生“未及亲聆教训”而深感遗憾。应当实事求是地说，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和运用《瀛环志略》的成功典范。因为阎锡山在《瀛环志略》的启迪下，跳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小圈子，他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又把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引进了由他创办的西北实业公司，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阎锡山在军阀割据时代之所以能够屹立四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台湾地区之所以重视徐继畬研究，也是同阎锡山分不开的。编写《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的方闻，就是阎锡山的老部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瀛环志略》和《敦艮斋遗书》，都是由方闻先生提供的原稿。对于徐继畬研究和《瀛环志略》研究十分重视并有很高造诣的原馥庭先生，也是跟随阎锡山数十年的老部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对徐继畬的不公正评价，致使人们对《瀛环志略》也产生了种种误解。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第11期《学术月刊》发表复旦大学教授陈绛先生题为《19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一文，才首次肯定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在学习西方方面的历史功绩。山西省对于徐继畬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白清才省长首先倡导的，其后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今天，在这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瀛环志略》的研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海瀛：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徐继畬与《瀛寰志略》

宋大川

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及其启蒙思想的反思和认识，大致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相同步，政治家、思想家，以及学者和社会人士，均纷纷从变革的角度探寻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用对比的方法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落后的历史原因、政治体制、思想观念进行分析探讨，论证“落后就要挨打”，试图对我国的改革事业有所借鉴。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专家学者试图重新认识和探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及其思想，从民族文化传统、思想意识渊源、外来事物及文化冲击、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等方面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徐继畬所著的《瀛寰志略》是近代启蒙思想家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巨著，21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汲取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的思想精华，用新视角、新思维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其投注了新的目光。

一

从7世纪的唐朝，到13世纪的宋朝，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均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欧各国从16世纪以来，相继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对本国和亚非一些国家血与火的残酷掠夺中，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中国从明朝末年以来开始衰落，进入清朝后，更加故步自封，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是积贫积弱，腐朽没落。19世纪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各地的作为，始终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其他国家均为弱小的“夷人”。然而，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黑

黑的鸦片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白花花的银两随着割地丧权的不平等条约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列强的金库。清朝的皇帝目瞪口呆，中国的官员们懵然不知所措。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了反思，进行着思索。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以他们新的思维方式和视角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当时的有识之士中，徐继畬无疑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他与他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们一起开眼看世界，屏息思中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初的启蒙思想。

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1795 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在徐继畬出生之前，五台县就以梵音乐鼓的佛教圣地闻名全国。在他出生后的一百年里，五台县地灵人杰，文山脚下又诞生了一大批叱咤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而徐继畬则以自己的新思维启发了乡人和国人，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1813 年，18 岁的徐继畬参加乡试，弱冠之年便中了举人，在只有熟读圣贤书才能出人头地的封建时代，这无疑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1826 年（道光丙戌）徐继畬 31 岁时，经过青灯黄卷的苦读后，满怀着圣贤的教导和家人的期望，同与他相似的学子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有幸的是，他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勤奋刻苦和家人的期望，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考中了进士。徐继畬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京城，就职于翰林院任编修，在天子脚下沐浴着浩荡的皇恩，这是当时人们很羡慕的职位。

翰林院编修徐继畬并不像后来那样目光远大而深邃，他谨记着中国历史上圣贤们的谆谆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信念和人生的准则。在以后的岁月里，徐继畬相继担任了陕西道监察御使，继而出守广西浔江，调升福建延建邵道，转署汀漳龙道，后授广东盐运使，迁广东按察使，转福建布政使，授广西巡抚。1840 年鸦片战争后，徐继畬调任福建巡抚。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船坚炮利的冲击，他在震惊之余，对“天朝上国”的腐朽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对西方列强的来龙去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知己知彼、师夷制夷，是他当时十分迫切的思想。在福建巡抚的任上，徐继畬写下了《瀛寰志略》，这是他事业上最辉煌的时期。徐继畬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变革图强思想的《瀛寰志略》并没有给他带来应得的荣誉，反而因此书而受到“妖言惑众”、“有损国体”等攻击。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在徐继畬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期间，发生了“神光寺英人租屋事件”。有先进思想、长于外事的徐继畬，为不激化矛盾

而对此事件采取了较灵活的策略。然而，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民众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福州士绅和在京的福建籍官员叠奏弹章。1852 年徐继畬因此被撤职，由二品降为四品，补太仆寺少卿，简放四川乡试正考官。然而，乡试刚刚结束，他却被“传旨革职”，回乡为民。

18 世纪 50 年代，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时期。惊恐万状的朝廷为镇压和防止农民起义，令回乡返籍的官员们编训团练，徐继畬也因山西巡抚的奏请而奉命襄办上党防务。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走遍太行山的关隘要冲，督察修缮，并写下大量的诗词。不久，他又失去了公职，来到山西中部的平遥县，主持超山书院。这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民办学校，作为学校的主持人，过人的学识、往昔的官职，尤其是《瀛寰志略》为他带来的巨大声誉，是他获得这一职务的重要条件。在超山书院的十年岁月里，徐继畬寄情于山水之间，游弋于学问之中。他把学生们可圈可点的作文和几十年来收集到的优秀文章汇集成册，编成《小题八集批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续编》。与此同时，徐继畬还写下《古诗源批注》、《五台新志》、《举隅集》、《后汉书批注》等大量著作，这是他思想上、认识上升华的时期。他看到，面对清朝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不能再做“春婆梦”，必须通过教育来唤醒民众，必须培养大批具有现代知识和先进思想的人才。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图强求变的思维浸润于教育实践，把国家的富强、师夷破夷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始终不懈地追求着民本主义和经世致用的理想。可以说，徐继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将变革的理论付诸于教育实践的先行者之一。

1865 年，在太平天国被曾国藩所镇压，清王朝又获得了苟延残喘机会的时候，徐继畬接到朝命，赴京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官衔为三品。这是徐继畬第二次到北京，这一年他已七十岁了。从 1852 年“传旨革职”到奉命入朝，徐继畬苦苦等待了 13 年。他已没有了 31 岁时的冲动和梦想，对于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古稀之年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宣传自己的思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因此，徐继畬把剩余的精力放在培养青年人的身上，希图通过教育来延续、施展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京城的 4 年时间里，他受命管理京师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第一个大学校长，而且是第一所外语学院的校长。徐继畬走向世界的思想教育了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向世界的学生，启蒙着处于大变革时期前夜的社会大众。1869 年徐继畬告老还乡，1873 年徐继畬 78 岁时被赏头品顶戴，他带

着清朝汉族官员的极品荣誉含笑而去。

二

1848年，徐继畲在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的任上刊行了《瀛寰志略》。这部十卷本的世界历史地理学著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社会各界毁誉参半。同时，也为他带来身后被誉为启蒙思想家的美誉。一致的是，这部著作使一向夜郎自大的大清帝国大为惊愕。他们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土地原来叫做地球；大清帝国与其他国家一起组成了世界；中国并不是“万邦之首”，而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起，《瀛寰志略》被人们看做是一部奇书，一部记述在中国人眼里是四夷八荒、黑白蛮夷的奇书。

《瀛寰志略》运用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记述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形势和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山川城郭，地图绘制精细，方位准确。对于当时守着“天圆地方”、“中国居中”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徐继畲对近代地理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掌握是令人吃惊的。他用经度和纬度分割地球，又用近代宇宙学的观点看待地球，把宏观无限的宇宙与微观地理的各国联系起来，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与传统舆地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地理学。而且，徐继畲在自己的教学生涯和教育管理工作中，把自己先进的地理学思想教授和传输给学生，在遵奉圣人之言的时代里，点燃了一支闪亮的新思想的火炬。徐继畲既是地理学家，又是历史学家，从接受和传播近代地理学的巨大作用和贡献上说，他无愧为近代第一人。

徐继畲撰写《瀛寰志略》大约花了五年时间。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了魏源、徐继畲这样的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他们急于搞清楚“洋夷”们如此强大的原因。徐继畲在福建做官的时间比较长，与外国人有比较多的接触，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经常向外国人询问世界各国的地理和风土人情。道光帝时，徐继畲因公驻厦门，与美国人雅裨理有一段比较深的交往。雅裨理对中国比较友好，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能讲福建话，随身携带着绘制精美的世界地图。徐继畲仔细地向雅裨理询问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并将其地图勾摹了十余幅。次年，徐继畲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再至厦门。其僚属霍蓉生购得地图两册，长二尺，宽一尺，这在当时可谓是

一幅大型地图了。这幅地图比雅裨理的地图尤为详密，为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此时，徐继畬又收集到许多西方人用汉字所写的地理和历史著作，这对他有了更大的帮助。徐继畬在外事活动中，总要抽出一点儿时间向外国人询问，对世界各国的地形地势详细了解，然后绘图立说。五年间，增删考证，拾遗补缺，数十易其稿，终于写成了使他成为启蒙思想家的近代世界地理宏篇巨著——《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共十卷，卷一至卷三，记述亚洲地理，基本上按照东亚、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中亚和西亚等现代地理学区划对亚洲各国分别记述。卷一，记述地球的概况，对五大洲、四大洋的情况简要叙述；将清朝的疆界绘制成图，说明在亚洲的地理位置；叙述亚洲概况；记述“东洋二国”及“南洋滨海各国”。卷二记述“南洋各岛”、“东南洋大洋海各岛”、“大洋海群岛”。卷三记述印度五部、“印度以西回部四国”、“西域各回部”。卷四至卷七记述欧洲地理及各国概况，由北至南，由东到西，分国记述，基本上与现代地理学欧洲区划相吻合。卷四简述欧洲历史及概况，记述俄罗斯帝国、瑞典王国和丹麦王国。卷五记述奥地利帝国、普鲁士帝国、日耳曼帝国和瑞士王国。卷六记述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诸国、荷兰王国、比利时等国家。卷七记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四国。卷八记述非洲各国，由于当时非洲大多数地区被欧洲殖民主义所占领，独立国家甚少，故徐继畬在记述时，对其历史沿革作了大致的描述。卷九至卷十记述美洲概况。卷九记述“北亚墨利加冰疆”、“北亚墨利加英吉利属部”（今加拿大）、美国。卷十记述“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南美洲各国、加勒比海群岛各国。

《瀛寰志略》在写作风格和体例上有着鲜明的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的舆地学观念是徐继畬撰写此书的基础。然而，他大量地学习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地理学思想，并运用其理论和科学方法记述世界各大洲、各大洋以及各国的概况。《瀛寰志略》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度学说划分地球，对世界各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有比较准确的划定。

第二，徐继畬在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的任上收集了大量的外国历史、地理等书籍，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了《瀛寰志略》史地兼备的特点和风格。徐继畬在记述各国的地形地势时，大量叙述了各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和民族渊源。同时，对历史上各国与中国的往来亦有着墨。

第三，在徐继畬的地理学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近代城市功能的观

念。《瀛寰志略》对各国重要城市的情况记述比较详细，对城市商业、工业、学校、客栈、城郭、教堂、民族文化传统及市政设施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向人们提供了较完整的近代城市的面貌。

三

徐继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中国从封闭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痛苦的时代，也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扪心思索、大声疾呼、奋发图强的时代。作为与民族英雄林则徐同期的大清高级官员，徐继畬同样正义清廉，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作为与魏源同样的具有近代先进地理学思想的学者，徐继畬有着强国救民的忧患意识和超越同时代大多数人的启蒙思想；作为履孔子、孟子之道的教育家，徐继畬将自己先进的观念、近代地理学思想传输给学生后人，其作用和贡献则是他同时期的人所无法比拟的。

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将鸦片战争后山河破碎、割地赔款的疾奋之情跃然纸上，把严禁鸦片、保卫疆土、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和英勇气概浸润其中，图强求变、师夷制夷的思想在《瀛寰志略》中表现得淋漓至尽。与林则徐、魏源相同的是，徐继畬并没有与其他昏庸的官员一样，把大清王朝看成是天下之中、万夷所仰的“天朝上邦”。他清楚地认识到，“天下之尊”的大清帝国与其他国家共同组成了世界；大清帝国在五大洲、四大洋中，不过是位居亚细亚大陆东部的一个国家；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的许多国家，从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比大清帝国要远远发达的多。《瀛寰志略》吸收了近代西方地理学理论，对“地球”和“世界”的观念是十分清楚的，对当时世界各国情况的掌握和对各国发展程度的把握上是比较客观的，对中国在地理学上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对中国国情及发展状况的分析也是相对客观的。在当时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一潭死水中，《瀛寰志略》的出版无疑地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朝的统治者、满汉官员，在野的封建道学、社会士绅，无不为《瀛寰志略》所展示的世界所惊诧，无不为大清帝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天下之尊”的事实所震骇。《瀛寰志略》的影响和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的范畴，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所记述的内容、所展示的空间、所反映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民大众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理论的形

成，均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瀛寰志略》反映了徐继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师夷制夷的思想。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不仅介绍各国的地形、地貌等地理情况，对各国的民族渊源、生活习俗及历史沿革也着重记述。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商业、教育、科技和航海等，记述尤其详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完成了近代工业革命，综合国力十分强大。尤其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教育普遍重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瀛寰志略》在记述西方各国时，对其高速发展的工业和科技、教育等作了大量介绍，反映出徐继畬图强求变的改革思想。同时，徐继畬在倡导图强求变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朦胧地感觉到，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在150年前封闭保守的中国，徐继畬就已经直观地发现教育和科技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这不能不使我们今天在反思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时，对徐继畬和他的《瀛寰志略》要多一分思索，多一些分析，对他超时代的思想火花投入更多的关注。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最早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学生的先驱者中无疑有徐继畬。《瀛寰志略》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部先进的近代地理学著作，而是在于它曾经作为一部宣扬近代进步思想的教科书走入了课堂，被许许多多的学生青年修习和研读。在这个意义上，徐继畬主持山西平遥超山书院和管理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同文馆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宣传自己思想的有利条件。徐继畬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教育实践，许许多多的学生凝听过他的谆谆教诲，许许多多的青年阅读过《瀛寰志略》。徐继畬和他的《瀛寰志略》启迪了中国近代一大批不甘落后、变法图强的有识之士。从今天的现代的意义来看，徐继畬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忧国忧民、对未来负责的教育家。

四

《瀛寰志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本惊世骇俗的学术著作。它一经出版，“立腾谤议”。后来虽受到维新派、洋务派人物的称赞，但直到一百多年后，才得到一部分近代史学者的肯定，认为它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的一部拓荒之作。该书撰写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即：《舆图考略》阶段、《瀛寰考略》阶段和《瀛寰志略》阶段。

1. 《舆图考略》阶段

《舆图考略》的具体写作是从1844年春天徐继畬会见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时，从雅裨理处得世界地图册子开始的。在此之前，徐继畬曾于1840年7月在海登县率民临海拒英。1841年7月，又随闽浙总督颜伯涛在厦门与英军激战而败，退守同安。这两次经历，使他“寝食不惶，心力交困”，对清王朝“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之现实，百思不可解。1842年6月，他接任广东按察使，9月迁福建布政使，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因此而涉入外交事务。出于知己知彼，富国强兵的目的，在这一段时间，他开始对海外各国情势进行了解和研究，搜集、阅读当时能够得到的各种中国人介绍外国情势的书籍以及汉译的外国刊物和报纸。正因为有了对海外各国情势的较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至1843年春天，道光皇帝召他进京，询及海外形势，风土人情，他才能“具所知以对”，道光皇帝非常满意。应当说，他对海外各国情势的这些了解和研究，不仅为他后来撰写《舆图考略》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而且也才使得他1844年春天从裨雅理处看到世界地图册子开始，便对域外情势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一方面钦佩外国人对地域描绘的精确，另一方面又觉得其汉语说明“俚不成文”，遂产生了一种著书立说的念头，随即就裨雅理所赠世界地图册子“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不久，其部下霍明高又购得一册尺幅更大的世界地图送他，从此，他便开始了对这些世界地图的研究，凡“五阅寒暑”，撰述草成，题曰《舆图考略》。全书除草图外，计考释文字约有三四万字，都是对图所作的文字说明。其草本虽然现已不可看到，但从现存于台湾“国立图书馆”的《舆图考略》手稿本中我们仍不难看出，此本是经作者起码两三次增删改写的稿本，仍保留有大量的最初草本的痕迹。如果我们剔除该本上的增删改写，还最初草本的面目，就可以看出其最初草本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在每洲的首页上都标有“舆图考略”字样；二是在每张图后都标有“×××图说”的题目；三是草本在段与段之间没有必要的逻辑关系，无事先设计的前后一贯的撰写体例，其一面收集资料，一面撰写的特点十分突出。其所据的资料，中国人著述的只有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以及西方人所著《高厚蒙求》等数种而已。与最后成书的《瀛寰志略》所用资料

相比，相差很远。

2.《瀛寰考略》阶段

《瀛寰考略》是最后定稿的《瀛寰志略》的过渡本。《瀛寰考略》这个本子的名称是在1844年7月就开始使用的，徐氏在这个本子的前面写了一个短序，称“方今恩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岸集。其境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之尔”。《瀛寰考略》是在《舆图考略》的基础上，从1844年7月到1846年12月的三年多时间，作者通过读书和口访笔录等途径，广泛收集域外各国的地理、疆土、历史、人口、人种、民族、宗教、物产、政治体制、教育科技、民俗民情等等各方面的资料，进行增删而成的。在此期间，作者在给舆地学家、《蒙古游牧记》的作者山西平定州人张穆的一封信中谈到：“海图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书得即摘录，其书皆俚不成文，而事迹颇有可采。每与夷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新闻。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巨观，惟其中舛误亦不少，如以北海西岸之瑞典与日耳曼南面的瑞士相混，大者如此，著书之难精，盖可知矣。”信中所说的“舛陋不足观”的前稿，指的就是《舆图考略》（此本现存于台湾“国立图书馆”）。从这一段话中，可以想见当时作者搜集资料的艰辛。由于占有了大量的资料，使作者在增删时对全书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成熟的统一体例。与《舆图考略》相比，《瀛寰考略》在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并具有了一定的史志的风格。至1846年，《瀛寰考略》在《舆图考略》的基础上，修改大致告成，与后来问世的《瀛寰志略》刻本已相差不远。

《瀛寰考略》告成于1846年至1847年之间，此间他曾请多人传阅并提修正意见，这在《瀛寰志略》的自序中作者作过一些说明：“稿凡数十易，自癸卯（1843）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见之，以为可存，为其删定其舛误，分为十卷。同人索观者，多怂恿付梓，乃名之曰《瀛寰志略》。”所以，《瀛寰志略》这个书名，乃是作者在最后付梓之前才最后决定的。在此之前作者对本书的修改增删，都是以《瀛寰考略》为书名的。

3.《瀛寰志略》阶段

《瀛寰志略》在定稿付梓之前，照理应当有一个楷书誊清本的。但可

惜此本今已佚失，其原始面貌我们今天已不得而见。现在能见到的是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徐继畬在福建巡抚任上由福建巡抚衙门所刊刻的《瀛寰志略》十卷本（下称戊申本）。这也是该书的第一个刻本。全书七百八十一页，页十行，行二十四字。该书一经问世，"即腾谤议"，昏聩的皇室官僚和那些封建政客们用心险恶地对书中所介绍的日耳曼、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政治体制、领袖人物等客观情况极为不满，攻击徐继畬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并荒唐地讥笑书中一些国家的译名说什么没见过葡萄长牙，没见过西班长牙，其无知而夜郎自大的嘴脸令人哭笑不得，徐继畬的后半生也因此书的付梓而进入了"无了休"的坎坷之中。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还有道光三十年（1850）红杏山房《瀛寰志略》的流传，说明徐继畬的这部著作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诽谤而被世人所弃。直至同治五年（1866），外国列强的炮火彻底打碎了清朝统治者妄自为大的美梦后，《瀛寰志略》中所介绍的域外各国的情况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决定重刻《瀛寰志略》，表明官方至此才对本书所记录的各国情况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这个刻本距初刻本的问世已有十八年，而在此之前，日本人早已借翻刻此书制造舆论，完成着告别封建制度的"明治维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日本人的翻刻本有咸丰九年（1859）日本刊本，咸丰十一年（1861）日本文久辛酉对嵋阁刊本。其后，本书在国内的刊本也越来越多，计有同治五年（1866）五台徐氏刊本，同治十二年（1873）掞云楼校刊本，同治十三年（1874）香海书店铅印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扫叶山房铅印本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印本。《瀛寰志略》一书的影响之大，由上述众多的翻印本可以想见一斑。

《瀛寰志略》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的一部拓荒之作。面对当时列强入侵，山河破碎的形势，作者睁开眼睛，鸟瞰中国之外的世界，敢于承认敌强我弱的严酷现实，抛弃清朝统治者腐朽的闭关自守，妄自为大观念，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本书的问世，也对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解放思想，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虽然我们今天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已远非徐继畬时代所能比，但是，作为一部拓荒性质的历史著作，不仅对了解近代变革图强的思想，而且对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宋大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从《瀛寰志略》看徐继畬的思想认识与心态

郭春梅

一

清中叶以来，“天朝上国”的思想充斥着当时中国人的头脑，到鸦片战争前后，这种天朝观念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社会观念，既与当时的生产力有关，更与清朝政府的统治政策有关。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对塑造人的精神有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为4850万两，其中田赋一项为3000万两，占总收入的63%；关税为450万两，只占总收入的9%。[①] 这就使得清政府不需要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直延续着一种阻挡汉人与外界联系以稳定维护政权的基本国策；尤其作为金字塔政权顶端的对社会有一种导向作用的清朝帝王把天朝上国的地位和夷夏大防看得非常重要，越发加强了天朝上国的整体观念。

关于清朝闭关政策及影响，有关的著作及文章在80年代以来均有不同程度研究，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朝与西方国家综合国力相差还不太远，但在生产力水平已拉开时代距离之时，由于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顽疾与虚妄，中国上层社会的思想认识与西方走向一种逆向轨道，大多数中国人沉溺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固守自我利益的自我封闭和自我陶醉之中，这就使中国和西方乃至于后来居上的日本有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

① 汤象龙：《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四川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第59—60页。

从当时以及以后的情形来看，上自天子、权贵、官吏，下至知识阶层、平民百姓，无不生活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之中，这种天朝上国的观念不仅渗透到了官员的思想之中，不仅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理念，也成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是非准则，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道光九年（1829），道光皇帝在批示李鸿宾的奏折中说英国“该国每言货船在粤海关约纳税银六七十万两，在该国以为奇货可居，殊不知天朝视之，实属无关毫末”[①]。鸦片战争前，即便是当时最开通的林则徐，在最初《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也以高高在上的口吻这样写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况以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②] 而在三元里人民的告示中，也这样写道：“照得向来英逆，素不安分，屡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③] 均是一幅居高临下的口吻，充斥着文化优越感、鄙夷外国和不屑与伍的心态。

近代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认识使社会氛围处于一种夷夏大防的警觉之中，也使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不能以求实的目光去看待西方及一些新事物，也不能正视世界的一些先进文化。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思想认识一直延续着，很多上层的精英不能也不愿承认自己落后的事实，结果导致了这个阶层长时间生活在一种虚妄的自我世界之中，其心态极为消极和扭曲，不能正视进步和改变的世界，成为中国变革与进步的最大障碍。

《清朝文献通考》指责“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蜡泥加洲者，墨瓦兰（即蜡，笔者注）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为一洲，而中国以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彼

---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57卷，《市籴二》，第8122页。

② 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齐思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第169—170页。

③ 齐思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1页。

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①]。在官方看来，外国任何有关世界的真实描述无疑为诳谬荒诞之说。

在中国与西方关系发生大转变的时期，也正是中国的保守精英们对西方文化大声讨的时期，面对的对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社会、国家、风俗究竟为何种状态？非常遗憾，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了解。民族自尊的群体观念在此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已演变成了一种群体的"自我封闭心理"。

"自我封闭心理"，在心理学领域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也称之为"妄想型人格"。这种人格障碍其特点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心胸狭隘。一方面可表现为骄傲自大、自命不凡……他们常常强调自己有理的一面，过分夸大对方的缺点或失误……他们缺乏自知之明。[②]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带有群体文化封闭心理，与中国的历史也与清朝的政策、制度有关。

徐继畬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于1843年任职于福建巡抚的。

在这之前，徐继畬亲历了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英舰驶入穿山洋，七月徐继畬调晋江汀漳龙道，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次年（1841）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驻守漳州。八月，英军攻破浙江定海、镇海等地，徐继畬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悲愤地记述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③]

可以看到，眼见远道的强敌入侵，清军一再惨败的经历以及割地赔款条约的签订在徐继畬的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震惊与伤痛。但是，打败中国的对手究竟有何能量？中国以外的世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远道而来的侵略者究竟是怎样越海来到中国的？这些都在他心中留下了疑问，这也就是他后来接触到西方相关资料后决心写一部真实世界书籍的主要原因了。

在徐继畬上任后，看到了西方所绘的几幅世界地图，这对既是一个地理学者，更是一个亲历过鸦片战争心存许多疑问的爱国官员而言，恰似千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293卷，《四裔考六》，第7469—7470页。

② 赖小林主编：《心理全息治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③ 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页。

里寻觅的东西突然展现在眼前一样，从此徐继畬开始了对真实世界的探索。

徐继畬极尽所能搜集一切相关资料，对接触到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进行多次咨询。其如饥似渴的求知状态、对新知识掌握的速度以及勇于承认现实的勇气令雅裨理深有感触地说："显而易见，他已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要远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他……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上。英国、美国和法国要比其他国家给予更为详细的考察。"① 从《瀛寰志略》的自序来看，也正是在逐渐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在他与美国传教士等人的接触中，逐渐发现他所了解的对手等国和以往了解到的"蛮夷"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周游世界的历史与所绘的世界地图逐渐颠覆了徐继畬的旧有认识，这对徐继畬触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②。不难想象，从鸦片战争期间满口称英国为"夷"到独信赖西方人所收集的资料和所绘之图，编辑《瀛寰志略》时的徐继畬的心态和思想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

当徐继畬越多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越发想向皇帝和整个同僚大声疾呼中国所处的危险境地，急于要向国人介绍和描述真实的世界。而在一种虚妄思维和扭曲心态的保守社会中，进行这种介绍和真实描述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徐继畬为此费尽心机，最终采取了迂回的表现手法。诚如二十余年后能真正理解他的王韬所说："中丞（徐继畬，笔者注）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不可逾，旧章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③ 徐继畬根本不懂外语，却经过"未尝一日辍"④ 的搜集与写作，几经寒暑和易稿，最终以世界史地介绍的形式实含危机意识向国人展示一幅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8页。

②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瀛寰志略·自序》，《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③ 王韬：《瀛寰志略跋》，《近代文献丛刊·弢园文录外编》，第226页。

④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瀛寰志略·自序》，《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真实世界面貌的原因了。

了解了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的目的和用心，我们也就明白了——通过《瀛寰志略》，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天朝上国”观念看待世界的徐继畬。

对《瀛寰志略》的编辑撰写，诚如作者所言，“坚绝不信揣摩之说”①，作者在此的用心是告诫国人，他了解和介绍的世界，是真实的，是真切的。现实的世界各国远非“古代夷狄”可比。作者以严谨的态度，爱国者的情怀，积极的心态，求真求实的精神，大胸怀和大气度的深刻思想认识，使作者在书中处处体现了警醒国人的良苦用心。由此，书中表现了作者思想认识中这样几个难能可贵之处。

第一，科学的精神。

首先是颠覆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鸦片战争前，对世界的认识依旧停留在闭塞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水平。在乾隆年间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中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②。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盲目自大，拒学“蛮夷”既是当时的一种习惯性思维，一种社会风气和习俗，更主要的是成为了政治评判标准，成为了断定是非的一种尺度。这种社会氛围加大了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难度。虽然如此，徐继畬并未盲从也并未屈从于这样的一种妄想之中，而是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这样描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赤道为日驭正照之地，环绕地球之正中，中国在赤道之北，即最南滨海之闽广尚在北黄道限内外，较之北地，寒暖顿殊。遂以为愈南愈热。”③ 第一次科学地向国人展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纵观《瀛寰志略》全书，徐继畬对世界处处体现了科学认知的精神，如记述地球的形状和地貌，“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泰西人推算甚详，兹不赘。）”④ 本着科学的精神，

---

①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瀛寰志略·自序》，《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一》第293卷，第7413页。

③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瀛寰志略》，《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④ 同上书，第5页。

徐继畬对不了解的知识虚心求教，反复考证，以求准确。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考证为基础，有疑惑则求证或存之。如“北冰海人人知之，南冰海未之前闻。顷阅西洋人所绘地球图，于南极之下注曰南冰海，以为不通华文，误以北冰海例称之也。询之米利坚人雅裨理”①。在徐继畬的地球图中，地球宛若一个地球村，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的真实面貌。

此外，徐继畬还科学地再现了各国的经济、社会、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科学地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现状以及科学详细地分析了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占领的原因。尤其对曾经的对手——英国的历史发展及社会状况进行了科学详细的介绍。“（伦敦）东西南北皆七十里，无城郭，居民一百四十余万。殿阙巍峨，规模闳巨，离宫别苑，绵亘相属。文武百官之署，各有方位，街衢纵横穿贯，百货山积，景象之繁华，人户之凑密，为西国第一大都会。”② “英国之制，相二人……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有乡绅主议。…又英国听讼之制，有证据，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询问，办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刑法焉。”③

没有诋毁，没有谩骂，没有曲解，一幅繁华有序的国家与社会画卷，这样一部科学真实的信史以至于使二十余年后造访英伦的郭嵩焘不由由衷赞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④。

而欧罗巴“其土膏腴，物产丰阜。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⑤。

与其说徐继畬做的是一部地理志，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本浸含其心血的社会科学启蒙著作。

第二，求真求实的精神与正视现实的勇气，是贯穿全书的灵魂。

清朝盛行考据学，考据讲求证据，要求去伪存真。然而，清朝一些在学术上讲求去伪存真的学者，却缺乏一种正视外来文化的勇气与变革的精

---

①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瀛寰志略》，《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② 同上书，第 225 页。

③ 同上书，第 230 页。

④ 转引自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07 页。

⑤ 《瀛寰志略》，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9 页。

神。在这里笔者所谈的变革，并非是对清朝社会进行一场社会制度与社会风俗的变革，而首先是能改变“天朝上国”的观念，改变夷夏大防的观念，正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历史、贸易、风俗和文化。如果说，乾隆时代中国还处于一种和西方交往较少的时候，而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大规模的东进和与中国的交往，使了解西方正视现实成为了中国人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对“天朝观念”下的中国人来讲无疑具有挑战性，而这个挑战并非当时中国精英所能接受的。

恩格斯曾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① 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鸦片战争并未触及到内陆社会，也并未改变中国的传统社会；就大部分精英们而言，也并未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既得利益，这也使得一部分高级官吏依然如故。大学士徐桐、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德润、内阁学士文治等人以坚决反对了解西方而著称。甚至在鸦片战争数十年后，他们依然固守着自己的观念。如刘锡鸿出使英国时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先进生活，然而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屑一顾和拒之千里的态度。“其（英国）铁厂、木厂，阅工截铁锯木，无非机器，皆非余所心属。”② 火车“不惟有害于中国，并有害于英”③。并与到访的波斯藩王的应对中这样说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④ 清代著名的文字版本学家也懂得养生之道的叶德辉说：“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⑤ 如此看来，此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精英的表现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仍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⑥，说到底，是对旧的农业社会怀有的留恋和面对真实世界消极的甚至是扭曲的心态和思维。

与同时代人相比，徐继畬所具有的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思

---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02 页。

② 刘锡鸿：《英轺私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61 页。

③ 同上书，第 49 页。

④ 同上书，第 141—142 页。

⑤ 叶德辉：《西医论》，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0 页。

⑥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6 页。

维与心态。

本着求实的精神、健康积极的心态，徐继畬敢于正视并不隐晦他国的优点，也勇于正视对手的优势。越南，“鸦片之禁甚严，犯者立置重典”[①]。徐继畬能勇敢地正面分析对手的强势和中国当时落后的现状，也找到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火器创自中国，彼土（泰西）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②] 这样冷静地认识对手，这样客观总结对手胜利的原因，对当时中国的警醒用心不言而喻。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天朝上国的自大社会心态和认识中，徐继畬把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汉唐与西方的对外关系以及双方在世界所涉及的区域作了比较，这样说道：“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为唐人。然唐时之番舶，亦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国。……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③] 在天朝上国的群体观念中，能冲破天朝上国厚茧般的束缚，认识到自己的汉唐盛世并不值得炫耀，更敢于承认自己的对手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快速发展和对世界的影响，体现了徐继畬对现实世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认识与评价，体现了少有的中国人的清醒，从这样的笔端中勾勒出的是一个能直面现实的有勇气的中国人的风貌，其勇气和深刻认识罕有志同道合者。以至于十余年后，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④]

第三，以平等平和的心态看待世界，敢于冲破思想与社会习俗的约束，从制度层面求实。

就在大量的官僚和知识精英们闭眼不看或者嘲笑西方的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之时，就在中国还依然生活在夷夏大防的时候，徐继畬在

---

① 《瀛寰志略》，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109 页。

③ 同上书，第 109 页。

④ 曾国藩：《致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6，岳麓书社 1995 年版。

《瀛寰志略》一书中以少有的世界战略目光看待世界和各个国家。

其一，他对其他国家的称呼在语气上是平等的口吻，如，称西方为“泰西人”，称日本为“日本”。这在当时清朝整个社会由上而下均称国外为“夷”的语境中，徐继畬这一称呼的改变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观念的率先改变。

其二，在《瀛寰志略》一书中，他一改中国士大夫鄙夷外国为“蛮夷之邦，犬国之性”，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给予称赞，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①]“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②]徐继畬能在封建君主专制朝代，又以二品官职的身份，如此赞叹创立民主自由制度的美国之父，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优点，不能不说，徐继畬本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大胸怀和大气势，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取明哲保身之道，体现的是徐继畬深深的爱国情怀。

其三，在徐继畬的笔下，各国无论是男王，抑或女主，只以德政和对国家治理的能力而论，并无丝毫的男女偏见，葡萄牙“女慈惠爱民，国人安之”[③]。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能如此叙述，除体现了作者的求实原则，也体现了作者超越封建时代的见识。

其四，徐继畬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移民经商、重商强国国策的赞叹，表现了作者主张发展商贸、发展经济的务实思想。

从《瀛寰志略》来看，徐继畬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徐书的用意是深刻的，商业贸易带来的繁荣、先进的西方、沦落的东南亚，无时不在警示着国人。

其五，作为世界发展潮流下的有心人，徐继畬的思想是开放的和积极进取的，同时也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

---

① 《瀛寰志略》，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 页。

② 同上书，第 267 页。

③ 同上书，第 215 页。

徐继畬到达了与西方近距离接触的境地。为了《瀛寰志略》的撰写，积极寻找资料，虚心请教西方人，反复考核中外资料，求真去伪。这种态度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开放。《瀛寰志略》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较翔实的记述。如果说，正视“夷国”所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求实的精神，更需要的是一种直面中国落后西方的勇气，因为这种勇气本身就包含迅速转变的思想。

不仅如此，徐继畬且能从客观开放的角度谈到其他国家的宗教信仰习俗，波斯、印度的“火神崇拜”，为“义起报本，非邪神也”①。“佛教兴于印度，以慈悲为主，以寂灭为归。摩西十戒，虽浅近而尚无怪说。”② 相比较在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社会的上下层依然把基督教的各种宗教仪式视为邪教而言，我们看到了徐继畬的博大胸怀和平和心态。

《瀛寰志略》还是一本真实的各国社会史画卷，徐继畬对世界各国的风俗、衣着、发式等作了一些描述。佛郎机“所织大呢羽缎皆精致，又能织花纹丝缎。…其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自来火之枪，火轮之车船，大半皆其所创。都城有钟表匠二千人，每岁造时辰表四万件，自鸣钟一万八千架。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③。与当时人把这些视之为“奇技淫巧”而言，徐继畬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思想认识。

徐继畬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各国的优点、弱点、利弊，一一而论，娓娓道来，在他的著作中，既有求真的观点与态度，又有本着民本主义的积极态度，在展现各国政治、科学、贸易和社会风俗的同时，又表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如对西班牙的描述：“境土恢闳……其俗长于泛海，善于远行。……然近年衰弱已甚，且贫苦者何也。富而无政，虽秦隋不免覆亡，况区区夷国乎？”④

鸦片战争后，曾被震惊的皇宫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唯独个别思想敏锐的中国人警醒到了这场战争背后的问题。徐继畬在开篇的凡例中这样写道：“南洋诸岛国，……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

---

① 《瀛寰志略》，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8 页。

② 同上书，第 92 页。

③ 同上书，第 196—197 页。

④ 同上书，第 214 页。

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故于此两地，言之较详。”[1]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徐继畬的警觉之心。如果说，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提出了“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的论点，而早于其二十年的时间，徐继畬就以他国的命运，警醒着国人。

王韬对《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作过评论，认为二书都是近来谈海外掌故者之“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比较而言，“各有所长”，“中丞（徐继畬，引者注）以简胜，司马（魏源，引者注）以博胜。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灿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2]。王韬尤其精确地指出徐继畬的勇气和深思远虑更是当时官吏不可企及的。“呜呼，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逢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3] 真正认识到了《瀛寰志略》的真谛与目的所在。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在当时的中国太少也太晚了，不亦惜乎悲乎？

在求真求实原则下，徐继畬以冷静的头脑，正视现实的勇气，还有忧国忧民的心态与虚怀若谷的胸怀，撰写了一本本该令当时中国人清醒和奋起的书。

徐继畬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本书，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勇气、观念和心态。

二

纵观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全书透露着一种深思远虑、催人警醒的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透露着一种积极的观念，即健康的、虚怀若谷的、平等平和的心态。徐继畬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在当时是事实存在。正视现实，正视世界，学习一些国家包括对手的优点，这是徐书的宗旨和目

---

① 《瀛寰志略》，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② 王韬：《瀛寰志略跋》，《近代文献丛刊·弢园文录外编》，第 226 页。

③ 同上。

的。向中国人指出这一点需要的不仅是一种认识，更需要的是一种勇气，徐继畬做到了。这就是徐继畬的魅力和清醒所在。

徐继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除了他是一个严谨的地理学者和在鸦片战争中的经历外，还和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在徐继畬看来，做人首先要“心正而后身修”①；做学问“要诚其意者毋自欺”，因为“人有所知即有所不知，而特患人之自欺也”②。由此决定了徐继畬在了解到新的强敌之时没有向其他人一样自我欺骗与幻想，没有被情绪所控制，而是选择冷静勇敢地面对和了解。

从徐继畬和清朝顽固精英们的两种思想认识和心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都能像徐继畬一样能正视现实，正视西方的先进，并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很难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会在以后逐渐形成，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侵略虽然是必然的，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轨迹不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西方的侵略和中国的现状。心理状态如何，是一味的诋毁、排斥先进文化？还是正面认识、分析并学习其他国家甚至是侵略者的优点以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革？虽然是两种态度两种心态，但导致的结果却差之千里。

不论清朝绝大部分顽固精英们是否愿意承认，不论其心态多么消极甚至扭曲，事实不会因其而改变，历史的发展也不会因其而停滞。当他们抱着一种消极封闭扭曲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时，中国未来的历史轨迹也就逐渐走向了如马克思描绘的那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③

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氛围中，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徐继畬《瀛寰志略》的悲剧命运。“甫经付梓，即腾谤议”④，“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

① 徐继畬：《退密斋时文·学庸》，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3 页。

② 同上书，第 369 页。

③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6 页。

④ 徐继畬：《文集·复吴思澄比部世兄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6 页。

灵"[①]，而他在《瀛寰志略》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诚如郭嵩焘在二十余年后所说的："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②]

徐继畬对中国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郭春梅：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教授）

---

① 史策先：《梦余偶钞》第1卷，《近代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82页。

② 《张其昀序》，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7页。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述论

殷俊玲

岁月的潮涨潮落，使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而湮没无闻。徐继畬，这位山西五台出生的清朝官员，却让中国人记起，也让诸多外国人所关注。人们探访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土地，寻觅他的遗物和手稿，流连于他的文章诗草，从中感受他的失意与苦闷，探究他那卓然不群的思想。是什么使人们如此关注他的生平与所为？他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呢？要而言之，其编著的《瀛环志略》便是人们关注的缘由，它为国人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视界。质而言之，徐继畬是中国近代以来真正开眼认识世界的第一人，《瀛环志略》便是明证。

一 《瀛环志略》的成书

在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的东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在东方，1644年，满族贵族挥师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西方，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从此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自此，西方新生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的对峙和斗争便在历史的长河中铺展开来。

在中国清朝，与西方资本主义机器的轰鸣、各业的节节向上相比，仍然是一派中世纪的田园景象：

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
瓶储无粟谁负耒，征税煎迫难逃生。

农夫的贫穷化作了物产的丰饶，宫殿的瑰丽。早在元代，威尼斯人马

可·波罗就描述了中国广阔的沃土，连绵的城市，丰盈的物产，这些描述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无限神往。但直至清朝入关，中西方之间的了解仍是朦胧的。中国人既不辨其地理位置，又不知其家国内政，一律把它们视作“蛮夷”之邦予以蔑视排斥。而西方则对中国心怀梦想，一次又一次踏浪而来。

面对西方一次次叩关的热望，开国不久的清王朝拒之以闭关的冷脸。虽然后来有广东一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并不能满足西方的渴望。而英国马戛尔尼来华要求通商被坚拒后虽然满怀失败的怅惘，但同时却带回一个令西方鼓舞的信息：中国衰弱已极，一旦中英发生战争，中国必将土崩瓦解。资本主义扩张的欲望因此更加张扬，他们在伺机而动。随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果然一败涂地，令清朝仁人志士发指皆裂，泣下沾衣。

身世家国之痛使忧国忧民者开始重新审视被自己称作“蛮夷”的敌人。在抗敌守城的日夜劳顿中，在与外国人的日常接触中，徐继畬深知所谓“蛮夷”之敌的形象并非仅如林则徐所知是坚船的迅速，利炮的威力，他清醒地认识到眼前的“蛮夷”之敌并非等闲之辈。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必须作出新的选择。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了解敌人已势属必然，刻不容缓。

但是，呈现于国人面前的关于外国的记载却是几近臆想附会，或张冠李戴，或内容失真，谬以千里。有感于此，徐继畬开始留意考究外国的情状。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继畬升任福建布政使，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这种身份为他接触西人，了解外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徐继畬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多次交谈，向他询问外国情况，并向雅裨理借摹世界地图册。此后，徐继畬随时采访，广为搜集有关外国的资料，正如他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说“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徐继畬孜孜不倦地探索外国史地，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接触过徐继畬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谈到徐继畬时说：“有时，他会一连几个小时谈论地理，把中国字贴在一本豪华的地图册上。……在他的请求下，领事夫人为他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用色彩标明不列颠、法兰西、俄罗斯等国的领土。他收到后，马上送来一张便签，询问为何阿富汗被省略掉，是否已经被波斯吞并，或者已经不再是个独立的王国了。”① 在记述南洋群岛时，徐继畬还亲自询问去过南

① ［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5 页。

洋的老舵手，以考证自己所阅资料的正误。

对于现有资料，徐继畬不仅留意官方文献和报刊，而且还对不为人注目的私人著述予以关注，并力求考证这些资料的真伪。如他通过考证，纠正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载“法人食小儿”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且甚属荒谬。对于不甚明了的地域记载，徐继畬采取审慎的态度，不妄加评说。对于西方地图，他欣然采纳，因为他知道西人足迹遍四海，且善于绘图。

五年寒暑，黄卷青灯。徐继畬苦心孤诣，经数十次修改，终于完成《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于福建抚署。《瀛环志略》计十卷，图四十四幅，记述各大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政治及国家盛衰等。这部精心考求的著作，在当时犹如给幽暗混沌的世界开启了一扇天窗，窗口呈现的璀璨星空既使一些人感到格外刺眼，也被一些人惊为奇异，从而引发了探求新知的渴望。

二 《瀛环志略》的视界

《瀛环志略》的视界在国人眼中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瀛环志略》描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之一国的正确认识。

徐继畬基本接受了西方地理学将世界划分为四大洲的理论，并描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明确指出，中国在亚细亚之东南，所占面积超过半个亚细亚洲。这就摒弃了国人盲目虚骄的无知心态，承认了世界之大，中国乃世界万国之一的事实。徐继畬还对“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作了大胆的直接的否定。他指出，“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①]。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强国。这样的认识突破了既往国人夜郎自大，不知天外有天的封闭心态，为国人对世界大势的认识和学习开启了新的航道。

第二，《瀛环志略》呈现了西方绚丽多姿的物质文明。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称赞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

---

① 《瀛环志略》第9卷，道光戊申刻本。

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精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深浅，不失尺寸”①。在谈到法国时，徐继畬称赞法人“所织大呢羽缎皆精致，又能织花纹丝缎”；“其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自来火之枪，火轮之车船，大半皆其所创”②。谈到英国时，徐继畬介绍了英伦三岛的繁华景象。他称赞伦敦建筑宏大巍峨，街道纵横贯穿，百货如山，商船云集。对英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介绍。徐继畬还对英国的纺织、造船、制炮工艺作了专门介绍。如他赞扬英国织布机器既省工，且所织之布精美绝伦；称英国所造之兵船，载重多而船体固，不畏风浪，易于驾驶，且进退自如，起止方便；所造之枪炮，表面光滑，运用自如。徐继畬还分别介绍了美国26州的物产和工商业状况。如在介绍马萨诸塞州和波士顿时，徐继畬写道：“城市万室云连，百货阗溢……其商船或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③ 徐继畬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介绍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西方繁荣强盛的钦羡之情，表明他已然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就启发国人从这种差距中奋起，不要沉醉于过去的文明而止步不前。如徐继畬屡次指出，西方的枪炮源于中国的火器，但是，他们能够在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制造出锐利灵活的枪炮，而中国却不能。

在展现和赞赏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瀛环志略》还揭示了工商可以富国的道理。徐继畬认为，西方诸国所以富强，与他们工商业的发达密不可分。他分析了欧洲诸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之富强全在于其贸易发达，商民遍及四海。对于美国的富强之由，徐继畬也持同样看法。他通过对美国各州贫富的比较，特别指出了工商业的致富之用。如他指出美国东北部由于有波士顿、纽约、非勒特尔非尔三大通商码头，故而富商大贾云集，虽地域不广，但气象不凡。而内地都靠耕作，虽土地广阔，但财力不如海滨之盛。徐继畬还通过对俄国和英法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工商致富致强的道理。在当时中国农本主义的大气候中，徐继畬能够看到工商致富致强的现实，并对此表示了赞赏，自是慧眼独具，难能可贵。这样的呈现，无疑会启发后人为国家富强而寻求工商发展的探索，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① 《瀛环志略》第3卷，道光戊申刻本。

② 《瀛环志略》第7卷，道光戊申刻本。

③ 《瀛环志略》第9卷，道光戊申刻本。

第三，《瀛环志略》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对于英国，徐继畬着重记述了英国议会制度，对上、下两院的议事情形作了详细介绍。述及美国政治制度和华盛顿时，徐继畬笔锋中流露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欣赏和对华盛顿的由衷钦慕与敬仰："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①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②

徐继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关注与赞赏，可谓是当时国人之先觉。其时，在侵略者炮火轰鸣的刺激下，虽有林则徐和魏源对"蛮夷"之属的重新审视，但他们只看到敌人火炮轰天，兵轮如飞的现实，都停留在肯定西方军事技术的认识层面，而传统的"天朝上国"意识并没有改变。徐继畬则不再拘囿于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以坦诚为笔，以真实为墨，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之一隅，多角度审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选举制、议院制等政治制度及美国"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领袖华盛顿表达了毫不掩饰的赞赏。

三　自强的主旋律

《瀛环志略》全书始终回响着催人自强的主旋律。

通观《瀛环志略》全书，徐继畬在介绍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行文中处处体现出他对各国强弱盛衰原因的热切探究。德雷克称徐继畬"为了评估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原因和性质，他百折不挠地从西方人那里了解地理实情，并研究所能得到的地理学文献"③。

《瀛环志略》对世界上奋发图强的人物和国家着墨很多。如对美国华盛顿、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拿破仑的介绍不厌其详。他称华盛顿"血战八

① 《瀛环志略》第9卷，道光戊申刻本。

② 同上。

③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年，屡蹶屡奋，志气不衰”[1]；称彼得大帝“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2]，终成就了俄国的强盛。

徐继畬不惜笔墨给这些杰出人物，无疑包含着他希望国人能够效法他们的良苦用心。这种用心也体现在他对西方国家介绍时的不同取舍态度上。

在介绍西方各不同地区和国家时，徐继畬对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洲作了详细的介绍，而对落后的非洲和南美洲则记述简略。在介绍欧洲的十六个主要国家时，以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最为详细；在介绍美洲时则以美国为最详，占全章一半以上篇幅。在内容的取舍上，对诸国的地形、地貌、物产、气候等介绍简略，对政治制度、军事组织、领袖人物及历史沿革诸内容则不吝笔墨。

不仅如此，徐继畬在介绍各强国时，都详细叙述了这些国家所经历的内忧外患，并描述了这些国家奋发图强的经历，以鼓舞国人图强的信心。同时，徐继畬还介绍了一些国家如奥地利、西班牙、波兰、瑞典等国由强变弱的事实，并引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名句来警醒国人要增强忧患意识。

对有利于国人学习和借鉴的人和事，不论其大小，徐继畬都尽力详述，不惜笔墨。如他在《瀛环志略》中写道：“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3] 对苏禄人自强的由衷礼赞溢于言表。为民族创痛而深思的徐继畬从苏禄人的胜利中获得中国人自救的信心和榜样，正如美国人德雷克所说，“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4]。

总之，《瀛环志略》在字里行间的取舍中，于笔锋的褒贬抑扬中，始终回响着激发国人自强的主旋律，产生了催人觉醒的力量。

四　《瀛环志略》的流传及影响

正是由于《瀛环志略》对世界大势客观准确的介绍、对民主政治的关

① 《瀛环志略》第9卷，道光戊申刻本。
② 《瀛环志略》第4卷，道光戊申刻本。
③ 《瀛环志略》第2卷，道光戊申刻本。
④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注及对国家兴衰强弱的探究，使得《瀛环志略》虽然为守旧势力所指斥，但却被有识之士视为“有用之书”，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国人。

《瀛环志略》成为近代国人了解世界的必读书目。凡出洋考察或充当使节的人，大多都随身携带《瀛环志略》，以便查阅。《瀛环志略》中对外国地名等的译法，后来成为总理衙门翻译外文书籍的标准。洋务运动的领袖曾国藩从《瀛环志略》中获得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洋务理论家郭嵩焘赞叹徐继畬虽未历西土，但所言确实，真是深识远谋。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认为《瀛环志略》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究列国之强弱盛衰，是“当今有用之书”。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则直接从《瀛环志略》中得到了关于世界知识的启蒙。他自称读了《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并把《瀛环志略》列作自己必读的西学书。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可以说，19 世纪后半叶追求新知的人们，几乎无人不读《瀛环志略》，并深受启发。正如德雷克所言：“实际上，徐继畬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 19 世纪中国整整一代思想家。作为变法维新的宣言，它为 19 世纪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①

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瀛环志略》多次被翻刻，且有多种版本。仅 1898 年就有三味书屋校刊本、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上海书局代印本。有人称当时《瀛环志略》已是“家置一编，不胫而走”，这虽是溢美之词，但也反映了《瀛环志略》普遍受到了国人的重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对《瀛环志略》作续补和增补工作。如何秋涛《瀛环志略辨正》、薛福成《续瀛环志略初编》、佚名《瀛环志略续集》等。这虽然反映了《瀛环志略》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但同时也显示出《瀛环志略》问世几十年后依然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瀛环志略》不仅启迪了国人对世界的探求，它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国民了解世界的重要书目。《瀛环志略》在日本受到广泛重视，多次被刊印，几近普及到一般读书人之中。1861 年的刻本印刷精美，地球图用红、黄、蓝三色套印，人名和地名还被分译为日文和英文。《瀛环志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5 页。

略》被日本有识之士认为是“通知世界指南针”，对日本维新变法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当代史家评论《瀛环志略》对日本的影响时指出：“如果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地理学，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于《瀛环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之词。”

《瀛环志略》也受到西方人的高度赞赏。1851年的《中国从报》评述《瀛环志略》是给予地理工作正确指针的一个里程碑，它比中华帝国高级官员和文人了解地球上其他国家情况的任何出版物都要高明得多。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华盛顿画像，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表达了对徐继畬著《瀛环志略》盛赞华盛顿的敬重之情。美国学者德雷克指出，《瀛环志略》比《海国图志》“更准确地、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①。

总之，《瀛环志略》是中西对峙下中国对西方重新审视的杰作，它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赞赏，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关注和欣赏，在国人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视界，反映了徐继畬理智的历史沉思和世界眼光，影响至为深远。

（殷俊玲：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教授）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从《瀛寰志略》看徐继畬多元文化观

秦　艳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在外国的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此后，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眼光注视向海外，出现了大批由中国人执笔，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边疆史地著作，如龚自珍《蒙古国志》、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何秋涛《朔方备乘》、姚莹《康辅纪行》、梁廷枏《海国四说》等。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二十二部以上关于世界地理问题的著作问世①。尽管“中国人关于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最后结果是，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②。但是，这些著作已大体描绘出世界地理历史的全貌，开阔了民众的视野，使他们逐渐地建立起一种崭新的世界观。而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则是其中的佼佼者。率先接受了西方现代地理的宇宙观，认同了多元的世界，以及不同于中国的多元世界文化。

一　多元世界中的多元文化观

在自序中，作者对《瀛寰志略》的成书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

①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①] 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终成是书。

徐继畲率先接受了西方现代地理的宇宙观，认同了多元的世界，以及不同于中国的多元世界文化。徐继畲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在《瀛寰志略》一书中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首先，他基本接受了西方地理学说将世界分为四大洲的理论，介绍世界时说：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②] 其次，运用近代区域地理学说分别介绍了四大洲五大海的大致方位。亚洲："亚细亚者，北尽北冰海，东尽大洋海，南尽印度海，西括诸回部，西南抵黑海，在四土中为最大。……" 欧洲："欧罗巴者，在亚细亚极西北一隅。地形与海水相吞噬，比之亚细亚，不过四分之一。……" 非洲："阿非利加在亚细亚之西南，当罗经坤申之位，东西南三面皆大洋，北面两内海界隔（红海、地中海），仅一线与亚细亚相连。其地广莫，约得亚细亚之半……" 美洲："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与三土不相属。地分南北两土，中有细腰相连……" 五大海也使用了相同的介绍方法。[③] 此外，又分卷阐述了每洲所属各地区及国家的具体情况，如面积、人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再次，全书"以图为纲领"、"依图立说"。徐继畲认识到"地理非图不明"，以图作为全书的内在逻辑联系，据以构造编纂体系。全书共用42幅地图，除《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人人知之"而不赘说外，其余随图皆有"说"。从空间上确立叙述方式和顺序，符合近代世界史地学科要求的编纂体系之一，而《瀛寰志略》在运用这一体系撰述世界史地时又以中国所处的东亚为起点，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地著作确立了编纂范式。正如宋大川先生所说："《瀛寰志略》运用近代地理

---

①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自序》，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 同上书，第2—6页。

学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记叙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形势和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山川城郭，地图绘制精细，方位准确。对于当时固守着‘天圆地方’、‘中国居中’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徐继畲对近代地理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掌握是令人吃惊的。他用经度和纬度分割地球，又用近代宇宙学的观点看待地球，把宏观无限的宇宙与微观地理的各国联系起来，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与传统舆地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地理学。"[1]

更为重要的是，《瀛寰志略》的编撰，并不仅仅在于创立了新的编撰范式，而在于对建立中国人新的世界观的启蒙作用。从他对世界史地介绍的重点和论述中，他承认了世界是多元的，中国只是其中之一。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仅仅是在世界四大洲之一的亚洲的“东南”，中国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有着诸多国家而为国人罕知的世界；只有突破“中国居中”的传统舆地学，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才能打破“天朝上国”迷梦，承认中国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才能从华夷之辨中解脱出来，在事实面前承认他国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这样也才能从根本上更加理性地思考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地位，从根本上来探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探索出抵御外侮，自强振兴的切实道路。

《瀛寰志略》中虽然没有使用“文明”、“文化”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作出理论的表述，但对世界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国作了介绍，给人们提供了世界文明多元的情景：暹罗“城池楼阁相望”，田畴肥沃，“米极贱，每石值银三星，时载往粤东售卖。王衣文彩佛象，体贴飞金，用金皿，乘象辇，以闽粤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俗祟佛……又信番僧符咒。”“然其国多蛊，崇信符咒，风俗政治，远逊安南。"[2] 雅典“最讲文学，肄习之精，为泰西之邹鲁。凡西国文士，未游学于额里士，则以为未登大雅之堂也”[3]。意大利“建都城于罗马，诸国仰之如周京。……其民……好谈论游戏，喜讴歌，有稷下之风”[4]。即使国人轻视的“夷人”诸国也颇具长处，特别是其先进的技艺，进步的民主政治等，更令人艳羡。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

① 宋大川：《〈瀛寰志略〉的特色与历史影响》，载《晋阳学刊》2000年第2期。

②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③ 同上书，第194页。

④ 同上书，第196页。



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①]。英吉利官员“常服之冠，圆筒平顶窄檐，燕居多用软胎贴檐，略如中国之如意巾。礼服之冠，以黑绒为之，厚一指许。顶如斧刃，前后伸出长近二尺，略似中国之雨帽”[②]，与中国人一样有冠服礼制。至于美国，“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③]。将美国放置在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上，这在固守着“天朝上国”迷梦的蒙昧落后的当时，其言论无疑是大胆的，而其启蒙作用却也是振聋发聩的。其论西方文教，都会之盛，巴黎“推为第一，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游学之士，许住院借读……又有繁术院，居各项艺术之师。如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之类，学者各就所愿，群居讲肆焉”[④]。“佛郎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⑤] 其论英国“有大书院，曰屋度，文儒所萃”。还有荷兰“居民十二万，贸易之盛，为欧土大都会……来丁、乌特两城，有大书院，文儒所萃”[⑥]。而美国“好讲学业，处处设立书院。其士类分三等，曰学问，研究天文地理，暨耶稣教旨；曰医药，主治病；曰刑名，主讼狱”[⑦]。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提到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作者已经朦胧地感觉到，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更为进步的一点是，作者能透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精密的制造工艺，繁荣的商业贸易，看到促使欧洲复兴，实力强盛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认识已经深入到了西方文化的更深的层面。对此，前人已多有论述，兹不赘述。他承认了西方国家有其独立的文明发展史，非但不是中国的边夷属国，而且在“新世界历史中，强盛的西方国家占据着那样显著的位置”，世界是一个多文明发展的体系，对世界各国文化，“不必操儒者之绳墨而议”[⑧]。

总之，正如刘天纯先生所言：“徐继畬最早向中国人士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人类社会，特别是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产力发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2 页。
② 同上书，第 262 页。
③ 同上书，第 319 页。
④ 同上书，第 220 页。
⑤ 同上书，第 226 页。
⑥ 同上书，第 209 页。
⑦ 同上书，第 319 页。
⑧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4、198 页。

展的经验教训。这对被隔绝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是头一次获得如此详细而真实的海外知识，从而有了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比较选择的依据。"①

二 华夏文明优越感的遗留

《瀛寰志略》虽然在事实上承认了世界的多元，文化的多元。但不时会流露出华夏文化优越感。比如，开篇地球概述中，他已承认中国是亚洲东南一部分，并非世界中心，但在介绍四大洲时仍然将中国置于亚细亚之上，先论中国，然后才是亚洲概况及其他亚洲国家，并且在开篇就说"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②。仍然回到了中国中心说。并且，地球概述中亚细亚部分，中国几乎成为其代名词："亚细亚者……在四土中为最大。中国在其东南，卦兼震巽，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我朝幅员之广，旷古未有。东三省之东北隅，地接峨罗斯。正北之内外蒙古诸部，悉其庭幕，编入八旗为臣仆。西南之青海、两藏，置侯尉而安枕。西北之新疆、回疆，包《汉志》西域诸国之大半，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岁以牲畜供赋役。东海之朝鲜、琉球，南裔之交趾、暹罗、缅甸、南掌、廓尔喀诸国，修贡职无愆期。是亚细亚一土，未奉我正朔者，仅有东海之倭奴，北裔之峨罗斯，极西之弱小诸回部，南荒之印度诸国耳。则中国之在亚细亚，固不止得其半也。"③ 充分表明了其深深的中华文明优越感。

再如，在叙述欧洲强盛时，在称赞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也"后，却又说"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之"④。潜意识仍然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优秀的，只有受到中国礼乐诗教的熏陶，才能称之为文明之国，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其对非洲、黑人的描写，则更加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以及对落后民族的鄙夷、歧视的倾向。他对非洲的评价："天时炎酷，土脉粗

---

① 刘天纯：《徐继畬与近代化——兼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比较》，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2—143 页。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 页。

③ 同上书，第 2 页。

④ 同上书，第 172 页。

顽，人类混沌，在四土中为最劣。"[1] 对于非洲黑人被贩卖的事情，他说："土番形貌黑丑，蠢如豕鹿，以掠卖人口为俗，强半为诸国之奴，亦可悯也。"[2] 虽然表现出对黑奴被掠卖的同情，但似乎把责任推在了黑人自己的身上，似乎是黑人自身喜欢掠卖同胞，而不知他们是西方殖民势力下的受害者。对于非洲贫瘠，他认为是"番族之无此智能也"，认为黑人智力低下，没有自己改变自身生活状态的能力，表现出作者对黑人的鄙夷与偏见。

此外，他还用卦位来解释国家的贫富状况以及人民智慧等。他说中国："卦兼震巽，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3] 其论欧洲："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4] 而非洲："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其人类颛愚，故剖判已历千万年，而淳闷如上古，风气不能自开。"[5]

作者一方面在积极宣传欧美全新的器物和政治制度，向读者介绍多元的世界，一面又无法摆脱自身强烈的中华文明优越感，试图用中国传统学说去规范解释一个中国以外的世界。究其原因，首先是与时代及其历史环境不可分割的。鸦片战争之后，直至洋务运动之前，"华夷之辨"始终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掌握话语权的主导力量是朝廷，而朝廷对西方国家的认定仍然是"夷"；到洋务运动时，主流意识仍然是"师夷长技"，仍然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先进的，需要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先进技艺，狭隘的传统民族意识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就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影响与限制。所以，既有其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也有环境造成的妥协。比如在《瀛寰考略》中，作者已经说中国是亚细亚之中，而到了《瀛寰志略》却又回到了"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联系到《瀛寰志略》是地方官署刻印的"官方"书籍，就不能认为这只是作者思想的倒退，而很可能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妥协。其次，迷信与理性的共存，也正说明了作者的思想是处于一种不断进步过程中的

---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 页。
② 同上书，第 28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页。
④ 同上书，第 117 页。
⑤ 同上书，第 287 页。

表现。创新与守旧集于一身，这也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中人们思想的转变趋势的表现。我们不能以当代人的眼光来审视、批判历史进程中的陈述与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和时间放置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我们认识和评判《瀛寰志略》的基本历史前提。

三　由个案分析徐继畬的宗教观

这部分笔者想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为切入点，来探讨《瀛寰志略》所反映的宗教观，以此来说明徐氏的文明观。

事实上，就徐氏本人而言，作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虔诚信仰者，他对心学之外的各种宗教并无好感。雅裨理作为撰写《瀛寰志略》的主要顾问之一，曾经赠送给徐氏大量的基督教教义与经典著作，希望唤起徐氏对耶稣的虔诚信仰，结果大失所望，徐氏对这些书籍并不感兴趣，而对世界各国现实的各种状况深有兴致。即便如此，宗教作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反思的方法之一，作为普通百姓面对社会问题寻求解脱的道路之一种，它能从另一个角度上，反映某一特定文化。因此，徐氏在《瀛寰志略》中对各种宗教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并承认了儒教并不是衡量世界文化的唯一标准，承认了在儒学之外存在的各种宗教，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看到西方宗教东传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后，他对宗教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评价标准。

《瀛寰志略》中有大量的篇幅介绍各国的宗教信仰以及繁盛状况：佛教“印度为佛教所从出。晋法显、北魏惠生、唐玄奘，皆遍历其地，访求戒律大乘要典，纪载特详。其所谓恒河者，即今之安额河，印度人称为圣水。诸佛、菩萨、罗汉绘塑之像，多裸上体，或耳带环，胫束钏，乃印度本俗，至今未改。所衣袈裟，即印度人外著之沙郎。僧人为礼，合掌膜拜，亦皆印度土俗也……佛法自后汉入中国，至南北朝，而达摩航海东来，演教外别传，缁流遂布满中国……”[①] 回教：“今则玉门以西，尽亚细亚之西土，周回数万里，竟无一非回教者。”[②] 对欧美各国耶稣、天主信仰也有很多论述。“罗马都城，古迹最多。天主教堂极崇宏，光彩射目。入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教之徒如蚁，各食教主俸糈。别国之祭司，远方之信士，焚香礼拜者，踵相接也。”[①] 还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流传及教义进行分析区别：“今欧罗巴从天主教者，曰意大里亚，曰佛郎西，曰比利时，曰西班牙，曰葡萄牙；从耶稣教者，曰英吉利，曰荷兰，曰嗹国，曰瑞国，曰普鲁士，曰米利坚。此外两教参杂者，曰奥地利，曰日耳曼列国。天主教者，立十字架，做铜人，肖耶稣被钉受难之形。旁有女人像，肖耶稣之母马利亚。耶稣教不设十字架，不肖像，其余七日礼拜安息之类，皆从同。又别有希腊教者，亦天主教别派，额里士、峨罗斯尚之，与两教教规又不同。”[②]

徐继畬承认这些都是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对创制礼制、教化民风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佛教……以慈悲为主，以寂灭为归……耶稣著神异之迹，而其劝人为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③]。甚至对国家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英国“安各罗者……陈后主元年，据英伦立国。后分为七部，如列国小侯，时相攻伐。有厄伯德者，娶佛郎西王之女。女奉天主教，招教师来其国，为制礼仪，由是其国渐强……灭六国归于一”[④]。英国的统一与强大与天主教对其礼制、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但是，从全书对宗教的介绍，以及作者所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仍然认为儒学是最合理、完美的学说。他认为佛教教义中劝人向善的内容，是“周孔之化，无由宣之重译”。教化当地的居民即可，“特欲行其教于中华，未免不知分量”[⑤]。至于耶稣教“不祀别神，不供祖先，以耶稣为救世主，而以身命倚之，谓可获福佑。有得祸者，则谓灵魂已升天国，胜于生人世。揆其大致，亦佛氏之支流别派。欧罗巴远在荒裔，周孔之教所不及。耶稣生于其间，戒淫戒杀，忘身救世，彼土崇而信之，原无所谓非。而必欲传其教于中土，则亦未免多事矣”[⑥]。数次将其他教派的教义与中国传统儒教相比较，认为其在中国的传播“未免多事”、“不知分量”，充分流露出中华文化的优越感。

---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205页。
③ 同上书，第98页。
④ 同上书，第249页。
⑤ 同上书，第98页。
⑥ 同上书，第205页。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外来文化的传播是持审慎态度的，虽然承认其为世界文明的一元，但对其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排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中华文化优越感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对宗教在各国的传播的考察，徐氏看到了宗教对集权政治、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看到了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对国家政治的诸多干预。以及近代西方各国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在启发民智，激发民众民主意识方面的巨大作用。身为清朝的高级官吏，对这种情况的产生理所当然是非常警惕及排斥的。《瀛寰志略》详细描述了这方面的影响。

中古时期的西方各国，教权是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国王即位要得到教皇的加冕，出兵征战要获得教皇的允诺，疆土的划分也要教皇来定夺。国王就如同教皇手下的提线木偶，只能遵从其意旨，而不敢有所违抗。比如，英国“王显理第二立，有智谋。时天主教魁参预国事，王有所拔擢，教魁辄阻挠之。群臣怒，杀教魁。王惧教王之加罪也，自守斋，拜其墓乃已”[①]。教士被杀，国王居然要为其守斋，祭拜其墓。更有甚者，国王的私人生活也要受到教士的干预，“先是英伦以尚天主兴，久之，教师擅大权。王娶后，教师禁不令同室，王不听。教师劫后，以铁烙毁其容，寻毙之，王噤不能仇。由是王仅守府，国势不振”[②]。这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当国王执意己见，不受教士控制时，教皇也会通过其对百姓的影响和控制，来达到控制王权的目的。如英王“约翰嗣位，性强狡……侮天主教师，罗马教王怒，弃绝英民，息礼拜，闭殿堂，废其婚葬，禁饮酒食肉薙须，民皆怨恫咎王，王不得已，纳贡教王”[③]。终于通过对教民的影响达到了控制国王的目的。而这在当时高度集权的中国是绝对不容许的。

进入近代，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以各国的宗教改革为先声的。14 至 16 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经济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开始形成，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与分裂割据。英、法两国的封建君主在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集权的“新君主制”。他们加强政治集权，推行重商主义，奖励文化创造，有力地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9 页。

② 同上书，第 249 页。

③ 徐继畬：《瀛寰志略》第 7 卷，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1—222 页。

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但意大利、德意志仍处于分裂割据，迫切需要政治统一；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的等级权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构成了对天主教神权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 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廉价教会”。新旧教派的争夺，常常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国家之间的征伐。“欧罗巴诸国，自汉以后，皆奉天主教。教王居于罗马，操列国兴废之权。明初，日耳曼人路得，别立耶稣教。自是诸国，从天主教者半，从耶稣教者半。君民之相仇戮，列国之相攻伐，半由争教而起。”① 对此，作者不禁叹息：“耶稣之立教，以救世也。乃诸国因分教之故，而残杀不已，耶稣而有知也，其谓之何?”②

对于教皇对各国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甚至是实际的统治力，对宗教对政治的干预引发的社会动荡徐氏深感忧虑。他认为宗教应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不能反过来制约政治，从对各国宗教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徐氏是反对西方国家政教一体的现实，主张政教分离。同时，鉴于当时宗教是帝国主义征服“异教”中国的一种文化手段，是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作者也似乎含有警示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的深意，提醒国人与政府，防止西方各国以传教的名义来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引发战乱。

事实上，基督教的内传也的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是较早进入中国的人群之一。早期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大都通过传教士传入，西方宗教学说也是当时传入的西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据统计《耶稣教略》、《圣书问题》、《圣经类书》、《圣会准绳》等宗教书籍的译介，约占此时引进西书的 75%；在通商口岸，教堂林立，《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更是被传教士广泛传播，随处可见。传教士们还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据统计，1861 年以前，仅基督教新教开设的学校就有 50 所，学生千

①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6 页。

余人，著名的教会学校如福州的格致书院、澳门的马礼逊教堂、上海的徐家汇公学等。[①] 这些宣扬个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基督教义的传入，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巩固统治所极力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受到了冲击。1851 年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创立了拜上帝会，利用宗教的形式和力量发展起义势力，从而举起了反清的大旗。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发展时期也正好是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的时期。这时期的社会变革，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第一线的徐继畬，不可能没有感触。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并非表明作者未看到新教在启发民智，激发民众民主意识方面的作用，而恰恰说明了徐氏对这方面作用的敏感及警惕。作为清代的封疆大吏，他的第一要务只能是维护清廷的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徐继畬在《瀛寰志略》虽不时流露出中华文明的优越感，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方文明先进的一面，承认其是世界文明的一元，而不再是中华文化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同时，也能“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对其在中国的传播持审慎态度，并没有盲目地对其进行追捧。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德雷克先生所说，《瀛寰志略》指出了地球上的文化和文明是多元的。“当中国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近代化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徐继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充当了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②]

（秦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

---

① 郑权：《简述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历程》，《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 6 期。

② 转引自任复兴：《热心引入西方文化的清末巡抚徐继畬》，《炎黄春秋》1995 年 9 月。

鸦片战争后徐继畬在福建的对外交往活动①

邵　雍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研究史学界集中在他的《瀛环志略》方面，对其对外交往的实践研究偏少，主要有萧致治和杨木根合写的《鸦片战争与徐继畬》② 以及萧致治著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史》。另外潘振平写《徐继畬》③ 短篇传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历史场景。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为主，试图对鸦片战争后徐继畬在福建的涉外活动作一较全面的回顾，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史学界的同人参考。

一

徐继畬在鸦片战争时期是主张积极抵抗外来侵略的。他在战后不时地总结经验，试图掌握对外交往的主动权。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犯厦门时，时任署汀漳龙道的徐继畬在辖区积极防守。事后他认为厦门港道深通，无险可扼，"港口宽深，一人大担，直抵十三路头，万家阛阓，近压海边，既无城郭，亦无退步。二十一年英夷人犯时，乘南风扬帆，直扑岸上，该处炮位多至二百余门，血战未逾半

①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的部分研究成果。

② 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8页。又见萧致治著的《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清史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日，即已失事，此乃限于地势，智勇皆无所施”[①]。而“福州港道口门最狭，沙浅复多，各国小船虽往来无碍，而大船易于搁浅，是以英夷货船向在口门外熨斗洋面停泊，用小船拨（剥）货入口”。道光二十八年(1848)，英国巡港兵船在贞山沉港内搁浅损坏，从此大船再未入港。但徐继畬提出：“恃险为古人所戒，难保夷人不乘潮冒险驶入大船，自应预筹密防，以备不虞。”[②]“各省善后案内，炮台布置不为不密，工程亦未必不坚，用以壮形势、固边隅，不为无补，且除修缮炮台之外，亦别无善后之法。然审思粤东、浙省之往事，而仍欲恃炮台以无恐。”[③]从道光二十七年开始徐继畬与闽浙总督刘韵珂亲行履勘，修筑长门暨闽安南北岸新建炮台，势扼险要。由于当时英国“并未露蠢动形迹，办理一涉张皇，不特居民惊扰，且虑夷人猜疑，肇启衅端，只可暗中筹画，外面仍寂然无事”[④]。道光三十年徐继畬奏报说：闽省港口“各处旧炮多受潮剥蚀，膛内凹凸不平，难于施放。惟近年臣与刘韵珂督同升任藩司陈庆偕、候补道鹿泽长，所铸新炮七十余门，颇为坚固完好”[⑤]。

徐继畬对清军、乡勇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表现极为不满。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⑥]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徐继畬等人在奏折中又说：“回忆从前军兴时，各省招募水陆乡勇不下十余万人，帑金之耗于口粮者不下数百万两，然卒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而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之充斥，半系乡勇流毒。臣等每论及此，辄不禁涕泪垂膺，恨填胸臆。”[⑦]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福建海口防务情形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8—1029页。

②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福州厦门等口岸筹防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0页。

③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妥筹防英之策应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5页。

④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福州厦门等口岸筹防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0页。

⑤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为奉旨查询御史奏参各情节虽事出有因而传闻有误情节失实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2—1053页。

⑥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⑦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碍难如绅士所请而演炮募勇并不可仿粤禁英人入城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7页。

上述总结使徐继畬对当时的中外力量对比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提高了他对对外交往重要性的认识。

道光三十年八月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与他人的一份联合上奏最集中体现了他对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总体走向的基本看法：

“窃维中国形势，西北为背，东南为腹，自古边患皆在西北。东南滨海一带，土地膏腴，财赋所出，名都大邑，及商贾萃集之马头，大半近逼海滨，从前仅有海贼，别无外患。至前明乃有倭寇，然皆内地奸民勾结，事平之后，其患亦息。自我朝定鼎，戡定台湾之后，海疆宴然者垂二百年。英吉利以西海岛夷，为强售鸦片之故，突尔称兵，在粤则扰我虎门，在闽则扰我厦门，在浙则扰我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在江苏则扰我上海、镇江，且阑入长江，直逼江宁，截我运道，逆恶滔天。凡在血气之伦，畴不怀食肉寝皮之恨。”南京条约“俯准各港贸易，俾得息事安人……逆夷得志而骄，贪求无厌，近因广东百姓不许入城，复在上海投文，天津走诉，现虽默焉止息，亦未必遂无后言”①。这段话总体是正确的，为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证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就远处说就是列强单方面的强行修约交涉所致。徐继畬接着论述了难以战胜英国的两大问题。从地理上看，“英夷远在西溟，水程隔六七万里，彼能来，我不能往，奋中国之全力，亦断不能扫穴犁庭，锄其种类。即将其海上之船焚毁数只，亦未必扬帆远遁，永不复来，此其难于制伏者一也”。从军事上看，“中国自辽东至广东海岸约七千余里，除荒僻海口不计外，府州县城池及著名之市镇马头，近逼海口，为彼炮力之所及者，凡数十百处。彼处处可到，我不能连营树帜，逐处设防；彼时时可到，我不能昼谍夜探，先时知觉。即使择要防守，厚集师旅，而彼舟我岸，以兵勇血肉之躯，与浮沉之巨艇相争拒，鲜不为其炮火所攻溃。论者谓彼长于水，我长于陆，诱致内地，可操必胜之权。姑无论水陆短长之说未必可靠，即使可靠，而我之城邑市镇在海滨者动辄数万户或数十万户，苟欲撤入内地，将并其城邑市镇而撤之乎？且安插无所，抑委而去之，而听其逃亡蹂躏乎？将保卫之谓何？此其难于防范者二也”。同时徐继畬敏锐地指出英国有其致命的弱点：“以贸易为生，其国势之强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妥筹防英之策应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4页。

弱，民生之舒蹙，全在于此。其货船虽无所不到，而总以中国码头为养命之源；攻略割据之谋，敢施于散弱之五印度，孤僻之各海岛，而不敢施于暹罗、越南，况中国乎？即使空我海滨数城，割而与之，彼亦不敢居不敢守也。而一绝其贸易，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以终日之势。前年粤东阻其进城，彼亦遂暂时止息，固由粤民之齐心，实则受制于各行之停市。特以入城不能无颜以对各国，故复为上海、天津之行，欲别寻转圜之计。今我以正辞答复，彼亦既默焉回粤矣。论者谓彼已技穷，从此再无哓渎，可保后日之无忧。又或谓彼实惭恚，旋且大肆披猖，复如往年之犯顺。以臣等之愚昧料之，知其未必然也。"[①] 在当时像徐继畬那样有世界眼光，能从全球论战略的中国人不会超过个位数。在这里他虽然客观罗列了对今后和战的两种基本估计，但他过于乐观地同意未必战争的观点，这是他在对外交往研判上的重大失误。在此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徐继畬在分析英国的战略动向时说：英国"在西洋各国中，与佛啷哂迭为强弱，顷年逞鲸鲵之技，犯我边疆，亦几于孤注一掷，未受诛锄，反获五口，彼自有国以来从无此荣幸之事，方且夸示诸夷，自鸣得意。广东进城一节，不过欲幸全颜面，若竟毁裂和议，大发难端，调集兵船，费既不赀；纠约诸夷，势亦难合。欲如前此之侥幸有何把握？该夷心计最狡，度必不出于此"[②]。

徐继畬在另一奏折中认为广州"系西洋各国公市，为外夷数百年来生财之地。二十一年，英夷猖獗，广州府城几于不守，然总不敢尽力摧残者，彼不肯自坏其利薮，且牵制于各国之洋商也"[③]。然而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咸丰六年英军两次进攻广州，次年英法联军炮轰并占领广州，而这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恰恰就是"心计最狡，度必不出于此"的英国与法国联手发动的。

在徐继畬看来，"英夷举动与倭寇本不相同，此番之恫喝与前事又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无混行杀掠之事，即滨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牵制全局者，亦未必无端攻扰。今若以防堵二字处处张皇，甚或调兵募勇，洗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妥筹防英之策应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4—1025页。

② 同上书，第1025页。

③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碍难如绅士所请而演炮募勇并不可仿粤禁英人入城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7页。

炮购船，无论一经试办，即须糜帑，而我树召敌之形，即难保不生其尝敌之计。……臣等叠奉谕旨，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伏愿我皇上神谋内断，坚定不移，以群言备刍荛之采，勿以群言乱安危之计，天下幸甚。"①

由此可见徐继畬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正视外国侵略者，"以镇静为主"，力求"民夷两安"。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

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徐继畬由广东按察使迁福建布政使。五个月后，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厦门开市。"福州一口于道光二十四年开关"②。次年二月徐继畬署理福建巡抚③，道光二十六年十月迁广西巡抚，两个月后调任福建巡抚。至道光三十年八月，厦门"夷目夷商与华人杂处，港内夷船每日不下十数余只，省城则夷目一人，夷商及传教之夷共十余人"④，总体情况还算安稳。

徐继畬在福建处理的外事主要有以下几件：

1.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夏之交英国福州领事官李太郭抵达福州，本欲在城内租屋居住。尚在福建藩司任内的徐继畬经与刘韵珂商酌，"以夷目准住城邑，虽已载入条约，但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未便，务当设法拒绝，方臻妥善。惟官为禁阻，该夷必以有违条约借口，必须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然后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⑤。随后由署侯官县保泰出面向绅民密为授意，并令先具联名公呈，以便由县据此照会。并准备在李太郭进城之日，再行邀集多人，在南门外坚持力阻。不料联名递呈者虽有二百余人，迨李太郭进城之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妥筹防英之策应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6页。

②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福州厦门等口岸筹防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0页。

③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58页。

④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福建海口防务情形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9页。

⑤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英人租住神光寺情形并拒绝英人购买台湾煤炭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7—998页。

日竟无一人出城阻止，闽县差役家丁上前劝阻，几致决裂，李太郭遂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房屋。

同年九月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至福州查看码头，徐继畬出城与之接晤，该酋即以李太郭住屋卑陋为言。及德酋去后，徐继畬接据李太郭函信，恳于城内白塔寺附近地方代租房屋，俾其移寓”。适有绅民李有年等“闻知其事，即联名赴藩司衙门呈请谕阻”，徐继畬即“将民情不顺缘由，向李太郭晓谕，饬令地方官在南台为之另觅房屋”[①]。

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英国领事管事李太郭、阿利国、若逊、敢那接连租住乌石山之积翠寺房屋。其中若逊是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接替阿利国新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的。十八日他与翻译官吗哩嗵等随行人员乘坐杉板小船驶进南台港口，即于是日进城，至乌石山积翠寺内与阿利国等一同居住。二十日由阿利国引见藩司徐继畬。[②] 与积翠寺东畔相连的道山观房屋自道光二十五年起，由英国翻译夷目夏巴、巴理诗、吗哩逊、金执尔接连租住。“两处房屋俱在山坡，四无居邻。该夷目租赁已阅多年，绅民亦相安无事。”[③]

2. 接着英国人在福州南台口岸开市贸易，索要码头。徐继畬认为英人此举“无非欲广销货物，若能劝谕居民铺户不与交易，则该夷无利可牟，自必无所贪恋，弃之而去。随复密饬署福防同知裕禄及保泰，邀集绅耆，嘱令密约居民铺户，公立议单，不与夷人来往货买，及开市三月，果无一人前往交易。该夷情急，将运到洋布等物零星拆售，仍不能出脱。……该夷即求臣等出示晓谕，臣等佯为不知，仍饬该厅县向铺户居民密为劝谕，坚守议单，竟无成效”。徐继畬通过这两件事认为：“闽省民情既不足恃，自不便再露端倪，致令饶舌。仍与之要约明白，嗣后惟领事夷官准租城内房屋，其余夷商俱遵条约住城外港口，并令将赁屋租约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六七年来，虽口舌不免，臣等随时随事宽严互用，相机驾驭，尚

① 刘韵珂等奏：《福州绅民李有年等联名反对英国领事入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4卷，第9—10页。

② 《闽浙总督刘韵珂奏报福州新换英领事茹逊情形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20页。

③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英人拟搬离神光寺到道山观盖楼已予驳斥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1页。

各相安无事。”[1]

3.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二十七日，由厦门地方招觅工匠代造、英夷出银租住的英国夷馆竣工。署福建巡抚徐继畬等邀英国领事李太郭至馆逐一验看，双方约定初十日迁居。“届期英国人从先前在鼓浪屿出银租住的房子迁入新馆，将鼓浪屿全境交还。”徐继畬亲至该屿查看，“实无一夷留屿，遂将空出民房交［地］保看守，咨呈提臣将驻屿兵弁撤回归伍，并出示招民复业”[2]。此时避居难民流离失所已历数年。

4.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二日（1846年3月28日），一英国小船驶进福州，停泊南台港内，水手人等先后赴市购买鱼肉，价未给足，即将鱼肉拿走，各店铺对此均抱不平。初五日又有夷人阿金因在街行走时被碰了一下，公然用手杖殴伤中国百姓额角。被暴行激怒的附近居民铺户及路过行人因侵略者欺人太甚，将英商记连并夷人等掷殴致伤。经徐继畬等饬委地方文武弹压抚谕，旋各走散。次日，夷馆馆内之广东人将路过门口民人扛抬的酒瓮碰破，致相争论。附近铺户居民闻闹赶至，愈聚愈众。这时有另一广东人开枪射击，打伤两人。众人“称广东人均系夷人带来，大家找寻夷人讲理，遂一同拥至夷馆，将馆外栅栏挤毁，并在街殴伤黑夷一人。……乘机将夷馆内货物搬抢”[3]。徐继畬于接据禀报后，“先后派委员弁，会同该管文武，选带兵役，驰赴该处弹压查拿，一面妥为抚驭，设法解散。当据报获抢殴各犯黄坤坤等二十六名，起出赃洋二千九百九十五圆及零星货物”[4]。徐继畬等人认为：“臣等当以匪徒固宜严惩，而当众怒未平之际，若不明白晓谕，窃恐乡愚无知，转谓地方文武偏护夷人而不爱百姓，虽暂时解散，日久必难相安。随刊发示谕，以尔等因夷人及广东人多事，群动公忿，原系良民。乃匪徒乘机抢夺夷馆，实不与尔等同心，若不严拿究办，是使匪徒得意，继必抢夺尔等财物，现在严办匪徒，正所以保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英人租住神光寺情形并拒绝英人购买台湾煤炭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8页。

② 《福州将军敬穆等奏报英人移寓厦门新馆鼓浪屿全境收复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80页。

③ 《福州将军敬穆等奏为英人欺侮民人激起公忿当经分别审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45—646页。

④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为审拟抢夺英馆殴伤英人之黄坤坤等案缘由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70页。

护尔等。"[1] 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还是比较明智的，也比较容易获得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徐继畬等对派往乌石山英国领事阿利国住处进行交涉的人面授机宜，称"此番闹事本系伊等起衅，现在南台百姓百数十万皆动公忿，虽经各大宪劝谕解散，并派兵在乌石山下暗护伊等，嗣后伊等如再不约束夷众，激成众怒，即官为保护，亦属无济"。中方交涉人员既按此口径与阿利国会面，阿利国见众怒难犯，只好表示事后必当明定条规，严谕船馆各色人等，不许再惹事端。十三日，徐继畬在接待阿利国来访时要求对方说"此后必须严行管束夷众，中国官员亦禁止众百姓，不许欺凌远人，两不偏袒，方可永敦和好"。徐继畬事后认为"南台为商贾幅（辐）辏之区，五方杂处，烟户繁多，内地民人口角争执，亦事所恒有。况夷人本非我族类，杂处阛市之中，或因语言不通，或因买物争竞，一时之较长论短，更难保其必无。但使随时处置得宜，既安民众之心，复杜夷番之口，自不致另生枝节，酿出事端"[2]。五月初二日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肯定了徐继畬的指导思想，要求福建官方"平时认真稽查约束，遇有争竞之事，处置务求平允，既以安民众之心，复不令夷人有所借口，是为至要"[3]。闽浙总督刘韵珂后来说："南台民夷互殴，匪徒借端抢毁夷馆之事，若非与徐继畬商办妥速，英夷亦未必不得以借口。"[4] 事实上，在福州的英国人自三月间与南台民人争斗之后，"并未复出滋事，数月以来，情形更为静谧。该夷等或因众怒难犯，是以较前敛迹"[5]。

5. 道光二十八年（1848）有外国人乘马行走，坐骑因道旁儿童戏掷瓦石受惊，致使骑者跌伤，旋即找中国官府理论。事发后徐继畬与闽浙总督刘韵珂一道"饬地方官，传谕地保，遍嘱各家长，约束其童，不许与夷人顽闹滋衅。并令委员等通知夷目，不得令夷人驰马，嗣后甚属安静"[6]。

---

① 《福州将军敬穆等奏为英人欺侮民人激起公愤当经分别审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45—646页。

② 同上书，第646页。

③ 《著福州将军敬穆等务必平允处置民人与洋人争竞之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62页。

④ 《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53页。

⑤ 同上书，第702页。

⑥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为奉旨查询御史奏参各情节虽事出有因而传闻有误情节失实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3页。

6. 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驻福州英国领事金执尔呈报英国驻华公使文安照会，请求在台湾径行采煤。徐继畲等“备文照复，正言拒止。……时隔数月，虽未据文安再行渎请，福州夷目亦从未再提此事。惟该酋回至香港后，与在港商人私议，欲将福建港口易换台湾”。徐继畲表示：“采煤之想既不复萌，即换港之议亦当中沮。”①

7. 道光三十年八月，瑞士传教士发士、吕吉士两人在福州水部门外看得废庙地基，意欲租定盖房，因附近居民不愿，赴福建巡抚衙门暨福州将军衙门具呈。徐继畲“随饬藩司庆端会同候补道鹿泽长亲往履勘，旋据该司道等勘得该处距城太近，诸多未便，仍饬令该夷另觅住处”②。

8. 十月初十日，已在福州城外南台地方租屋居住的发士、吕吉士雇坐小船，赴五虎门外夷船借得洋钱二百圆。回至金牌洋面突遇贼船拦抢，发士被一贼用尖枪刺落水中淹毙，吕吉士泅水逃回，船中洋银被贼抢去。徐继畲“查金牌洋面系属内洋，距省城止一百数十里，该匪等胆敢驾船抢夺，杀伤事主，不法已极。未便因事主系属夷人，稍涉松懈。当即飞檄署闽安协副将林相荣，限三日内务将正贼拿获。旋据该署副将于十四日，将匪船主朱青青即朱茂科拿获，并续获朱爪婆、朱阔嘴、朱恭恭三名解办”③。

对徐继畲的对外交往活动其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刘韵珂极为满意。道光二十六年夏他向道光皇帝奏报说，“藩司徐继畲洞悉夷情，心思周到，一切宽严操纵无不恰合机宜，每与臣商办夷务，彼此意见相同”，并坚信将来英国新领事到后，“得有该司在省相机驾驭，自可相安无事”④。同年十月清政府调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为广西巡抚，十一月刘韵珂上奏高度评价了徐继畲在福建任内的外事工作，称赞“徐继畲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并不时向厦门道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狯，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随时设法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奏陈倘英人欲以福建港口易换台湾自当严词拒绝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30页。

② 《福建巡抚徐继畲奏为奉旨查询御史奏参各情节虽事出有因而传闻有误情节失实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2页。

③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住居福州南台瑞士人被劫并葡人杀毙民人两案均已获凶分别办理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47页。

④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为丹麦国船只抵厦及现已开驶出口并福州厦门英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02页。

了结，相安无事"[1]。刘韵珂强调，闽省"办理夷务，尤须专任得人，方无反侧。缘闽省夷务虽稍减于广东，而实难于江、浙，广东为夷务总汇之区，各国夷船麇至，并与省城相近，办理诚非易易。江、浙通商每省均止一口，又距省城较远，有道府县为之维持，尚不甚难。闽省则两口通商，一在南台，逼近省垣，为入省门户；一在厦门，孤悬海外，为台内咽喉。而福州、福宁、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各府所属，均多滨海，夷船可以偷泊，英夷领事又驻居省垣，稽查抚驭稍有未闻，即难保不别生枝节。……英夷领事……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畬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其开导之法，悉与臣意见相符。……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以为己有也"。刘韵珂说："若闽省夷务既日渐增多，即徐继畬尚未离闽，已须添员协助，矧又升任他省，是襄理并无一人。嗣后不论夷人之等差，事体之小大，皆须臣与之接晤面议……第恐各夷来往无时，听之不可，拒之不能，出入自由，将视督署为茅，夷适足以启其轻视之心，未免有伤体制。"因此请求令六品顶戴前任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来闽接办夷务。鹿泽长"虽于闽省夷船不能如徐继畬之熟谙，于外夷各国方域及强弱情形，亦不能如徐继畬之考据详明……然较之夷务素未经手办理隔膜之员，究属短长互异"[2]。可能是考虑到了刘韵珂的意见和建议，清政府除了很快任命鹿泽长为福建经办夷务委员外，十二月又将徐继畬调任福建巡抚，次年六月兼署闽浙总督。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徐继畬在奏折中表示，"臣与督臣刘韵珂身任封疆，责无旁贷，遇有民夷交涉事件，固不敢迁就纵容，有伤国体，亦不敢操持急切，致启衅端，所以七八年来尚称安帖。若竟毫无主见，任令夷人滋扰地方，非特辜负深恩，且闽省民情强悍，亦断不能相安无事，以至今日"[3]。当然民夷相安是相对的，有矛盾有冲突是绝对的。福州开关"夷人初到时，与本地民人犹时有争竞"[4]，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应对。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53页。

② 同上书，第752—754页。

③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为奉旨查询御史奏参各情节虽事出有因而传闻有误情节失实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4页。

④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福州厦门等口岸筹防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0页。

三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民夷两安”的目的，徐继畬在对外交往方面的总策略是尽量避免自己（福建官方）与英国人的正面冲撞，而是借用民众的力量，对侵略者采取釜底抽薪的战术，暗中进行抵制。徐继畬不无得意地向道光皇帝奏报说，如此不动声色镇静筹办，“无非借民以拒夷……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不拂民之情，而可关夷之口”①。

道光二十四年（1848）英国人根据《南京条约》在福州南台口岸开市贸易，索要码头。徐继畬认为英人此举“无非欲广销货物，若能劝谕居民铺户不与交易，则该夷无利可牟，自必无所贪恋，弃之而去。随复密饬署福防同知裕禄及保泰，邀集绅耆，嘱令密约居民铺户，公立议单，不与夷人来往货买，及开市三月，果无一人前往交易。该夷情急，将运到洋布等物零星拆售，仍不能出脱”②。不久因缺乏当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此计失灵。

道光二十六年以后，英国船只时在淡水厅属之鸡笼山一带洋面游弋。徐继畬查知“鸡笼附近各山有产煤处所，该夷火轮船只需用此物，其频年驶往，未必不有所垂涎。因恐内地奸民贪利勾串，或竟私自采挖，均不可不防其渐。当经密行该镇道，转饬前任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乡士民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在案”。道光三十年三月，驻福州英国领事金执尔呈报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照会，以采煤一事径行干请，经徐继畬等备文照复，正言拒止。时隔数月，英方从未再提此事。文翰回至香港后与在港商人私议，欲将福建港口易换台湾。徐继畬等“派委干员，前往会督该处文武，传集绅民，谕以大义，怵以利害，务令全台百姓亿万一心，互相查禁。使该夷恍然于煤炭之未得采购，实由民自为禁，并非官与作难，纵令贪狠狡黠，亦将颓然自失，借口无由”③。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往来交涉实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2页。

②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英人租住神光寺情形并拒绝英人购买台湾煤炭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8页。

③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倘英人欲以福建港口易换台湾自当严词拒绝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30页。

遵守《南京条约》是徐继畬处理外事的基本原则。对于英国人间或提出背约要求，“均可随时设法了结，相安无事”①。“恪守成约”也是道光皇帝的意思，他多次指示徐继畬等人“坚执成约，明白理论，断不可稍涉迁就，致贻后患”②。“凡该夷稍有违约之处，即当严词拒绝，俾该夷感而知畏，不致遽生嫌隙。”③

徐继畬对条约中已经规定的，哪怕对中国不利的条文也坚决执行。道光三十年八月他在一份奏折中明确表示：“其五口夷自夷商所用华人难以数计，此辈下流诚属可恨，惟江南所定条约中，既有准其免罪明文，地方官即无拒遂之法。又各外国夷人在五口习教，系道光二十六年，因佛夷渎请，即有奏准开禁明文，并奉旨于五口张挂告示，地方官何能禁其不来？”④ 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三日，住澳门之葡萄牙国护货船一只，停泊南台江面。船上有黑夷二人上岸买丝苎，一黑夷与铺户陈炉炉争论价值，用手携尖刀划伤陈炉炉额颅。民人林举为进前拦劝，黑夷疑其帮护，用刀戳伤林举为肚腹殒命。行凶之黑夷当即脱逃，该处居民将同行之黑夷拿获。当经候补道鹿泽长饬该营县，将民人拿获之黑夷先行收禁，勒其交出正凶。该船主山至甚为恐惧，旋于十五日，将划伤陈炉炉、戳毙林举为的凶手淹波啰吐交出。徐继畬“查各国通商条约，夷人犯罪，应交该国领事官自行办理。惟大西洋与葡萄牙国领事官往广东之澳门，福州并无该国领事官。当由臣等委员，将凶手淹波啰吐、干证啥璧二人解送广东，咨文钦差大臣两广督臣徐广缙，发交该国住澳门之领事官，查照条约办理”⑤。同年十二月初八日道光帝肯定了徐继畬的做法，发表上谕称：“上岸黑夷用刀戳毙民人林举为一案，既据查明福州并无大西洋葡萄牙国领事官，即著遴委妥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753页。

②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务使英人及早搬出神光寺并将候（侯）官县知县革职等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33页。

③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查参办理英人借住神光寺措置不善之地方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109页。

④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碍难如绅士所请而演炮募勇并不可仿粤禁英人入城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8页。

⑤ 《闽浙总督刘韵珂奏报住居福州南台瑞士人被劫并葡人杀毙民人两案均已获凶分别办理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47—1048页。

员，将凶夷淹波啰吐、啥壁二名解送广东，交徐广缙查照条约办理。”[①]

不过徐继畬有时对条约中已经规定的也会作些变通的处理。福州开埠伊始，英国领事官李太郭本欲在城内租屋居住。徐继畬认为：“以夷目准住城邑，虽已载入条约，但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未便，务当设法拒绝，方臻妥善。惟官为禁阻，该夷必以有违条约借口，必须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然后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②] 因福州绅民届时阻止不力，此计未果。徐继畬后来还是与已经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房屋的李太郭约定：“嗣后惟领事夷官准租城内房屋，其余夷商俱遵条约住城外港口。”[③]

另一方面，对条约中没有的，就沿用过去的惯例行事，维护中国的利益。道光末年，琉球国王尚育因法、英两国船只时至其国游弋，并强留杂色人等在彼居住，两次遣使告急，闽浙总督刘韵珂均咨徐继畬酌核转详办理。而徐继畬在处理琉球事务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宗主国庇护藩属国模式。当时中国政府对英国人伯德令在琉球行医十分不安，每逢便船劝其回国，而伯德令就是不走。道光三十年十月徐继畬认为，“伯德令并眷属人等，居住琉球国已阅数年，其心叵测。现有英国船只到彼，该国悉请撤回，仍未附载回国，反出恐吓之言，是其意在逗留，可以概见。上年伯德令既称，非奉官谕不便回去。而前次文翰照复两广督臣徐广缙之文又称，通商五口伊尚可应，琉球远在海外，迥非内地五港可比等语。显系意存推诿。臣等查前定各国条约，中国所属藩封原未议及，该酋文翰既设词推诿，即使两广督臣徐广缙再行照会，亦难保其必肯撤回。惟琉球以海岛微国，世效琛球，久托天朝之覆庇。今因英夷留医士在彼，日切忧危，频来呼吁，未便置之不议。自当仍由臣等咨会两广督臣徐广缙，再向夷酋文翰相机开导，将伯德令等及早撤回，以恤藩封而免惊扰。”[④]

毋庸讳言，徐继畬也有力不从心，在种种压力下向外国侵略者妥协退

---

① 《著福建巡抚徐继畬严讯枪毙洋人之人并将戳毙民人之洋人交徐广绪办理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6页。

②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英人租住神光寺情形并拒绝英人购买台湾煤炭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7—998页。

③ 刘韵珂等奏折，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页。

④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英人伯德令在琉球至今未撤回仍咨两广总督查办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49页。

让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甚少，还是遭到了颇多的质疑和指责。于是徐继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玩起了无约推定，即中外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外国人什么都可以干。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奏折中运用无约推定，为葡澳当局的“护航”行动辩护。他向道光皇帝报告说：南台停泊火轮船五六只，向商船每只索洋银三百圆，代其护送，往来闽浙一节，“臣查此项夷船并无火轮，系篾篷而非布篷，俗名假夹板，系住澳门之大西洋即葡萄牙国。因英夷新开香港码头，其澳门房屋无人租赁，贫窘无聊，因制小夹板数十只，编列号数，每船配夷人五六名，广东水手数人，安设夷炮数门，护送商船，往来各省港口，业已数年。洋盗最畏夹板，望辄避去，各商船借此壮胆，每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各港口雇觅护送，俱系随时讲价，出自情愿，并非强行勒索。遍查通商条约，并无夷船不准护送华船之文，骤然禁止，未必即肯停歇。况闽、浙、江苏三省洋面数千里，水师即巡缉无懈，终难保无盗船出没。设一旦将护商夷船概行查禁，无论夷人不肯听从，且恐各商闻之，反生怨望，尤多未便，止可稽查弹压，勿令滋事而已”[①]。应该说徐继畬是在为福建当局的无能进行辩解，他的理由很难成立，因为《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固然没有不准夷船护送华船之文，但同样也没有准许夷船护送华船之文。按照徐继畬通常处理外事的原则，条约中没有的，一般是不应再让步的。

四

给徐继畬带来极大麻烦的是英国传教士租赁福州城内神光寺事件。事件发生在道光三十年六月，此时，咸丰已经继位。传教士借租神光寺开创了鸦片战争以后通商五口中外国民人入城的先例。清朝中央政府和咸丰皇帝本人对此十分恼火，再三下令福建地方政府尽速纠正，而被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搞得接连受挫的英国侵略者自然不会轻易退让，中外双方相持不下。在问题解决之前，一些在京的官员再三上奏，“揭发”徐继畬，福州当地的士绅也不买账，多次起草公开信件，与徐继畬叫板。站在交涉第一线的徐继畬内外受压，处境维艰，日子很不好过。

---

①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为奉旨查询御史奏参各情节虽事出有因而传闻有误情节失实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3页。

道光三十年英领事若逊回国，由翻泽官金执尔代办通商事务。不久有两个英国传教士到福州租屋。金执尔在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代向寺僧租屋两间，并将租约送侯官县兴廉用印。徐继畬查知后，“以讲经夷人应住何处，约内虽未载明，惟既非夷官，即与夷商无异，断不能听其人城居住”。徐继畬指示兴廉向金执尔领事言明错误，嘱令遵约搬移。但金执尔在与徐继畬交涉时坚称要听候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的指示，事情就这样暂时搁置起来。①

不料数日后，福州绅士“仿照广东绅士前致夷酋书信之式，缮写公启，交候（侯）官县转致夷官，令讲经人作速搬出城外。旋有书院肄业生童，谓神光寺系各生童会课之地，难容夷人租住，应各约会同至寺内与之讲理等语。公具告白，在城遍贴，又阖省士民亦贴有公白数十纸，其语意均与书院生童所贴告白约略相同。因之匪类人等即以割取夷人首级，写列字条，粘贴数纸，希图乘机滋闹，借得肆行搬抢”。金执尔见公白字条，复至徐继畬衙门两次投递申陈，剖诉缘由，求为保护。徐继畬与刘韵珂往返密商后认为：“福州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与广东情形迥不相埒，即就臣等前饬阻止进城，及禁绝交易两事，已可概见。……若但以文人恐喝之词为胁制夷人之计，非惟无益，实恐有损。……自须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臣徐继畬当饬该管府县，密谕生童各体此意，勿再肇衅。一面故示优容，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迁移，致使露处。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② 与此同时徐继畬密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各处弹压巡防，以防匪徒乘间肇事。应该说，这种冷处理还是比较适当的，客观效果也是好的。照道光三十年七月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的说法：“该夷疑团已释，该绅士等亦无异词。”③

但在京的闽籍官员不甘寂寞，道光三十年七月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

---

① 刘韵珂等奏：《福州绅士童生张贴公启，反对英国平民占住神光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卷，第17—19页。

②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英人租住神光寺情形并拒绝英人购买台湾煤炭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9—1000页。

③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报福州厦门两口未见南旋英船驶人并神光寺两英人居住情形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88—989页。

上奏说：本年英夷突欲在福建省城内神光寺借寺居住，“该省候（侯）官县知县不察舆情，遽将该夷租约用印，准其借住。……咎在官不在民，其理甚显。……诚恐该夷住寺之后，与该士民必不相安，倘或借端滋事，彼时听之不可，禁之不能，夷人既不感恩，官与民又不相洽，大可虑也”。

该奏折福州士民为劝令迁出神光寺事公致英使信刊本附件，全文如下：

公启者。前日因闻贵国领事官代讲经民人租赁神光寺，将租约送县用印，即欲搬进居住。本地士民均极骇异，当即赴县佥禀在案。今闻本县主已据舆情照会贵国领事官，速行退租，以期相安无事。……

查贵国人在福州通商，本应依照原约，只能寄居港口。前有领事管事等官入住城内乌石山之积翠寺，本地士民本不情愿，只因各宪再三劝解，谓系暂时通融。……然积翠寺所住者尚是贵国之官，犹可言也。若讲经民人亦要赁居城内，则又何所限制。核之原约太不相符。明因本地士民从情稍肯通情，遂有得一思二之请，是不以原道为可感，直以厚道为可欺，岂本城内数十万家之人，不能为广东人之所为乎？不激之则依旧相安，激之恐众怒难犯，此情之不可行者一也。

且原约内云，各国租地，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官，体察民情，公平议定，内民不得抬价，远人不得强租，务须两情允协等语。今神光寺系本地生童常川会课读书之所，士民齐心，不愿出赁，贵国即未便显背和约，自取硬占之非。彼僧人但守香灯，而出租原不能作主，即县署虽曾用印，而定议亦必体舆情。……迨经县主查知，复接绅民公禀，恐此举猝然滋事，故于照会中自认一时疏忽，请速更正消销。是县主已将正理言明，则贵国亦应循理照复。且贵国素重信义，苟因此租屋小事，竟将原立万年和约内所称，两情允协，不得强租之语，任意抹煞，信义安在？此理之不可行者二也。

积翠寺高在山巅，树林深密，匪类若来滋扰（扰），贵国尚可预防。若神光寺仅在山下，往来既属通衢，附近尤多匪党，颓垣成路，本为窃贼出没之区，而贵国人在彼讲经，势必招人观听，匪徒更堪聚集，闹事不定何时。倘借端抢物伤人，士民含怨而不前，官长走援而不及，纵使事后控告，亦必人逃难拿，物散难追，悔之晚矣。此势之不可行者三也。

……谅贵国领事官久在中华，深明事体，故特陈其礼义，布其腹心，惟望自谋保护之方，共享太平之福，彼此幸甚。[①]

咸丰皇帝对此事件较为重视，于道光三十年七月五日发表上谕说："通商定约原期民夷两安，若办理稍有偏倚，必致激成事端。惟当恪守成约，不惟城内房屋未便听其居住，即城外租赁地方，亦须查照成约，妥为安置。倘成约之外稍为迁就，不独民心不服，即夷商亦有后患。该督等仍应密之又密，慎益加慎，勿存畏葸，勿涉张皇，务使夷衅不生，民心共顺，方为久远之计。"[②] 七月十八日的上谕又称："朕思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强民从夷争势必激生事端，关系非浅。著刘韵珂、徐继畬按照所奏情节，妥为晓谕，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③]

同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林畅祖奏：刘韵珂从权应允英夷居住福州城内乌石山积翠寺，"民心恐惶已非一日，惟恪遵官令，久已隐忍成风，而奸民贪利，甘受夷人之饵者，亦不乏人。近来城外传教讲经，渐闻纷扰，城内则自积翠寺以外尚无被占之地。……臣闻福州府人家书，均道及绅士寄夷公启……绅民之意，大约因广东有不许入城之举，力持界限，不肯使积翠寺外再占一区。"奏折强调"使省会为夷人念经宣化之地，于国体人心大有关系"[④]。

附件中有福建绅士与徐继畬的来往信函。福建绅士致巡抚徐继畬信函称：

松龛中承大人阁下敬陈者：窃自五月下浣，蒙发台函，以夷入租址内神光寺讲经一节，从容设法，总可驱除，须略宽时日，于以转身之地，谆嘱则徐密致众绅等因。……不意延今半月，夷人愈进愈多，

① 《福州士民劝令迁出神光寺事公致英使信刊本》，《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5—996页。

②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办理神光寺一案惟当慎益加慎务使民英两安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01页。

③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妥办英人借住神光寺一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97页。

④ 《给事中林扬祖奏英人租住福州神光寺绅民反对而官方不为办理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05页。

并无搬移之意。且每日辎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抬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人目击，明指为炮位军械，民心倍切惊惶。……恭读钧函，有断不致城内再有一椽租与夷人之语。仰见禁令严明，曷胜钦祷。惟闻连日夷人又往各寺观常川踩看，随处议租。又闻闽县前一带民房，亦有几种人欲来占住。口称系为英咭唎等国办事，要将房屋作衙门等语。无非以神光寺等为效尤，以县印为借口，未知果堪禁止否？……窃观夷人故智，总以恫喝为能，其日前复县之文，所谓飞报再港公使，专候札谕之语。虽云本非真情，而既欲硬占强租，势必往香港请数只兵船，前来福州海口，以张强梁之凶焰，而吓积怯之恒情。若不早赐良筹，预为准备，一旦猝然事至，又必相率惊逃，恐太不成事体。……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①]

信中附有一纸“英人揭帖”，宣称：“我大英国自开基以来，无战不克，即前番与尔清国构兵，尔情急割地求和，缴银赎罪，我主本不应允。本大臣看汝势急事迫，兵弱民贫，姑从所请，不忍相残。故前番初到积翠寺，尔通省之官员奉我如父母，阖城之绅士敬我如祖宗，此次命我国温纯在神光寺念经宣化，尔等乃串之书院生童，即时大胆驱逐。故先行谕明，以后如有迂腐之徒，无知之辈，再来骚扰，我必定叫汝作刀头之鬼，勿谓言之不早也。特谕。”[②]

福建巡抚徐继畬复福州绅士信函说：

适奉公函，敬稔诸君子保卫桑梓，思患预防，曷胜佩感。查神光寺居住之两夷人只有大小箱笼八只，早经搬入。后来续到者乃系英夷翻译官星察理。随后又来一个副领事官味吐坚拿，带有一妻一媪，所有陆续搬入者皆系此两人，行李俱住积翠寺。其极重主人箱，南台委员曾经查问该夷，开箱令看，皆系玻璃器物及日用铜锡器皿。……该夷官居积翠寺者现止三男二女，讲经人止二人，携械炮意欲何为，此不足致疑也。又星察理从广东来，请有办笔墨一人，系江西人，携有

① 《福建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畬信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06—1007页。

② 同上书，第1007页。

妻室，在闽县地面租房居住，来令曾来面禀。此辈顽钝无耻，甘为夷人服役，诚属下流，然系华人并非夷人，和约中并无夷官所用华人不准住城内之说。且积翠寺所用杂项人等，皆福州城内华人，事同一例，更未便无端拒逐，致令借口，此外实无夷人又租城内房屋之事。继畬查此事办理谬误，在兴令之误与县印，即将该令参革治罪，亦属咎有应得。然夷务非参官之所能了……今我不遣逐两夷人，而但将士民不愿，和约不符之理，与之徐徐讲说，似不至遣来侵扰。从来静能镇躁，缓可堕急，操之太蹙，适是堕其奸计。继畬性虽迂缓，然同仇之愤切切于心，从前为委员时，每与此辈周旋，何尝不憯恨在心，思得而食其肉。然国家之定和议既出于不得已，则疆吏之办夷务亦苦于无如何。……夷官之入城居住，系查照和约之文，亦非无端放入。且我福州虽称省会，而地方之富庶，民气之强悍，实非广州之比。……首善则有余，御侮则不足。敌来则惟有与之拼命，不来则审己量力，不宜与之生端。……至省港炮台情形，虎门闽安最为扼要，闻少穆大前辈大人曾乘扁舟阅看，正拟数日内驱谒平泉，面求指示。火药炮位，已密饬各营将检点查阅，且连发函信，与玉坡制台密商，但须暗中筹画，不敢稍涉张皇。……夷人帖子殊堪发指，想因省中有取夷人首级帖子，故出此狂悖之语，当今委员持示夷官与之讲理，专此肃函布复，诸惟亮詧不备。[①]

当时评判徐继畬与福建绅士是非曲直的最高权威无疑是咸丰皇帝。他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十八日颁发上谕："该夷诡谲性成，固当示以镇静，然过于迁就，必失民心。驭外之道莫先安内，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该夷转有所借口。……总宜恪守成约，凡该夷稍有违约之处，即当严词拒绝，俾该夷感而知畏，不致遽生嫌隙。至民气民情，尤须固结，闽、粤之民皆吾赤子，该督抚身任海疆，若民夷稍有不安，即系尔等办理不善。"[②] 八月初三日颁发的上谕又强调："海疆要地，夷衅固不可开，而固结民心实为制夷之本，权其轻重，宽猛兼施，该督等身膺重寄，惟当遵奉前旨，平心

① 《福建巡抚徐继畬就英人居住神光寺一事复福州绅士信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107—1109页。

②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查参办理英人借住神光寺措置不善之地方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09页。

筹办，以卫民生而弭夷患。倘因民夷争执，激成事端，朕惟该督抚是问。”①

在咸丰皇帝的强大压力下，同年八月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上奏承认神光寺事件发生后“始有绅士公呈。又数日，始有绅士致夷人公启，暨书院生童及闽省告白，旋有匪徒粘贴某口定取夷人首级帖子。臣徐继畬以省城五方杂处，良莠溷淆……在绅士明白事理，固不肯造次构衅，而奸匪惜势倡乱，或黉夜滋事，杀伤夷人，酿成大事；或肆行抢掠，殃及居民，均不得不预为防范。而稍露形迹，又恐该绅士谓保护夷人，众口交谪。均密饬营县暗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一带弹压巡逻，以防后患”。“旋据夷目阙那申陈，以伊接夷酋文安批示，原定条约，外国民人亦准住城邑，讲经人未便搬移等语。臣等详加揣度，该夷因粤东不准进城，心不甘服，现赴上海投文控诉，故将原定条约中夷商准住港口之文，翻赖为准住城邑。……随由臣刘韵珂径行照会文安，以原定条约分明，中外咸知，不应翻异。且阖城士民积愤不平，即暂时暗中弹压，终难保不有变故。该二夷原租寺屋以六个月为满，应届租满之时即自行搬出，泯于无迹。”② 徐继畬和刘韵珂在联名奏折中认为，“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笔伐口诛不能慑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如果民知大义，志切同仇，地方官正乐于激励，以为防御之资。无如福州民气散弱，心志不齐，与粤民迥殊。……即现在夷人租屋一事，绅士有公启告白，而城内居民咸谓乐业数年，又欲闹事，使彼遭殃之言，互相含怨。且不特居民含怨也，即绅士与绅士所见亦各不同，彼此颇形龃龉，书院生童随声应和，更不主其事。……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失计”③。稍后徐继畬等人在另一奏折中强调，在神光寺问题上“臣等与绅士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所不同者只有调兵演炮募勇之事”。“缘福州一口，英夷本视为鸡肋，特因强求而得，不能无端抛弃。臣等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故时时防范，总不予以可挑之衅，非敢过为迁

①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乘势开导租住神光寺英人迁移并平心筹办洋务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12页。

②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往来交涉实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0—1022页。

③ 同上书，第1022—1023页。

就。"[①] 徐继畬认为："粤省不许英夷入城……虽由绅民之齐心，实得力于洋行之停市。该省港口系西洋各国公市，为外夷数百年来生财之地。二十一年，英夷猖獗，广州府城几于不守，然总不敢尽力摧残者，彼不肯自坏其利薮，且牵制于各国之洋商也。此外四口，惟上海贸易差盛，如福州、厦门、宁波等处，市舶寥寥，彼皆不甚爱惜。既不能以停市制其死命，而乃欲鼓涣散之民气，慑狡狯之夷情，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②] 另经徐继畬调查，所谓"夷人帖子""出自汉奸之手无疑，现时未得主名，自应严密访缉"[③]。

九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英夷强租神光寺……事关绅民与夷人互相争执，该督等惟当持以镇静，出以公平，总期该二夷及早搬去，庶绅民均可相安。倘筹办终不妥协，竟至酿成事端，惟该督抚是问。侯官县知县兴廉，办理地方公事不知详慎，著即行革职。"[④]

十月又有湖广道御史何冠英上奏称：福州英人"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将东门外之鼓山寺、西门外之西禅寺全行霸占。并南门外之银镶浦、水部门外之路通桥，强买民房，起造楼屋。甚至五虎门炮台内道光二十一年所铸六千斤大炮，钉塞一尊，南门大树下嘉庆二十五年所铸四千五百斤大炮、顺治十一年所铸二千斤大炮，钉塞二尊。阖城士庶哗然。其时守炮弁兵意存规避，因暗雇打铜匠名旺者，起钉修补，希图掩饰，然火门钉坏，实已不堪施放。并闻日有骑马夷人四处踏勘，口出狂悖之言，虽经各乡民协力驱斥，而地方官反为出示禁阻等事"。何冠英指责"该督抚畏葸性成，苟安旦夕，以通商为掩耳之计，以和约为护身之符，即谕旨森严，亦不过含混其词，一奏塞责"[⑤]。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十一月的奏折中批驳了何冠英奏折中的大量不实之词，着重报告了就神光寺问题与英人的最新交涉情况，称星察卫领事屡向中方恳觅匠人失败后"无可如何，始称租屋本是小事……惟城外一时难得住处，应先搬至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碍难如绅士所请而演炮募勇并不可仿粤禁英人入城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7页。

② 同上书，第1027—1028页。

③ 同上书，第1028页。

④ 《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务使英人及早搬出神光寺并将候（侯）官县知县革职等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33页。

⑤ 《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奏陈福建英人霸占寺院民房钉塞大炮督抚畏葸请饬查办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38—1039页。

伊国翻译官所租赁之道山观暂住，即将神光寺交还，以免口舌等语”。徐继畬分析“今该夷目将两夷搬至伊处暂住，意在转圜，并非别租城内房屋，自不便过于较论，致令借口。惟该夷目说定之后，又向委员声称，日后欲在道山观建盖楼房等语。经臣饬驳不准，故至今尚未定局”①。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开缺后，咸丰帝对徐继畬的态度也转向严厉，他在上谕说：“徐继畬职任封疆，抚民防夷，责无旁贷。乃于降旨饬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是既已错误于前，又复因循于后，漫不关心，成何事体？徐继畬著传旨申斥。”② “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该抚现在如何筹办？夷情是否静谧？绅民能否相安？惧著明白回奏，毋再含混延宕。”③

十二月二十六日咸丰帝再发上谕：“兹据徐继畬复奏，该二夷以城外难得住处，先搬道山观暂住，即将神光寺交还等语。道山观与积翠寺东畔相连，其去神光寺远近若干，该抚并未确切指明。且同系福州城内庙宇，若止阳易其名，颟顸迁就，仍恐绅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后，遵照节次寄谕并徐继畬现奏各情，逐一访查，及该二夷应如何晓谕搬移，据实复奏。至刘韵珂、徐继畬等频年办理夷务，有无措置失宜及迁就消弭之处，一并详细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④

是年年底，两名英国传教士总算从租住的神光寺迁出，神光寺问题交涉终告结束。

徐继畬在处理神光寺问题上采取的还是借用民力釜底抽薪的办法。当他查明借住该寺的两个传教士“一系讲经，一系医病，其所租寺屋亦多敝坏”的基本情况后，当即分析：“若令城厢居民皆不赴寺听经就医，该夷株守无聊，自必居处不安。再令泥作木匠皆不受雇与之修理房屋，则风雨飘摇，该夷亦难久居。复密饬在邵郡督办官运回省之候补道鹿泽长，授意闽侯两县……等，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向泥作木匠人等遍为晓谕。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

①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英人拟搬离神光寺到道山观盖楼已予驳斥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1页。

② 《著传旨申斥福建巡抚徐继畬并著其将神光寺一案明白回奏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7页。

③ 同上书，第1057页。

④ 同上书，第1059页。

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属寥寥，以情势揆之，省垣居民果能同心一气，该夷寂处萧寺，断难日久迁延。臣等犹恐各庙僧人贪利，向夷人私自租屋，又密饬鹿泽长转饬两县，除南台港口房屋准照条约租与夷人居住外，其城内及东西北各关外所有寺庙，士民公议，一概不准租与夷人居住，均令住持僧具结存案。"① 徐继畬后来又"严饬侯官县兴廉密谕寺僧，不准收其房租。并密谕城内外泥瓦木石各匠头，不准代夷人修理神光寺房屋。九月间，连日阴雨，两夷所住之房渗漏不堪，遍觅瓦匠，无敢往者。夷目星察里屡向该员兴廉恳觅匠人，该员答以百姓不愿，断难相强，且神光寺无人收租，白住房屋亦伤体面，不如搬去为妥"②。

可是这次咸丰皇帝似乎并不赞同徐继畬的这种釜底抽薪策略，而且十分反感。在租住神光寺两英国传教士搬迁后，咸丰帝发表上谕："兹又有人奏，英夷自占神光寺后，复欲于东门、水部门、西门外建造楼屋。闽省工匠互相纠约，不准受雇，乃闽县、侯官两知县，出示严拿不肯受雇之人等语。似此抑民奉夷，尚复成何政体！著裕泰到任后，秉公密查，据实复奏，毋梢瞻徇。"③

英国传教士总算搬出神光寺并没有给徐继畬带来官场上的安宁。咸丰元年三月徐继畬奉命进京，降为太仆寺卿。从此离开了他多年为官的福建。

实事求是讲，徐继畬在处理神光寺问题上速度虽然慢了点，但其顶住各方压力，坚持稳妥缓进的策略还是成功的。由于他有理有节，没有落下什么口实，被英国侵略者抓到什么把柄，没有引起中英重大冲突，无论对朝廷、对百姓均是有利的。而这正是他在福建处理对外关系的一贯做法。正如他自己所说："论功罪者或各矜事后之明，讲韬略者或不少剿袭之论，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偾事者或欲再贾其忠勇，血性之谈，胪之篇章而甚易，耳食之说施之实事而多诬。"④ 他没有像同时期的两广总督徐广缙那

---

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往来交涉实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1—1022页。

② 《福建巡抚徐继畬奏报英人拟搬离神光寺到道山观盖楼已予驳斥等情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0—1051页。

③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59页。

④ 《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妥筹防英之策应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6页。

样一度依靠民众的力量暂时挫败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图谋，没有那种风光和荣耀。他也不像稍后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英国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①]，没有那样貌似强硬、自欺欺人。徐继畬清醒地意识到广州模式有它的特殊性，并非所有的通商口岸均能效法，因此采取了韬光养晦、内紧外松、保守稳健的对外策略，从较长历史时段来考察这种策略还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不无益处的。而当时各方强加给徐继畬的“强民从夷”、“抑民奉夷”之类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不实之词。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在福建的对外交往活动功大于过，值得今人借鉴，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邵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徐继畬“以商制夷”对外策略思想与实践

刘晓丽

一

徐继畬自幼治科举业，其多元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开放的学风与所受的家庭教育关系密切。父亲徐润第对他进行的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曾写《谕继畬书》、《再谕继畬》，堂舅续克家的新儒家桐城派的哲理、墨子学说，最重要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经世致用学说，所有这些，使得在西方人看来，徐继畬形成了面对现实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其突出的一点就是能够把传统的和儒家思想的形形色色成分和从中国文化范围之外的世界接受的信息几乎天衣无缝地揉和在一起”[①]。事实上，这是徐继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吸收西方先进的有益的知识，把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自己的中学根底融合在一起，站在了历史的潮头，担当起一个民族启蒙先行者的角色。

明代初期，一大批山西商人依托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物产资源和地理优势，在商机出现的瞬间，抓住机会，捷足先登，依靠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精神，遵循诚信敬业和开拓进取的商业法宝，创造出明清晋商“海内最富”的天下奇迹，让国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事实。早年的徐继畬，跟随父亲在汾河岸边的家乡度过[②]，目睹了晋商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和繁盛的商业贸易往来，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见识到了从事国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际贸易的巨大利益。

道光六年（1826），徐继畬中进士，朝考第一，文题《政在养民论》，初步显示了其爱民恤民的儒家思想，他认为“生万民者天，而天不能自治其民也。……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养之云者，养其身，并养其心。”“政”就是“天下之民，群待养于圣人，而圣人者，如其愿而与之”①。道光十三年（1833），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在较短的任期内，徐继畬写了《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特参州县讳灾催征税》、《特参退赃诱结疏》、《特参籍端科敛疏》等，这些上达朝廷的奏章，进一步体现了他崇奉的“为政养民”的思想，初步从政的思考与实践，与他的经世致用的开放学风相得益彰。之后，徐继畬出守广西浔江，升任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② 期间，徐继畬通过与英军攻占厦门的军事对抗，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有了第一次思考，看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出于经济目的，但作为泱泱中国，绝不一味以割地赔款退让：“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今见官兵连年挫败，知中国孱弱无能，其志愈奢，其谋愈狡。”“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要地为码头，岂能听之耶!”③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徐继畬擢升两广盐运使，迁广东按察使，同年九月，擢授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二月，升任福建巡抚。在官场的顺利擢升，使徐继畬得以直接办理西方各国的通商和外交事宜，并在这中间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人，这其中有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国领事李太郭与美国医生甘明，以及后任英国领事阿礼国和夫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及其统治者，同战争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道光帝谕“可谓大快人心一事”，又谕林则徐停止对英贸易，迫使英军发动军事行动，随即指责林则徐“处置失当”，林被罢官而满洲贵族琦善代之，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口通商条约》签订，其中的两口——厦门、福州都在福建境内。“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守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努力下被暴力

①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1 页。

② 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1—72 页。

③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79 页。

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地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 所有这些，使徐继畬体会到两点：第一，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那样一个封建官僚保守体制下，古老的东方文明与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之间，如何把握通商与外交尺度，确实举步维艰："时事日益艰难，以孱弱之才，当盘错之地，孤恩溺积，又何能免？所幸外宦十余年，两袖清风，依然如昔。……仆官情素淡，无恋栈豆之心。乃自戊戌到闽者，旋值海氛甚恶，以避难为耻，遂牵率不能引退。上年已决计归田，又蒙受疆圻之任，恩重命轻，何敢自惜。"② 第二，正因为处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桥头堡，也使徐继畬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更直接见证了先进文明的洗礼，这种与山西内地截然不同的环境，与他积聚多年的经世致用的开放学风一拍即合，使他获得了比同时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更为直观、实在的洞察力。他也由此领悟到，中国士大夫急需一个新的视野，一个能够放眼世界的更准确的视角。他的视野从古老东方的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理性之学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洞悉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不触动封建国家的官僚体制）挽救国家的济世之道，那就是比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林则徐的强硬抵抗更有效的"以商制夷"的重商思想。

二

徐继畬"以商制夷"的策略思想，主要集中在《瀛环志略》的著述、上奏清廷的一系列奏章以及给家人和友人的通信中，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以开眼看世界的全球世界观透视西方文明的实质。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利用中外文献、西方各阶层人士的口述资料等，对世界各国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考察，得出结论，西方先进文明，是以合理的政体为前驱，以大机器工业化为基石，以政权与商业（对内）贸易（对外）的强有力结合为纽带，向世界上较落后地区推进的。据此，徐继畬提出了以近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② 《山西通志·乡贤录》，转引自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化为主旋律的经世主张，提倡清政府实行官商合作和务实的外交。

英国：“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①

英国荷兰在东南亚：“嘉庆年间，荷兰王为佛郎西拿破仑所逼，走死荒野，国为佛郎西所并。英吉利恐佛人之兼有巴地者也，嘉庆十四年（1809）秋，以舟师逼巴城，荷兰酋坚守不下，逾年往复，以天炮环攻，荷兰酋遁去。地遂为英所有，除荷兰苛法，商旅便之。一时轰传荷兰为英吉利所灭，即此事也。后数年，拿破仑破败，荷兰复国。其王以卑礼厚币请于英。英复以巴地畀之。然英船视巴地为东道主，荷兰不敢忤也。”②

欧洲各国：“惟俄罗斯与中国互市在西北陆路，不由海道。其至粤东贸易者，英吉利船最多，居各国十分之六。西班牙之船，大半来自吕宋……船之多，几过于英吉利，而洋米之外少别货。……法兰西货物，每岁来粤，不过三四只，少则一二只。”③ 葡萄牙：由于远航技术的巨大进步，是最早来到中国沿海的欧洲访问者，“隆庆初……葡萄牙人遂立埔头于澳门，是为欧罗巴诸国通市粤东之始”④。

荷兰：早在明朝中叶，荷兰人就航海东来，到了中国和爪哇的海域，逐步占据了各岛国并设立了海港：“通东西七万里之海市，故国虽小而富饶甲于西土。”⑤ “近年以来，小西洋诸岛国，以英吉利为主，东南洋诸岛国，除吕宋属西班牙外，余皆以荷兰为主，地本弹丸而图国计于七万里之外，历数百年而无改，亦可谓善于运筹者欤！”⑥

在更进一步分析对外商业贸易形势后，徐继畬预料到了这种贸易关系使本已千头万绪的清政府更加错综复杂，甚至会出现无法预料的问题，但是这些情况早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现在，面对涉及中国在外部世界影响的重大利害关头，中国除了积极主动地成为对外贸易的参与国之外，再无别的选择。并且中国早已经有了参与这种国际角逐的历史基础：那就是东南亚为数众多的中国商人。他们世世代代为这一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该得到自己国家的明确的强有力的支持。中国不应当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译者序），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第 43 页。

③ 同上书，第 114 页。

④ 同上书，第 238 页。

⑤ 同上书，第 206 页。

⑥ 同上书，第 211 页。

对西方在这一地区的渗透和华侨的艰苦努力听之任之。

以国家的力量支持东南亚华侨，经营沿海边疆，这是扩展内地对外贸易的支撑点和与西方各国进行商贸的较易操作的起点。徐继畬接任福建布政使后，监办与各国通商事务，奉令移驻厦门。当时的厦门发挥着连接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纽带的作用。早在清政府仅仅开放广州一地与西方人通商之前，厦门就已经与早期到来的西方商人有贸易联系。而台湾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华侨的船队每年根据贸易信风往返于福建、厦门和东南亚群岛之间，在这期间，福建本土人、华侨和从事海上贸易的西方人建立了一定的商业联系。

“福建漳州、泉州侨居在吕宋的华侨不下数万人”，在台湾生产的大米有剩余之前，吕宋的大米长期由福建的商人输入。但由于没有强大的祖国，“这些华侨每人每年交五六两银子的人头税才可居住”①。

“近年诸番来粤东者，多聚于马尼剌。米利坚、佛郎西遣酋来通市，其船皆会集于此。”②

由于贸易，吕宋成为南洋诸岛最繁盛的地方。“南洋诸岛……中国流寓甚众。广州、嘉应州之人为工，潮州之人为农，泉州、漳州之人为商，获利者多为泉漳人。”③

印度，“两广、福建之物，往往由温都斯坦贩至回疆。……温都斯坦之孟加拉、孟买，皆英吉利大埔头。闽粤之货山积。由两处至回疆，皆商贾通行之熟路，转运固甚便矣”④。

而华侨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开拓，不仅在东南亚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当地的政治、法律生活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近年广州嘉应州，已有数万华人到婆罗洲开矿。他们组成公司，推择长老为‘公司理事’，每一年或二年一换。广州、潮州每年有数只船前往贸易，获利甚丰。”⑤

噶罗巴为南洋大国，“闽广之民，流寓其地者，以万数计。荷兰择其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33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同上书，第81页。

⑤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贤能者为甲必丹（欧罗巴官名，如中国州县之类），专理华人词讼。近年因华人把持行市，禁新到唐人，不准留驻”[①]。“噶罗巴，漳泉之人最多。有数世不回中华者，语番语，衣番衣，食番食，读番书。”[②] “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纳贿和兰，求其推举为甲必丹。华人角口斗殴，皆质之甲必丹。长揖不跪，自称晚生，是非曲直，无不立断。”[③]

据此，据徐继畲认为，由于西方列强的到来，中国大陆周边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再也不能沿用几千年的旧式，让一个夷狄国家攻打另一个夷狄国家，而坐收渔人之利了。如苏门答腊：“从唐宋两朝起，苏门答腊就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荷兰、英国都占了岛上的港口，可是近年来英国用这个岛上的商港换下荷兰占领的马六甲，因此该岛全归荷兰。中国商船频繁地到这个岛上贸易。”[④] 中国必须有效地利用同东南亚各国已经存在的贸易关系，利用这一地区华侨的力量，施加政治影响，抵消西方对这一地区的渗透。

由此，徐继畲看到了贸易作为现代国家实力基础之一的重要性。西方人的贸易只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已经开始损害中国在各附属国面前的宗主国地位。他由此得出结论，在国际关系中，贸易本身是一个决定性的机制。[⑤]

早在明清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中国的附属国体系中，商业贸易一直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一点没有被士大夫阶层和知识阶层看清。徐继畲通过对南洋各国与中国宗主国关系的全方位探查和分析，看到中国要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巩固这种贸易关系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将这种贸易关系扩大到西方世界是清政府理清国际秩序的当务之急。

提出了“以商制夷”的具体方略。根据以上两点，徐继畲针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现状，提出了对内禁吸鸦片、“抚夷通商”，对外经营东南沿海，以国家战略支持广大华侨，积极参与对外贸易的两大对策。在分析了

---

①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第 42 页。

② 同上书，第 39 页。

③ 同上书，第 41 页。

④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 页。

⑤ 同上书，第 77 页。

中国鸦片贸易的历史之后，他认为迅速杜绝鸦片贸易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只有通过严惩倒贩鸦片的官吏和参与的士兵，鸦片市场才会逐渐被取缔。他主张采取渐进的政策，最后达到彻底杜绝鸦片源头的目的。应允许那些吸毒成癖者戒除恶习，但每年每县应处死十几个吸毒成瘾的罪犯，惩一儆百。他推断说，如果坚持不懈地地推广这个办法，十年之后，能戒毒者自会改过自新，其余的瘾君子也会被惩治殆尽。

关于"抚夷通商"，徐继畬采取的是内紧外松的羁縻策略，认为只要停止贸易，西方人"则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以终日之势"，自会不战而退。基于这样的思想，英国人在南台口岸开市贸易时，他"密饬署福防同知裕禄及保泰邀请绅耆嘱密约居民铺户公立议单，不与夷人来往货物"。致使"开市三月果无一人前往交易，该夷情急，将洋布等货零星拆售，仍不能出脱"[①]。他还在福建层层设卡，重税茶商，以阻止茶商从福州卖给英国人茶叶。这些做法使得英国商人亏损巨大，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但"以商制夷"主张并非断绝中外贸易，而是把暂时禁止中外贸易作为抵制侵略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虽然不可能彻底抵御西方的入侵，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内，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抗敌手段。后世中国人在反抗外国侵略时所采取的抵制洋货手段，乃至当今世界各国外交斗争中所运用的经济制裁，实质上也可以说是这种以商制夷手段的发展。

关于对外贸易，他认为可以仿效西方国家的"以商立国"，进行海外殖民，参与到世界对外贸易格局中来，并以国家战略经营沿海边疆，以此富强国家。他把中国古代的海外拓荒传奇人物虬髯客当作开疆拓土的英雄来称赞，以强烈的自信进行对外开放，并直接提出了经营台湾、琼崖的计划："然古巴、海地两大岛，比中国之台、琼；平其余各岛，亦多腴壤。欧罗巴人极意搜求，得片土即经营垦拓，遂使万古穷荒之地僻岛，不无献之精华，其能事曷可少哉！"[②]

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富强，中国必须加入到与另一文明的竞争当中去，

---

① 吕义才：《从神光寺事件看徐继畬的对外策略》，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5 页。

② 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6 页。

必须仿效西方国家的商业与国家战略结合方针，这时徐继畬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进行全方位考察并亲自实践得出的结论。

三

福州洋人入城事件，是徐继畬“以商制夷”策略思想的集中实践，它的焦点在“遵商守约，抚夷通商”。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规定了英国人可以在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且可以进行贸易往来，并规定英国可以在五口口岸派驻领事等。此后，各国商人开始陆续在五口城外居住、经商。但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入，各国商人要求进一步到五口城内居住，这就引起了入城与反入城斗争。在处理1844年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要求入城居住事件上，徐继畬先是暗中发动城中绅士阻止其入城，在发生意外后，徐继畬根据条约承认了既定事实，允许其租住城内房屋，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华洋互市，相安无事”，“以商制夷”方针初试。在随后发生的神光寺事件的处理上，其实徐继畬援引了类似的方法，但是由于清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变化，加之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干预及其影响，使整个事件复杂化，超出了一个具体事件本身的意义，但客观地说，神光寺事件的处理也是徐继畬“以商制夷”策略思想在实践中的继续，并是一次深刻的尝试。

徐继畬“以商制夷”的策略思想与实践，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

现代外交本质上是通商和贸易，以经贸手段加入全球经济新格局是大势所趋，政治军事的争夺最终也是为了经济目的。以商制夷手段，是把经济手段引入外交斗争，是中国外交斗争近代化的一种萌芽表现。徐继畬深刻认识到在这“古今一大变局”的时代，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一种求隔绝而不能的国际关系，从经济强盛的欧罗巴各国，到崛起的美洲，到大洋洲、非洲诸国，无不在因通商和贸易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这种位置在不断变动之中。就连非洲突尼斯这样的国家，也形成了与欧洲各国通商的国际关系。这其实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只有积极参与世界的竞争，才是明智的选择。徐认识到英国发动于远东与中国的战争，是为了强迫中国与之通商，而不是像明代的倭寇纯粹的攻城略地：“英夷举动，与倭寇本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无混行杀掠之事，即滨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牵制全局者，亦未

必无端攻扰。”①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启迪了所有追求国家民族富强的爱国者。徐继畬通过扩大自己世界知识的范围，认识到这个世界已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支配，他力图暂时缓和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为中国赢得时间，而国家富裕和强大是紧密相连的。在当时清政府积贫积弱的局势下，“以商制夷”是徐继畬以自己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眼光和韬略，给自己的国家贡献的最恰当的、最明智的富国强国之道。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及“以商制夷”思想，成为当时及其后世一代代民族精英了解世界的必读书，有力地推动了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那个年代出洋考察或充当驻外使节的中国人，大多随身携带此书。19 世纪后半期追求新知的人士中，几乎无人不读此书。王韬认为这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②。他从书中领悟到时局堵塞变化和海外各国富国强兵之途。康有为购读“瀛环”、“海国”等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用。梁启超则直接从“瀛环”中接受到新的世界观念的启蒙，1890 年他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③。

郭嵩焘是徐继畬“以商制夷”思想的卓有成效的后继者。他认为首先要有与西方竞争的商战思想，与当时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④。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库亦常丰，这也是西方富强奥秘所在。他进一步解释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

---

① 徐继畬：《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转引自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6 页。

② 王韬：《瀛寰志略·跋》，转引自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8 页。

③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 99 页。

④ 《郭嵩焘日记》（二），转引自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08 页。

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①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南辕北辙。再次，他认为必须以利导民。在他看来，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②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③。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最早的否定，后来，像左宗棠这样的洋务派也已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④。

19 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迎接现代文明的挑战，这是两个密切关连的问题。⑤ 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挟其军事和经济的优势摧毁形形色色的堡垒，把一切国家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来说，林则徐英勇抵抗外国列强的行为固然是爱国，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多少仁人志士探求的结果，而维护与西方各国的平等相处，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现代文明，促进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这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刘晓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

①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转引自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5 页。

② 《郭嵩焘日记》（二），转引自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08 页。

③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转引自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0 页。

④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 63 卷，转引自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25 页。

⑤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1 页。

给外交以空间

——徐继畬开放思想影响因素研究

冯素梅

晚清中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的一段变调的旋律。在西方列强一次次侵略战争的沉重打击中，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闭自守状态到被动地打开大门，又被强迫卷入了世界近代政治体系中。在最初遭遇一连串的军事失利的懵懂过后，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开始觉醒，纷纷对西方侵略者的本来面目进行认识和探究。在这些人中，徐继畬是走在前列的异类的一个，他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践，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国人介绍外面的世界，用不激进的折中的办法解决涉外事务，即给外交一定的空间，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也被称为近代中国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东冶镇人，出身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使、福建延建邵道台、汀漳龙道台、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等职。1840 年鸦片战争后，徐继畬调任福建巡抚。在福建巡抚任上，他写下了具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不朽名著《瀛环志略》。《瀛环志略》中徐继畬向国人传达世界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的信息，而“神光寺事件”集中地体现了徐继畬在涉外事务中的实事求是的务实理念。在封建传统天朝大国的思想势力包围中，徐继畬何以能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中形成务实、开放的思想，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 徐继畬家乡文化自古就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开放性及勇于变革的精神

山西文化首先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山西自古就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山西位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塞北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是有史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跳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地位。在少数民族南下中原过程中，山西地区是首当其冲之地。当北方少数民族的铁骑掠过山西之境，同时就把草原游牧民族的文明特征带进了这一地带。在对抗过程中，激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也是屡见不鲜，但是除了这两种状况之外，更多的是民族大融合。进入有文献可考的年代，山西地区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学习，不断发展，形成了民族融合的潮流。草原游牧民族迁入或侵入山西后，与所到之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胡汉通婚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匈奴族作为一个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民族冲突融合的趋势影响下已然消失，而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都曾在山西地区建立政权或割据一时。对山西的汉族民众来说，与各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汉族文化之中，久而久之，对异族的警惕心理和防备心理慢慢就淡化，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异族文化的排斥心理自然而然地就趋于淡薄直至消退。久而久之，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族不同种的文化就成为山西发展历史上经常具有的状态。从某种角度看，古代山西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山西地区的华夏子孙在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地域文化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① 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包容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推动力。② 作为一个山西人，生而具有山西文化的包容性

---

① 申维辰：《华夏之根——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中华书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题记。

和开放性的烙印，受这种民族融和趋势的作用，徐继畬对不同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异质文化的接受和直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山西历史文化还具有不断变革和不断进步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走在了时代前列。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三晋的改革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不仅在本国实施强有力的革新举措，而且奔走列国，引领各国政治、军事改革的行动，为当时各国国力的强盛，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诞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在继承冯太后平城改制的成果基础上，毅然决然地将都城迁到汉族封建文化的沉积地洛阳，从思想上、政治上全面汉化，为当时落后的鲜卑族封建化扫清了障碍。进步的思想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前奏，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发展依据，又是新思想诞生的摇篮。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不断地深化进步思想，为后来的改革进一步奠定基础。① 在山西这种活跃的变革性思想因子决定下，徐继畬对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夷夏之防的思想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改变。《瀛环志略》中，中国人惯用的称呼周边民族的“夷”字几乎消失不见，他还弃用了一些有贬义的外国国名的译称，为了纠正国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偏见，揭示世界的多元性，徐继畬引用和绘制了数十幅相当准确的世界及各国地图，与书中的有关章节相配合，并在“书中总是把西方人发现的科学事实与中国人的错误概念并列”，使人一目了然，受到应有的启发。他用具体的图表、事实把清朝这个“中央王国从世界的中心移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中国人大体上是用自己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看待有关的现象和新事物的，徐继畬在认识世界，认识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制度，以及探求诸国富强之道等方面的先进性是值得肯定的，在当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②

二 徐继畬家乡重商意识的浸润作用

人的发展不只具有自然性，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在中国人的传统

---

① 申维辰：《华夏之根——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中华书局、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8 页。

② 严冰、陈永祥：《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的西洋观》，《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思想和观念中，家乡的乡风民俗的影响有时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深刻的。徐继畬的家乡山西，在明清以前，民风俭朴，《诗经集传·唐风》载：山西“土瘠民贫，勤俭朴质，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杜佑《通典》：“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隋志》：“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其于三圣遗风尚未尽澌灭。”至明代前期，依然是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①] 明代在开中法的特殊机遇下，山西靠北临边地的地理优势，贩盐开中取利，商业开始发达，明清之际特别入清以后，山西人又转而从事长途贩运，成为著名的旅蒙商、旅俄商和边贸商；道光初年票号诞生，票号商一纸汇票汇通天下，一度执中国金融牛耳。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晋商成为闻名天下的中国最著名的商帮之一。晋商先进的管理经营经验成功地创造积累了巨额的财富，随之为山西的民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诚信经商、以义取利成为当时山西人普遍的观念。当然，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仍是读书科举，但是经商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的影响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学而优则仕不再是唯一的人生奋斗目标和理想，学而优则贾、贾而优则学成为许多山西人新的人生轨迹，甚至出现了“子弟之俊秀者都入贸易一途，其次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的现象。以义取利，义以制利，名以清修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不过，晋商巨额财富一方面带来了富贵显赫，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活的奢华，这就渐渐地影响到当地民风。明清时期，山西民风渐渐由俭朴走向奢靡。

山西地区新民风的出现，客观上更有利于新思想的萌发，最突出的是明末清初民主启蒙思想家傅山的出现。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一说 1607），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一说 1684），山西阳曲人。傅山的成长期，正是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对于他的反对奴性、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平等，反对爱私、主张爱众，反对封建纲常，主张人欲合理等民主启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②]

晋商对徐继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山西的富有自幼就在徐继畬的心目中留有强烈的印象。因此，成年后徐继畬非常重视商业贸易对国家和地区

---

① 张正明：《明清晋商与民风》，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1—192 页。

② 同上。

的影响和作用。在他的《瀛环志略》中，在介绍世界各国时，商业贸易往往是重点阐述的内容，尤其是英吉利、荷兰等欧洲强国，在侵入亚洲各小国时，企图进行商业贸易，攫取利润的目的被屡屡提及，在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他认为商业贸易是很重要的目的。徐继畬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持赞赏的态度，认识到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重视商业、工商业的发达，“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另外，他在分卷介绍各个大国时几乎都谈到了它们的商业繁荣，如在介绍法国的巴黎时：“其街衢盘绕环匝，列肆密如蜂房，往来者毂击肩摩，昼夜不绝，每岁京都所收税银计九百万两，欧罗巴都会之盛，推为第一。”在介绍英国的苏格兰时说其民“经商遍四海，积资多在数万里外，故地虽寒瘠而多素封”。介绍英吉利三岛时说：“街市之中，衽帷汗雨，昼夜往来如织。其商船四海之中，大利归于商票，而工则贫。”[①] 徐继畬看到，这些国家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它们在世界各地到处建立港口，发展贸易，“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这并不意味着徐继畬为西方不远万里侵略中国进行开脱，而是他看到了只要西方各国存在，这种以武力为商贸开路的做法就不会改变，且压力会愈来愈大。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一味退守始终是被动的，而要强大起来，商贸是其源泉。较之于林则徐、魏源只认识到西方人的技术先进，徐继畬的看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亦更具有近代性、开放性。[②]

三　徐继畬在沿海为官的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

徐继畬出身于内陆省份山西，山西地形地貌自然形成一个封闭的堡垒，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和近代社会，外国人与中国的交往很少达到山西，即使是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了许多口岸以后，西方人和西方思想文

---

① 参见严冰、陈永祥：《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的西洋观》，《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② 王振锋：《中国近代世界观的一代宗师——徐继畬三论》，《城市研究》1994 年第 6 期。

化开始渐渐涌入中国沿海各地时，山西还是较少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这种状态在徐继畬在北京和陕西为官时，仍然没有大的改变。在调任福建沿海为官后，徐继畬受到开放的海洋文化的熏陶，思想中吸纳了新鲜的观念。在沿海为官，使徐继畬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更多的中国以外的世界的知识，另外也有机会处理涉外事务，在涉外事务中体现自己务实开放的思想观和价值观。

1840 年农历七月，徐继畬调往福建东南部，任汀漳龙道代理道台。道衙设在厦门对面的漳州。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面对面地领略到西方列强的巨大影响。福建有着与山西等华北地区截然不同的地形地貌，没有黄土高原的沟壑和高山大河，而是有濒临台湾海峡的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一个个优良港湾，以及众多的华人海上贸易团体。福建有着从事海上国际交往的悠久历史，也有和远方来的外国人打交道的长期经验。福建商人的商船远赴东南亚，然后从摩鹿加群岛、爪哇、婆罗洲、马来半岛带回各种异国的物产。福建华侨的船队根据贸易信风往返于福州、厦门和东南亚群岛之间。"他们与漂洋过来的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已非一日，这些西方人也逐步加入他们经商的行列。"①

1843 年 11 月 2 日厦门口岸开放以后，11 月 7 日朝廷委派徐继畬督办福建省的通商事务。在那里，他开始了亲自与形形色色的西方人的接触。1843 年的厦门，已经定期地吸引来许多外国船只。乘船而来的有西方领事、医生和传教士。这些来到福建沿海的西方人促进了中国的变革：充分开放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和外交；传播了西方的医学和婴儿接生法；广泛地带进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知识。对徐继畬这样出生在北方的官员来说，这些变革给其现在与原来所熟悉的山西、河北截然不同的环境，涂上了新的色彩。在新的环境里，他的才华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保持了感兴趣而开放的姿态。他异常敏捷地引进西方文明的活水，从而使他获得对中国问题的更为实在的洞察力。与徐继畬接触过的西方人发现，这位中国高级官员实在非同寻常。在他们心目中，徐继畬不仅光明磊落，公道正派，而且十分礼貌友好。②

① 参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28 页。

徐继畲开放思想标志性著作《瀛环志略》，就是在福建为官时，在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帮助下完成的。徐继畲在《瀛环志略》的自序中就提到，“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能识其字，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① 除雅裨理外，徐继畲还曾向其他在华西人如美国传教士甘明、英国驻福州两任领事李太郭和阿礼国请教，并参考了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

雅裨理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徐继畲几次会面的详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继畲在涉外事务中既坚持原则又不苛刻激进的外交策略。如雅裨理在1844 年 1 月 27 日的日记中写道：“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他按照中国人的意愿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限制我们只能在几个较开放的街区活动。作为对手，英国领事提出较合适的限制应是（应允许外国人）到内地进行一天的旅行。布政使逐渐表现出开明和宽大，但仍不同意领事提出的（应允许外国人到）如此广大的区域（活动）。交换一些文件，互访过几次之后，问题仍然像从前那样没有解决。我们已多次会见布政使，其地位仅次于巡抚，而且有可能成为本省和邻省的总督。他是我迄今遇见的最爱寻根问底的中国高级官员。”②

让徐继畲承受降职处分，且饱受攻击非议的有关英人租屋的神光寺事件，更是集中地体现了徐继畲在涉外事务中的处事原则，即以既定条约为依据，不简单地激化矛盾，采取迂回的措施使事件得到解决，也被称为“阳示德意，阴为钳制”政策，长远来看，这一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当时，徐继畲这样的外交策略无疑是缓

---

①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自序》，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美国研究》1997 年第 2 期。

和矛盾的最好办法。

四　结论

实力决定影响力，弱国无外交是一条无奈的定律，在晚清中国被动开放，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局面下，中国是很难有外交可言的。如何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中争取更大的利我性，简单激化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给外交一定的空间，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先进因素采取一定的开放接纳姿态，从而在了解学习别人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也许是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一点上，近代启蒙思想先驱徐继畲表现得尤为突出。影响徐继畲开放思想形成的因素很多，除了山西文化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山西民风的影响，在沿海做官经历的熏陶等方面外，文中没有提到的还有徐继畲自身的求实求新的思想性格因素，其文化教育背景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等。

值得指出的是，徐继畲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由衷赞誉促进了近代华盛顿神话的衍生。列强侵入中国以前，受闭关锁国的国策的束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夜郎自大的思想充斥头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外面的世界。华盛顿作为美式民主的象征，随着西方各种知识的传入，在晚清中国士人的心目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多的关注。加之徐继畲对世界各国的许多认识和知识是受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影响，美国文化的先进因素通过雅裨理的介绍逐渐被徐继畲所接受。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思想意识中，上古尧舜禹三代是圣君明王的理想典范，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传承中的影响深远。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畲赞赏华盛顿："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他还评誉道："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①

徐继畲以中国人熟悉的"上古三代"拿来比附华盛顿这位异国领袖，

---

① 参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9 页。

创造了中国人对从无谋面的神秘人物华盛顿的想象空间，使之形象更加生动具体。徐继畬把华盛顿比成"异国尧舜"，是传统中国思维里，以圣君观念为天下立制创法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他的赞誉视为：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作为，以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符合了徐继畬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向往。受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继畬以上古三代和三国时期曹魏作类比，现在看来虽然有些格格不入，但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声音。

随着《瀛环志略》广泛传播，华盛顿身为"异国尧舜"的形象在中国也一步步雕塑而成，在华盛顿转化为"异国尧舜"的形象历程里，徐继畬堪居"首功"，此后其他人的著述，则屡屡复制与扩张他的论调。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赞美，推动了华盛顿神话在中国的形成。[1]

（冯素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献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① 潘光哲：《"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郑大华、邹小站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辑，《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

吴义雄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刊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域外世界的窗口。虽然具体的政治环境使得徐继畬在他的生前和身后都遭受非议，但在此后数十年，中国很多有识之士是通过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看世界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知识史上的成就，也为后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近年来，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研究徐继畬和《瀛环志略》的论著。但我认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也是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透过其人其书，站在刚刚被打开的中国大门口的西方人，看到了这个古老帝国开始萌发的新机，听到了这个惯于自我封闭的民族开始和陌生的殊域异国对话的声音。已有学者就当时的西方人对徐继畬其人其书的认识与看法进行了探讨[①]，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更深入地发掘资料，作进一步研讨。本文仅就笔者所见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瀛环志略》刊行前后西方人对徐继畬其人其书的了解与评论。

一　三篇书评，两种评价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1851年4月号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5页的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作者是著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中国丛报》的编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但实际上，在出版于广州的这份月刊刊载卫三畏的这篇

---

① ［美］龙夫威：《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参见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5页。

文章之前，发行于美国波士顿的《传教先驱》（*The Missionary Herald*）月刊已经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

《传教先驱》是美国公理会所办的传教刊物，以刊登与该会在世界各地传教事务相关的文章、消息、通信、报告、评论等为主。但该刊1850年7月号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A New Chinese Geography"）。该刊编者在文章的前面加了按语，其中说道：

> 以下是一篇很长的来信，它与本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相比都有些不同，但它对学者、慈善家和基督徒来说都很有趣。中国人在学习地理学！而且不仅是地理，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在中国至少发现了一个人，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通过刊刻这里介绍的这样一部书，来攻击在许多个世代建立起使我们超过3亿的同胞与世隔绝的高墙的无知和愚昧。一位总督在序言里赞扬了这部著作。这是当代世界进步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趣味的一章。①

这位编者特别注意到徐继畬在书中提到的雅裨理（David Abeel）的作用，因为雅裨理是由美国公理会的传教机构美部会派到中国的。

这篇书评是以长篇通信的形式出现的，它的作者是美部会在福州的传教士弼莱门（Lyman B. Peet）。弼莱门原在曼谷传教，1847年7月到福州，参与建立美部会在福州的传道团。② 在弼莱门到达福州的第二年，《瀛环志略》初版刊行。他向《传教先驱》寄这份稿件的时间是1850年1月。他在文章中说，"几个月前，一部中文地理书在这个城市出现"③。但从现在所知《瀛环志略》的版本信息来看，该书并无1849年（道光己酉）刻本。故有理由推断，弼莱门所见为道光戊申（1848）初版。

弼莱门在文中首先简述了该书10卷的内容，指出该书采用的世界地图"与我们一般学校中使用的地图样式相同，不过其地名较少，未标经纬度"。其余42幅地图"尽管未画经线和纬线，在其他方面却相当准确，而且因为它们也许是中国人首次进行此类尝试的结果，它们理所当然反映了

---

① "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6, July, 1850, p. 227.

② 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194页。

③ "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6, July, 1850, p. 217.

作者的天才和勤勉"[1]。他将《瀛环志略》的序言进行了大段的翻译，突出了其中关于该书资料来源的说明、关于因语言障碍造成的苦难、特别是关于雅裨理的贡献的部分。

之后，弼莱门按照自己的观点，分几个方面介绍了《瀛环志略》的内容。他认为该书：

（一）"表明了中国人对我们的认识"。他通过翻译徐继畲在书中关于欧洲和美国的介绍，来说明徐的认识水平。除徐继畲在书中的一般性介绍外，还特别摘译了书中关于欧洲的国债、各国经济状况、欧洲的宗教等内容。在关于美国的部分，弼莱门摘译了书中关于美国立国简史的部分，以及关于美国人民、政区的部分，重点介绍书中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段落，并将徐继畲在书中对华盛顿的赞扬之词完整地翻译。（从"华盛顿，异人也"至"可不谓人杰哉"。原文见《瀛环志略》卷九）正是这段话，后来导致了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此为众所周知，兹不赘述。[2]

（二）"接受并确认我们的年代学"。所谓"我们的年代学"，是指西方学术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描述。由于19世纪前期的中国文献一直声称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的文明国家，而其他国家都是"化外"的"蛮夷"，故《瀛环志略》对西方历史叙述的采纳让身为传教士的弼莱门倍感兴奋。他认为徐继畲"对西方国家的叙述预计将会使读者马上看到，欧洲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中国"。由于"本书采纳的年代学就是欧洲作者普遍运用的年代学"，以《圣经》表达的西方古代历史体系，在《瀛环志略》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些，都可以向中国人表明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3]

（三）"向中国人表明了更为正确的关于不同宗教的观念"。这主要是指徐继畲在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的不同特征，既有对波斯、印度、阿拉伯、欧美等地不同宗教的信仰和历史的基本描述，也有对天主教、耶稣教的大致区分及其演变历史的介绍。作为传教士，弼莱门还特别注意到书中对"God"一词的多种表达方式：天神、神天、天主、上帝、耶稣，等等；也向他的读者介绍，"religion"的中文对应词是"教"。[4]

（四）"有利于在中国传播宗教之光"。弼莱门在这部分表达的大致意

---

① "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6, July, 1850, p. 218.

② Ibid., pp. 219—222.

③ Ibid., p. 222.

④ Ibid., pp. 222—224.

思是，《瀛环志略》传播了正确的知识和观念，从而有利于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基督教的传播。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①]

弼莱门也遗憾地指出了该书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是涉及基督教信仰的方面："他没有谈到创世问题，以及随后的历史"；"没有提到神对埃及人的审判"；对基督教的教义也未准确地介绍，如对耶稣的复活，"他漏掉了许多当时的详情和证据"，等等。[②]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弼莱门对《瀛环志略》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提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解释。他说："通过省略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内容，作者使自己避免了提及导致最近发生的与英国的战争之原因的不愉快任务。他因此不必讨论他自己国家的宗教和制度，或是为它们辩护。其结果是，这部著作包含了比世界上任何时代的异教徒作者的作品都远为正确和广泛的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与制度的叙述。"[③]

这篇文章占据了整整八页的篇幅，在西方世界第一次介绍了《瀛环志略》这部杰出的中文著作。从文中可以看出，弼莱门这位传教士非常注重基督教传教事业可以从这部书的刊行和流传得到什么帮助。相比之下，卫三畏在第二年发表的篇幅更长的评论文章，则较为注重《瀛环志略》的学术意义。

卫三畏所见《瀛环志略》亦为道光戊申本，这是他在文章标题中就告诉读者的。他的文章标题很长："瀛环志略：一部世界地理书，现任福建巡抚、山西五台徐继畲阁下所著。书分 10 卷。福州，1848。"[④] 卫三畏对该书的评价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了："这部著作已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它成为中国学者刊行同类作品的先导，将会令中央帝国的权贵和士人获知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位置、资源和产品。"[⑤] 和弼莱门一样，卫三畏显然也很重视徐继畲与雅裨理的关系，在文中引证雅裨理的日记来说明二人的交往对写作《瀛环志略》的重要意义，又全文翻译了徐继畲的自序，以表明传教士与该书写作之关系。

---

① "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6, July, 1850, p. 224.

② Ibid.

③ Ibid.

④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uán Chi - lioh* 瀛环志略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ü Ki - yü, the present Lieutenant - governor of Fukien. In 10 books. Fuhchau, 184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69.

⑤ Ibid.

卫三畏还翻译了刘韵珂所作的序，以显示该书在中国官员中得到的评价。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部书较之以前中国流行的地理书所取得的进展，应该将它与中国人所具备的关于外国的知识作一比较。"卫三畏挑出来的比较对象是他在广州的书肆里看到的地图。在他看来，这些地图是"极为无知和极端错误的标志"，"在这些地图中，（中国）十八行省占据了十八倍于其他所有国家的面积；万里长城将它们与沙漠戈壁区隔开来，在沙漠的另一边，俄罗斯在地图的北部从东到西伸展开来，山脉、河流和湖泊点缀其间，明显只是为了使地图显得优美如画。在西边，从北到南是一个大洋，英格兰、法兰西、荷兰、葡萄牙、果阿、波斯和印度，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着，相互距离不等。在东部和南部，有些岛屿的轮廓，分别是那些中国人很熟悉的国家和岛屿，诸如日本、琉球、吕宋、爪哇、马六甲、苏门答腊，等等；以及安南、暹罗、缅甸、西班牙等帝国，以及充斥于地图东南角的不易辨别的地名"。按卫三畏所说，钦差大臣琦善在大沽口和义律谈判时，还企图用这样的地图向后者证明，"英国要想战胜这样一个相对巨大的强权是完全无望的"①。甚至在广州这样一个和西方人打交道达二百年以上的地方，人们对于那些洋商所自之国亦毫无了解，它们的相关知识与二百年前相比并无进展。更有甚者，人们对于自己邻近地区的地理形势也茫然无知。总之，"中国人对于地理作为学问是所知甚少的"，它们绘制的本地地图"充满了传闻和猜测"，没有一幅是通过三角测量法得到的。1705—1712 年耶稣会士进行的测量是当时中国人拥有的最为准确地形测量，但后来的版本还以政治目的进行了修改。② 卫三畏在这里所描述的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地理科学方面的知识水平。他提出，在评估徐继畬的贡献时，必须考虑他所处的这种"漆黑的愚昧"环境，以及他所受教育中所存在的偏见。以此作为参照系，具有四十余幅绘制精确的地图的《瀛环志略》所达到的成就，无疑标志着中国地理学的重大发展。

卫三畏在文中以大约十四页的篇幅，即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撮要介绍了《瀛环志略》各卷的内容。在介绍书中关于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内

---

①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uán Chi - lioh* 瀛环志略 *or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ü Ki - yü, the present Lieutenant - governor of Fukien. In 10 books. Fuhchau, 184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172—173.

② Ibid. , p. 173.

容时，卫三畏摘译了他认为重要的、涉及西方、经济、文化、风习的段落。徐继畬赞美华盛顿的那段著名的话，他也全部照译了。[①] 此外，《瀛环志略》第十卷关于美洲奴隶制的评论，卫三畏也将其大段译为英文。[②] 和弼莱门一样，他也认为徐继畬将中国地理和历史略去不谈是“避开了一些困难，使他在涉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工作中不必将之与自己的国家进行令人不满的比较”[③]。由于这部分内容以该书和翻译《瀛环志略》为主，这里就不再多作介绍了。

卫三畏强调徐继畬所处的知识环境之愚昧落后，不仅是为了赞扬徐继畬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也为了解释，作者所面临的知识背景上的困难导致了《瀛环志略》所存在的缺陷。卫三畏全文翻译了徐继畬的《凡例》，以徐在其中列举的各种困难，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书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书中将美国的罗得岛（Rhode Island）与希腊的罗得思岛（Rhodes）相混淆；书中的欧洲地图“大体上正确地显示了各国的形状和疆界，但正如雅裨理先生所说，作者对精确性似乎不太关注，没有标注经纬度”[④]。他在介绍了《瀛环志略》的大致内容后说，通过他所摘录的内容，“我们的读者会觉察到，这部地理书有着很多缺陷和错误。它提出的关于许多国家的观点是残缺不全或是错误的。世界各国的自然物产几乎全被忽略了，这些国家人民使用的语言未能得到分析；他们政府的形态，他们在艺文和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不是未得到正确描述，就是完全没有被提到；对于其疆域、地貌和资源的描述也是很粗糙的；书中的地图质量较差，不少城镇被错置。”[⑤] 需要说明的是，在指出《瀛环志略》的不足之处时，卫三畏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敬或蔑视的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卫三畏也声明：“这只是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地理书相比较而言的”，事实上是用了一种“不公平的标准”，正如用《大清一统志》的最

---

①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uán Chi - lioh* 瀛环志略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ü Ki - yü, the present Lieutenant - governor of Fukien. In 10 books. Fuhchau, 184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189—190. 《中国丛报》1851年5月号讨论中文印刷问题的一篇文章，将徐继畬这段话用中文印了出来，见：*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283.

② Ibid., pp. 191—192.

③ Ibid., p. 179.

④ Ibid., pp. 173—174, 182.

⑤ Ibid., p. 192.

新版本来责怪西方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不够准确一样。他强调：

> 考虑到作者的教育背景和地位，它是其研究工作、公正坦率和丰富学识的崇高丰碑，而且可以将其看作与英国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产生的第一批果实之一。我们认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国统治阶级和学者们的傲慢自大，消除他们的愚昧无知，向他们证明，他们并非地球上的惟一（文明）国家。我们已经听到广州当地人对其内容所表示的惊诧，怀着轻易的狐疑询问他们从书中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①

卫三畏认为，《瀛环志略》将会为希望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关于外国的知识的人提供实质性帮助，特别是在用中文表达新事物和新观念方面。当然，有时徐继畬用来表达外来事物的中文名词未必尽当，但“在主要的表达方面还是正确的”，“细致缜密并非其目标。为了其同胞的福祉并向其提供信息而叙述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才是其最高宗旨”②。

在这篇长文的结尾，卫三畏希望徐继畬能将自己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为自己的同胞提供一个经过修订的、正确的《瀛环志略》新版本，并贡献新的作品。他年轻的君主将会从现在这本书中获益，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被召唤到其忠告足以影响皇帝决策的位置上去。我们还希望，他的拼写方式将会被那些有机会在自己作品里用到这里词汇的外国人所采纳”，在中西文化开始交汇的初期阶段，帮助解决经常造成混淆、令人头疼的名词对译问题。③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名词问题，需要漫长的实践才能加以解决，一个人或一本书难以独立承担统一名词的重任。但应该看到，正如卫三畏所说，徐继畬为近代中国知识史上这一重要的进程奠下一块极有分量的基石。至于卫三畏的另一个愿望，不久之后大约就变成了失望。因为徐继畬很快被迫去职，而他所承受的压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这部风行一时的《瀛环志略》。

---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92.

② Ibid., pp. 193—194.

③ Ibid., p. 194.

总体来看，弼莱门和卫三畏的评论文章都对徐继畬的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非常有趣的是，对与《瀛环志略》同属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作的《海国图志》，当时西方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按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观点，《海国图志》这样一部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代表着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水平的巨著，其学术和思想意义至少不在《瀛环志略》之下；而其作者魏源在近代学术思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也应不在徐继畬之下。事实上，众所周知，一般谈论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通常将魏源及其《海国图志》放在更有代表性的位置上。

但是，《海国图志》刊行后，当时却并未受到传教士或其他在华西方人的好评。相反，《中国丛报》也发表了一篇书评，对这部著作进行基本上的否定。

普鲁士籍传教士、时任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中文秘书的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1847年9月号《中国丛报》发表了关于《海国图志》的专题评论文章。郭士立看到的是1844年刊行的五十卷本。他没有能辨别清楚，该书的作者是魏源，而只是简单地根据该书的序言中的一些话，以及封面的题签方式，将其作者定为林则徐。因此，他在文中首先用将近两页的篇幅评论林则徐。他认为，林则徐“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人，很少有人可以像他那样夸耀拥有多种美德，但同时却表现了如此之多的邪恶”。他承认林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品德，坚定不移，具有中国达官贵人阶层中“少有的无私精神”；但又提醒读者注意，这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展现了刻薄和卑鄙世间的一面，残忍，鲁莽，可耻，固执己见，对于和外国交往的首要原则一无所知，驱使其国家走进了一场可怕的战争，而他在危急时刻却像孩子一样无助”①。

关于《海国图志》，郭士立认为“可以看作一部外国事务文摘，涉及政治、历史、统计数字、宗教，等等，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编纂物”。他从序言和第一卷看出，这部书的“伟大宗旨是讨论夷人的战略才能和优越之处，以及可供采纳以打败他们之武器”。显然，他注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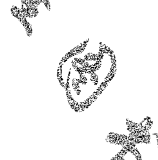
---

① Charles Gutzlaff, “Hai Kwo Tu Ch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p. 418. 郭士立意识到，林则徐将他未完成的作品交给了魏源，魏源为其增加了大量资料，但从全文看，他将林则徐看作是这部著作的主要作者。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中心思想所在，但他将这一思想理解为好战姿态，说"我们宁愿要一部关于维持和平的作品"[1]。与卫三畏对《瀛环志略》所用地图的评价相反，郭士立这样评论《海国图志》的地图："全书塞满了对我们自己地图的可悲的模仿品"，其世界地图是"古老的"，"好像它们是一千年前画出来的"[2]。

他对该书的内容的评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凡是书中引用中国史籍，说明中国周边诸国之历史状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他都认为具有价值；而凡是书中根据西方文献、涉及西方国家，以及非洲、美洲等在中国传统史籍中缺乏记载的，他都用蔑视和嘲讽的语气，指其内容颠倒、错漏不堪。基本上，郭士立评介《海国图志》的内容，主要是挑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加以驳斥和嘲笑。全文的基本格调是轻蔑和讽刺。例如，在谈到书中关于安南、暹罗、缅甸的内容时，他认为"非常有趣"，其中的"各种论述我们从未在其他书中看到，而可以从本书收集"；他觉得，第十二卷关于日本的内容"是原创性的，资料丰富，很少为我们的作者所知"；但关于印度的部分，那就"编排混乱，错误百出，大部分内容采自外国人的叙述"；关于《海国图志》对阿拉伯国家和波斯的叙述，郭士立讽刺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它们属于西印度"；又说："他关于亚洲土耳其的叙述，正如可以预料的，也是很粗糙的"；在他看来，《海国图志》关于印度、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的叙述表现了"十足的无知缺陷"；关于非洲的部分，作者所知"不比一个小学生多"；而关于欧洲和美洲的部分，按郭士立所言，那简直就不堪卒读了，书中关于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和历史的叙述整个就是一团糟的错误堆积。[3]

实事求是地说，魏源引以为自豪的"以西洋人谈西洋"的内容，的确存在很多错误，这在晚清时期已逐渐为中国学者所认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早期阶段，这部著作还是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这是郭士立所无法了解的。不过，郭士立也承认，这部书的作者还是"勤奋的"，而像他这样一位重要的官员"谈论外国事务"也是"令人



① Charles Gutzlaff, "Hai Kwo Tu Ch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p. 419.

② Ibid., p. 420.

③ Ibid., pp. 420—424.

高兴的"；这部著作也已使其他官员"兴奋起来"，因此是"一个好的开端"①。

尽管郭士立在文章的最后收敛了他对《海国图志》的冷嘲热讽，但这篇文章的主基调是很明显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对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及二书作者的态度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也许，从徐继畬与西人交往的角度，可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　两种文明的相互探询

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过的，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瀛环志略》较之《海国图志》有明显的优长之处，西方人对二书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二者学术质量的看法。但是，《瀛环志略》的瑕疵也是很明显的。卫三畏、弼莱门对《瀛环志略》评论的宽容赞扬和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冷嘲热讽，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当林则徐在广东为《四洲志》搜集各种资料时，因鸦片问题引起的中英冲突，给那里的中西关系带来了敌对的气氛。身为英国政府雇员的郭士立，在为《海国图志》撰写评论、并认定林则徐为其作者时，必定对当时广东的政治氛围记忆犹新。继承林则徐的志业而撰成《海国图志》的魏源，虽未被西方人当作像林则徐那样的敌人，但他未与西方人有过直接的交往，他的名字对于在华西人来说是陌生的。

与此相反，西方人与徐继畬有过多次的直接交往，而且这些交往的友好格调，超出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态度的预期。西方人与徐继畬的交往发生在五口通商后的福建，较之鸦片战争前后在广东上演的历史剧，那里的中外交往已经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脚本。

不过，西方人首次注意到徐继畬，也是在他到广东就任按察使之时。《中国丛报》1843 年 6 月号的《大事记》栏目登载了一则消息："3 月 3 日，星期五。新任广东按察使徐继畬抵达广州，从那位庸懦尸位的孔继尹（Kung Kiyin）手里接印视事。"孔氏当时是护理广东按察使和盐运使。这则消息在英文中夹印了徐继畬的中文名字，但其中没有提到对徐继畬的任

① Charles Gutzlaff, "Hai Kwo Tu Ch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p. 424.

命原本是广东盐运使。[1]

根据多年后卫三畏的说法，《瀛环志略》的内容“主要来自他对雅裨理与马儒翰的问询”[2]。按：马儒翰（John Roert Morrison）是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长子，当时是少数较为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西方人之一。当徐继畬在广州任职之时，担任英国香港政府中文秘书和司库的马儒翰正往来于香港与广州之间，与钦差大臣耆英及其助手黄恩彤进行海关税则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谈判。就后来的《五口通商章程》及所附《海关税则》的条款进行讨价还价，是在此期间马儒翰的首要任务，他与徐继畬的接触，很可能是比较短暂的。而在《五口通商章程》等条约签订后不久，马儒翰就因病去世，故徐继畬与他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事实上，徐继畬在《瀛环志略》的序言中也没有提及马儒翰。

广东任职的经历对于《瀛环志略》的写作究竟有何具体帮助，看来难以明了。但徐继畬在广东的短暂任职，仍引起了这里西方人的注意。他离去的消息也登在《中国丛报》同一期同一栏目：“31日。黄恩彤由江苏按察使改任广东按察使，接任因徐继畬调任福建布政使后留下的遗缺。徐继畬在此间的短暂任期是令人满意的，但可以期待，像黄恩彤这样一位曾经与中英商业和政治关系的新解决有如此之深的关系的人，留任广州的地方官员所会带来好处。”[3] 从这则消息可见，在广州仅任职三个月的徐继畬，给当时在作为中西交往中心的广州的西方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但他们对自己更为熟悉的黄恩彤的任职显然更为兴奋。《中国丛报》的编者进而评论说，徐继畬升任福建布政使对福建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要接替的是曾望颜。曾望颜“是一位本地出生的人士，在对外国人怀有偏见的氛围中出生并长大，他是反对向外国人让与任何权

---

①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328. 根据有关资料，徐继畬的按察使前任是王庭兰。徐继畬从护理按察使孔继尹手里接印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丙午，离任是四月乙亥。（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47—2148页）查道光二十三年无丙午、乙亥日，丙午、乙亥日分别是三月三日（4月2日）和四月二日（5月1日）。疑《清代职官年谱》有误，而《中国丛报》所载的3月3日实为阴历三月三日之误。据以上所述，则徐继畬任广东按察使仅一个月。但这又与徐继畬任广东按察使三个月的一般说法相抵触。很可能徐继畬在正式就任按察使之前时的正式身份仍是盐运使。另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被称为“庸懦尸位”的孔继尹，在数月后正式接替黄恩彤任按察使。

② ［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③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333.

益的头面人物”。他认为徐继畬进京陛见，“或许将得机会消除皇帝对外国人的误解”①。这说明，出于对徐继畬的初步了解，西方人士已经将他当作一位开明的人物。

徐继畬与西方人的进一步接触，就是他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交往。《瀛环志略》自序所提到的主要是来自雅裨理的帮助。雅裨理（David Abeel）是首批来华的美国宗教人士之一。他本属美国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1830 年初到广州时，雅裨理并非向中国人传教的传教士，而是作为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牧师，在黄埔的西方海员中从事宗教服务。他在 1830 年底结束海员之友会的工作，转为美部会传教士，之后到南洋地区传教，1833 年因健康原因回美国。雅裨理在 1839 年重回广州，鸦片战争期间在澳门、马六甲等地活动，1842 年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一起前往英军占领下的鼓浪屿，开始在厦门的传教活动。他在厦门建立了美部会的传教基地，但在 1844 年 12 月即因健康状况的再次恶化而离开厦门，次年在美国病逝。②

徐继畬在就任福建布政使后不久，即于当年 11 月被派往厦门办理通商事务、勘定外人活动区界址。这次机会促成了他和雅裨理等人的交往，使他获得撰著《瀛环志略》的资料的主要渠道。这段交往也从而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性一页。很明显，徐继畬和雅裨理都很重视这段关系。徐继畬不仅在《瀛环志略》的自序中强调了雅裨理的帮助对撰写该书的重要性，而且在《瀛环志略》及作为其底本的《瀛环考略》书中多次引用后者的言谈，作为立论的依据。③ 雅裨理也将他与徐继畬交往的过程在日记中详加记载，并在他在世时就选择其中重要的内容在《中国丛报》

---

①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333. 曾望颜的确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封关禁海议”。

② 按：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机构，但一度与美国归正会海外传教差会合作，共同派遣传教士来华，直到 1857 年。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 68—70、141、188—189 等页。

③ 参见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雅裨理牧师之交游》，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6—239 页。

公开发表。[①]

在研究者已很熟悉的这几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徐继畬是积极地、孜孜不倦地向外国传教士和其他人士探询世界知识的。雅裨理在1844年1月27日的日记中说："我们已经见过阁下（按：指徐继畬）数次……他是我们见过的最能追根究底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问过许多关于外国的问题后，我们建议带给他一册地图集，向他显示他感兴趣的那些地方的幅员。他对此愉快地表示同意，在一个下午的部分时间，我们给他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一般性信息。我们答应送给他传道书。昨天我将《新约》和其他一些书打了包。"[②] 这是目前所见徐继畬与西方人直接交往的第一篇如此清楚、详细的文字。从这段文字可见，徐继畬了解世界知识不是被动地从传教士的宣传品或专题著作中接受，而是主动地向外人探求知识。

雅裨理记录的与徐继畬的又一次直接交往发生在2月19日，当天是中国新年。徐继畬在返回福州途中被再次派遣到厦门，继续解决外国人在厦门居留地问题。"在获悉阁下返回厦门后，我们前往拜访他，结果获得一次特别愉快的访问。他说他已经读过那些传道书，请求问些问题，主要是一些他遇到的人名和地名。显然他已认真地读过《新约》，给了我解释最为重要的真理的机会，我祈祷上帝，我的解释能在他的心里留下印象。"[③]

《中国丛报》还发表了其他几篇雅裨理日记，但无关于徐继畬的直接记载。任复兴先生抄录的雅氏日记原稿则显示，二人在2月29日和5月13日又有两次会面。在2月29日，雅裨理和徐继畬一起"呆了近三小时，以给他地理学方面的指教"；而后者在研究借给他的地图册后"已经制作了六到八幅地图。他们还讨论了外国国名的发音问题。5月13日，雅裨理又和徐继畬在一起，"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教给他地理知识"。雅裨理这次又看到徐继畬所制作的一些地图，称赞这些地图"十分准确"。他从谈话

---

① 笔者经对照发现，与任复兴先生从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神学院抄录的雅裨理日记相比，《中国丛报》发表的雅裨理日记在字句方面颇有不同。任先生抄录的原文及译文见 http://www.xujiyu.cn/Article/ShowArticle.asp. 由于此神学院所藏雅氏日记为原件，《中国丛报》发表的日记当经他本人或编辑改动。为了显示当时的读者所能读到的雅氏日记的内容，本文采用《中国丛报》本，以存异文。

② "Notice of Amoy and its inhabitants: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of the Rev. D. Abeel at Kúláng s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236.

③ Ibid., pp. 236—237.

中得到的印象是，相对于一些平常的知识，徐继畬对关于世界的“基本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和贸易，特别是和中国的贸易”更为关注，他尤为关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情形。[1]

我们当然可以把上述事件，看做是中外杰出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但考虑到当时徐继畬的地位和雅裨理的传教士身份，如果不是徐继畬为了寻求新知主动与后者接触，雅裨理是不可能见到他的，更不可能在一起呆整个下午或“近三小时”。在当时官场排外心理仍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徐继畬与外国人如此密切地接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他向被中国士人视为“蛮夷”的外国人寻求知识，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为了向域外文明寻求新知，他在若干年后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徐继畬在福建交往的外国人不止于雅裨理。美国学者龙夫威（英文名 Fred W. Drake）在这方面进行了出色的资料发掘工作，研究成果体现在其所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第 3 章。据龙夫威的研究，这些人包括：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enry Gribble）、与雅裨理一同到厦门的文惠廉、美国传教医生坎明（William H. Cumming）、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合文（James C. Hepburn）、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s）、继李太郭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等等。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说，除雅裨理外，他在福建“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这其中，阿礼国是提供了较大帮助的一位。根据英国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的记载，“事实上，阿礼国领事及其夫人向徐进一步提供了地理和历史资料，他的关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著作正在顺利写作中。阿礼国答应送给他一个地球仪，而且在他的请求下，阿礼国夫人为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在上面以不同的颜色表明分别由英国、法国和俄国控制的区域。‘在收到后不久，他又送来一张便条，询问为什么漏掉了阿富汗，它究竟是被波斯合并了，还是丧失了独立王国的地位。’”[2] 英人对徐继畬的评论是，徐在福建政府官员中了解情况最多、视野最为开阔的人，他超越同侪，“远远走在国人的前面”，同时虚心好学，

① 见：《雅裨理 1844 年日记（节录）》，http://www.xujiyu.cn/Article/ShowArticle.asp.

②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us Chi - 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1. 中译文参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 页。

"几个小时的时间他都会用来谈论地理学。他在一位广州的僚属送给他的一本昂贵的美国版地图册上贴满汉字名称"。[①] 这些都反映出，筚路蓝缕开创中国的世界地理研究的徐继畬，如何备尝艰辛、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新知识的求索。他并没有对一切资料、包括得自外人的新资料不加分辨地接受，而是尽心考证，力求准确。这种悉心探求异域学术文明的功夫，正是魏源在写作《海国图志》过程中所欠缺的。

据卫三畏的评论文章，除了上述外国人，徐继畬写作《瀛环志略》很可能还得到一位中国人的帮助。

> 来自香山。他那时刚刚在旅居美国4年后回国，他在美国学习英语，读、写都还算不错。这位年轻人当时是英国皇家战船"都鲁壹号"（Druid）船长士密（Capt. Smith）的翻译，但他对本国语言及厦门方言的知识都很贫乏，以致外国人和中国官员对他的翻译都不满意。我们认为很可能这位年轻人曾受徐按察使的召唤，让他翻译他从纽约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历史书的纲要，他大可用自己的方言进行口译。[②]

笔者未看到关于这位年轻人的其他资料，但相信卫三畏不会无端杜撰这样一个故事。这则史料证明徐继畬为了其著作的准确性，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位为敌国军方服务的中国人，标准的定义是汉奸。但将他从英国人身边召走，利用他的语言能力和携带的书籍为开眼看世界的事业效力，我认为这并不是应加以指责的行为。对徐继畬来说，这位在历史的烟尘中隐没了姓名的年轻人的价值，在于他的英语知识，以及他所带回的地理、历史书。也就是说，徐继畬看中的仍是他所带来的域外文明。

就在徐继畬为了寻求西方的地理知识而殚精竭虑之时，西方人也在观察徐继畬，并通过他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这里，仅以徐继畬与英国圣公会在香港的传教士、后任香港教区主教四美的交往，对此加以说明。

四美从1844年底到1846年春先后访问了当时的通商五口，考察各地

---

① George Smith, "Notice of Fuhcha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 226. 参见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295页。

②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án Chi - 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70.

政情民俗。他在 1845 年 12 月访问福州，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关于徐继畬的信息，也写下了他的评价，上文已予以征引。他还写道，徐继畬是“一个具有自由观念的人，曾在广州任按察使，相当通晓西方的地理和政治”[①]。这可以说是四美对徐继畬的初步观感。

四美在 1850 年底再到福州，12 月 7 日见到了徐继畬，并与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参加这次会面的中方官员还有两位县令、一位水师官员和一位海关官员，英方则有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译员星察理（C. A. Sinclair），他在这次会谈中的角色是翻译。与以往徐继畬通过与外国人交谈寻求世界知识不同，这次交谈的主题是，四美向徐继畬请教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在四美到福州时，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正在进行《圣经》中译本的修订工作。在此之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郭士立和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以及英国浸礼会在印度的传教士马须曼（Joshua Marshman），先后翻译、修订、出版过几个完整的《圣经》中译本。但来华传教士群体对其都不能满意，故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决定联合修订《圣经》中译本。由各通商口岸派出的代表，从 1847 年 6 月开始，在上海进行集体修订工作。此次修订持续三年之久，最后产生的译本被称为“委办本”中文《圣经》。但在此过程中，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之间，就“God”和“Spirit”用中文如何表达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大体说来，英国传教士主张用“上帝”来翻译“God”，用“风”来翻译“Spirit”；而美国传教士则坚持用“神”来翻译“God”，用“灵”来翻译“Spirit”。双方之间就此产生的分歧持续数年，到 1850 年终于分道扬镳，各自出版自己的“委办本”《圣经》。[②]

这种争论，就涉及在中文里“上帝”和“神”何者更适合于表达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观念；进而，涉及“上帝”和“神”等词汇在中国典籍和中国文化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传教士们为此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征引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为自己的立场寻找依据。修订

---

① George Smith, “Notice of Fuhcha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 215. 按：四美后来将其在通商五口的游记出版，中译文参见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4 页。

② 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 374—391 页。

委员会的最后分裂，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新教传教士这一群体的分裂，这是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四美到福州见徐继畬，向后者请教“上帝”和“神”何者是合适的译名，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四美将徐继畬的回答概括为以下八点：

1. “上帝”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非一种偶像，或是“神明”之一，而是宇宙之主。他对“上帝”的定义近似于康熙帝所说的“天上之主”。

2. “天主”在中国人当中一般被认为是基督教国家之主宰。

3. “神”这个词所表达的首要的和实质性的观念是“无形”的观念。

4. 中国的“上帝”和基督教国家的“天主”都不能被归于作为崇拜对象的“神”；但作为不可见的和非实体的存在，可以被称为“一种神”。

5. 尽管“上帝”是一个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名称，但“天主”在中文本《圣经》中也同样是一个表达独一真神的好译名。他主动建议用“神天”或“天神”作为译名，而且表示在中文作品中用后者作为 God 的译名更好。

6. “神”这个词的现代含义与古代有所不同，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天神”、“地神”和“鬼神”等词，还可以被用来混称一切本质上不可见的、神秘的东西。

7. “灵魂”是指活人之灵。圣贤死后的灵称为“神明”。

8. “神灵”和“神明”意思几乎是相同的，很少有所区别。（他不断强调此点。）①

四美之所以专程向徐继畬请教上述译名问题，是因为《瀛环志略》在谈到西方基督教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些名词问题。作为一位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又就西方历史文化进行过专门研究，徐继畬是当时西方人眼里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之一，被当作求教的对象，是完全可以理解

①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H. E. Sü Ki - yú and other Chinese Officer, and the Bishop of Victoria, held at Fuhchau, Dec. 7th, 1850”,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247.

的。实际上，四美在与他的交谈中，也就他的书中的内容向他提问，而他的回答，有些就是根据《瀛环志略》的内容作出的。以上所列的前三点，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对应的表述。当然，在交谈中，四美就这些问题和徐继畬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徐继畬就四美的提问和他书中的内容作出进一步解答。[①] 这样，在中国人眼里作为观察世界之窗口的《瀛环志略》，在西方人眼里却成为探询中国文化的一条路径。

从上述徐继畬回答的几点来看，徐继畬并未在"上帝"和"神"这两个译名之间作出对或错的选择。他似乎对"上帝"这一译名肯定较多，但也没有否定"神"这一译名；同时建议用"天神"或"神天"作为西方人独一真神概念的中文表达方式，又似乎倾向于在译名中包括"神"这个字。他承认，《瀛环志略》中"无疑有不少错误"，而且资料"又分别来自不同的外国作者"，包括雅裨理、郭士立和其他天主教传教士，而那些他参考的不同传教士著作中关于西方神性观念的译名又各不相同，只有他在书中所加的自注才表示他自己的想法。[②] 这种说法，体现了徐继畬对学术问题诚实的态度。

徐继畬和四美在交谈中就以上八点逐一进行了讨论。徐继畬的主要观点都通过星察理的翻译，被四美记录下来。从其内容可见，虽然徐继畬并非能够真正理解西方人的宗教观念，但他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的。按四美的记述，在谈到"上帝"时，徐继畬"没有一次提及，或是考虑到作为道教偶像的上帝"。但被问及西安发现的景教碑时，"他坦陈对其只有模糊的观念"，不过他还是解释了"祆"和"天"的含义。[③]

徐继畬的意见对于解决传教士们的争论有多大的作用？对此，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中国丛报》编者卫三畏在徐继畬会见四美的这篇报道后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说上一期发表的关于《瀛环志略》的书评"将会帮助外国读者了解这位杰出的作者的观点，而作为一位很受欢迎的中国学者，他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作出的评论则是很有价值的"。但接下来卫三畏指出，和徐继畬谈论宗教问题，"必须记住，即使外国人向他阐述基督教的信条，但由于对于外国人给他的译名的完整意义存在误解，他对于真正的宗教也

---

①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H. E. Sü Ki - yú and other Chinese Officer, and the Bishop of Victoria, held at Fuhchau, Dec. 7th, 1850",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247—249.

② Ibid., pp. 247—248.

③ Ibid., p. 249.

是非常缺乏完美观念的"；与他交谈的外国人"按照自己的观点阐述那些名词，而中国人则是根据其从年轻时就形成的对于神灵和信条的观念来对这些名词进行阐发"；总之，在他看来，"一个异教徒，除非得到出自《圣经》的圣灵的教导，肯定不会承认只有独一的神，而无他神；他也不会承认，他的祖先和历代圣贤崇拜的、他被教导加以崇敬和膜拜的对象，并不是神灵，而是'一无所有'。"① 卫三畏还对徐继畬回答的八点中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评论，基调是这样一位异教徒的话是无法被当作独一真神在汉语中的正确表达的。

这种评论，反映了支持美国传教士观点的卫三畏对徐继畬的一些说法的不快。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徐继畬能否帮助传教士解决重要的译名问题，而是作为圣公会香港教区主教的四美向这位《瀛环志略》作者的求助。在这个和西方的相遇造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年代，徐继畬这个人和《瀛环志略》这部书成为中西两种文明相互探询的标志，这才是我们应该加以珍视的历史记录。

三　一位先驱与一个特殊群体

如上所述，西方人对徐继畬的好评并非完全来自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欣赏和《瀛环志略》的文化价值。从以上所述及的史实来看，19 世纪 40 年代徐继畬和来华西人在福建的多次接触和往来，已经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牵连，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基于文化交流层面的相互认同感。徐继畬的名字或是"那位专使"、"福建巡抚"这样的字眼无数次出现在《中国丛报》上。在发表弼莱门的书评之前，《传教先驱》已经数次提到过徐继畬。圣公会香港教区主教四美的游记的出版，则使更多的西方读者获悉这位传奇性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进取精神、他的品格和才情。而这种与西方人的密切联系，正是《海国图志》及其作者魏源所缺乏的。

与徐继畬交往的是近代早期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未见到他与英美商人接触的记载。但商人在当时来华外国人中数量较多，徐继畬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也可能和他们有所接触。这个来华外国人群

①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H. E. Sü Ki－yú and other Chinese Officer, and the Bishop of Victoria, held at Fuhchau, Dec. 7th, 1850",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249.

体人数不多，但对近代中西关系格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仍是多数中国人戒备乃至蔑视的对象，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又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引领了西学东渐的潮流，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思想，但中国社会对于他们的传教行为和军事强权都抱有强烈的警惕甚至敌意；他们欢呼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仍被限制在通商口岸划定的狭小地域。在福建以及广东的通商口岸活动的这一群体，就是徐继畬在写作《瀛环志略》过程中交往的对象。

徐继畬后来因与外人的交往，以及在中外冲突中主张采取理性态度而遭受攻击。实际上，他所主张的是放弃那种为了某些教条而对涉外事务采取僵化态度的政策，与那些为了尽快了事而对西方人一味妥协迁就的官员迥然有别。兹举一例。1843 年底到 1844 年春，在厦门与英人商议居留地问题期间，徐继畬曾尽其所能抵制外国人的要求。据传教医生合文和坎明当时寄给《中国丛报》的通讯，“福建布政使作为专使来此地处理外国人居留地事务。因为某些未经泄漏的原因，高级当局认为选择任何地方都好于鼓浪屿，尽管他们对究竟应选何地备感困惑”，为此，英国领事记理布与中方官员进行了多次勘查，均未发现合适地点。“专使和本地官员显然也相信，没有什么地方比鼓浪屿的地点更近，交通更方便，而且更为僻静，但他们都推卸了选择鼓浪屿的责任，借口是耆英已决定，鼓浪屿必须放弃”①。从雅裨理的日记也提到这件事。他写道，徐继畬“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计划是将我们的活动范围限于厦门的几条公共街道。相反，英国领事则提出，合适的范围是前往内地一天可及的地方。这位专使逐渐睁开了他的眼睛，扩大了他的眼界，但他仍害怕将范围扩大到那位领事建议的那么大圈子，在经过一两次文书往来后，他将此事搁置如前”②。鼓浪屿后来还是成了专供外国人居留的租界，但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徐继畬对于外人的要求还是尽力加以抵制，并非一味讨好外国人而罔顾国家利益。

不过，徐继畬在对外交往中，相对于其他中国官员，的确给来华西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如上所述，他追求西方新知识态度真诚，他为了寻求准确的世界知识，不惜折节下交，与西方传教士频繁接触。这对于以往习

①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168.

② “Notice of Amoy and its inhabitants: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of the Rev. D. Abeel at Kúláng s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236.

惯见到中国官员高高在上，以对“夷狄”的蔑视和折辱为荣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印象极为深刻的。

笔者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看到一份徐继畬给英方官员的函件，时间是1846年中，具体时间未具。根据函件内容判断，收件人当为英国驻福州领事阿礼国或若逊（R. B. Jackson）。该函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在福州发生的民夷互殴事件。从函件本身无法判断事件的具体起因，但函中谈及“此案起挑之由，即系英仆独认”，可见是英人挑起事端。随后引起的争斗中，民人林森在案中被殴伤，另有丁瑞桔、周忠弼二人被枪打伤。英方受伤三人，“一为英商记连，一为米伦洋仆，一为罗巴所用黑面人”①。此外，该函还涉及随后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徐继畬此函的目的，是通报中方调查的结果，要求英方提供其受伤者之具体情形，以便在拿获的中方犯人中进行审讯定罪；同时，也要求英方提供开枪打伤华民的罪犯情况。从这封函件来看，徐继畬的态度是不亢不卑，提出要按法律办事，既未偏袒华人，亦未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对方。值得注意的是，在了解到英商记连决定离开福州回广东后，徐继畬说：

> 至商人记连欲回粤东，自缘经此危险，惊魂未定，恐以后不能相安，决然舍去。此也无怪其然。惟该商系贵国正经贸易之人，城内外生意，行中都说其好，并无怨恨之人。既经此番变故，弟已禀商督宪，添派员弁兵丁，加倍保安，似可以安心生理。弟已饬地方官再行慰留，阁下亦宜再行劝留，以全大局。②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徐继畬对于通商事宜乃至正常的中外关系的态度。他并不像当时很多官员那样，先入为主地恐夷、仇夷、厌夷，将中西正常的商业、文化交往看作被强加的负担，而是希望对这些交往加以维持和保护。我认为这种态度是符合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的，这寥寥数行字句，足以表现徐继畬先驱者的风范，和超越于同时代人的卓识。

1850年福州的“神光寺事件”，是徐继畬在对外交涉过程中遭遇到的影

---

① 徐继畬致英领事函件，抄件，英国外交部文件，《钦差暨巡理官告示内附汉官信札》，F. O. 233/185，第拾壹号。

② 同上。

响最大的事件。学术界对此事件及其对徐继畬的影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本文不必重复。这里要考察的是徐继畬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对待外人的态度和主张。他在和闽浙总督刘韵珂会衔的奏折中说，“若但以文人恐喝之词，为胁制夷人之计，非为无益，实恐有损”，这就表示了他们在处理对外事件过程中希望实事求是，而非一味盲目从众的态度。徐继畬还表示，他“当饬该管府县密谕生童，各体此意，勿再肇衅；一面故示优容，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迁移，致使露处”，这种平息事态的策略较之那种一味强硬的姿态，在并无重大民族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是更为得体的。①徐继畬在与福州绅士讨论此事件的信中，还表示“夷官入城居住，系照和约之文”②。徐继畬与刘韵珂会衔的另一份奏折，对朝廷官员和福州地方绅士纷纷引为榜样的广州反入城事件，表示不愿仿效，认为福州与广州不同，广州作为中西贸易的中心，用停止贸易的做法使英人就范，而福州“既不能以停市制其死命，而乃欲鼓涣散之民气，慑狡狯之夷情，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他们更进而指出：“窃以为百姓宜安而不宜扰，必于无事之时，先自张皇于形迹之间，效法粤省，似亦疏于计矣。”③ 很明显，徐继畬等在此事件中表现出了维护中外关系和平局面的决心，极力避免将此事件放大为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类似广州反入城斗争那样的事件。

以上两个事例，典型地体现了徐继畬的对外态度。这种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对并非从事侵略活动的外国人的善意，当为在福建乃至其他通商口岸的来华西方人所体察。实际上，五口通商初期的福建口岸，其政治氛围与战前广州有很大的不同。19 世纪 30 年代在广州活动过的雅裨理，在 1842 年后到厦门，发现这里的政治环境与前者有很大不同。当地官员乐于与外国人交往，而且态度和善。雅裨理感叹说：“如果我在新秩序建立前从未在中国生活过，我也许不会因官员们在行为举止的惊人变化而如此感动。他们现在谦恭有礼且温文尔雅，与他们从前的傲慢轻侮恰成对照。”④ 正因为如此，徐继畬才在来华西方人群体中被评论为“具有

① 《刘韵珂等奏办理英人租住神光寺一案情形及英使照会购买台湾煤炭已加拒绝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1 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8 页。

② 《何冠英等奏英人租住神光寺案士民反对而巡抚徐继畬一味畏葸折》，同上书，第 55 页。

③ 《刘韵珂等又奏碍难如绅士所请演炮募勇并不可仿效粤省禁英人入城片》，同上书，第 87 页。

④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us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p. 35. 参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 页。

自由思想”，“对外国情况了解最多”，“事业最为开阔”，等等。

在讨论来华西人与徐继畬的关系时，还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徐继畬接触较多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这一独特的群体。当美国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刊登关于徐继畬的消息时，清廷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禁令尚未正式解除。当他如饥似渴地向雅裨理等人寻求世界知识时，道光帝驰禁天主教的谕令尚未颁布。虽然传教士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来到通商口岸，基本上已无被逐之虞，但清朝上下对传教士的态度毕竟不能认为是友善的。在神光寺的问题刚刚被提出来之际，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的奏折中，在谈到租地英人时说：“况闻该夷借住该寺，意在讲经。外夷所讲之经，大半邪说，诬民惑众，关系匪浅。”① 这种言论，很可以代表当时清朝官员乃至一般百姓对传教士的观感。

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们几乎欣喜地发现，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有一个如此独特的徐继畬。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他们在其他中国官员身上看到的那种无知的自大，他所追求的知识，正是他们创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这样的机构，不惜时间和金钱，要向中国人传播的。② 不仅如此，徐继畬对于其他官员视同瘟疫的基督教，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徐继畬愉快地接受传教士送给他的基督教书籍，并且认真地阅读③，主要是为了寻求其中包含的知识性成分。但这类消息通过雅裨理日记的发表传达给西方读者，这对传教士的在华事业来说是一种很难得的激励。

让传教士们特别兴奋的是，《瀛环志略》对传教士雅裨理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弼莱门和卫三畏的两篇书评都几乎全文翻译了徐继畬的自

① 《孙铭恩奏英人租住神光寺传教请饬督抚惩办措置不善之地方官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46页。

② 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方人输入西学的情况，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早期活动研究》，第4、5章。

③ “Notice of Amoy and its inhabitants: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of the Rev. D. Abeel at Kúláng s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p. 236—237. 或许是受到徐继畬的影响，闽浙总督刘韵珂在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1846年12月21日）巡视厦门，也与当地的传教士相接触。刘韵珂“友好地”召见了美部会传教士波罗满（William J. Pohlman）等人，“并对我们的工作说了好话”，询问他们的国籍，又称这些传教士为“兄弟”。波罗满写道：“这被看作是伟大的一步。千百个人看到我们被接待，这消息不久传遍全城。没有其他外国人曾经有机会见到总督阁下。上午，他派人给我们每个人送来他的名刺，我们则送给他一本《新约》，一本中文基督教年历，以及其他书籍。这次访问或许将给我们未来的事业带来重要的益处。这样一个人将对基督教发挥多么好的影响！”（“A new Chapel needed—Chinese Officers”,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3, pp. 211—212.）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

序。《传教先驱》的编者按明显地表露出因自己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官员那里受到如此重视而非常自豪的情绪。卫三畏在评论中称赞，“徐承认从雅裨理那里得到帮助的坦率，与那位整本剽窃了斯当东（George Stauton）先生关于种牛痘的方法和益处的作者的吝啬，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照”。[①] 的确，《瀛环志略》的刊行使传教士的作用在中国读者中得到了彰显。

传教士们还认为《瀛环志略》的刊行能够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帮助他们的在华事业。如前所述，弼莱门在书评中总结《瀛环志略》的意义，其第二、三、四点分别是“接受并确认我们的年代学”、“向中国人表明了更为正确的关于不同宗教的观念”和“有利于在中国传播宗教之光”。关于此书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意义，弼莱门说，由于中国的封闭所造成的无知状态，任何能够“消除中国人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黑暗状态的作品”，都能够使“爱这个种族的人（即传教士）感到满意并得到帮助”，而《瀛环志略》就是这样的作品。[②] 他还强调，“在提到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但以理、保罗、路德、华盛顿，以及在一切人之上的世界的救主耶稣时，是那样准确并充满敬意，使用的又是数亿怀有偏见的异教徒的语言，并在他们当中流传”[③]。

由于他对《瀛环志略》的价值如此肯定，弼莱门甚至担心该书的销售价格（每部75美分）和它的大部头会影响其流传。他向徐继畬请求允许编写一个节本，并免费派送，但被徐继畬所拒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印行她的某些部分，隐去作者的名字，如果能筹到钱的话。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删节部分，不久就将使之流通”[④]。我们至今仍未看见由传教士印行的《瀛环志略》的部分内容。但弼莱门希望此书能够迅速流传的心情，在他的信里跃然纸上，反映了他对此书价值的认知。

卫三畏在他的书评里也认为“这部著作有利于激起对基督教的尊重”。他认为各国不同的宗教信仰引起徐继畬的重视，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及其相互区别，都进行了介绍。他也感叹，“在看到诺亚、亚伯拉罕、但以理、摩西、保罗和在一切人之上的救主耶稣的名字，由一位中国官员以尊敬的口气提及时，真是令人满意”[⑤]。他对书中提到的有关基督教的史

①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án Chi - 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70.

② “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6, July, 1850, p. 224.

③ Ibid.

④ Ibid. , pp. 224—225.

⑤ Ibid. , p. 193.

实也很注意，认为“北京政府的官员们一定会从中得到很好的教益，在很多他们现在依然无知的事情上得到启蒙”。虽然《瀛环志略》在这方面还有不少遗漏或错误，但卫三畏认为这无伤大雅，“而且我们不应忘记，这只是一部地理书，而非神学著作”①。他同样指出，这部著作对于在华传播关于外国事物的各种知识，以及为这些知识体提供译名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②

以上所述可以表明，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来华外国人群体，为何对徐继畲及其著作如此尊重，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

“神光寺事件”对徐继畲的仕途造成重大打击。他在官场迅速崛起的势头就此受挫，几乎一蹶不起，直到十几年后才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复出，其时已至暮年。当年与他相交往的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士，或者已经作古，或是风流云散。但他仍然是来华西方人关注的对象。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他的复出感到高兴，“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③。卫三畏在1876年返回美国之后，依然在一篇致辞中对已经辞世的徐继畲表达敬意。这篇致辞概述了徐继畲的事迹，并提到徐继畲因为在《瀛环志略》中对华盛顿的表彰，而与美国政府之间发生的那段著名的故事。④他的名著《中国总论》，将徐继畲称为中国官员中“善于思考的人”⑤。

本文只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现与徐继畲同时代的“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畲及其著作”。尽管自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徐继畲及其著作给与充分的关注，已经发表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但笔者认为，还有不少资料有待于继续发掘和研究。这其中，也包括徐继畲辞世后西方作品里关于徐继畲及其作品的资料。

（吴义雄：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① “A New Chinese Geography”, *The Missionary Herald*, Vol. 46, July, 1850, p. 193.

② Ibid, pp. 193—194.

③ ［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记忆——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④ ［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⑤ ［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7页。

从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看幕末、晚清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

任复兴

方闻称："自（松龛）先生罢官后，《瀛环志略》亦随之不多流传，而日本官民则先后翻刻数次，大有助于其维新。我国则至同治五年总署始再刻印。至光绪三十一年端方、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乃大印行。前者距书成已十八年，较日本己未翻刻迟七年，较文久辛酉刻版，亦迟五年。而光绪三十一年印行，较书之初版，竟迟达五十有七年之久，时不我与，以致中国一切落后，是岂先生一人之不幸，可胜叹哉！"①

所称已未版，未见他人介绍；1861 年日本翻刻《瀛环志略》文久辛酉版，也叫对嵋阁本，笔者得到方闻赠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已经 21 年，今夏又从内地购得一套原版本，爱不释手，描述如下：

十卷十册，精写刻本，皮纸刷印。半框高 200 毫米，宽 147 毫米，全书高 258 毫米，宽 182 毫米。

封面用明黄厚纸，压有满面万字不到头暗白底纹。

内封：上部，文久辛酉仲秋新刊；中间，瀛环志略；右侧，徐继畬著，江上春洋、森荻园、三守柳圃训点；左侧，阿阳对嵋阁藏梓。

全书地图数量如汉刻本，由铃江贯中、渡边广芳临。铃江贯中临彩色地球图两幅，赤道直径 274 毫米，用四色彩印，如东半球图，亚洲用粉红色，非洲用米黄色，欧洲、澳洲用绿色，大洋用淡蓝色。铃江贯中临亚细亚图，改正了徐继畬原图日本、琉球相对于亚洲大陆的错误方位。

---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21 页。

内文地名、人名，在行右标注日文，在行左标注英文；内文中国年号，在行右标注汉字日本年号。

这一日刻本《瀛环志略》，在印刷和装帧的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同期同名的中国版本。

此书透露出的信息，一是日本人士善于吸收、超越他国造纸、印刷技术，二是幕末志士仁人勇敢突破了江户幕府实行二百多年的锁国令和禁止基督教书籍输入政策，突破了朱熹宣扬的华夷观念等思想禁忌，而中国的华夷思想却至今未得到彻底清理，投胎转生到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中。

一　锁国与禁书

16 世纪中叶起，葡、西、荷等西欧列强先后到日本传教、贸易，为禁止天主教传播，防止商人富豪与幕府对立，巩固幕藩体制，江户幕府1633—1639 年先后发布五次关于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锁国令，禁止奉书船（持有幕府老中出海证书的船）以外的日本船只出海，严禁天主教，只准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至长崎贸易等。日本维持锁国体制达二百多年之久，直到 1853 年在美国炮舰政策压力下才重新开放。锁国期间同中国、荷兰和朝鲜保持一定贸易关系。日本（有的经过琉球）与中国贸易中获得丝绸、毛织品、书籍、高级消费品和武器。这种贸易完全由幕府垄断，在经济上可以加强对地方封建领主的控制。荷兰主要信奉新教，向幕府保证不传教，舶来商品有丝织品、棉织品、药品、钟表、砂糖、欧洲工艺品等。日本出口商品主要是鱼翅等海产品。

禁书与书籍检查是锁国令的重要部分。严禁有关基督教义之说的书籍入境，首先搞清舶载书籍中是否有涉及基督教的内容，然后才允许与此无关的书籍入境。由于书籍输入的手续比一般商品复杂，幕府特地在长崎奉行属下设有“书物改役”一职。禁书，也就是违反禁止输入之令的书籍。现藏长崎市立博物馆的《圣堂文书》，是原由向井兼德保管的长崎圣堂遗物中的文件。向井兼德是曾任圣堂祭主及书物改役之职的向井家的后代。因此，这些文件虽被命名为圣堂文书，其内容实为书籍检查文献。据学者研究和该文献记载，宽永七年（1630）起，任圣堂祭主及书物改役之职的向井家曾严格禁毁唐船持渡耶稣会士著作，以及中国

人著述中涉及天主教的书数十种。贞享年以后禁书政策渐趋弛缓。《通航一览》记载，对“西洋人著述禁书”明末李之藻编“《天学初函》一部二套十六本”，“据享保五年规定，其中《圜容较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通编》、《交友论》、《泰西水法》等西洋人著述之书，如不记邪法教化之言，不予禁止。其后，上述十一种相继传来，因未发现邪教教化之事，故允其市售。另《西学凡》等《天学初函》所辑之书（七种），以及《弥撒祭义》、《代疑篇》、《天主实义》等十八种严禁入境。……《寰有诠》，此书贞享二乙丑年（1685）十一番唐船携来，烧毁。……《福建通志》，此书贞享三丙寅年十二番船携来，烧毁。……《帝都景物略》，此书元禄八乙亥年（1695）十六番船携来，涂抹。……以上四十九种书籍中，十一种允许携来，三十八种严禁。此目录乃圣堂检查纪录有载。”对市场发现的违禁书籍也加以焚毁。书物改役能从这种文化垄断检查特权中获利，直到1853年佩理来航前后，仍较严格地实行。①

二 《瀛环志略》被查和放行

通过长崎一港输入的书籍无一例外地经过检查，导致了大意书以及书籍元帐、入札帐等直接与输入业务有关的帐簿的制成。《圣堂文书》第三七〇至三四二页记录了幕末《瀛环志略》进口日本情况：

“请示报告：

一《瀛环志略》（未三番船持渡），二部各一套六本；

一《浪迹丛谈》（同上），一部二套八本。

上列二书中，均略有涉及耶稣教之处。因其为新来之书，是否可将其写入大意书中，抑或一如前制，用墨涂消或是焚毁？其中《瀛环志略》，乃曾作为蕃书调所御用书而订，故一部可作例外呈上，而所剩一部及《浪迹丛谈》，又当如何处置？谨请赐示。”

从纸质、笔迹考虑，这一文书作于幕末期间，是书物改役向奉行请求指示的信件。由于文书中有蕃书调所之名，可以大致判断出文书的制

① ［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5页。

作时间。幕府于安政二年设立洋学所，翌年改称蕃书调所，文久二年又改称洋书调所，最后又称开成所。因此，这一文书应作于安政三年至文久元年的六年之间，而安政六年即为己未年，因此这一文书当作于安政六年。

作为安政六年的有关资料，现九州大学九州文化史研究所元山文库旧藏《村上文书》中《书籍类落札帐》中的一五五页反面至一八二页就是安政六年未六月的落札帐：

> 安政六年未六月廿五日、六日验货。
> 未壹番船、三番船书籍于六月晦日至七月朔日在会所投标完毕
> 一《瀛环志略》，贰部。
> 五十匁九分　书店
> 四十三匁五分　书店
> 二十四匁九分　岛屋
> 一《浪迹丛谈》，三部。
> 二十二匁六分　书店
> 十八匁六分　纸店
> 十三匁六分　岛屋

这份文书上注有竞标后的书价。其中《瀛环志略》为二部，其数量与《圣堂文书》中记载的一致；《浪迹丛谈》共三部，比《圣堂文书》记录的多了二部，这两部书也许是未一番船带来的。

由于此书记述了海外诸国天主、耶稣等教，所以与先期输入的《海国图志》一样有违禁的嫌疑。《浪迹丛谈》为梁章钜所撰，是部随笔集，卷五中有天主教项目，简单记写了明末以来基督教布教情况、仪式、教义内容。问题也许就出在这一部分。但此书最终未被列为禁书而进入了投标竞价。大庭修认为，这是“由于书物改役已有了嘉永五年《海国图志》不被列入禁书的经验，所以事先又去征求了一下奉行的意思。通过这一条不起眼的资料，我们不难看到在幕末禁书检查制度已逐步丧失实际意义”。他还记载：“《瀛环志略》十卷，清徐继畬撰。由井上春洋、森蔌园、三守柳圃加训点，阿波德岛的小西吉兵卫、宫岛屋伊左卫门的刊本出版于文久元

年（1861）。”[①]

《海国图志》由嘉永四年（1851）的亥二番船首次输入日本。该船的书籍元帐中还有亥四番船、子一番船的书籍目录，此帐或许作于嘉永五年（壬子）的五月。这次持渡的《海国图志》共三部各六套，原价一百三十目。同账新渡项目下有这样的注记：“此行之书似有违禁字句，向井外记就此事前往奉行所征询处置意见，遂奉命全部送呈备查。壬子十一月十八日，向井外记交涉此事的信件，附在相关文牍中。”

文中“此行”意为这一项目，向井外记即当时的书物改役向井兼哲。他按旧例检查书籍并作大意书，由于书中写有属于查禁之列的西洋事情，故报告奉行所请求指示，并将全部书籍收纳于奉行所，同时将无现书可卖的情况通知负责贸易的官员。这三套书后来分别为御文库、学问所和老中牧野备前守所得。嘉永七年，《海国图志》卷首“筹海编”二册及“墨利加洲”二册由山县教授江户盐谷世弘训点、津山箕作庠西标注洋音出版。此书是奉川路圣谟之命翻刻的。盐谷、箕作于安政二年乙卯八月刊行了“俄罗斯国部”二册，“英吉利国部”三册刊行于安政三年丙辰八月，还刊行了“普鲁庄国部”一册，刊年不详。又有赖三树三郎于安政四年丁巳年刊行了其中的“印度国部”。魏书1847年刊本在1851年输入日本，1852年应当传到江户，1854年就出现了和刻本。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佩理在1853年叩开日本国门，所以“墨利加洲”部首先被翻刊。此书首次传到日本时还被书物改役向井外记视为禁书并征询如何处理，但在三年之后，就被翻刻了。如此迅速的翻刻速度，真实地反映了幕府末期国际形势的紧迫。[②]

邹振环认为，日本开始对近代西学的接受也是借助中国这一中介的，即使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仍然是通过阅读汉译西书来了解西方文化的。在地理学的领域中同样如此。“日本幕府末期的著名洋学家柳河春三在1861年出版的汉文本《横滨繁昌记》中，有“舶来书籍”一节，其中介绍的近刊汉文西书有《谈天》、《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博物新编》、《重学浅说》、《智环启蒙》、《全体新论》、

① ［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78页。

② 同上书，第373—374页。

《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妇婴新说》，西方地理学方面的有《瀛环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说略》、《联邦志略》，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上海新闻》等杂志。[1]

三　辛酉版对徐书的删改

在和刻文久辛酉版问世前，汉刻《瀛环志略》只有福州道光戊申版和福州道光庚戌版两种印本，庚戌版是对戊申原版作了极个别改动后印刷的，增加了刘鸿翱序。从辛酉版载有刘鸿翱序分析，依据的底本可能是道光庚戌版《瀛环志略》，但不能肯定，只能笼统地称为福州版。在华夷观念作祟、禁书令未解除情况下，辛酉版的训点出版者，将福州汉刻本涉及基督教的内容，无论是徐氏的论述，还是他引用别的典籍的字句，均予以严厉删改。

福州版最早出现"天主"、"耶稣"等字样在卷二：

"又黄毅轩（可垂）《吕宋纪略》云：'干丝蚋在海西北隅，地多产金银……闽海之东南数千里，即吕宋在焉……前明时，干丝蚋据其国，设巴礼院（即天主教），行礼拜之教。巴礼者，番僧也（天主教之师）。以濂水为令，不祀先祖。所奉之神，惟六嗙氏而已（即耶稣）。濂水者，以巴礼王（即罗马教王）之尸，煎为脂膏。将奉教之时，令人自誓其身为六嗙氏所出。巴礼将脂水滴其头，故曰濂水。'余按……吕宋稍远，西班牙以诡谋取之，倚为外府者，数百年矣。陈、黄两书所记，大半皆天主教规，乃西班牙本国之俗。"（道光戊申版《瀛环志略》卷二，第6b—7b页）

辛酉版改为：

"又黄毅轩（可垂）《吕宋纪略》云：'干丝蚋在海西北隅，地多产金银……闽海之东南数千里，即吕宋在焉……前明时，干丝蚋据其国，设巴礼院（即洋教），行礼拜之教。巴礼者，番僧也（洋教师）。以濂水为令，不祀先祖。所奉之神，惟教祖而已。濂水者，以巴礼王（即洋教王）之尸，煎为脂膏。将奉教之时，令人自誓其身为教祖所出。巴礼将脂水滴其头，故曰濂水。'余按……吕宋稍远，西班牙以诡谋取之，倚为外府者，数百年矣。陈、黄两书所记，大半皆洋教规，乃西班牙本国之俗。"（文久

① 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辛酉版《瀛环志略》卷二，第4b—5b页）

“天主教”、“罗马教”均改为“洋教”，删除“耶稣”字样。

对福州版《瀛环志略》卷六《意大里亚列国》后面集中介绍基督教简史的部分，辛酉版伤筋动骨，全部删除。从福州版页37b第9行，至页39b第10行上半行，一字不剩，共删除4页另1.5行，即41.5行，约1100字。

辛酉版对福州版卷六《意大里亚列国》末尾介绍欧洲各国基督教流行情况，部分保留，并作删改。

福州版为：

今欧罗巴从天主教者，曰意大里亚，曰佛郎西，曰比利时，曰西班牙，曰葡萄牙；从耶稣教者，曰英吉利，曰荷兰，曰嗹国，曰瑞国，曰普鲁士，曰米利坚。此外，两教参杂者，曰奥地利，曰日耳曼列国。天主教规，立十字架，作铜人，肖耶稣被钉受难之形。旁有女人像，肖耶稣之母马利亚。耶稣教不设十字架，不肖像，其余七日礼拜安息之类，皆从同。又别有希腊教者，亦天主教别派，额里士、峨罗斯尚之，与两教教规又不同。近泰西人称天主教为公教，称路得等教为修教。余谓，耶稣之立教，以救世也。乃诸国因分教之故，而残杀不已。耶稣而有知也，其谓之何？（道光戊申版《瀛环志略》卷六，第39b—40a页）

辛酉版删改为：

今欧罗巴从洋教者，曰意大里亚，曰佛郎西，曰比利时，曰西班牙，曰葡萄牙；从西教者，曰英吉利，曰荷兰，曰嗹国，曰瑞国，曰普鲁士，曰米利坚。此外，两教参杂者，曰奥地利，曰日耳曼列国。又别有希腊教者，亦洋教别派，额里士、峨罗斯尚之，与两教教规又不同。近泰西人称洋教为公教，称路得等教为修教。余谓，立教，以救世也。乃诸国因分教之故，而残杀不已。教祖而有知也，其谓之何？（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卷六，第34页）

其中整句删除：“天主教规，立十字架，作铜人，肖耶稣被钉受难之形。旁有女人像，肖耶稣之母马利亚。耶稣教不设十字架，不肖像，其余七日礼拜安息之类，皆从同。”“天主教”均改为“洋教”，“耶稣教”均改为“西教”，“耶稣”一词，有的删除，有的改为“教主”。

四 日刻《瀛环志略》整本和《海图图志》节录本回流中国

一个多世纪以来，日刻《瀛环志略》整本和《海图图志》节录本等世界地理著作资料，部分回流中国，流传于民间的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近年还偶尔出现在拍卖市场，笔者今年夏天是从古籍爱好者手中买的。收藏于图书馆的，据王勇著《中国馆藏和刻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载：

> 史部·地理类（五）外纪
> 《瀛环志略》十卷
> [清] 徐继畬撰 [日] 井上春洋等训点
> 日本文久元年（1861）阿阳对嵋阁刻本
> 北大、人大、上海师大、天津、南京、南大、天一、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北京分馆
> 《 咭唎纪略》一卷
> [清] 陈逢衡撰 [日] 荒木謇之进训点
> 日本嘉永六年（1853）津潘荒木氏采兰书屋刻本
> 《海国图志墨利加洲部》八卷
> [清] 魏源撰
> 日本嘉永七年（1854）刻本
> 大连
> 《海国图志墨利加洲部》八卷
> [清] 魏源撰
> 日本刻本
> 辽宁
> 《欧北五国志》不分卷
> [清] 林则徐译 魏源重辑
> 日本刻本
> 南京

以上著录显示，内地收藏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的有十六个图书馆，收藏日刻《海国图志》节录本的有三个图书馆。这些数据，有助于了解这两种书的发行量。

五　日本摒弃华夷观念

从辛酉版对福州版《瀛环志略》的删改看，当时日本思想界比中国对西方基督教更不宽容，但这只是暂时表面现象，日本思想界骨子里发生了变化——迅速摒弃了主张严格区别华夷名分的朱子学，实现了攘夷论与开国论的接近和融合。

在回应西方军事、政治的挑战上，日本比“天朝”更优秀，更有学理。围绕与美国签订的通商条约问题，日本国民展开开国论与攘夷论的激烈争辩。远山茂树分析说：“欧美列强的压力和号称‘中华’的中国的战败，促进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儒学，尤其是主张严格区别华夷名分的朱子学的崩溃。”这对朱学在中国的生存能力估计过低。他接着分析：“从华夷思想转化为开国思想上，日本比中国、朝鲜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江户时代的日本本来并未隶属于中国宗主权之下，因而所受以中国为‘中华’的华夷思想的束缚比较轻。中国因为实际上同周围各民族保有宗属关系，尽管洋务派得势，统治阶层的华夷思想总的来说是凭惰性延续着；在朝鲜，由于长期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李朝后期试图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小中华论，在两班的上层中还很强烈；而日本则不同。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受培里来航的直接外部压力比中国晚了十多年，统治阶层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尽管不很充分，却有对付它的余裕。他们中的先觉者很快就从以文化道德的优劣来在名分上区别华夷内外的国际观，转变到以实力的征服或被征服的弱肉强食的国际观上来，从而得以为了海防，为了对抗欧美、征服邻近诸国，主张吸取西洋技术文明，以及为了了解敌国情况，为了争取充实武备的时间主张战略开国论等形式，从锁国思想一点点地转向开国思想了。尽管在幕府末期的政局中，攘夷派与开国派表面上斗争得很激烈，但开国论和攘夷论的接近和融合，却比中国和朝鲜都更顺利地实现了。这就形成日本近

代化的特点。"[1] 这是回应西方挑战的优等生的经验之谈，对"中华"这个差等生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

输入日本的徐继畲和魏源的著作，在介绍世界情况上有相似作用，在华夷观念的取舍上却大异其趣，对日本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自有不同。

如潘振平所言，《海国图志》是一部未及精雕细琢的资料集，而《瀛环志略》是一部精心编撰的著作，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2]。但是，二者根本差别，却在于是否突破了华夷观念。魏源不隐讳自己宗旨："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三大主义"决非掩饰之词。《圣武记》的书名更马屁味十足。后世中国人多忽略魏所称"制夷"的真确意思，他津津乐道的道光初年犁庭扫穴、午门受俘的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就是生动、切近的注释。魏源以"三大主义"组织全书材料，是坚信天朝可以弘扬圣武于海国，"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总有一天会将"罪万准夷"的洋夷酋押到京城，献俘太庙，皇帝于午门城楼隆重受俘，然后寸磔枭示。徐继畲对华夷观念的突破及魏源的天朝理念，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徐继畲》及拙文《徐继畲与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变》等有所论述。从学理上说，继畲父亲徐润第扎硬寨打死仗，与朱学较真，借鉴西方天文学，熔心学、易学、气学于一炉，根本否定执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牛耳达六七百年，存理灭欲、华夷内外、奴化教育的朱熹理学，拒绝嗣孔孟，辟异端，倡导心灵自由、特立独行、与天为徒的空灵法界。继畲将其父遗作编为《敦艮斋遗书》，与《瀛环志略》同时刊刻于福州。这种宽容精神已经浸透到他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中。

摒弃魏源鼓吹的朱熹攘夷制夷学说，从伊藤博文可见一斑。伊藤博文原来是狂热的尊王攘夷派，1862 年参与过火烧英国公使馆。1863 年，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五人，为了实现魏源提倡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去英国留学，在西方仅一年多，思想却为之一变，抛弃锁国攘夷的偏见，转而以开国进取为国是。因长州藩发生炮击英、法等国商船事件，1864 年伊

---

① ［日］远山茂树著：《日本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6—7 页。

② 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任复兴主编的《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9 页。

藤、井上毅然回国，拜访英国公使阿礼国，自荐回长州劝说藩主，改变攘夷国策，阿礼国表示同意，但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长州藩大败。伊藤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开明风气”移入日本。维新后主持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日本式君主立宪制。后来伊藤回忆：“开始我也主张攘夷论，考察欧洲形势后，见其先进之文化，方察不可攘夷。”①

日本志士仁人不仅迅速摒弃了魏源鼓吹的朱熹华夷思想，转向开国，而且对魏源的谬误进行了文字的批评。

1879年，阿波冈本著二十卷本《万国史记》定稿，此书仿照《瀛环志略》体例，而且与徐继畬一样，以“地形如球”四字开篇。日本学贯东西的著名汉学家重野安绎为之作序，序文用多半篇幅批评魏源的华夷观念即中国中心观：“吾每阅汉土史乘，至所谓外国传、异域志，未尝不叹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虽强大轶己者，不夷狄视之，则藩属待之。其政治得失，不相关焉。国势强弱，不相问焉。彼为彼，我为我。其所以自大，即其所以自小。近时有魏默深者，好论海防，能通天下之故。然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夫大瀛环何往而不然。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彼虽国大，不过方数万里，寝处乎方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目为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井蛙之见耳。默深以达识者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则其他可知已。（冈本）子博我魏默深而《万国史记》其《海国图志》也，而体制之得宜，命名之不谬如此……是此书开卷第一义也。……明治己卯五月下浣成斋重野安绎撰。”

六　华夷观念投胎中国狭隘民族主义

上文提到的伊藤拜访过的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1840年代任福州领事时，曾为徐继畬著《瀛环志略》提供过帮助，1859—1865年为驻日本公使，有《大君的首都》（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两卷，1863）等关于日本的书。1865—1871年为驻华公使。据

① 李玉：《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明治维新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8页。

赫德日记，阿礼国1865年11月到了天津，同年圣诞节各国公使在法国使馆举行晚宴，迎接新到北京的阿礼国爵士。可见他比被特旨召回北京的徐继畬晚到京。故友重逢，话语必多，阿礼国不会不谈到日本受到西方冲击后“发愤为雄”的新闻。

直到20世纪末才有美国学者隐约发现，在1866—1867年的冬天，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台了一个实在大胆的改革方案——创建同文馆天文算学馆，但这一方案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是一次受到挫折的变法。[①] 不过这些学者仍忽略了此次变法中的灵魂人物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对办学目标未能明确揭示。

简言之，这次变法的理论前提是“古今一大变局”的理论，变局之下的变法，使中国进入以西方知识为灵感的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这次变法的目标，是在办学校的名义下悄悄进行官制、政制的改革，计划创建的名义上叫做“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高级文官摇篮，可以说是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和各省督抚藩臬后备官员培训学校，变法将调整以朱学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八股文为程式的科举制度，将储才之所翰林院纳入西学体制，培养有环球视野的、了然世界大势的、有一定天文算学知识的、能进行数理逻辑思维的年轻政治通才，为高级官员大换血做准备，用西学之人行自强新政，使西学官员三五年后尽快补缺，担当栋梁重任，以适应“古今一大变局”，“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的不测之变。变法依据的祖制和“典范”，是和西方耶稣会士一起研习天文算学，委任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正的康熙皇帝；变法树立的“矜式”，是现代首批外交官之一、为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口岸作出贡献的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徐继畬；变法的“指南”，是徐继畬辑著的东方第一部系统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也可以说，这是先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治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总署奏折称：“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且西人之术，我圣主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宜

---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8页；刘广京：《变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馆争议》，《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03—418页。

数典而忘。……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蕲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①] 众所周知，坚守朱学的倭仁策动一批御史和守旧官僚，在慈禧支持下挫败了这次变法。但同文馆在徐继畬等斩荆劈莽下，仍不失为中国第一所现代范式的高等学校。

对于中日在学习西方上的差异，加拿大学者诺曼有裁判：日本"最热心的荷兰学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他们遭到了无数的障碍：自习方法的完全欠缺、书籍的稀少、正统派儒家的偏见、当局的迫害、甚至排外狂者的暗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佐久间象山、渡边毕山、高野长英、吉田松阴等有胆识的人物，为了学习西方知识以适用于日本的情况而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一直活到明治时代的那些后起之秀，同他们的前辈一样，都是贫穷的武士和浪人，他们曾经充分地领略到幕府的高压手段，而又习知海外发展的大势，因此特别适合于在推翻幕府和树立新政权之际发挥领导作用。德川末期的日本和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在于此。在中国，当政的官僚阶级是通过科举制度，主要从士大夫阶级中选授的，因而其处世观是文人的。这个士大夫阶级已经成为儒教正统派的小心翼翼的保护人，对于正统的顺从乃是进身官僚阶级的枢键。他们无视或轻视西方文明的一切表现，那种文明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对中国表现成为最恶劣的一种商业上的贪婪和军事上的傲慢的混合物。中国文人的态度概括在 1793 年乾隆皇帝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勋爵的著名的复文中：'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清朝和幕府对于任何染有西方（应理解为基督教）色彩的新学问都显出极为顽固的偏见；它们双方对于会侵犯到官僚统治阶级（在中国为文人，在日本为武士）的特权的任何根本改革都严加反对。可是，在日本，具有军人的见解、顽强国粹主义和明治维新时期（1867—1868）的成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1—933 页。

功的领导地位的下级武士，靠了采纳曾经给予西方列国以应付‘落后’国家的优越力量的那套工业技术和必要的制度供本国之用，方得挽救日本未蹈中国的覆辙。中国的行政官，不同于对幕府政权已存二心且其抱负又已为德川的阶级身份制所阻隔的那种武士官僚，这些儒教的文人，却仍浸淫于古制而不能自拔，致对任何远大的改革都踟蹰不前。这个官僚阶级毫无疑问地曾经力图将那套芜杂的行政机构加以修缀补苴，直至其土崩瓦解，而身陷其中，以致同归于尽而后已。但是这种改革和嗣后的改造却晚于日本七十余年。中国将这时牢牢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打破得太晚了，它挣脱由于这种外国主宰而加重了的国内社会衰颓的时机也太晚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差异是在于下述事实：日本封建制度的崩溃解放了由武士所领导各种潜在的社会势力，使武士在町人的支持下，乘着农民暴动的浪潮，得以在国家独立未受到不可救药的削弱之前，打倒了幕府并树立起新政权。在中国，西方列强的干涉势力以及官僚统治集团的全力以赴竟将一切反叛和社会改革的企图压制了下去，以致国家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不得不再羁延几十年。”①

诺曼的分析与远山茂树颇为接近。方闻的慨叹，与诺曼相同。

在义和团的排外运动中，天朝朝贡国体制轰然崩塌，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念却投胎到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中再生。不必说那些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近代史论著，更不必说与倭仁同唱一个调的愤青，就连有的以思想解放著称的学者，在清理华夷观念这份腐臭遗产时，反省精神甚至也不能与百年前的重野安绎等日本学者比。比如袁伟时在《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中，认为满口“夷”字的魏源率先抛弃了华夷观念：“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最早站出来批判这个陈腐观念的就是魏源。……魏源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如此深刻的见解表明什么呢？一是他比较彻底地抛弃了自我封闭的华夷观念，而把传统文化中尊重别人和博采众长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袁书仍无批判地、频繁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浸透着华夷观念的病态口号，甚至说“‘师夷长技’可以同不同的指导思想结合。”全书第四部分大标题是“经世致用思潮与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还

① ［加拿大］诺曼著，姚曾廙译：《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33页。

有“通向‘师夷长技’之路”、“师夷长技和改革社会运行机制”的小标题。[①] 这就与魏源陷入同样自相矛盾的窘境。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像徐继畲一样，将书面的、口头的“夷”字统统删除。[②]

（任复兴：原忻州日报高级记者、徐继畲研究会会长）

---

①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目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5页。

② 任复兴：《〈瀛环志略〉若干稿本初探》，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纪念先知先觉的乡贤徐松龛先生

原馥庭

徐松龛先生名继畬，五台县人。其遗著《瀛寰志略》，台北市商务印书馆出版，系方彦光先生1946年友人所赠。《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系方彦光先生编，1982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徐广轩先生《敦艮斋遗书》，系方彦光先生收藏，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台北市“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山右丛书》中有《松龛先生全集》。

台北近年出版之古籍，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山西先贤《元遗山笺注》，司马光《涑水纪闻》，王通《中说》、《元经》、《王文中子研究》、《文中子考信录》，《傅青主年谱》，《柳宗元文集》，《薛文清公（薛瑄）文集》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山西府州县志甚多，系抗日战争时“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所收集者，日本投降时交南京国民政府。

美国著名之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籍甚多，如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三四十万册。其中有线装书徐广轩《敦艮斋遗书》、民国初年的山西《人民须知》、《六政三事》、《山右丛书》等。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书籍颇富。

百余年来，英、法、德、意、日、荷兰等国重视“汉学”，设有“汉学院、系”，也有著名的汉学家。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现有著名汉学家千余人，亦有专科学者。1924年印度泰戈尔曾到山西考察中国文化，并派人深入农村考察民间文化。

徐松龛先生一百六十年前所著《瀛寰志略》，首先介绍世界形势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期望清代认识中国的环境，挽救危局。其见广思危，履霜知冰，对中国维新与革命，抵抗列强瓜分，多次渡过被灭亡的难关，影响远大，可谓先知先觉者。

清咸丰三年（1853），浙江宁波耶稣教会赠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中的中文碑文称："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著《瀛寰志略》云：'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选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为人杰矣哉。……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徐松龛先生推崇华盛顿天下为公，民主选举，有如中国尧舜帝位传贤，不以天下为私，足以先后媲美。现代世界所行之民主选举多有名无实，学者以为"美国现在是资本专政的时代"，美国竞选国会议员，一人的竞选费达七千万美元，由财团资助，名为"政治献金"，但财团岂肯白助白捐。日本竞选国会议员，二十年前已是"五当三落"，有五亿日元的竞选费才有希望当选。因此，学者叹曰："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912 年孙中山先生在太原演讲说："欧美资本专制已成而始为之计，则其难不啻倍蓰。美国大总统某氏曾恶资本专制，以大总统之力抵制之，卒未有效。其专制较政府为尤烈。我国何可不预为防之，机会却不可失。"孙中山先生当时又说："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制造新武器，供应全国扩张武备之用。开采煤铁，利用外资外力，为成功之捷径，不必十分排斥外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民为主，以民意为重，是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现在虽然是民主时代，施行民主选举，但弊端尚多，而且极为严重。许多国家仅有民主之名，党派林立，争权夺利，政治紊乱，社会不安，民生疾苦，加之外力介入，成为他国侵略的对象。中国近百年内，曾经直接民选村长、乡长，因系义务职，既劳心力，而且贴钱，无人竞选，近似纯洁的民主。

现在时代不同，各国国情不同，处境亦不同。吾国如何建立长治久安的民主政治，应取各国之长，舍各国之短，不忽视时代，不盲目追求潮流，公私兼顾，不偏不执，似需政治家，科学家深思熟虑，尽心竭力，为国家长久大计而奉献。

1895 年清政府割让台湾，日本侵占五十年，残杀同胞，掠夺资源，消

灭文化；幸有私塾，维持国学，受教者能文能诗。清乾隆四年（1739）太原杨二酉任巡视台湾御史，首先创立台南书院，培育人才，奠定文化基础。《马关条约》签订时曾赋诗一首，流传于台湾，文曰："万顷云涛立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闻，舟人那知伤心地，惟指前程是马关。"在台同胞，永念国耻，身居海岛，心怀故乡。

国家由贫而富，由弱而强，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绝大的生命牺牲创造而成的。今日感念徐继畬先生先知先觉，为国人介绍世界，也感谢百年来历尽苦难屈辱的先贤领袖及无数同胞的牺牲奉献。当珍惜得来不易的成就，自强不息，己立立人，己裕裕人，振兴中国，造福人类。

附：徐继畬（松龛）先生大事纪要

徐继畬（松龛）先生大事纪要

乾隆六十年（1795）生，父徐润第（广轩）。

道光六年（1826）进士。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江南道监察。

道光十六年（1836）任陕西道御史。七月任广西浔州知府。

道光十七年（1837），秋，调福建延建邵道。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调福建汀漳龙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任广东按察使，九月任福建布政使。

道光二十四年（1844），《瀛寰考略》初稿完成。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任广西巡抚，赴京请训，途经杭州，奉命"改任福建巡抚，勿来京"，即返福建，1847年二月接任巡抚。七月兼署闽浙总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在福建出版。

咸丰元年（1851），三月，清帝召见，因被诬告媚外，降调太仆寺少卿。

咸丰二年（1852），秋，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因福建任内起解犯官迟延，遭免职。四川乡试毕，即返故里。

咸丰四年（1854），三月，督办潞泽辽防务，堵太平天国洪秀全军，至次年八月事毕，归里。

咸丰六年（1856），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

咸丰九年（1859），日本出版《瀛寰志略》。

同治四年（1865），十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冬授太仆寺卿。

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出版《瀛寰志略》。
同治六年（1867），二月，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同治八年（1869），老病请辞，归里。
同治十二年（1837）卒，享年七十有九。

（原馥庭：台北《山西文献》总发行人）

徐继畬与台湾

席涵静

一　前言

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道光六年（1826）进士，旋被选为庶吉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福建巡抚，咸丰二年（1852）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同治六年（1867）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同治十二年（1873）卒，享年78岁。

台湾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入清朝版图，即归福建省管辖，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彰化县、嘉义县、淡水厅、澎湖厅、葛玛兰厅，即一府四县三厅。直至清光绪十二年（1886）台湾始设省，脱离福建省，故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同治五年（1866）间有关台湾之事务咸由徐继畬以奏折（题本）呈报朝廷。

依据《徐继畬全集》第3、4集，共收录徐氏之奏折、题本共855则，其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同治五年（1866）奏折有465则、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咸丰元年（1851）之题本共390则。依明朝的制度：臣末章疏，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清朝则例行之事用题本，紧要之事用奏折，清末则废题本，专用奏折。另外徐氏奏折中附录同文馆事务、福州神光寺案等，因与台湾无关，故不计算在内。

二　徐继畬与台湾有关之奏折

就徐氏855奏折中有关台湾者计有87则，其中最多者为奏报台湾粮价，计有31则之多，足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徐继畬都很关心台湾的民生

问题；次多者为台湾各县、厅发生之刑案，徐氏则据实详述，一一奏报，计有 17 则；另有台湾造船银两拨发问题，亦有 17 则，刑案为台湾内部社会问题，而修造船只是指水师战船，是国防问题，由是可知皇帝与徐继畬对台湾关切的程度。第四类是军需粮饷拨发的问题，包括台风吹沉船只粮饷的补发、军需粮饷的报销等计有 10 则。第五类为人事升迁问题，计有 11 则。第六类是转达上峰的政策，防范英人觊觎台湾。现依序分析在下。

1. 台湾社会治安问题

台湾一府四县三厅，当时人口稀少，在人口聚集的城镇中仍常有刑案发生，刑案大多是杀人越货、追逃欠债未遂伤人致死等。徐氏奏折中有关台湾治安者 18 则，台湾县、嘉义县、淡水厅均有之，嘉义县多达 12 则。按嘉义县位居台湾中部，系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诸罗县民协同官兵，抵抗林爽文叛乱有功，蒙皇帝赐名“嘉义”县，清季县内有北港溪可供航行，大陆商船常入碇北港贸易，故北港成为嘉义县治。

由徐氏奏折中可知：刑案发生后首先由该地地保率事主向县衙报案，一面由刑仵首勘验，然后呈县府，再转呈知府，再转呈福建巡抚徐继畬，再由徐氏等因奉此一番后上呈军机处或朝廷。故奏折多繁复，少则四五百字，多则洋洋洒洒数千字。且隔海传送，风汛阻滞，公文有延误半年以上者。台湾发生的刑案大都能缉获凶手，并将凶手判刑，如“绞监候”、“斩立决”等。

2. 台湾的粮价问题

台湾稻米一年三熟，有如谷仓，清代朝廷至为重视，屡令福建巡抚徐继畬按期申报。徐氏有关台湾奏折中呈报台湾粮价者 31 则，以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呈报之粮价为例：米分上米，每仓石 2 两 1 钱；中米，1 两 9 钱；下米，1 两 7 钱。奏折中常有与福建各地米价合并奏报者，如“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奏报闽省内地各属本年九月并台湾三、四月粮价等情折”。奏折云：“台湾府署三、四月份上、中米价较上月稍减，三月份下米较二月略增，四月份下米与三月份相同。”又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月二十八日奏报台湾上年十一月份粮价等情折云：“台湾府上年（即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份粮价与上年十月份相同，地方绥静，民气安恬，堪以仰慰圣怀。”

徐氏奏折中奏报台湾米价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终于咸丰元年（1851），共计31则。每折中都附有粮价清单，将福建省各府及台湾府之粮价并列呈报，但奏折末了均有“地方绥靖，民气安恬，堪以仰慰圣怀”等语。奏折或呈军机处，或直达天听，有时御批：“知道了！”

3. 奏报台湾厂修造战船动支银两问题

台湾孤悬大海，为求安全，亟应发展水师，而水师无船舰则无法发挥其实力。反观泰西之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早于15世纪即开始大量制造舶，开展海外贸易，并建立海军，拓展海外殖民，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492）哥伦布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西方海上霸权触角逐渐伸向东方，如葡萄牙人窃占澳门、英人屡次进窥我粤、闽、台等地区，故实有加强海防之必要。徐继畬奏折中提到修造战船费用500两以上须向皇帝奏明，故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二十九日提到：台湾协标右营济字9号、10号，澎湖右营巩字1号、2号，澎湖左营绥字13号等战船均需修理，总共用银2500两，故徐氏循例呈报。又例如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一日奏折中提到：台湾协标中营平字2号大同安梭船一只，顺字4号大船、以及艋舺营济字13号船等大修之工料费按实报销，会同闽浙总督臣裕泰恭折具奏。又例如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二十九日为台湾船厂小修战船台湾协标中营济字3号、台协右营顺字9号两船拆造完竣，合共动支1101两，会同闽浙总督刘韵珂合词具题，伏祈皇上圣鉴。

按清制有关军事事务之奏折须由该地区之总督与巡抚同折上奏，是时徐继畬任福建巡抚，其顶头上司为闽浙总督刘韵珂。

4. 有关台澎各营俸饷奏折

徐继畬常关心驻台官兵粮饷应按时发放，兹以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二十九日奏折为例，其云：“窃照台湾各营官兵俸饷等项，向由府、厅造册送司，分别扣抵、支给、压办在案。兹据藩司陈庆偕详称，台湾各营道光二十八年份应领俸饷、马乾、养廉等银216416两零。内除朋扣小建并台湾府造册请除及由司划扣各要款银142270两零，实给银74145两零。又发还府库垫给各款银22087两零。又澎湖二营应领俸饷等银32997两零，内除朋扣小建并澎湖厅开折请除暨由司核扣各款共银14275两零，实给银18074两零。以上统计发银114954两零。循照旧章，仍由厦门配

渡，台郡交收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上面说道 11 万两多银子如何运达台澎呢？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起，因厦门夷氛未靖，由福州雇佣商船径渡台湾北部之八里坌登岸。但由八里坌运台湾府城路途远，又要雇挑夫挑运，费用甚高，同时商船上应派有来自台澎之守备、千把，配带器械，沿途押护饷银。

从严审核。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畬合奏连续两折，第一折指出台湾军需银两共需 992057 两，业核办完竣。第二折说明前折所列银两经派员详加钩稽，从严核减，实际请销银两共 98.8 万余两，并奖励办事精细之有功随员。

朝廷对驻台官兵恩惠。清雍正皇帝体恤台湾戍守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内地，今加沛特恩，于驻台之兵丁每年赏银 4 万两，为内地赡养家口之用，著总督等均匀分派，按期给发。台湾自嘉庆十八年（1813）在台湾驻守兵丁共 14658 名，每名应匀赏银 2 两 7 钱 2 分 8 厘 8 毫。

按这举实是对清代驻守台湾官兵一大恩惠。另按上此折时，徐继畬暂兼闽浙总督，故末尾签署为“闽浙总督系臣兼著，毋庸会衔合并陈明”。

5. 升补在台官员

有关在台官员之升迁、补实等问题，徐继畬任职福建巡抚期间，对在台官员人事升迁甚为重视，依例查核以后以奏折呈报朝廷，例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二十五日奏折云：“闽浙总督臣刘韵珂署福建巡抚布政使徐继畬跪奏：窃照福建台湾府嘉义县知县王德润因案革职，所遗嘉义县知县系海外要缺，例应在内地现任人员内拣选调补，惟查有准补（福建）清流县知县王廷干，年三十七岁，山东安邱县举人，道光庚子科进士，以知县即用，于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到（福建）省，因差渡台……现署嘉义县知县，该员才健守洁，办事勤奋，于该处风土民情均极熟悉，以之调补嘉义县，洵堪重任。”

按此案系台湾嘉义县知县出缺，徐继畬立即会同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朝廷，由当时署理嘉义知县之王廷干补实。又按徐继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二十三日经朝廷发布署理福建巡抚，至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八始补实福建巡抚。

另一例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二十五日徐氏会同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朝廷，请准以原任台湾县知县之黄开基升补台湾府海防同知。

另有一例为一奏折同时调整四位官员者，此折发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二十一日，是将原任台湾淡水厅同知史密升补台湾知府、以胡国荣升补鹿港同知、原台湾县知县由澎湖通判刘功澍升任、澎湖通判则由试用通判张启煊接任。

缴清罚俸仍可回任原职。例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十六日之徐氏奏折：台湾凤山知县郭兆荣，以前在福建任官时违规被处罚俸，罚俸银百余两，罚俸缴清后，仍被徐氏奏请调补凤山县知县，是少见之例。

台湾道员俱加“按察使”衔，便于自行奏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十六日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畬会衔奏折略云：依照乾隆五十三年上谕，凡遇有补放台湾道员者，俱加“按察使”衔，俾得自行奏事。又同奏折中新授台湾道员徐崇干依例加授“按察使”。

按道员不能自行递折奏事，有事须请巡抚等代奏，甚为不便，且台湾地处大海，不测之事甚多，台湾道员加授按察使可自行奏事，台湾地区所发生之事故可直达天听。

6. 防备英人觊觎台湾

徐继畬奏折中提及防备英人觊觎台湾者有二：其一为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二十二日折云：“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昨据刘韵珂、徐继畬奏英夷欲往台湾采煤一节，已寄谕于拒止之后，加意防备矣……伏查台湾地方并非（五口）通商码头，亦非各国夷船应行经由之处。乃在道光二十六年以后，节据台湾镇道禀报，淡水厅属之鸡笼山一带洋面，时有英夷船只驶往游弋，臣等查知鸡笼山附近各山有产煤处所，该夷火轮船只需用此物，其频年驶往，未必不有所垂涎……”

另一奏折为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密寄闽浙总督刘、福建巡抚徐，内云：“著刘韵珂等密谕台湾镇道，督率文武，严密防备……如该夷有求换港口文书，即答以成约内通商五口，本无台湾地方，断难允准。”

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为通商港口，其中并无鸡笼（基隆），然台湾北港之基隆、瑞芳地区颇多小型煤矿，开采后由基隆运销各地，故引起英人觊觎之心，故徐继畬劝告台湾道须加强防备英人涉足台湾之野心。

三 结论

徐继畬任福建巡抚多年，其间并两次代理闽浙总督，管辖台湾多年，很遗憾的是不曾来过台湾。

徐氏在福建巡抚任内关心台湾，有关台湾之奏折大约可分为六类，即台湾粮价、刑案、造船经费、驻台官兵俸饷、官员升迁、防备英人对台野心等等。以上各类事件全由台湾道先呈报徐氏，徐氏再行斟酌写成奏折，上报朝廷。

徐氏之治学，成果丰硕，如地舆学，在清代中叶是非常独特的学问，徐氏除博览全书之外，又不耻下问于中外人士，其成就在清代震动朝野；徐氏之经学、史学也有宏大成就，其读《四书》札记、读《后汉书批注》多由发古人所未发者；又如其所著之《五台新志》、诗集、应酬文牍等足为后世学者之典范，如今哲人远去，典范犹存。*

（席涵静：现任台北《山西文献》社长兼总编）

---

* 论文征引资料咸取自白清才、刘贯文主编之《徐继畬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

革新与图治

——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畬

冀满红　吕　霞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早启蒙国人认识世界的先行者，徐继畬堪与林则徐、魏源齐名。学术界对徐继畬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对外交涉及其著作《瀛寰志略》的内容多有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则主要考察徐继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时期的情况，以期丰富徐继畬的研究。

一　沉寂十三年之后的再度起用：入值总理衙门

19世纪60年代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既是清朝中央政权历经20年的刺激与冲击被动地进行政治机构调整的产物，又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国家高级官员主动寻求与西方协调并渐次构建近代外交的尝试，其中当以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为代表。在他们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的初衷主要是"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仿照军机处但又独立于军机处之外的一种新式机构，服务于其中的人员理所当然地应具有新式思维。徐继畬入值总理衙门应该说与他的新式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继畬的思变求新来源于他在福建主持两口通商事务的经历，"久驻

---

①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5—2676页。

岭表，熟悉敌情，得其要领。”① 在对外事务和涉外纠纷的处理手腕和才干方面，深得闽浙总督刘韵珂的肯定：“（徐继畬）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夷性偏执，非其习好相信之人，竟难冀其听受，是以抚臣郑祖琛到任已及半载，英夷领事从未禀陈一事，亦绝不至署请谒。而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畬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② 不仅如此，与徐继畬有交往的外国传教士对其也颇为推崇：“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③ 这种对于外交事务的通达了解，为徐继畬沉寂十三年之后的东山再起提供了重要基点。

同治四年十月初三日（1865 年 11 月 20 日），清廷发布上谕：“命前任太仆寺少卿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④ 一般而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须由“内阁部院满汉京堂内特简”⑤，为给予徐继畬以合法身份，便不得不赐其以三品京堂候补的殊荣。对此，徐继畬自己也甚感意外：“前者朝廷查办废员，虽蒙恩铃出，调取引见，而自顾衰庸，断不作出山之想。不料本年闰五月间忽奉陛见之旨，不敢复辞，勉强扶病入京，遂入此无了休之局。年逾七十，乃复作春梦婆，知必为海内高人所笑。”⑥ 如果说徐继畬因政见分歧被迫落职归乡被西方人士比拟作“东方的伽利略”（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皆因维护真理而遭受打击），那么徐继畬的起用无疑是他们所乐意见到的：“前福建巡抚徐继畬由于地理知识丰富，得以进入衙门任职。……他的复出是好的迹象，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 les borgnes, les borghes sont

---

① 曾国荃等修：《山西通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64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1 页。

② 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第 4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3—394 页。

③ 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转引自［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的《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 页。

④ 清朝官修：《清实录》第 48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640 页。

⑤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2 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考 8778。

⑥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 17 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71 页。

rois（法语：举国皆盲人，独眼称大王）。”①

徐继畬入职总理衙门，起初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理衙门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关。“总署的组织类似于合议制的委员会”，“（总署大臣）个人的职权在原则上以管理为主，其余并未明定差异；一般是通过会商的形式来解决”②。不难看出，对于需要解决的事项，一般由全体大臣共同会商，联衔上奏或咨会相关部院。但晚清官场陋规的存在，使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不免有些偏颇。“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虽事权不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亲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③ 相对于总理衙门设立之初的元老，徐继畬的资格无疑不太足够，在其任职的五年里，排名一直较为靠后，详见下表。

徐继畬在总理衙门供职时（1865～1869年）的同僚姓名表④

年　份	姓名（按原表排名先后顺序）
同治四年（1865）	奕䜣、文祥、崇伦、恒祺、宝鋆、董恂、薛焕、徐继畬、谭廷襄
同治五年（1866）	奕䜣、文祥、崇伦、恒祺、宝鋆、董恂、薛焕、徐继畬、谭廷襄
同治六年（1867）	奕䜣、文祥、宝鋆、董恂、薛焕、徐继畬、谭廷襄、倭仁（未到任）
同治七年（1868）	奕䜣、文祥、崇伦、宝鋆、董恂、薛焕、谭廷襄、徐继畬
同治八年（1869）	奕䜣、文祥、崇伦、宝鋆、董恂、薛焕、谭廷襄、徐继畬

对于此种顺序，钱实甫在其专著《清代的外交机关》中解释：“总署大臣中因有管理的皇族在内，自然便居于领袖的地位，和军机处的没有明确首长方式不同。其他大臣（学习行走不计）的挂名，大致以任命时间的先后为序，这又和军机大臣相同。”⑤ 钱说颇有道理，但无法解释同治七年

① ［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② 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7页。

③ 《清代之竹头木屑》，孟森等：《清代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0页。

④ 钱实甫编：《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69页。

⑤ 参见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第167页。

和八年徐继畲与谭廷襄顺序的前后改变。惜资料限制，笔者亦未找寻到充分证据，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 “爱屋及乌”式的重印：《瀛寰志略》价值的凸显

如果说徐继畲入职总理衙门是其政治生命的重新开始，那么与身份的提升所伴随的则是学术地位的凸显——《瀛寰志略》在总理衙门重印且被列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便不足为怪。《瀛寰志略》付梓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畲力著此书主要着眼于“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①]。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以说是早期系统地介绍国外史地知识的权威著作。这种权威当来自于徐继畲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和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②] 按理说，《瀛寰志略》振聋发聩的价值应当受到国家精英阶层至少是致力于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的肯定。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徐继畲在著述《瀛寰志略》时，曾将草稿示其友人以听取意见。知交好友张穆就对此表示出委婉的不满：“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③] 守旧分子的反对更是偏激：“（徐继畲）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④]《瀛寰志略》面临的这种遭受抵制的遭遇，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徐继畲所宣扬的先进文化，冲破了传统的以君权为中心、华

① 王韬：《瀛寰志略·序》，《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② 《瀛寰志略·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③ 张穆：《㐆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第269页。
④ 李慈铭撰：《越缦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80—481页。

夷有别的等级名分制度，超越了当时坐井观天的知识分子的理解能力。这正如德雷克所说："因为他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①]《瀛寰志略》的价值便被淹没在盲目的叫嚣与反对声中，以致造成"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②] 的后果。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变。"经过欧洲列强的第二次战争，那些改革的对立势力再不能保持长期的优势地位了。徐继畬关于中国需要处理好与新世界的关系的意见，终于拨动了19世纪60年代改革派政治家们的心弦。"[③] 同治五年（1866），得到李鸿章、沈桂芬等人赞同，徐继畬同僚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重新刻印《瀛寰志略》，"同治乙丑（1865）继畬应召进呈，板入内府，今都城有翻刻本，上海有缩刻本。"[④] 与此同时，《瀛寰志略》亦被同文馆用作教科书，成为了解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必读之书。这本"19世纪40年代就出版的简明扼要介绍世界知识和国家管理学的著作，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和尊敬"[⑤]。"中外刊布，群奉为指南。"[⑥] 但这种迟来的《瀛寰志略》潮流，让人在庆幸之余不免感到沉重的遗憾："如果当年（1848）他对中国面临的新形势的理解能在皇朝和官僚主义化的领导阶层中推行得更广，中国也许能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十年时间，避免伴随着缺乏准备的急速转变而产生的某些极度痛苦。"[⑦] 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曾于1859年和1861年两次翻刻《瀛寰志略》。日本学者大古敏夫在他的文章中说："《志略》继《图志》之后，传入幕府末期的日本，日本人用日文译注了《志略》，普及一般人中

---

①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自序），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阎锡山：《松龛先生全集·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1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③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④ 《五台新志》第4卷，转引自潘振平：《〈瀛寰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⑤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⑥ 杨笃：《松龛先生传》，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12册，第701页。

⑦ ［美］龙夫威：《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间。如果说，幕府末期的地理说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于《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①

郭剑化、杨华在《〈瀛寰志略〉近代化思想析》一文中认为：“事实上，以同治五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版发行为转折点，《瀛寰志略》日益成为所有追求新知识的中国人的必读书。”② 作为晚清政府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国家官员斌椿，他在出国时就带着好友徐继畬赠送的《瀛寰志略》。此后，出洋考察或充当使节的中国官员大多随身携有《瀛寰志略》，以便随时查阅。且“昔时译署翻书，人地国名，皆取准于《瀛寰志略》”③。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时，在《瀛寰志略》的基础上，继续搜集资料，主持编撰了《续瀛寰志略初编》。由此可见，在以总理衙门为首的国家新派官员的鼓励与肯定之下，《瀛寰志略》的重新出版发行无疑提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程度，从某种程度上启蒙了中国人崭新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表示了对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的莫大关注。徐继畬曾经在《瀛寰志略》中高度称赞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这段赞扬的文字被镌刻成碑文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67年10月21日），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根据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举行隆重仪式，发表演说赞扬了徐继畬，并赠送他美国著名画家普拉特所绘的华盛顿肖像。

三　总管同文馆大臣：不可或缺的精神表率

同文馆设立的契机，当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相关条款的签订。《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

---

① ［日］大古敏夫：《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中国近代的始刊启蒙地理书》，《求索》1985年第5期。

② 郭剑化、杨华：《〈瀛寰志略〉近代化思想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③ 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缓辑诸书纲要折》，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页。

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① 为避免因语言文字的误差而造成国家主权的更多丧失（《中法条约》中传教士利用文字的隔阂满足己方私利），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在同治元年（1862）设立同文馆，致力于西方语言及科学人才的培养。设立之初，同文馆的建制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与借鉴俄罗斯文馆的先例，故并未引起多大的思想矛盾和政治纷争。但在徐继畬入职同文馆之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徐继畬与同文馆的结缘是顺应恭亲王奕䜣及其总理衙门同僚的奏请：“惟查臣衙门前设学习英、法、俄国语言文字各馆，均设洋教习一员，专司讲译；此外各设汉教习一员，兼课汉文，令该学生等奉以为师。现在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只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臣奕䜣与臣文祥、臣宝鋆、臣董恂、臣崇伦公同商酌，惟有臣徐继畬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畬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② 简单地分析这份奏折可以看出，徐继畬作为“群情宗仰”的总管大臣似乎更多地意味着精神领袖的作用而没有实质的权力，总理衙门才是同文馆的管理决策机构，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文馆的行政长官。但一般而言，“同文馆管理大臣于本衙门大臣特简”③。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兼职同文馆总管大臣，为徐继畬的系列革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 年 2 月 25 日）着手管理同文馆始至同治八年二月十五日（1869 年 3 月 27 日）以老休致短短的两年之间，徐继畬将原先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语言的同文馆改造为全面学习国际经济、法律、天文、历史、地理等内容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他不仅注重同文馆教材的修订与补充，生员的数量与质量，还多方聘请西方博学人士担任教习，“这里的教员都是来自国外的教授，他们受雇于中国政府，教授中国学生欧洲语言、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课程。”④ 同时，他还提出“兼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02 页。

②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11 册，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524 页。

③ 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2 册，考 8779。

④ ［英］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6 页。

容并包，智周无外"① 的办学方针。对于外国人士来说，顺应时代要求而作出的变革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但对于墨守成规的国人来说，一切显得荒谬而可笑：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1867 年 3 月 18 日），"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②。这种强烈的否定与责难集中体现在同治五年（1866）底至同治六年（1867）初开始的震荡朝野的同文馆招收科举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知识一事上。

依据总理衙门奕䜣等大臣最初的设想，"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畬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③。但是对于深受儒学道统浸淫的中国保守士人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引起京城内外的轩然大波在所难免，其中以顽固著称的倭仁为代表："以奴才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④ 时倭仁任同治帝师，学术造诣和政治地位颇为崇高，有"理学大师"之称。他的"立国之道"和"人心根本"的立论在士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对盲目恪守传统的国人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顽固派的责难，虽然总理衙门提出了有力的反驳，并在慈禧的暂时支持下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同意同文馆招生。但实际上，同文馆"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来，必有成效"⑤ 的努力成效几乎微乎其微："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

①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11 册，第 4499 页。

②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519 页。

③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11 册，第 4542 页。

④ 同上书，第 4557—4559 页。

⑤ 同上书，第 4417 页。

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①]

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在对天文算学馆设立与招生的攻击不遗余力的同时，对于总管同文馆大臣徐继畬的批判也不留情面：“至今季开同文馆，以前太仆寺卿徐继畬为提调官（其头衔实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笔者注），而选翰林及各部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为丑夷之学子。……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丧，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湘乡之讲习泰西技算，实为祸端；至于继畬，盖不足责尔！”[②] 对此，徐继畬虽感到委屈和无奈，但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与理想。然时隔不久，精于权术的慈禧出尔反尔，下旨明令除非另行科举出身之外的同文馆毕业生朝廷一律不予分配录用。徐继畬躬亲力行所培养的朝政改革的希望遭到了封杀。在此打击面前，徐继畬自认衰老，回天无力，于同治八年（1869）“以老病乞休”[③]，离开了变幻无常的政治舞台。

结语　一个晚清士人思变求新努力的缩影

晚清以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步步加深。面对此种变局，从传统经世致用学派蜕变而来的先进士人开始寻求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冠以“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在一批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僚的推动下进行。这时候的变革已初步从鸦片战争伊始对船坚炮利的单纯重视发展到对国家建立新式机构的尝试，在奕䜣、桂良等筹划下设立的总理衙门即为显著一例。徐继畬入职总理衙门固是因为他对涉外事务的得当处理及对西方政治地理的通达了解，但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这是适应时代更新，适应国家思变求新的趋势。《瀛寰志略》价值的重新被发掘亦是因此原因。

徐继畬作为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八年（1869）间总理衙门的成员之一，深得奕䜣的倚重。他试图利用这段中外关系相对平稳时期来谋求国家地位改变的决心是坚定的，当然，囿于总理衙门的任职，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对同文馆教育的变动上。然而，徐继畬作为一个对西方有着深刻认

①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1册，第4605页。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6册，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821—3822页。

③ 《清实录》第5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18页。

知的中国士人，他对同文馆所进行的变革努力不免携带着西方的影子，含有激进的内容。这种激进对于故步自封而又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自豪的中国保守士人来说，在短时间里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受到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攻击最终导致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究其失败原因，就徐继畬自身而言，这主要在于他对改革同文馆教育弊端的困难认识不足以及改变这种弊端的过分急切。马士曾说："那些同中国行政方面曾经有过密切关系的人们，当完全了解它的缺点并清楚地看出它的弊端的时候，一般的都认为中国的学者官员们只需予以学习西方现代行政方法的优点的机会，他们便会迅速地采行一些可以使这个帝国的辗轧着的机器与现代世界相协调的改革。"[①] 这种将行政改革看得过于简单的做法，与徐继畬对于同文馆改革的看法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就整个士人阶层而言，传统知识惯性所形成的禁锢，使他们对于新事物有着天然的排斥。在思想尚未解放之时，对变革的群起而攻之是解决保守士人内心恐惧的惯用伎俩。因此，虽然徐继畬"比其他人更早地领悟到了中国何去何从的真谛"，但"也备尝了它的苦果。"[②] 当然，国家政权执掌者态度的动摇不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失败。

然而深有意味的是，徐继畬的思变求新努力只是晚清士人寻求国家变革的一个缩影。推及整个晚清时期（1840—1911），虽变革声浪不断，却鲜有真正成功者。察其败因，与徐继畬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不管怎样，他们为中国的自强与近代化所作的努力确实是值得铭记的。这正如阎锡山所说："（徐继畬）深识远虑，常烛照数计于数十年之前，数十年之后。……泰西名硕，独敬礼先生，诸王大臣莫能拟也。今先生殁四十年矣，世益变而事益亟，而先生之一身，始也纷然，今也漠然。"[③]

（冀满红：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吕霞：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6页。

②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③ 阎锡山：《松龛先生全集·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11册，第1—2页。

徐继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高春平

教育是关系吏治民生，国家安危，民族未来兴衰的根本大计。深入考察近代山西五台籍著名学者、廉吏、爱国志士徐继畬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对研究处于新旧交替，西学东渐，中体西用思潮下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嬗变及其近代化的艰难进程颇具意义。

一　晚清封建教育的空疏少用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国内阶政矛盾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打击下已出现种种衰亡迹象。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办和私立学校教育逐渐变得名存实亡，弊窦丛生。具体表现：一是学校管理制度衰败不堪，“考课”流于形式。教官年老昏庸，受贿之事屡见，监生吸食毒品，嫖娼聚赌者不乏其人。入监读书之人大多口衔烟袋，手捧茶杯，东游西荡，毫无心思学习。社会上出现了“天下教官多昏耄，滥竽恋栈”，“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①] 的流弊。二是科考舞弊成风，科考录取名额的限制与日益增加的人口矛盾十分尖锐，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嘉道以来，科举录取名额与人口矛盾更盛。以举人为例，清政府限制应试人数，规定每省上年中举 1 人，次年只准选送 60 人，并限制中举名额。例如，乾隆九年（1744）全国人口约 2 亿，15 省仅考取举人 1053 人。到嘉庆二十五年

① 《清史稿·选举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1820）人口已增到38000万人，录取举人共1493人。① 表面看增加了440名，但实际上76年间，每年增加不足6人。以每3年举行一次乡试计算，每次只增加18人，再平均到15省，每省每届乡试名额平均增加1.2名，而同期全国人口数量增加近一倍，到道光十七年（1837），全国人口更突破4亿大关。② 也就是说乾隆时，全国约18万人中有1名举人，而道光时38万人才有1名举人。结果造成“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入翰林”③。经过多次考试淘汰，能中进士为官者无几，于是“野有遗贤”，“旷才在外”。加之，考场上贿赂公行，公卿子弟视科举为囊中之物。大学士穆彰阿儿子不入场而中试，被称为“场外举人”。相反，知识渊博的进步思想家张穆，却因不向考官行贿而被监场者借故诬以怀挟，逐出场外，未能参加考试；大文学家蒲松龄屡试不弟，著《聊斋志异》，以狐仙鬼怪讥刺社会；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虽才名天下，誉满京师，但终因小楷不佳而未能入选翰林。三是士风日坏，捐纳日甚。嘉道以降，封建教育腐朽没落还表现为士风和学风已颓废衰败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一是知识缺乏。“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知，更不足责也。”④ 二是道德败坏。士子本是学圣希贤，忠君爱民，教化众生的得力工具，但此时，许多士子价值观扭曲，不再以学问和道德作为对人的评价标准，而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为害乡里，把科举作为“敲门砖”，由封建卫道士变成了封建名教的破坏者。徐继畬在《训嗣子树》一文中就曾痛心疾首地说：“读书专为明理，世乃视为科名之计程矣，读书而不明理，纵使中得举人、进士，考其存心行事，乃不如乡党自好而目不识丁之人。出而为吏，则但知要钱，吏治民生全然不讲，名节廉耻全然不顾。国家开科取士，要此等读书人何用？”⑤ 有的甚至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老百姓畏之若虎狼毒獒。三是花钱捐官盛行。由于名额有限，世风日下，捐纳挤占入仕正途，许多士子不再脚踏实地的读书做学问谋求科举正

---

①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第198卷，《选举八·文科·乡试中额》，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卷，台北中华书局重印本。

④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40页。

⑤ 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途，而是把心思目光转向过去正直士子所不齿的"捐纳"之途。特别是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为镇压农民起义，兼之财政收支的逆向变化和解协饷制度受到破坏，清廷仅在嘉庆年间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前后征收捐银达3000万两，按当时捐一知府需银13200两计算，可捐2273位知府。这就造成两个恶果：一是加深固有的满汉矛盾。道光年间，缙绅录所载，"各省知府之缺，多由满人捐纳而得"①。二是人为地增加了官缺的紧张程度，造成仕途严重壅塞。道光时曾国藩感叹地说："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翰林院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京官尚且如此，外官更不必细说："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② 从而形成了整体性，结构性的官员过剩。而且，正途阻滞堵塞，必然使人才如河水倒灌，流向极端，迫使士子们放弃读书进取，捞钱买官，无心应试，从源头上败坏吏治。正如道光十四年（1834），黄爵滋指出的："今州县应试之士，较之以前不及其半……非应试之人少也，读书之人少也。"③

总之，晚清封建教育的衰退源于科举衰败、学校没落、官场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它们互为因果，表里渗透，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不仅直接对封建中央集权制产生削弱作用，而且导致了人才匮乏，士子离心，并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爆发。

二　徐继畬的家教及其教育观的形成

家庭、社会、学校是影响每个人成长教育的必经环节。因此，很有必要考察徐继畬的家庭、求学、科考、入仕与做官交友。对徐继畬一生影响至深的主要有三人。一是其父徐润第，二是堂叔徐寅第，三是堂舅续克家。

徐继畬的父亲徐润第（1760—1827），家德夫，号广轩，乾隆乙卯（1795）进士，授内阁中书，时年35岁。因母病，乞归奉侍。1795—1797年在介休县教书。1798年入京候职，1808年任储济仓监督，旋因政绩显

①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许大龄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3、197页。
② 《曾国藩全集》奏疏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
③ 王延熙等：《道咸同光奏议》第1卷，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久敬斋石印本。

著调海运仓、施南府同知，1820 年告归，授徒自给。

1798 年徐润第候职期间，应内务府大臣佶山之请，延教其子阿灵阿，同窗共读者有徐继畬、王秋宝等。课徒之暇，徐润第只同挚友高鹗、少宰桂香岩、太守杨启廷、编修王月潭等谈诗论文。徐润第为官数十年，衣不盈两笥，交游最寡，所师所友，皆当世名贤。先后及门者百余人，多能修德行、树名节、工文章，非若世俗之反以科名重也。生平于先儒之书，读之殆遍，旁涉道藏、内典，中岁专心学易。可见徐润第学识宏富，是一位严师慈父。他以饱学、严谨、耿介、清廉、果敢为特点的人品、道德、文章，熏染影响了徐继畬的一生，铸就了徐继畬好学深思、不图虚名、不阿权贵、清廉务实的品性。嘉庆十七年（1812），徐润第对年已 18 岁的儿子先后写下《谕继畬书》八百言和千余言的《再谕继畬书》，系统地给留京自学应试的儿子徐继畬灌输科举应试与立身处世的道理。

关于修身　徐润弟说："为人要为大人，人之大者，非富贵崇高之谓，亦非矜意气、尚权谋，笼罩众人之谓。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心体本自大，只要顺而养之，无害其自然之性，则清明侔天，博厚如地。只如这不忍之心，施之兄弟则量与父母同大，施之宗族则量与祖宗同大，若施之乎人，下及于物，则其量与天地同大矣。盖人之做事，须从此一点真情血性上发出，方无为名假妆等弊。凡贤人、善人、吉人、高人、正人、端人、才人、能人等类，不必按其名字，规规揣合，自然无美不备。何也？人性无美不备，性具于心，直养无害者，不戕其性者也。率性之为道，道不可名状，人亦不可名状，但见其浩乎无涯而已。此人难名，第称为大。"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对儿子说："平昔心中一切私己、薄人、忌嫉、冷漠、阴贼、短绝、便宜、巧诈诸念头，凡有伤于天心仁慈公普者，时自剪除，秉一个空荡荡热腾腾底心，委命投诚于天。"①

关于应试　徐润第施教于徐继畬的，自然主要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准则及宋明理学，但并不完全拘泥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而对科举应试与立身做人的关系，具有超俗的、独到的见解。他在《谕继畬书》中讲："尔既应试，自然望得。然勤读经史，体认义理，乃心术、人品、文章、功名之本，此时正宜于此著力，得进毋自满，前程万里，小成不足道也。不进毋自灰，年尚有待，暇中正好著力也。为学本是自修之事，近

① 王延熙等：《道咸同光奏议》第 1 卷，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久敬斋石印本。

世以为取科名事，可谓大迷，轻重本末之辨，尔须知文。且科名得失，半由命数，自修则其权在栽，有得而无失也。舍本趋末者，不得科名便成满盘之废。由本及末者，不得科名而于嗣续之道，已自潜滋暗长，其为家运灵长之福，较之做官所获多多矣。"①

可见，徐润第对科举得失的看法，虽难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更多的是能辩证看待，强调勤学自修，讲求义理才是心术、人品、文章、功名的根本，对千百年来"读书—科考—入仕"的传统官本位理念是一种难得的超越和挑战。

关于寡欲 徐润第认为："夫寡欲，心功也。人心属火，不能无所寄，寄之粪草，恶臭冲天矣；寄之檀炉，香气满堂矣。""人心不容犯手，非可硬提，有所持循以养之，久而久之，趋其熟路则欲自寡矣。"② 心寄"檀炉"为寡欲第一法。则"直内应外"为寡欲第二法。所谓"直内方外"是指行为合于儒家礼仪。

关于保身 徐润第认为："一在谨疾，其义易明。一在涉世，其端难知。"因为世人大多"福祸倚伏难可测试，见小利而忘大害，贪近功而昧远灾"，涉世而求保身，只有做到"沉静如石"、"果确如石"才能成功。

关于为人 徐润第认为涉世为吏，要以"仁"为本，"义"不归于"仁"，"则义无归旨而不能精"。"谚云：'众人是圣人。'若自察无精义之能，宁顺舆情，毋矜拙断。"

《谕继畬书》寄出未久，徐润第又写了《再谕继畬》，此信是对前书内容的提炼概括，首句开门见山地说："尔前问寡欲，恒久、应酬之道，吾前所答，犹非探本之论。若论其本，则三者只是一体事，心不存耳。"所谓"心不存"者系指私欲。"欲来间之，故木恒也。心恒不存，发于应酬，如何不差！是故寡欲则诸弊自除矣。"

关于私欲 徐润第劝说儿子要摆正个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认识到个人仅是芸芸众生中的"沧海一粟"，应随附大众。他说："世有世运，家有家运，身有身运，太仓一粒，何自恃而欲自异于满仓之粒；大海一沤，何所见而欲自异于满海之沤，其若乐生死，亦随大众，头出头没，颠科浮浴

---

① 转引自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1 页。
② 同上书，第 227 页。

于六合间，而一听彼苍之位焉耳。”[①] 因此，除私欲，要做到，心体常虚，只有心体常虚，达到“率性”的境界，方可应酬适宜。

徐润第的家教有两个特点：一是言教与身教并重；二是以生为友，坦诚交谈，从不训斥，也无居高临下之感。两谕《继畬书》，系统地反映了徐润第灵活运用宋明理学思想教子成人的观点，它对徐继畬人生道路的选择，居官的清廉，治学的严谨，为人的耿介均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一言以蔽之，对待继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均发生显著的作用。

对徐继畬一生影响较大的第二位人物是他的堂叔徐寅第。徐寅第，字虎臣，号车堂，嘉庆辛酉（1801）科拔贡。从嘉庆二十五年秋到道光六年（1820—1826），青年徐继畬一直随堂叔读书，直至考中道光丙戌科二甲第六十名进士。其间，寅第勤政、好学、廉洁、正直的处世哲学，对徐继畬的影响不亚于其父徐润第。

嘉庆六年，徐寅第经朝考任直隶肃宁知县，任内绝苞苴，严请托，风裁冷峻，有笑比河清之目。疑狱一讯即决，案无留牍。管仓尤慎，量入为出，虽穷急不挪用分毫。嘉庆二十三年（1818）升景州知州，三年后又升顺天府西路同知，道光二年（1822）冬，特旨擢河间府，所至皆有治绩。因其兄润弟已于两年前告归，而他任职的直隶地区文化发达，故徐继畬随堂叔学习，受益匪浅，直到考中进士。

对徐继畬一生影响甚大的第三位亲人是他的堂舅续克家。续克家，字子敬，号轩斋，“性质直好义，言必由中，不解作世故周旋语。于宋元明先儒理学之书，研其精义，皆有心得。尤熟历代史事，年代族贯记忆不爽。……为文好学桐城二方，不屑揣摩时好，故迄不利于名场。制行方正端严，合族子弟称为楷模。偶有争端，公一言剖决，无不悦服。性爱才，遇后学聪颖之士，诱掖奖劝，冀其有成，或赠以膏火，助以资斧，使之成名。家故中赀，自奉甚约，遇人急难，推解无吝色，以此晚年家事窘，频亦恬然不介意。中岁尝设帐于介休，既而归里，闭户读书以老”[②]。徐继畬八岁前，随母识字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十岁，就读于本宅私塾。徐继畬

---

① 转引自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9 页。

② 《同溪续公墓表》，载《山右丛书初编·松龛全集》文集卷 4，转引自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1 页。

少年时多次随母亲到外公家，每次堂舅轩斋都要问其学业，并引至斋中读其藏书，这为徐继畬的早期教育打下坚实的根基。十一岁至十五岁随母赴京侍父，在家父徐润第及其好友王月潭等教诲下便可啃《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古文。

秉承乃父的遗风，徐继畬在其继子徐树十八岁时也写了《训嗣子树》，提出了孝弟、忠厚、明理、淡泊等为人施教观点，作为人父对人子进行家教，是其教育目的与观点的集中反映。

关于立志 徐继畬："志气不可不立，悠悠忽忽，颓堕自安，弹指半生，一事无成矣。科名之得失存乎命，而读书明理则其事在我。四书五经，学之根柢；诸子史鉴，学之条贯；古文古诗，学之旁趣；制文试帖，学之程式。但能淹贯古今，通达事理，文章做成片段，科名自然可得。即使不得，亦不愧为读书佳子弟。"[①] 读书明理高于科举入仕，这一观点继承了其父家风。

徐继畬的父亲徐润第和堂舅续克家均设帐施教于山西介休县，其堂叔徐寅第也是由教蒙馆而成拔贡入任知县的，他本人守丧期间和罢官后两度以教书度日，咸丰二年（1852）秋，皇帝又委派他为四川乡试主考官，后又在平遥超山书院执教十年。同治六年（1867），徐继畬复被任命为同文馆总管。因此，完全可以说徐家是教师世家，徐继畬是有理论有实践的教育家。

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徐继畬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观点，在教育的内容上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照搬和延伸，但在教育方法上则把握教学实际增加了示范教学、珍爱异才，因材施教等办法。

示范教学方面。他在平遥超山书院主讲时，日与诸生同甘苦，他教学生作八股文，命题之后，与学生同作一题，写成后就给学生以为示范。学生传阅比较，提高很快，受益匪浅。这样下工夫的教学法，当时的塾师们是不用的。他给学生的范文，后被编辑成《退密斋时文》一书。

珍爱异材、因材施教。徐继畬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的办法。因此，施教的关键是要知材即了解掌握学生。徐继畬最欣赏的学生是赵思位，"思位幼有夙慧，三岁四岁赵子钞尔雅授之，随从随读，有未及授连下数句者，人皆异之，授

---

① 转引自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以毛诗，片刻能背诵两三篇。至六岁，诗、书、易、春秋已卒业，九岁四书五经皆熟诵，继之以左氏内外传、史汉唐宋八家古文，唐贤古诗及敦艮斋时文，年十二即能文。”① 可惜，这位少年神童十八岁应试入县庠时忽患喉疾而卒。徐继畬闻知“不禁顿足惋悼而有蕙折兰摧之叹也”。

而对天赋平常的继子徐树，八岁上学，延师专教，本族顽童概不令附学，亦不许无故出大门沿袭坏习，徐继畬虽用心施教，但也未抱太大的希望。咸丰二年（1852）徐继畬在致顶头上司刘韵珂的书中曾提及其继子的天赋，以及教育的方法与目的。信中说：“嗣子树即堂弟继埙次子，过继时年六岁，交两妾抚养之。十六岁娶妇，今已十八，读书资性颇钝，五经左传甫读完，现今读史汉唐宋古文及小题明文，上年初试作时文，心思笔气尚可用，但稚嫩不成片段耳。亦不望其必中，但望其明白道理，能立人品，守着数卷残书，延接先人香火足矣。”

三 《瀛环志略》中反映的徐继畬的教育思想

徐继畬一生奉行“经世致用”思想，在其著名的史地著作《瀛环志略》中同样处处透露着重视西方科技和教育，主张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教育观点。他多年任职于福建、广东，目睹了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认识到中国再不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忽视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战后十年间，他力倡变革，并向当局系统传递外部世界的全景信息。他认真研究英、法、美三国的教育科技。关于英国的高等教育，作者讲述英国的博物馆和大学，《瀛环志略》中提到位于伦敦的“屋度”、“大书院”和“冈比黎日有大书院”。他十分欣赏法国的教育和科技。书中写道：“佛郎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首都巴黎，“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游学之士，许住院借读。又设医院十四所，选名医居之，每岁收疗病者一万四千人。各国学医者皆裹粮赴巴（黎）勒，三年或五年学成然后归。又有繁术院，居各项艺术之师，如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之类。学者各就所愿，群居讲肄焉。”

对当时新兴的正在崛起的美国的教育科技，包括聋哑教育、经费投入、分类管理等，作者均详细介绍，并按州名分别讲述各地的大学教育。如华盛

① 转引自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3 页。

顿的“查治当有书院，育婴馆”；纽罕什尔的“公哥突有大书院”，洼满地“满比厘阿有书院”；“麻沙朱色士”的“摩士敦”有“大书院六所，藏书楼数处，一楼藏书二万五千册，官吏士子皆许就读，惟不准携归”；“干捏底吉”的“哈的富耳”有“大书院一”，“纽伦敦”有“大书院四，其学馆为二十六国之最”。“又有别院教哑与聋者，以手指代语言，诸国皆效之”；纽约尔的“推来”，通国书院学馆甚多，其费岁一二百万元。有演武馆，教习枪炮军械；马里兰的“阿那波里有书院”；勿尔吉尼阿的“里士满有大书院”；南喀尔勒那的“个伦比亚有大书院二”；苦耳治的“靡理治有大书院”，阡的伊的“法兰富耳有大学堂”，阿拉巴麻的“磨庇理”有大书院。作者最后总结说：“众国皆奉西教，好讲学业，处处设书院。其士类分三等：曰学问，研究天文地理暨西教旨；曰医药，主治病；曰刑名，主讼狱”。这实指美国后来的综合类、医学类、政法类大学的类别。

作者对西方科技的推崇更是随处可见，如对法国的轮船制造和英国的蒸汽机带动的纺织工业的记述：“其（法国）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自来火之枪，火轮之车船，大半皆其所创，都城有钟表匠二千人，每岁造时辰表四百件，自鸣钟一万八千架。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他国亦有仿造者，而终逊佛。”[①] 英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启，自能运动，是以工省而价廉，每年用棉花四十余万担”。

关于近代新式交通运输工具铁路与轮船，书中也讲到“火轮船之制，四五十年始创为之。先是欧罗巴诸国，织布多用火轮机。能者推广其法，遂造为火轮船，近年米利坚又推广其法，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亦可谓精能之至矣”[②]。

四　徐继畲的教育实践活动

徐继畲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有四次：

第一次是道光七年（1827）九月其父卒，十月乞假获准扶父柩回籍，由此到1829年辞官守制。其间，曾受聘继承其父在介休的教职，同时教导本读子弟。在守丧期间，除课徒外，徐继畲教学科研相结合撰写了《尧

①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环志略校注》第7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7卷，第261页。



都辨》、《晋国初封考》等论文。

第二次是从咸丰六年（1856）罢官到同治四年（1865）十月的十年间，徐继畬在平遥超山书院教书课徒，把忠君爱国的热忱用于教育事业，十年间，他也确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造就了一些举人、秀才。

平遥超山书院是由当地24名绅士兴办的私学。学校管理大事由董事会决定，日常事务由值年董事经管。在院生员约30名，邻县借读学生20余名，书院正薪240金，润笔每年三四百金，总计700金左右，可维持徐继畬一家八口人的生活。为了忘却由朝廷命官沦为山村教书先生的烦恼，徐继畬努力抑制感情，把全部精力移情于教授学生，把自己的道德文章传授给青年学子。为使生徒尽快掌握八股时文的精髓与技法，他创造性地运用了三个方法：一是示范教学。命题后自己和生徒同时作文，然后将自文交给学生传阅比较研究，从中揣摸技巧，迅速提高。二是精选范文。他从明清两朝时文中选出自以为精粹的32篇文章，分为机法、环境、笔路、议论四编，每编各8篇，集为《举隅集》雕版问世，目的是使学生读这些范文后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三是点评佳作。他对卷帙浩繁的八股文集《小题明文》选择加以评注，供生徒们阅览。为使自己的学生尽快成才，考取功名，甚至将从来秘不示人、毕生批注的《后汉书》借给学生阅览，以致生徒们传抄，某些批加注的文字。到抗战爆发后的1940年，这些传抄文字流落到太原市旧书摊，被时任太原市长的叶灵凤购得，并以《徐继畬批后汉书残本》出版。

第三次是同治六年担任京师同文馆总管。同治四年（1865）秋，清廷将咸丰初年罢黜的徐继畬召回北京，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是在清廷经过庚申之难的剧痛后推进自强运动的背景下用汉臣、办同文馆的举措之一，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因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文武大臣更佩服徐继畬的“器识深沈，谋猷卓远”，总署奏准重印《瀛环志略》。书中变局、自强、学习西方等命题为自强运动提供了指南。总署认定中国致败的原因和焦点就是士大夫不悉外情，缺乏西学知识和责任感。奕䜣在奏折中讲：“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窍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1] 而在战后，士大夫故态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复萌，照旧华夷之防的高调，抱着儒家的经典，沿着千年的科举仕进阶梯上爬。这无异重蹈覆辙。要走出覆辙，应付不久将来的不测之变，必须对教育和官僚制度动大手术，及早培养任用一批既有西学知识，又有抱负责任感的官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翰林院年轻有为的编修、检讨、庶吉士和有五品以下京内外正途出身的官员身上，试图在三五年时间内经过同文馆，从中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通才和三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于是自同治四年（1865）开始，一是奖掖同文馆第一批外文翻译人才，二是派同文馆生出洋留学，在此基础上，同治五年起，又招考举人和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二十以外者，并招考翰林和进士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署上奏辨析此举的必要性。

徐继畬对朝廷的重用，不胜感泣。如果这个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变官制、育新才的计划得以实现，那清末的历史将会改写。遗憾的是母后垂帘，亲王辅政格局争权的矛盾迅速裂变，新政很快遭到京城守旧官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在慈禧幕后操纵下，编联指斥奕䜣云：

> 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正月二十九日，御史张盛藻率先上奏发难，半个月后，大学士倭仁（字文端）亲自上阵，从夷夏之防的所谓“国体”竭力反对。经过几番激烈的政见之争，守旧派代表倭仁占了上风，奕䜣受到排挤，同文馆招生计划以失败告终，这一意将西学“新芽”，嫁接到中学之“鲇木”上的教育改革计划失败，对清末政局，尤其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首行是它大大减缩了同文馆的规模，严重影响了清末学兼中西、匡危济世官员人才的培养；其次，中学传统依旧，西学被排斥在夷夏之防的壁垒外，旧的教育、文官体制继续阻挠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第三，清议空谈日趋嚣张，毒化了变革图强的政治空气和社会氛围，给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隐患；第四，中国丧失了近三十年宝贵的追赶时机，造成一再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光绪二十二年（1896）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痛斥倭仁等清议人物破坏同文馆招生计划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灾祸：

“昔同治初叶，恭亲王等请选编检庶常，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等，入同文馆，学习西艺，给以廪俸，予以升途，得旨依议。其时正当日本遣人出洋学习之时耳。此议若行，中学与西学，下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至今三十年，向之所谓编检及五品以下官，皆位卿孤矣。用以更新百度，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文端之言，其误人家国，岂有涯耶！”①

徐继畬以“时艺卓然成一家言，海内推为宗工”的声望在制定、实行同文馆计划中所起的主要设计师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反对派把他当做主角之一大兴问罪之师。徐继畬年过七十再度出山，本欲实施教育改革，通过同文馆培育英才进而对国家自强大有裨益，不料事与愿违，同文馆招行计划功败垂成，自然心灰意冷，但他在历经挫折后，仍主张重视和学习西方教育科技的思想，尤其是其全球性的眼光和超前思维可谓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驱，教育改革的先锋。同文馆计划的失败，从根本上看，再次说明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与顽固。

第四次是同治八年到十二年（1869—1873）。1869 年 3 月，徐继畬以老病乞休获准，4 月回到故乡五台县东冶镇。当时举业尚盛，许多人执弟子礼慕名来学。他不顾年高体衰，继续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坚持每月逢五讲学，逢十批改作文。第二年春，五台县请他为崇实书院的明伦台书写楹联，他复书其父徐润第任施南知府时为书院所撰联，以表达自己的教育主张并寄托对家父的思念：

> 学以明人伦也，若为功名富贵而来，发足便已错了；
> 道在求放心耳，徒工语言文字之末，到头成个什么。

同治十二年（1873）秋，徐继畬病故于东冶镇故居，享年 79 岁。清廷念及他毕生为国家、为民族、重教育、倡西学、撰《志略》、育人才的功绩，赏其头品顶戴。

（高春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

①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1904 年版，第 31 页。

徐继畬与京师同文馆

林齐模　顾建娣

一

1865年暮春的一天，在山西五台县东冶镇的一处老宅中，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匍匐在地，诚惶诚恐地接受圣旨。这位老人就是《瀛环志略》的作者，曾经做过福建巡抚的徐继畬。

与林则徐、魏源等一样，徐继畬属于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如果从纯粹知识的角度来看，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表明徐继畬在某种程度上比林、魏等人对外部世界了解得更加深入。或许正是由于徐继畬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超前于他同时代的人，《瀛环志略》出版后并不为大多数人欢迎。咸丰皇帝继位后，清朝朝野对西方的态度明显趋于强硬。由于在福建巡抚任上处理英人在福州租屋一事招致一些闽籍士大夫和京官的不满，徐继畬连遭弹劾，于1851年被召回京城，降为以四品京堂候补。一年后，他因上《三渐宜防疏》受到咸丰皇帝的公开称赞，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这令许多人很惊讶，那些反感徐继畬的人们肯定对此很不舒服，于是不久徐继畬便被人揭出他任福建巡抚任中的一起漏报官犯逃脱的失职事件，经吏部议定撤职。从此，徐继畬离开官场，回到故乡山西，一晃就是13年。

在这13年中，中国经历了两场影响巨大的战争。其一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二是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攻占，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行宫，后病死那里。以皇太后那拉氏和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政治势力通过辛酉政变击败以肃顺等顾命大臣为首的政治势力。那拉氏和奕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崛起的封疆大吏通过

惨痛的教训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强大，不再盲目自大，改变了咸丰朝一度强硬的对外政策，开始与列强合作，并在“自强”的名义下，兴办一些洋务事业。

1861 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习惯上简称总理衙门），作为处理涉外事务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了培养翻译人才，1862 年正式成立了附属于总理衙门的京师同文馆。随着清朝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转变，政府迫切需要对外国了解，懂洋务的办事人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瀛环志略》的价值，徐继畬的才能和见解开始被世人理解和认可。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素来钦佩《瀛环志略》及徐继畬，早在 1849 年董恂还没有位居高位时，他第一次获得此书后，就视若珍宝，反复阅读，“每读一过，又辄萌奢念，不知何日得赋清扬适愿”。正是在他的大力推荐下，1866 年由总理衙门刻印《瀛环志略》，广为散布。董恂在为该版本所作的序中对于该书与作者的遭遇大为感叹：“特不解当年见是书者，何以不尽谓然……今则连茳一堂，晨夕亲炙，是书亦不胫而走，于以知载籍极博，而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自有确不可易者在，而益叹文章之显晦，又各有其时也。”①

时间的推移和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徐继畬的价值显现，于是在偏远的山西生活了 13 年后，年已 71 岁的徐继畬在 1865 年接到让他进京陛见的圣旨。

一个外国人曾经从他的角度谈到徐继畬退隐和复出的原因。1876 年，在华生活工作了 43 年的卫三畏辞去美国驻中国使馆秘书兼翻译职务回美国。卫三畏在纽约发表的一篇致辞中提到徐继畬：“总理衙门中有一位官员，今已去世，1849 年他曾任福建巡抚，出版过描述异域地理、历史的著作，其中的事件主要来自他对雅裨理与马儒翰的问询。由于对外国过于推崇，该书的出版使他遭到了贬谪，约在 1851 年他回到故乡以教书为业。14 年后，这个叫徐继畬的人被召回朝廷重新为主上服务，原因正是当初他被贬的理由——对外国人的精深了解。他这样的人才是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北京政府急需的。在我的建议下，美国政府送给他一幅精美的华盛顿肖像。总统曾是他所著《瀛环志略》中颂扬的对象，普（蒲）安臣先生作

① 转引自徐崇寿：《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8 页。

为驻华公使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把肖像赠送给他。"①

徐继畬于1865年秋天到京，11月20日被谕令"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第二年7月，被正式授予太仆寺卿的实缺。徐继畬到京即被安排到总理衙门，在恭亲王奕䜣的领导下办理洋务。奕䜣对他很是尊重与照顾，考虑到他年纪较大，于是向朝廷奏准，特许他可以"不递膳牌"，免除他每日上朝的辛苦。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薛焕将自家的一座院落借给徐继畬居住。其他同僚如董恂等对徐继畬仰慕已久，对他自然是优礼有加。这一切让徐继畬很是感动，但他毕竟年届迟暮，且已经离开官场十几年，对功名利禄早已看淡。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日益陷于被动应对的境地。当时经办洋务对外没有实力作后盾，对内又不被国人理解，往往内外受气。对于有过因"神光寺事件"而遭罢免经历的徐继畬来说，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总理衙门任职是一个"无了休之局"，中外实力的巨大差异让徐继畬看不到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希望。所以他在给好友薛焕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只是勉强为朝廷效力，"至不得不退时，亦无可如何矣"②。

二

徐继畬任职总理衙门后不久，总理衙门奏请在已经成立的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学馆，并招考科甲正途官员入馆学习。此事在当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徐继畬深深卷入其中，并在相当程度上最终因此告老回乡。

同文馆成立开始几年招收的学生都是14岁上下的八旗子弟，名额只有24人，所学内容主要是英文、法文和俄文，同时也聘有汉教习教授汉文，只相当于一所小型的语言培训学校。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由洋务派推动的"自强"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发展。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深感人才匮乏，于是总理衙门计划扩大同文馆，将之提升为培养高级洋务官员的学校。1866年12月，由奕䜣领衔的总理衙门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其折曰："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

① ［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② 《致薛觐唐少宗伯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页。

天文、算学中来……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赴臣衙门考试，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① 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假如这一计划顺利实施，将会培养出一批三四品以上的学兼中外的高级官员。一些国外学者曾评价道：“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就指日可期了。”② 徐继畬是总理衙门中历经道、咸、同三朝的元老重臣，且又是最早接触和了解西方世界的先驱者，他在这次同文馆的扩大过程中被任命为首任总管同文馆大臣。在当时以总理衙门为一方，以大学士倭仁等保守派官僚为一方，围绕增设天文算学馆、招考科甲正途出身的学生的论争中，徐继畬无疑是总理衙门方面的重要角色。

总理衙门的奏请获得清廷的批准，但却遭致朝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一时人言沸腾。于是总理衙门方面于 1867 年 1 月 28 日上奏，在批驳反对意见，再次阐述增设天文算学馆、招考科举正途出身的学生理由之后，奏折进而建议将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对象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官。可以想见如果这一计划顺利实现，同文馆将取代翰林院成为清朝新的储才、育才机构。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同文馆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舆论认为同文馆是让正途科甲人员以夷人为师的责难，奕䜣等奏请设立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一职，并推荐徐继畬为首任总管大臣。1867 年 2 月 25 日上谕发布对徐继畬的任命：“太仆寺卿徐继畬，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惟寺务恐难兼顾，著开太仆寺卿缺，以专责成而资表率。”③

以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官僚出于捍卫儒家道统的本能，对总理衙门招收正途人员入同文馆跟西方教习学习本来已经强烈反对，现在发现同文馆竟然意欲取而代之，于是一场震动朝野的论争公开爆发了。

1867 年 3 月 5 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总理衙门的计

①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46 卷，故宫博物院 1930 年版，第 3—4 页。

②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3 页。

③ 《清穆宗实录》第 195 卷，同治六年正月丙子（1867 年 2 月 25 日）。

划，认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皆数百年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有以培养之也。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1] 清廷当日就对张盛藻的奏折作出回应，明发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同文馆，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并拟章程六条呈览。当经降旨依议。兹据张盛藻奏：科甲正途，读书学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等语。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畬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2] 这道上谕明确表明清廷对总理衙门的支持，并公开批示此事不用再议。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保守派总后台的大学士倭仁只好亲自抗疏力争，请朝廷收回成命。

1867年3月20日，倭仁上奏，声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

---

①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故宫博物院1930年版，第15—16页。

② 《清穆宗实录》第195卷，同治六年正月甲申（1867年3月5日）。

止。……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隐患，天下幸甚！”[①] 在当时朝野多数官僚士大夫看来，倭仁的奏折立意高远，论证慷慨激昂，文辞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待西方文化侵略的担忧。此文一出，立即被辗转传抄，广泛传播。

倭仁奏折对同文馆招考正途出身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总理衙门后来的一份奏折里说：“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②] 一般正途出身的士人遂都不愿或不敢投考同文馆了。这让总理衙门诸人，尤其是身为同文馆总管大臣的徐继畬非常焦虑。1867 年 4 月 6 日，总理衙门就倭仁奏折专门奏复，详细阐述招考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计划出台的经过情形，特别强调这是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疆臣反复沟通得出的共识。为了让倭仁理解总理衙门的一番苦心，随折还附有摘录的上述地方督抚相关的一些奏折、信函，请朝廷转谕倭仁阅看。但是倭仁看后却再度上奏，继续坚持己见，反对同文馆招考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在当时围绕同文馆招生发生的争端中，社会舆论明显支持倭仁一派，对同文馆极尽讽刺挖苦，据翁同龢日记中记载：“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教为师。’”[③] “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④]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当事诸人所受压力之大。作为首任总管同文馆大臣的徐继畬只有忍辱负重，勉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由于倭仁带头反对，导致同文馆无人再来报考，这让总理衙门诸大臣既沮丧又气愤，于 4 月 23 日再次上折：“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

---

①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47 卷，故宫博物院 1930 年版，第 24—25 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6 页。

③ 《翁同龢日记》第 1 册，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1867 年 3 月 18 日），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519 页。

④ 《翁同龢日记》第 1 册，同治六年二月二十四日（1867 年 3 月 29 日），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521 页。

失，倡浮言者失之也。……今人心既为浮言所摇，臣等无从勉强，拟就现在投考者择期考选，取中者入馆研究，仍时加察核，倘有弊端，即奏请裁撤。"① 由于倭仁前面的奏折中曾说过"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作为对倭仁的报复，总理衙门在这次奏折的附片中建议让倭仁保荐数名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择地另设一馆，由其亲自督导，如果有成效，那么总理衙门所办的事情就可以次第裁撤。

朝廷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随即下旨结束这场围绕同文馆招考事件的论争："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② 这一招将军之棋让倭仁颇为尴尬，只好上奏说明自己"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要让自己另行设馆。但他在奏折中还是重申反对让正途人员跟随夷人学习天文、算学。1867 年 4 月 25 日，上谕继续令倭仁"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③。同日，上谕又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或许是想让倭仁对于洋务事宜有客观的了解，以解除他对洋务事业的盲目反对。但是倭仁却不愿在总理衙门任职，上奏力辞。这益发表明他坚决反对洋务事业的立场。清廷不同意倭仁辞总理衙门之职，谕令："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务，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著毋庸议。"④ 倭仁辞却不了总理衙门的职务，只好称病请假。但病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6 页。

② 《清穆宗实录》第 199 卷，同治六年三月癸酉（1867 年 4 月 23 日）。

③ 同上书，同治六年三月乙亥（1867 年 4 月 25 日）。

④ 《清穆宗实录》第 199 卷，同治六年三月戊寅（1867 年 4 月 28 日）。

假不能无限期请，于是倭仁又称病请求开缺。但是上谕却不同意开缺，只同意再赏假一月。很快一个月假期又满，倭仁只好继续称病请求开缺，于是上谕令“倭仁不必给假，一俟气体可支，即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其余一切差使，均著无庸管理”①。顺势开除了倭仁的各项职务，只让其保留弘德殿大学士一职。

当时曾有人为倭仁鸣不平，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等，但都遭到上谕驳斥。特别是借申斥杨廷熙，谕旨语气严厉地对倭仁提出警告：“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一摺，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推原其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杨廷熙此摺，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该大学士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执己见，著于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②

由于有清廷的始终支持，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一事还是实行了。1867 年 6 月 21 日，在总理衙门举行了选拔考试。但是最终参加考试的人员中正途出身的很少，多是监生等杂项人员。总理衙门无奈，只好降格以求，从 72 名投考者中勉强录取了 30 人，入同文馆学习。1868 年 7 月，按照章程规定对这 30 人进行考核，结果有 20 人因学习没有效果被清退，只留下李逢春等 10 人继续在馆学习。为了补充缺额，总理衙门奏请谕令上海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就该地同文馆内选拔优秀学生来京考试。广东于 1867 年 12 月选送了 6 人到京，上海于 1868 年 4 月选送了 5 人到京。

纵观这场论争的过程，表面上看来，徐继畬所在总理衙门一方依靠清廷的支持取得了胜利，天文算学馆设立并开始招生，倭仁一派遭到申斥和打击。但是实际上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成功破坏了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计划，同文馆的发展计划遭遇严重挫折。

身为总管同文馆大臣的徐继畬对于这样的结果无疑会深感失望和沮丧。1869 年 3 月，徐继畬以老病告归。此后，同文馆总管大臣职位空缺数年，直到 1889 年，清廷简任曾纪泽、徐用仪为管理同文馆大臣。

---

① 《清穆宗实录》第 205 卷，同治六年六月甲午（1867 年 7 月 13 日）。

② 《清穆宗实录》第 204 卷，同治六年五月辛巳（1867 年 6 月 30 日）。

虽然同文馆的扩大计划没能如其所设想的那样实现，但是徐继畬和其他总理衙门同事们的努力还是为同文馆创造了通向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可能性。其一，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扩展了同文馆的课程内容，开启了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教学，从此同文馆不再是一所单纯的外国语言培训学校，而是逐渐演变为具有近代大学意义的学校。其二，天文算学馆的招生打破了同文馆只招收八旗子弟的规定，使之成为满汉学生兼收的学校，扩大了招生范围，这使同文馆可能选拔更多优秀生源，为其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风气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和西学的态度都有所改变，同文馆的处境也逐渐改善，招生额扩大，又逐渐增设了化学、格物馆。到 1889 年时，除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等语言文字各馆外，还设有天文、算学、化学、格物各馆。教学内容也“汉洋并习、功课较繁”①。1902 年 1 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综合性大学的一部分。徐继畬等人在 1865—1868 年间为同文馆的扩大和提升所做的艰苦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徐继畬既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又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之一。

（林齐模：北京大学校史馆助理研究员；
顾建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

① 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77 年版，第 126 页。

徐继畬与平遥超山书院

宋丽莉

徐继畬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早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并“开眼看世界”的人。这位思想的先行者就像划破长空的流星，尽管不能扭转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但却能为尚不觉悟的世人点拨迷津。徐继畬从手拥重权的一省巡抚到削职为民，仕途虽然中断，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学术道路并没有因此中断。在栖身平遥超山书院的十年时间里，这位“眼光向外”敢于学习先进的思想家开始转向“眼光向内”、教书育人、思想启蒙的民间生涯。

咸丰六年（1856），落职归里后的徐继畬在生活困苦中接受了平遥超山书院的聘请，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他的到来，对平遥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徐继畬执掌书院促动平遥等地学子的求学热情

平遥，虽紧临省城，但却是个文风不如商风盛的地方。徐继畬来时的平遥，经济发展冠称三晋，彼时商业全盛，城内大街小巷商铺鳞次栉比，十五个市场区域每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异常。其“商贸以颜料、货栈旅店、绸缎、布庄、医药、茶叶、烟业、洋货各商为主；钱肆以典当、钱庄、银号、印局、账局、票号领先”①。商业之盛，激发了当地百姓强烈的经商意识。时人对山西有“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② 的印象，此地尤其如是。虽然平遥

---

① 晋中市史志研究院编：《平遥古城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4页。

②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二年。

向有“尊儒重学，圣教覃敷，崇文尚礼之风”①，但事实上平遥的文教却与此并不相称。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平遥的书院数目较少，与其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书院是科举时代地方上设立用来供学子们读书进修、聆听讲学的处所。康乾盛世时，大兴学风，山西境内书院不断地修旧创新，大有普及之势。据称仅乾隆时期，“山西几乎平均每年建成一所新书院，运城、长治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书院，有的县份不止一所，而晋北落后地区也急起直追，像左云、天镇、五寨、静乐、河曲等县，均创立了书院，填补了历史的空白”②。而这一时期，平遥仅有一处西河书院。而且，这个西河书院也是勉强支撑，“渐趋废弛”，用于维持书院正常运行的“王公所买之田迷失，无可稽考”③。这在书院之风相对兴盛的清代山西来说，平遥的这种实际状况实在算不上“文风兴盛”。从另一个重要指标人口数量上看，平遥书院规模也是相对较弱的。其次，就学者数量较少，与其人口也不成正比。据载，早在雍正年间时，平遥以其“地丁钱粮于汾州八郡中实为巨擘，而入泮名数旧例中学”④，至乾隆年间，平遥“县属士子罔所风厉儒行，门修人文弗能振，惟科名之弗耀亦久矣”⑤。从这些情况看，平遥确实文风抵不上商风。

地区	晋南区	忻州区	晋东南区	晋北区	晋中区	吕梁区	总计
人数	2297676	1296241	1694728	1200341	2458731	1383252	10330969
书院数	40	14	16	11	21	9	111
书院/10 万人	1.74	1.08	0.94	0.92	0.85	0.65	1.07
位次	1	2	3	4	5	6	

（据成文浩、孙文学《清代山西书院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晋阳学刊》2007 年第 4 期，其依据是光绪本《山西通志》、《晋政辑要》以及各府、州、县志有关资料的记载，时间截至光绪年间）

咸丰六年（1856）起，徐继畬主掌超山书院。徐继畬在山西是远近闻名的鸿学硕儒，本身有着深厚的八股功底。徐继畬出身于仕宦门第，父亲

① 《修复文庙功德碑》，碑现存平遥文庙大成殿东侧后碑亭。

② 王志超：《山西书院史话》，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33 页。

③ 徐继畬：《平遥超山书院创建重修原委碑记》，碑现存平遥文庙超山书院中院之东。

④ 《改升大学碑记》，大清雍正三年岁在乙巳榴月立碑，碑现存平遥文庙大成殿之东。

⑤ 《重修平遥县儒学文庙碑记》，大清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夏日立碑，碑现存平遥文庙大成殿之东。

徐润第是乾隆末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储济仓监督、施南府（今湖北恩施县）同知，生平潜心于陆王理学和周易之学。在随父就学的过程中，徐继畬得以博览群书，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17岁以头名考中秀才，次年又在山西省乡试中以前四名的身份跻身举人。道光六年（1826），徐继畬以殿试一甲三名的身份顺利获得“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其后，徐继畬在地方任职，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到福建延建邵道道员、署理汀漳龙道，其后又历任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短期署理闽浙总督等职。在削职归籍前，徐继畬仕途平顺，思想活跃，爱国忠君，声名颇佳。

平遥超山书院之设，前身是古陶书院，创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几废几葺，一直徒具虚名。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始得以修文庙余资存当收息，才使书院有了必需经费。多年来，平遥“登贤书者只有两科多至四人，捷南宫者数百年来仅有五人。至于联翩直上，鼎甲争先，概乎其未之前闻”①，此番书院更名为“超山书院”，其意即在“促进文运高峣”。书院规模设备齐具充其量只是具备了硬件，要想真正提高学子水平，提升文化气氛，师资是其最重要的软件。基于此，平遥超山书院自兴建以来，志在求访各地鸿学硕儒以期振作书院文运。徐继畬落职归籍后，以其本身的影响和在学术上的造诣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超山书院董事们的重视。他们遂以大礼敦请徐继畬出任书院山长，其时徐本人正处于内焦外困迫切需要谋求一份职业之际，两相促成，徐遂就职书院。此后，远近求学于书院者络绎不绝。除在院三十余生员外，“邻县请批看课文者，亦二十余人”，同时“远近多有谋筑室赁屋以便请业”②。此外“幽、并、凉三州，馆课猥集”③。可以说，徐的到来，不仅极大地引发了当地学子的求学热情，同时也惠及周边，引发了周边学子的求学热。

---

① 《平遥县创立宾兴文社碑记》，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七月既望谷旦立碑，碑现存平遥文庙大成殿之东碑亭。

②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1页。

③ 同上书，第243页。

二 徐继畬开放思想及经世致用之学对当地学界的大促动

1840年，对中国来说是个意义非常的年份。这一年，“闭关锁国”与世无争的中国竟然遭遇了来自国外的武力挑战。在实力悬殊的枪炮对话中，中国一战而败，被迫放下“天朝上国”之尊，屈辱求和。在这扭转历史的非常时刻，徐继畬巧合性地以一个清朝大员的身份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一触即溃的事实让他在深深的痛苦中萌发了强烈的反省意识。长期以来经世致用的主导思想让他开始了“眼睛向外”的探索。知其强，要知其所以强。徐继畬本着这个最基础的出发点，开始“放眼寰球”，着眼于考察外国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特产以及风土人情。他利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广泛搜集资料，经过认真考证、求索，徐继畬标志性的鸿篇巨制——《瀛寰志略》于1848年完稿刊行。该书开中国世界地理研究之先河，多角度、全方位地向国人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基本真实的国外社会。此书一出，以其惊世骇俗的言论对思想陈旧的官场及当时社会产生了石破天惊式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国外民主制度的介绍直接触动了最高权威的神经。在一片指责声中，《瀛寰志略》备受冷落。在举世皆浊、众人皆梦的世事中，最先清醒的人不仅是精神上最痛苦的人，而且也往往是际遇最坎坷的人。徐继畬的起伏命运也正是这样一个“堆出于林”被风摧折的生活原型。其后，在两次被诬陷落职后，徐继畬带着他孜孜以求“放眼世界”的志向折转来到了超山书院。

徐继畬在书院期间，个人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并把其学术研究扩大到方志学、谱牒学等学科领域。如他在古代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方面，留有亲自评点的《后汉书批注》手稿，多抒己见。他在研究《汉书》与《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了《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沿边十郡考略》和《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在地方志的撰写过程中，对编排体例自成新章，并编撰了《五台新志》。在诗歌方面，徐继畬的《古诗源评注》亦独抒己见。此外，在八股文方面，他撰写的《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举隅集》和《超山书院课程》显示了其深厚的八股文功底，是清中后期八股文大家之一。他对学子们不仅教授文章之法，而且将他多年的潜心研究及治学心得体会进行言传身教。由于从学

渐多，他在“讲解经史，批改课文”的同时，“逐日丹铅狼籍，手不停挥”[①]，在悉心栽培学子的同时，他“经世致用”的为学态度及其“放眼寰球”的卓识远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学子。同时在超山书院就职期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开始在社会上广为传颂。徐继畲超乎世人的开阔思想，对“开放之风难入关”的内陆山西来说，可谓因近水楼台之便，而得风气之先。而这对直接受益于其教的平遥学子们来说则不会不有所触动。

三　超山书院时期徐继畲的教育思想当时堪称先进

方法上，尽管其教育仍以传统八股形式为主，但却一反传统道学究的态度。

首先，他鼓励学子们超脱八股文的框架局限。“在任期间，治院严谨有方训课一丝不苟，倾心于入院诸生的学业深造和培养，提倡研讨、争辩和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使诸生学习气氛宽松活泼。”[②] 徐继畲“在平遥馆中无日不搦管，无日不展卷。每命一题，辄草一篇未式”[③]。在参用八股文的同时，他“参用唐贤五律法，以求免俗”[④]。这种免俗的追求既是他本人的风格，也是他对枯燥八股文的一种否定。

其次，他对学子们的教育不仅限于八股，在个人潜心研诗的同时，对学子们八股以外的学习热情也给予赞赏和鼓励。徐本人研究面颇宽，且多有造诣，学子们在深受其言传身教的同时，志趣非止八股一途。有介休田子逢曾专程向其学诗，徐继畲虽自谦不受，但却对其诗仔细评点，不仅给予其中肯评价：“有性灵，亦有兴象，但未入老境耳。五言律诗已成体，七律七绝，亦多风致，古诗则初学，尚未成也”[⑤]，而且字里行间对其“不喜为科举之学”持欣赏态度。

学术上，他潜心研究的态度及其对现实的强烈思考和关注影响着平遥

---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45 页。

② 晋中市史志研究院编：《平遥古城志》，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61 页。

③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63—265 页。

④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2 页。

⑤ 同上书，第 609 页。

学子。咸丰年间，尽管世事纷纭，社会动荡，但科举一途仍遵循旧制，传统的忠君明伦思想仍是学业正流。所谓学业，就是“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①。超山书院之设，也是要“非徒讲文章也。正当讲明人伦”②。当时许多书院风气不正，不仅“山长充数，不问品学”，而且“士风浮夸，动滋事端”，学习也“多课帖括，无裨实用”，“注意膏奖，志趣卑随”③。徐继畬是个认真的学者，在执教期间，他杜门谢客、埋首教业，课余或潜心研究学术，或参谋地方政事。其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不仅浸透着他半世学术所得，同时也蕴涵着强烈的现实关注情怀。这种学识使平遥学子在尽得先生知识的同时，也不由自主会受到强烈的感染。

四 徐继畬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对平遥乃至山西产生过相当影响

徐继畬在长期留居平遥期间，与当地富商交往较多。不仅给当地不少商家写过墓志铭等文，据说还帮助蔚泰厚等票号修订过票规制度。票号研究专家孔祥毅先生认为徐早在出仕之前，即与平遥商人往来密切，一说蔚字号票号的号规是徐继畬协助制定的，其父还给蔚字号写过一副对联。

徐继畬因与山西巡抚关系较好，通过其实施了徐本人的一些政治主张。时任山西巡抚的王庆云与徐曾同在翰林院供职多年，颇有私交。王庆云任晋抚后，徐与其“多所书信往还，徐继畬屡建议，多被采用”④。

徐继畬本人有着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因而在当地积极参与了团练事务，防范农民起义军。徐继畬刚至平遥时，虽在行动上表现出“买菜讵访公府掾，种瓜休说故时候”⑤ 超脱官场的姿态，但思想深处却“梦魂仍伴紫薇省，杖履何心绿野堂”⑥。其削职后，同僚“多以塞翁失马相庆，每闻

① 《世祖章皇帝钦定卧碑文》，雍正癸丑孟夏立碑，碑现存明伦堂内正壁上。

② 《新建超山书院碑记》，大清道光二十四年岁次甲辰秋八月谷旦立碑，碑现存文庙超山书院中院东侧。

③ 葛飞：《晚清书院制度的兴废》，《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④ 徐继畬：《致王雁汀中丞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页。

⑤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3页。

⑥ 同上书，第236页。

此言，寸心如割……其心头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能忘也”①。惜乎其策多不为时用，只好转向地方。如1861年腊月归家时，徐继畬在家乡料理团练事务，次年又参与太汾平三府、沁霍隰三州、并关北之忻代两州团练事务。虽然其剿灭义军属利益派性所定，但他的这种实践活动对当地社会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

正是因为徐继畬本人躬身教职，倡导经世致用，受到了平遥学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敬佩与尊重。据称在其离开平遥时，当地各界人士及诸生弟子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送行的轿车队伍长达数十里，他坐的轿车已到达祁县城，排在后面送行的轿车还在平遥城。

应该说，徐继畬在官场起落屈居超山书院将近十年，是其人生低谷。一方面其生活清苦，既无力携眷共同生活，也常苦于举家居用；一方面在思想上，个人际遇的低落，使他在难以排解的忧国忧民心态中精神压抑。但同时，他以严谨的学风和超人的学识在教育的职位上潜心十年，培养了一批学子，推动了当地文教。从一定角度上说，他与超山书院的缘分，既是其个人之不幸，也是超山书院之大幸。

（宋丽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6页。

“山西并不闭塞”

——从徐继畬谈起

阎守诚

十几年前，我在李元庆、孙安邦主编的《三晋一百名人评传》① 中写过《徐继畬》，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瀛寰志略》的内容和影响、徐继畬的抗英策略以及徐继畬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时，我之所以写徐继畬，是因为我父亲阎宗临教授逝世之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在笔记本上做过一个简略的徐继畬年谱，写作的具体时间不知道了，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文革”的前夕。历史学者研究一个人物，往往先从编年谱入手，他为徐继畬作年谱，是在为研究徐继畬做准备。可惜，由于“文革”的缘故，打断了他的研究进程，没有能对徐继畬作进一步的研究。我写《徐继畬》正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研究吧！

我父亲阎宗临（1904年6月13日—1978年10月5日），系山西五台中座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4年高中毕业后，来到北京。1925年，在朋友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工厂做工5年，1929年入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文化。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讲授中国文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父亲和母亲毅然回国，共赴国难。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无锡国专及中山大学。1950年，应张友渔、赵宗复的约请，回到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逝世。

我父亲生前一直很重视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他常说：“爱国先从爱自己的家乡做起，爱家乡先从了解家乡做起，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桑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该热爱自己的家乡吗?”他自己

---

① 李元庆、孙安邦主编：《三晋一百名人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也身体力行，以中西交通史的学术专长从事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他曾说："山西虽是内陆地区，但并不闭塞。第一个去巴基斯坦与印度，取道海上返回中国的是东晋时临汾人法显，著有《佛国记》。金朝浑源人刘郁著《西使记》，叙述了报达帝国的灭亡和旭烈兀的西征。他的兄弟刘祁著《北使记》，记录了元初西北的风土、景物。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是清初平阳人樊守义的《身见录》。这些史迹都值得我们研究。"正是出于"山西并不闭塞"的认识，他亲自为这些古文献作了笺注，来证实这个观点，在山西地方史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十多年来，我没有再进行过关于徐继畬的研究。但在这期间，我国的史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也有很多新的见解，这必然会影响到对徐继畬的研究。由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上经典的世界历史地理专著，它在当时对人们开阔视野、启迪智慧、了解和认识世界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也是山西人对历史和学术的巨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瀛寰志略》出版160周年，恰巧也是我父亲逝世30周年，因此，想借此机会以"山西并不闭塞"为题，简单介绍一下我父亲在研究历史上走向和面向世界的山西人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山西人中最早走向世界并有专著的是东晋的僧人法显。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从小出家为僧，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西行求法，当时他已六十多岁了。法显大致是沿古代丝绸之路，经西域到中亚，再到南亚，至印度，是经陆路出国，而回国则是义熙八年（412）经海道回来的。前后凡14年，游历了29个国家，其中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等地。他以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千难万险，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旅行。他是汉唐时期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带回了大量梵文的佛教经典，翻译了戒律经典六部六十三卷，为中国佛教的系统化和正规化作出了贡献。他还根据游历中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佛国记》，详细地记录了中亚、南亚、南洋诸国的地理、历史、宗教和风俗。因此，《佛国记》成为今天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史地的重要资料，也是一部世界名著，有法文、英文、日文等多种译本。我父亲在1965年完成了《佛国记笺注》，他在《后记》中写道："前搜集中亚与南海资料时，得向觉明先生的帮助，以南京四学院所刻《历游天竺记传》为底本，参照《宋云行记》、《西域记》、《佛游天竺记考释》及《法显传考证》等，试为笺注，对山西地方史料或

有补于万一。”但这个笺注在他生前并没有能发表，只有一个手稿。我把这个手稿编入了1998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阎宗临史学文集》和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阎宗临作品·中西交通史》中。

我父亲在《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①]上写了《北使记》笺注和《西使记》笺注。《北史记》作者刘祁（1202—1250），山西浑源人，金朝名士。兴定四年（1220）金主完颜珣派遣礼部侍郎吾（亦作乌）古孙仲端出使北朝（金人称蒙古为北朝），以求两国和好。乌古孙独往西域，涉流沙，逾葱岭，觐见成吉思汗于回纥国。成吉思汗拒绝和好，乌古孙无果而还。刘祁是乌古孙好友，根据乌古孙讲述的出使经过和见闻，写成《北史记》，收在刘祁所著《归潜志》第十三卷内。《北史记》记述了西域、中亚各地的风俗，可补正史的不足。《西使记》的作者刘郁是刘祁的弟弟。元宪宗二年（1252）旭烈兀受命西征，消灭波斯的木乃奚。此后即进兵两河流域，征服报达帝国（即黑衣大食，首都在巴格达），结束了阿巴斯王朝，再向西进军，占领叙利亚，到达地中海滨，建立起伊儿汗国。宪宗九年（1259），常德奉命西行，出使慰问，次年返回，历时一年又两个月。中统四年（1263）三月，刘郁记录了常德出使情况，写成《西使记》，成为研究蒙古向外扩张的重要资料。《西使记》刊于王恽《玉堂嘉话》中[②]。由于《西使记》中有关于中亚的重要历史资料，一直受中外学者重视，在清代即有英文和法文的译本。在《西使记》笺注的绪言中，我父亲曾说明笺注这两部文献的原因，他写道：“《中州集》内，元遗山简介刘从益时说：‘从益有二子，祁字京叔，郁字文季，俱有名于时’[③]。刘祁笔录乌古孙出使北朝的经过，刘郁又记述常德出使的经过，真是兄弟比美了。从山西地方文献而言，两种记述，弥足珍贵。故就所知者为笺注，作为研究中亚历史的资料。”

《身见录》是我国第一部旅欧游记，距今已将近三百年了。《身见录》的作者樊守义字利和，康熙二十一年（1628）生于山西平阳府。康熙四十四年（1705），因为“礼节问题”，罗马教廷派多罗来华，处理纠纷。清廷以宾礼优遇，但多罗行为不端，于康熙四十六年（1705）自南京发布

---

① 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山西地方志研究》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王恽：《秋涧大全集》第94卷，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元好问编：《中州集》第6卷，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禁约”，康熙非常不满，为了澄清是非，同年冬，康熙派艾若瑟出使，与教廷对话，樊守义随行。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才又陪同艾若瑟东还。舟行至好望角附近，艾若瑟病故，樊守义独归中土。回到北京后，很多人询问欧洲风土人情。樊守义于康熙六十年（1721）将其旅欧近十三年的经历写成《身见录》。樊守义是历史上第一个用文字叙述自己对欧洲观感的中国人，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意大利当时封建割据的情况和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风气。因此《身见录》有它独特的文献意义。但《身见录》最早只由目录学家王重民在北平出版的《图书季刊》上发表“罗马访书记”一文中介绍过，原稿并没有刊行，收藏在罗马图书馆，夹在《名理探》一书中。1937年，我父亲到罗马，将原稿拍照带回，并加以考校注释，最早刊于1941年广西桂林《扫荡报》的《文史地》副刊52、53期。新中国成立后，经修订重新发表于《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2月号。经过父亲的努力，才使这一珍贵文献得以公诸于世，广泛流传。

值得强调的是，我父亲认为：《身见录》的性质与《佛国记》相仿佛。法显与樊守义又同是平阳人。所以，他在《身见录》校注的《后记》中说：“平阳时出名人，晋时有涉绝幕的法显，清初又有渡重洋的樊守义，两人记述，幸完整传于今日，在山西乡土文献说是有特殊意义的。”

樊守义之后，面向世界的山西人就该是徐继畬了。所以，我父亲的学术视点就转向了徐继畬，可惜，刚一接触，就中断了。

法显和樊守义同是平阳人，而我父亲和徐继畬不仅同是五台人，也同是面向世界的山西人。他们相隔一个世纪，经历和际遇都不一样，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研究也不一样。徐继畬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开始面向并走进世界，但中国人并不了解世界，所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世界的介绍和研究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梁启超说：“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①]

我父亲的学术命运却充满坎坷。他对世界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版于七十多年前，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但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漫长岁月，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改革开放、学术昌明的今天才重新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和广泛的好评。

---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24页。

我父亲在高校任教四十余年，主要是从事世界史和中西交通史的教学与研究，他通晓法文、拉丁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在西学与国学两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他的代表作品，如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法文本）、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以及重要论文，多发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78年父亲去世之后，我一直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著（包括手稿）。1998年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2003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法国早期汉学与传教士》，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阎宗临作品》（包括《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欧洲文化史论》），全部约一百万字。“阎宗临的作品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多年来罕见的一种真学术。那里没有半句空话，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矫饰，有的只是个性鲜明、中西会通、见解独到的历史文化分析和论述，以及透过这些论述所折射出来的一种至深至切的对于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且，虽然是真学术，阎著的文字却一点也不枯燥，相反，它十分的灵动优美，耐人寻味，能让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能让你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史学大手笔。”① 我父亲作为山西籍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研究和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他也关注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关注法显、刘祁、刘郁、樊守义和徐继畬这些面向世界的山西人，才有“山西并不闭塞”的思想。

事实上，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而且三面是山，北靠蒙古高原，因此，在古代，山西是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地方，也是一个军事要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山西与外界的交往相对困难，也就比较闭塞。但即使这样，历史上也有许多山西人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他们的研究，是山西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我父亲对面向世界的山西人的研究，主要还是那些能著书立说，在文化交流上有贡献的人。其实，学术视野应该放大一些，比如，明清以来的晋商，就是一个走向全国，甚至世界的群体；清末、民国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从山西出国留学的人才；还有改革开放以来，走向世界的山西人，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山西并不闭塞”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

① 高毅：《邂逅阎宗临》，《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3期。

“山西并不闭塞”的历史传统，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和宝贵。山西经济要腾飞，社会要发展，人民要富裕，就必然要加强和世界的联系，在各个方面与世界接轨。要做到这点，前提是要认真去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著名的学者饶宗颐教授在为我父亲的文集作序时，他用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话，来说明“知彼”之学的重要，也就是“究心西事”的重要，他批评国人长期不重视对“西事”的研究，指出“近世学风，流弊之大，国之不振，非无故而然也”。他称赞我父亲：“（余）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徐继畬也是真有志于“知彼”之学的，因此，他才能写出《瀛寰志略》这样杰出的著作。我们今天纪念徐继畬，最主要的是继承“山西并不闭塞”的历史传统，认真研究“知彼”之学，使山西真正面向世界，为建设山西贡献力量。

（阎守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继畬与晋商

张 舒 正 明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道光丙戌（1826）进士，官居福建巡抚，悉通外务。精心所撰《瀛环志略》，不仅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的一部拓荒之作，而且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巨著。徐氏在这部著作中，很注意考察西方的商务，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航海贸迁，不辞险远。"①他认为西方人，是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②。徐继畬生活的年代，正是晋商在国内外商界活跃的时期，徐氏作为山西籍人，又悉通外务，对于国内晋商的兴衰、经营之道，自是十分关注。他曾为晋商族人撰写"寿序"，为晋商遭受兵盗之祸害与捐输各事奔走疾呼。

一 机遇是晋商兴起的一个因素

徐继畬认为蒙古地方与内地商贸的开放是晋商兴起的一个因素。明代蒙古地方与内地，仅是断断续续有限开放官市或民市，内地商贾不能深入蒙地经商，间有者也只能走私。入清后，允许内地商贾持"龙票"（类似今之通行证）到蒙地经商。山西地邻蒙古，这就给晋商赴蒙经商一个很好的机遇，从而促成了晋商的兴起与发展。徐氏以忻州周朴斋家经商致富为例，说明了这一情况。徐氏指出：周氏所以能"不数年而少有，又不数年而富有，迨公年四十余已累资巨万矣。……有感于公之际遇熙朝，中外无

---

① 《瀛环志略》第4卷，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② 《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疆域之限，故能起家塞外，无异于起家州里也”[①]。徐氏指出，雁以北为古边陲，戎马时来，堡寨之民多贫瘠。但是入清后，漠南漠北各部悉编入八旗。在漠北者为外蒙古八部，经商服贾者得以深入瀚海往来如内地。在漠南者，为内蒙古，“服贾者亦时以百货往，车驼往来，殊无限隔”[②]。周朴斋先世以贫无生产，移家于萨拉齐厅（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勤苦治生，粗能温饱。朴斋15岁，其兄18岁时，兄弟俩抓住清王朝允准内地商贾，凭“龙票”可赴蒙古各地区贸易的机遇，深入蒙地各旗经商而致富。时朴斋正逢壮年，冒寒暑往来塞外，手足肌肤皴裂，面目黧黑，勤劳治生。晚年以塞外非葬身地，又移家故土。朴斋虽为忻州巨富，且轻财好义。姻族之急贫者，周恤无虚日，亲友婚丧不举者，量为资助。更有甚者，取积年借券焚烧之。遇荒年，开仓周济饥民无难色。因此，周氏“虽骤富，而感颂者多”[③]。

二 晋商女中豪杰

徐继畬与晋商多有交往。他说：晚年返乡后，一度在平遥超山书院任教，与介休富商冀国定相识，其子“从余受学已数年，故太夫人之风范，知之为最详”[④]。所谓太夫人，是指冀国定之夫人马氏。冀国定为介休北辛武村富商，在他主持时期，“资业半在荆楚，又有在京师、畿辅、山左者”[⑤]。冀氏仅在湖北就有商号70多家，以当铺为主，资本在10万两以上的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等，时冀氏家存现银300多万两。冀氏七代单传，冀国定40岁膝下无子，后续娶马氏，生5子，冀家人丁兴旺起来。冀国定去世后，因“诸子尚未更事”，内外皆由马太夫人经理。徐继畬对这位马太夫人的才干十分赞赏，他在《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序》中称：马太夫人“内外诸事悉自经理，南北贸易经商字号，凡数十处，伙归单簿稍有罅漏，即为指出无不咋舌骇服，不出户庭，而六辔在手，综理

① 《诰封武翼都尉周公朴斋八十寿序》，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⑤ 同上。

精密，不减赠公在时。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①]。马太夫人掌管冀氏商务及家务近20年，凭借马太夫人的精明能干，使冀氏在商界很有影响。据说，平遥开标利，如果马太夫人不到就开不了场，因为不知马太夫人是放还是收。徐继畬指出，“身闺壶之中，而夙明大义，深识远见，或为男子之所不及”，对马太夫人“巾帼丈夫之称，遐迩如出一口也”[②]。

三　社会不靖和捐输过频是晋商衰败的一个因素

首先，清代从乾隆后期，社会危机已渐呈现。嘉庆年白莲教起义，道光年鸦片战争，咸丰年太平军、捻军起事，都是清王朝的衰亡之兆。社会不靖，兵祸连绵，王朝又加捐加税，人民负担加重。在此状况下，晋商的贸易活动自是更加艰难。徐继畬对此很有认识，他认为盗贼频出，是晋商受害之一。徐氏说：“南路之祁、太、榆、徐、平、介，北路之归化城一带，盗案层见叠出。……口北之盗，皆山东骑马贼，散于各厅之乡村。店伙之黠恶者暗与通线，客商往来银钱货物骡马，往往被劫。蒙民交杂之地，事隶七厅，法制向本疏略，盗劫之横行已达七八年矣。其地虽在口外，而生意皆祁县、忻州之人。两地之元气未伤，所持者东西两口，今乃竟成畏途。……太汾各县之盗案受害者，当铺富户；口北之盗，受害者专在客商。……今又黄河屡决，淹为泽国者，数年粮船不行，水手之赋闲者以数万计，弱者转死沟壑。强者四出为盗，乃必然之势。太、汾数十县夙有富名，归化各城夙称繁盛，群盗之集于此，盖亦无怪其然。”[③] 徐氏不仅指出了晋商遭受盗贼所害之苦，并且指出了盗贼产生之因和盗贼集聚之故。

其二，晋商遭受兵祸之害。徐继畬说：“近年南方遭兵燹，商号折阅已甚。”[④] 徐氏以介休北辛武村富商冀氏为例称：咸丰初“全楚被兵，（冀氏）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近两年来，海淀字号被焚掠者

---

① 《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② 同上。

③ 《致王雁汀中丞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页。

④ 《侯节母李宜人五十晋六寿序》，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8页。

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尤多，亦大半被焚抢，较之从前，家资不及十之三”[①]。正如徐氏所说，冀氏商号资产因兵燹已损失十分之七，余仅十分之三资产，损失相当惨重！

其三，晋商遭受捐输之害。清王朝后期财政十分拮据。名为捐输，实为强迫。商人深受其害，而晋商是最大受害者之一。由于清王朝多次摊派商人捐输银两，商人难以承受。徐氏指出：山西“较为有力者，不过太原之祁、太、榆、徐，汾州之平、介及忻州耳。此外，皆贫瘠之区。……惟太、汾各大县上年甫办捐输为数甚巨，此时再行接办，各捐户难免竭蹷。”[②] 徐氏对晋商捐输数额曾作统计。他指出：“晋商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③] 《清史稿》载：清王朝财政收入，嘉庆十七年（1812）岁入银为4013万两，道光二十二年（1842）岁入银为3714万两。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④]。可见，当时清王朝财政岁入仅三四千万两，而晋商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总之，徐继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之官员，能以犀利之眼光观察世界，洞悉国情，剖析晋商，其远见卓识，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张舒：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
正明：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① 《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② 《复阳曲三绅士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页。

③ 同上。

④ 《清史稿》第125卷，食货六。

徐继畬与山西地方社会

赵俊明

徐继畬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知府、道台、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直至福建巡抚，两署闽浙总督。考察其一生，尽管入仕为官数十年都是在山西省外，但他无论在仕还是被罢官都同家乡有着诸多联系，对当时的山西地方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和贡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关注山西地方政务

作为出生于山西的官吏，为官之初徐继畬对山西省内政事极为了解和关注，不断上疏皇帝，奏明家乡官场的积弊，并献言献策，以求清明山西政务。

道光十三年（1833），中进士七年后的徐继畬补陕西道监察御史。初拜台谏，正值道光帝下诏求直言。由于长期关注山西省内政事，徐继畬对家乡官场积弊了解甚多，接连上疏参劾贪官。首先，上《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参劾忻州知州史梦蛟和保德知州林树云不理政事，入省钻营。“史梦蛟任忻州最久，一年之中在州署者不过三四月，其余八九月常在省中。林树云任保德州亦复如此。……每到省中，其门如市，两人在山西最久，亦历州县甚多，问其官声，绅民绝无颂感，不过长于应酬，善于逢迎，历任上官倚为心腹，名为两地守土之官，实为省垣垄断之首。一则由忻州升知府，旋调首府。一则由保德州调署汾州府，此其

盘省垣之功效也。”[①] 为达自己升职和提拔属员的目的，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省城，四处结交钻营，最终得以到要害岗位。徐继畬严正要求道光帝严惩这些擅离职守、投机钻营之官，以刹住奔竞之风。紧接着他又上《特参藉端科敛疏》，揭露山西平阳镇总兵部费音借祭告商汤王陵，巧立名目，大肆摊派，仅荣河知县武履中便“在署内设筵，遍请书差。……在城内设公馆七处，汤陵附近设公馆七处，科派乾菜铺垫银一千五百两，修理裱糊器皿、灯笼、彩绸、红毡、夫马一切杂派又五千余两，其余无名之费不可胜数”[②]，搜刮民脂民膏达白银两万两，绝大部分装入私囊，以致出现“胥吏四出，日事追呼，阖境骚然，民不聊生”[③] 的惨景。要求道光帝“严行查办，勿事姑容，勿任消弥，以儆官邪而苏民困”[④]。当获悉武履中得信被查，便说合本地绅民、村长，为其出具退还赃物证明、企图极早结案。又上《特参退赃诱结疏》，揭露部费音、武履中搞假证明的卑劣行径，进而揭露当时山西州县贪污成风，遇有言官参劾或百姓告发，上官千方百计保护贪官，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结果使贪官污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种种事实。并要求道光帝下诏重新审理，按律惩办，以求使“回护消弥之积习可略除”[⑤]。

继而又上《请整顿晋省吏治疏》，揭露当时山西历任官吏，不讲操守，重案不办，把当官作为发财的途径。道府州县官吏利用词讼收受贿赂，致使百姓倾家荡产，官吏累万盈千收入私囊，上官因饱其应酬，对下官不但不参劾，反而包庇、调动甚至提拔。尤其遇到赌博、鸦片案牵连富家子弟，官吏便视案情索钱，未审理曲直，先接受贿赂。更有甚者，遇有命盗重案，州县官更是借机勒索，接受贿赂，颠倒黑白，讳大为小，讳有为无，致使善良百姓垂头丧气，有理无处说，而有钱有势之人愈益得志，横行霸道。即使有个别不服继续上告的人，上官又以为州县已经处理，若翻案必然参劾贪官，便授意复审官员以恐吓手段威胁上告的平民，最终还是

---

① 《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 页。

② 《特参藉端科敛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特参退赃诱结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 页。

维持原案。为此，他建议道光帝下诏，对声名狼藉之官严加参劾、解任，对受贿之官，“严加追究，必使尽情败露，置之重典，不得发交本管道府任其消弥”[①]；对操守廉洁、百姓爱戴之官，加以奖励，优先提拔，务使贪廉分明，以达到惩贪奖贤之目的。并要求“严饬各该州县遇有命盗重案，据实详办，倘有隐匿不办者，经该管上司访闻或民人告发，先将该州县奏参解任，提省严究，如系有意消弭，即将该员严行参办”[②]，以使晋省吏治有所起色。

此外，他还关注山西的盐政。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对当时一塌糊涂的山西盐运状况甚为不满，在所作的《盐法论》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加之山西省南部连年旱灾，百姓难以负担巨额的盐课，提出对盐课“归地丁之说，策之万不可行……行票之说，策之可行”[③] 的改革方案。

由于此后他一直在南方为官，距离家乡较远，对山西的情形可能不甚熟悉，期间没有关于山西政事的奏疏。但在他被罢官归田后，仍然关注山西的盐政，在写给巡抚王庆云的《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中从复商断不可行、官办难于经久、归丁之情形不同三个方面发表的对山西盐政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再次出仕后在京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徐继畬仍挂念山西省内的情形，1867 年底，回民西捻军张宗禹部由陕北延川、绥德等县渡过黄河，到达晋西吉州，又上《请命助剿疏》，请朝廷派重兵助剿，以维持山西地方稳定。

二　督办团防，协助维持地方社会稳定

在徐继畬被罢官在乡的十余年中，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先后发生了太平军、捻军起义、回民叛乱，山西地方社会治安不断受到冲击，出于自身的责任和朝廷的征召，徐继畬多次参与督办团防，帮助维持山西地方社会的稳定。

在徐继畬被撤职回到五台后不久，1853 年北上的太平军攻占了河南怀

---

① 《特参藉端科敛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请整顿晋省吏治疏》，第 5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③ 《盐法论》，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5 页。

庆（今沁阳），并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占领了垣曲。作为有名望的乡绅，徐继畬挺身而出，借用布政使司的印花，同团练总局在籍鸿胪卿贾亮才、侍读郭棣园等具名向朝廷上《奏参抚臣哈芬纵敌入境迟延贻误晋省危急请速拨兵赴援折》，列举了巡抚哈芬由于防堵失误，致使晋南之垣曲、绛县、曲沃三县失陷，平阳告急，而其"统带重兵竟以泽潞为避贼藏身之地，城池之接连失陷一概置之度外……误国之罪当居何"[①]？请求由福建的王庆云取代山西巡抚哈芬的职务。后来清廷派恒春代替了哈芬，徐继畬以退职官员和地方绅士的身份领导省城太原的地方民团，同心合力，保守城池。后来由于太平军扰及河北，镇州告急，五台戒严。徐继畬立即"带兵勇回五台，防要隘，办团练，劝捐输，保卫桑梓"[②]。太平军闻当地早有准备，没敢入境，从而得以无事。在此期间，还奉命向乡绅筹集资金。在《复阳曲三绅士书》中说："弟在五台劝捐，费无限唇舌，所捐不足二千金。"[③] 虽然仅仅筹到不足两千两银子，但他还是相当尽力的。

不久之后，响应北伐太平军的捻军在晋东南地区起义。第二年春，巡抚恒春请徐继畬指挥整个晋东南地区的民团。年近六旬的徐继畬赶往晋东南，从东南两面布置防御。"于二月由省垣先赴辽州，查看各口隘，即转黎城，查阅东阳关，转至潞安、长治等处召集官绅，会商进行各事。……日衣短后，率文武，裹糇粮，乘驴马，亲历各地，遍加勘察。其最要者，如云头低、黑龙洞、黄泽关、大摩天岭、抓角岭等重要关口，皆择地筑阵垒，布置兵员，放哨稽查，定里驰传……"[④] 同时，徐继畬还责成文武官员收集他所管辖地区各个关隘的地图，开展防御性的侦查活动，做了卓有成效的防御准备。

1854 年底，徐继畬推荐过的王庆云接替恒春出任山西巡抚。作为昔日旧友，徐继畬给他写了封长信，就镇压盗匪与造反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山西的防守事宜应注意这样四条：守口宜择要，练兵宜聚集，将才宜物色，火器宜讲求。

---

① 《奏参抚臣哈芬纵敌入境迟延贻误晋省危急请速拨兵赴援折》，《松龛全集·奏疏》卷下，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22 页。

②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01 页。

③ 《复阳曲三绅士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1 页。

④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10 页。

徐继畬以年近六旬之躯，在上党办理防堵事宜历时一年半左右，1855年“秋间即议撤防，所有留守裁撤迁散等善后事诸事正多棘手，与陈剑芝观察、恒月川方伯祥切筹划，先后分步办理报宪查核，煞费苦心”[①]，到八月底才完毕告归。对于他在此间指挥民团办理防堵事宜的作为，后人选编的《山西献征》有这样的评价：“值粤匪北犯，当事奏派先生督办，防堵其，后回捻猖獗，复奉督率官绅总办各府州团防之命，驻太行年余，亲历各要隘，所措置悉合机宜，沈文定、桂芬时抚晋甚倚任之。”[②]

1861年冬，有一股直隶的流匪窜入徐继畬的家乡东冶镇一带。东冶是五台城西南处的一个较大的市镇，有居民千余户，店铺字号二百余家，居民们惊恐异常，诸绅问计于徐继畬。徐继畬“劝办团练，并请知县余小欄令派邑人王秋原任其事，并署把总”[③]，以帮助他组织地方民团，防御流匪，维持治安。由于他们事先早有准备，使得“流匪不敢遽来”，[④] 闾阎复得平安。

1862年，捻军入关中，巡抚英桂再次请徐继畬一起筹商防堵事宜。徐继畬“明知体弱力衰，不堪任此，而既奉简书，又系捍卫桑梓，义不容辞，亦不敢辞。……英中丞嗣又奏明，以太汾平三府，沁霍隰三州，并关北之忻代两州团练相委”[⑤]。然而由于年老体衰，他不能承担重任，推荐了永宁李子廉镇军、临县张子云协戎、介休李东樵、侯春坪两户曹为帮办，并举荐参与过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王春野为沿河团练总办，巡抚英桂具加以委任，而这些人也都能悉心从事，办理得当。

三 讲学著述，致力发展地方文教

出生于封建时代书香门第的徐继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徐润第在知施南府三年归里后，辗转于五台、晋阳、崞县和介休等地以教书为生，徐润第的堂弟徐寅第也是由教蒙馆而成为拔贡知河北省肃宁县，徐家可以说是一个教育世家。受他们影响，徐继畬一生除在外为官

---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9页。

② 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山西献征》上册，民国二十五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印，第29页。

③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5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259页。

外，在家则教导族中子弟及乡邻好学者，在外较长时间受聘于平遥超山书院，教书讲学，为山西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1827 年，在徐继畬中进士后的第二年，由于父亲徐润第卒于任教的介休馆舍，他急偕夫人回乡安葬并在家守孝。第二年春天，即有介休的士绅想礼聘徐继畬接任其父的教习位置，他没有接受。但他在守孝在乡期间也没有闲着，“设法教导本族子弟如侄孙实甫等外，邑人亦友亦弟子或随入馆，或往来请益，所知者如王丕显、谢瑚、赵盘文、杨安民、王瑞琳、刘贡西等皆各能树立”[①]。其中王丕显后来中进士，做官有清名，杨安民、王瑞琳、刘贡西三人也都中了举人。这是徐继畬在为官之前的一段短暂的教书生涯。

1852 年底徐继畬被罢官返回家乡五台县后，不久即赶上太平军窜入山西，他先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督办团练进行防堵。在 1856 年再次返回五台后，省城太原的绅士便诚邀他到晋阳书院执教，他深表谢意但没有接受这一职务。此后不久，他接受平遥官绅的邀请，到超山书院任主讲[②]，由此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教书生涯。

平遥超山书院是由当地的绅士们兴办的私学，大事由董事会决定，日常事务由值年董事经管，徐继畬只负责教 30 名在院生，另代批改 20 名邻县学生的作文。为了让学生们能够通过八股考试进入仕途，他努力研究八股文，收集八股样板 32 篇编成《举隅集》，并作了精辟的讲解，作为学生们的教材；而且每月以八股文来“大课生童”，还亲自动手写了 50 多篇文章和 30 多首试帖诗，集为《超山书院课程》来做示范，创造了一套新的教学方法。除了八股文之外，在其他知识传授方面，他也全力以赴，把自己所知尽力教于学生。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和诲人不倦，使学生受益匪浅，致使其他县的许多学生也来超山书院赁屋居住，听他讲课，请他批改文章。1861 年徐继畬写的《致先篪八弟书》中说，“今年平介两处外课将及三十人……自因三拔贡之故”[③]，这也致使书院不得不改进设施，扩建原有的讲堂和 15 间校房。不少门生后来或取得功名，步入仕途，或继承祖业，

---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3 页。

②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5 页。

③ 《致先篪八弟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4 页。

经商致富，均学有所成。同治三年（1864），徐继畬七十初度，他的一批门生自发地组织起来，送上缎面金字寿屏以贺，署名者共计 87 人。从身份看，有进士、举人、副榜、拔贡、优贡、监生、教职、康增附生、辅台、童生。可见，他主持超山书院期间，确实为地方培养出了不少可用之才。

1869 年，徐继畬以老病乞致仕告归归里，还家之后，"就东冶镇东街中丞第延接请业者如刘井瑛、张映环，西街有渠纶阁、凤阁兄弟，皆有才，习举业，来执弟子礼。定每月逢五讲学，逢十课文"[①]。如此不辍，直至 1873 年卒。

此外，徐继畬还为服务桑梓编撰书籍。在超山书院期间，他对地方志撰写与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撰写《五台新志》。至同治四年（1865）撰成初稿三卷，第四卷有目无书。因被召入京，以所作《五台新志》三卷付侄孙徐耘田，曰："此余未竟之书，所缺乡善、列女、艺文之卷，尔遵余文续之，他日贤父母修邑志，呈之以供采择。"[②]徐继畬所编的《五台新志》仿李寒支之志宁化例、康对山之志武功例，一洗前志繁芜，独具别裁。全书以叙事体，行文畅活，独具匠心。如叙治所，则历叙街衢；叙山川，则兼及物产；生计门，详述农工商贾之生活状况而不举物产，是志还纠正了水道一门疏舛之处。光绪初，曾国荃抚晋时，阅手搞，赞赏"综核简明，义精文赡，诚著述家当奉为准绳"[③]，并命县令依原目补辑成书。杨笃赞赏"是书质实简严，不屑铺张粉饰，诚古法也"[④]。

此外，他还在 1864 年的《致武芝田观察论县名及县志书》中对山西所修的郡县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山西郡县志弟所见无多，省志亦不过集各州县志而成，因讹袭谬，绝无可观。惟《潞安府志》沿革尚不甚舛误，文亦晓畅，自系出同人之手，苦太烦冗，尚需删节。最芜者太原各志……三晋志书名作，惟汾州府及汾阳县新志出于戴东原之手，景星庆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84 页。
② 同上书，第 270 页。
③ 曾国荃：《五台新志・序》（光绪版）。
④ 徐耘田：《五台新志・跋》（光绪版）。

云，偶然一见，此不独山右所无，即宇内亦仅见”①。并极力推崇陆清献修的《灵寿志》、李寒支修的《宁化志》和康对山修的《武功志》，指出修志应以这些为模本，对山西省内的志书修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 结交、品评晋商，关注地方商业发展

徐继畬的高祖赐禄，幼年失怙，家道中落，分家只分得薄田三亩，破屋三间，瘦牛一头，破车一辆。他毅然将这些不值钱的家产悉数卖掉，怀揣变卖家产所得资金，随乡人游塞外贩卖牛羊，加入了晋帮旅蒙商的行列。历尽千辛万苦，赚得一些钱财，家境稍裕，便起房盖屋，娶妻生子，在故乡五台县东冶镇住宅旁开了一家木材店，同两位家兄合伙经营，家道开始中兴。而徐继畬家乡五台处在经得胜口（大同北部长城要口，明代马市市场）、浑源、五台、曲阳到河北定州的这条重要商道上，他从小便感受到了晋商的兴盛。

他的父亲徐润第于湖北施南府同知任上辞官归里，先后设教于河南光州、山西五台、晋阳、崞县、介休。在介休县，曾应当地人称“侯百万”的侯培余之请设馆于北贾村，教授其季弟绍先等治举业。尽管时间不长徐润第便病故了，但也使得徐继畬对晋商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德雷克就曾断言：“很明显，就在徐继畬获得高位之前，他对那些商业团体也并非不了解。”②

但徐继畬和晋商有更多结交则是在他晚年应聘出任平遥超山书院的山长期间。平遥城自晋商的崛起后，就成为中国北方商埠重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各业店铺多达200余家。然而，山西商人历来既从商，又重教。商家子弟需经过读书受教的训练培养，才有资格继承祖业，严课成为山西商人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平遥商品经营和货币经营的迅猛发展，平遥商界捐资修复久废不用的超山书院，延聘名师，培养后代。超山书院由24家商绅组成董事会管理经营，书院“山长由绅士询访进士之

---

① 《致武芝田观察论县名及县志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679页。

②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有品学者，禀县尊送关敦请”①，而徐继畬无论人品、才学、官声、资历，都是最佳人选。于是自咸丰六年（1856）起，徐继畬受平遥官绅延请，从家乡五台来到平遥，主持超山书院，设帐授徒几近10年。

在平遥城从事经商活动的商贾大户，与徐继畬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介休侯家。在徐继畬应请撰写的《侯节母赵太恭人七十寿序》中，可以看出他与侯家的密切关系：“先君子施南公（按即其父徐润第）尝与笃斋副车（按即侯培余）为宾主，教其季弟绍先。余顷年设帐绵田，与其昆仲游，晚岁归田馆平遥，又交其群从子孙。累世通家，过从无间，故其家事知之为最悉。”② 后来，侯家改营票号，业务突飞猛进，到咸丰年间，其规模与实力，几与鼎鼎有名的“日升昌”票号不相上下，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机构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增多，必须相应地制定一套组织章程和规章制度，以约束全体人员，更好地拓展业务。恰在此时，徐继畬出任超山书院山长，于是经东伙的协商，请徐继畬通力相助，执笔为文，制定出一套包括票号内部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经营业务管理等内容的号规章程。简约的文字中体现着近代晋商严密组织、严格管理、务实崇信、宽严相济、责利分明的管理文化，贯穿着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继承与认同，闪现着儒、道、法、兵诸家文化的光华，可以说徐继畬参与其中并对山西票号管理制度亦有所建树，当不为过。

咸丰年间连绵不绝的战乱当然也祸及晋商，这在同徐继畬关系密切的另一位晋商介休冀家的遭遇中可窥见一斑。因其父在介休北贾村侯氏教馆担任教师时便同冀国定相识，故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后，冀国定五子冀以正慕名而来，投其门下为徒。在其母七十大寿时，徐继畬在《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大寿》一文中述及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战乱对冀家的影响：“是时，全楚被兵，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近两年来，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尤多，亦大半被焚抢。较之从前家资，不及十之三。”③ 冀家如此，其他晋商自然也难逃厄运。在另一

① 《平遥超山书院创建重修原委碑记》，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94页。

② 《侯节母赵太恭人七十寿序》，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8页。

③ 《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大寿》，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篇文章中，徐继畬以同情的笔调，略述晋商当时的普遍遭遇："各殷户家资，皆在买卖。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所称为富户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①

战乱给遍及全国的晋商所造成的巨大财产损失显而易见，但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而筹措军饷时，仍把目光瞄准山西，一再对晋省商民下谕捐输，名义上是"暂时挪借，以助国用"，实质上是变相苛征。据《军机处副录》，当时管理户部事务的祁寯藻上报捐输情况的奏折中提到，自咸丰二年（1852）二月起，截至咸丰三年（1853）正月，近一年中，以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其中山西捐银就达 159.93 万两，占到全国捐银总数的 38%，居全国首位。这种捐输对晋商发展打击之大，可以想见。徐继畬在《潞盐当议致王雁汀中丞》、《复阳曲三绅士书》中则力陈捐输对晋省商民的危害，真实地道出了清政府对山西商人超限度的加捐苛求，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在《致刘玉坡制军年伯书》中，他还感叹道："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如此捐纳不止，山西"富民膏血已罄竭矣"。② 也反映他内心对晋商的真切同情以及对晋商发展的极大忧虑。

综上可见，作为出生于山西的官吏，为官的徐继畬关注山西地方政务，为山西的政务清廉作出努力。在被罢官在乡的 10 余年中，则在乡督办团练，帮助维持地方社会稳定；讲学著述，致力发展地方文教；结交、品评晋商，关注地方商业发展。这些都对当时山西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继畬也对自己的家乡山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俊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

① 《潞盐当议致王雁汀中丞》，《松龛全集·奏疏》卷下，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 页。

② 《致刘玉坡制军年伯书》，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0、671 页。

五台徐氏父子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周山仁

“敦艮斋”为五台徐润第先生的书斋名，先生所作“札记”、“书信”①，由其公子徐继畬在福建任上的1848年（戊申年仲春）刻版，即是《敦艮斋遗书》。徐润第先生一生笃服阳明心学，而且嗜好易学，“先君子中岁即潜心易学，官内阁中书时，不妄请谒，公余闭门，手《周易》一编，冥思默识证以儒先讲学之书，旁推交通，独有心得”②。《敦艮斋遗书》，就其内容而言，就是用周易八卦，与阳明心学相互证得。是书较少发明，也难说对阳明学有多少创见或推动，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对当时的山西学界，以及对徐继畬的思想言行都有一定的影响，故有探幽穷赜的必要。

一 徐润第先生的事功及其师友弟子

谈及徐氏父子的学术，必须先了解清代山西的学术源流。山西自明清以来，传统教育、学术一直停滞不前，甚至“鄙陋不堪”。以科举考试的成绩为例，有清近三百年，山西科举考试竟无一状元，仅有一榜眼，三探花。③ 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传主，除阎百诗祖籍为太原外，竟无一人入选。④ 然至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晋人于成龙、陈廷敬、

---

① “（先君子）……归里设帐，从游日众，诸生请业之余，先君子辄为讲授入学宗旨，证以易象。其人猝未领会，则伸纸疾书书千百言或画图缀说以启悟之。……道光丁亥奉讳归，捡得札记数册，乃嘱及门诸子各钞辑所存，共得若干卷。”徐润第：《敦艮斋遗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郭荣生：《清朝山西进士》，台湾商务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页。

④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范镐鼎以理学，祁韵士、张穆以边疆地理入选。[①] 尤其是后者，对山西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祁韵士、祁寯藻、张穆、王轩热衷西北边疆地理学，他们之间有着师承关系，于山西学风有扭转之势。当然这种建立在传统教育体制之上的学风转变，与西方学校教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持八股而取干禄者，当有云泥之判。

清代学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开启风气。[②] 尤其是顾炎武，严惩明末的讲学之弊，关心"六经所指，百姓日用"，讲求"通经致用"，考据学由是而发。总而言之，清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其学风与明代"空疏"的学风截然不同。当然，宋明理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主体，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不过，清代的理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争执不像宋明那么激烈，甚至有心学、理学调和的趋势。

就宋明理学发展而言，山西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明代"新建学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时，山西仍然以理学为正统——不能说阳明心学没有对山西学界没有影响，但山西似乎一直缺少心学的大师级的代表人物。整个明代，山西理学界服膺的本土大师是薛瑄，或者说薛瑄的理学影响，抵制了心学在山西的大规模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徐润第的心学就有了一定的意味。

按照近代学者常赞春的说法，山西文化由明代衰落，"明祖之兴，以枭雄之姿，猜忌成性，恨王保保太原之守，于是剥削山西之进士与翰林，以摧其文化，盖唐以后，文学之盛衰，随科名转移"[③]。

常赞春曾为民国初年的"清史馆"作过清代乡贤人物的事迹文献整理工作，对山西学术和文化有较为准确的判断。[④]

山西学术发展到近代，有几个学派和人物值得注意。一是对傅山学术的回顾和重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按照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说法，清代学术的走向类似"文艺复兴"，逐渐地由当代向远古回溯。当然，山西学者对傅山学术的重视，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和晚清文网

---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中国书店1990年版。

② 这里需要说明，王夫之其实对清初的学术界几乎没有太大影响，王夫之在复国的努力失败后，窜逃于江湖，与当时的学术圈几无交往，直至晚清曾国藩兄弟重印《船山全集》，王氏思想才得显现。

③ 常赞春：《常子襄国学文编》（手稿），第133页。

④ 常赞春为清史馆编纂清代山西人物的事迹和文献，以供清史馆采用。此资料就是后来编辑成书的《山西献征》。

松动，本土学者孺慕乡贤的心理有关系。如寿阳刘雪崖先生，抛弃功名，“尤慕傅青主先生之为人，所得片言单词，如获至宝”①，由此刊印《霜红龛集》。另外有阳曲张廷铨、张廷鉴也热心搜集傅山先生的著作。一是以寿阳祁韵士开创，平定张穆发扬光大的西北边疆学、考据学派。祁韵士子祁寯藻“屡掌文衡，且多与文人学士交”，当时除了张穆外，曲沃的张子特、寿阳的阎汝弼的朴学，代州冯志沂的古文，徐沟乔松年的考订和诗词，都受张穆影响，都为名家。另外一派就是五台的徐氏父子。“五台徐广轩究心阳明学派，文亦清劲。子徐继畬作《瀛环志略》，世尤称重。然文学以举业特长，亦成一种风气。”②

其实，徐润第不仅为山右心学名家，而且与傅山学术有很大的关系。寿阳张氏兄弟为广轩先生的学生，当时“阳曲张太史廷铨与弟廷鉴方搜集傅青主先生遗著，且欲以实学为乡里倡”③。于是张氏兄弟邀请润第至省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崞县的张震、寿阳的刘雪崖，均以搜集傅山遗著为志向，诸学者关于傅山先生的学术“恒就先生相商榷，先生间为引申，识语率能得青主言外旨。刘先生所刻《霜红龛备存》录先生所论独多”。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对徐润第先生的认可。

《清史稿》徐润第先生没有专传，只是在徐继畬传后说“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④。徐润第生平，常赞春《山西献征》有生平记载。⑤ 又台湾方闻先生有《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⑥，以及徐继畬著《徐氏本支叙传》，能大概条理出徐润第先生的事功和学术。

五台徐氏为当地望族。徐家始祖由洪武年间迁往五台大建安村，大建安村属东冶镇。到徐继畬生活的时代，东冶镇为“五台合县大都会，居民千余户，铺户字号二百余”⑦。所以当地有俗语“县不如镇，镇不如村”

---

① 常赞春：《山西献征》第6卷，台湾山西文献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版，第35页。

② 常赞春：《常子襄国学文编》（手稿），第135页。

③ 同上书，第21页。

④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86页。

⑤ 常赞春：《山西献征》第5卷，台湾山西文献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版，第20页。

⑥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发行。

⑦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作者按：东冶之繁华，一是此地为五台不多的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且有水可以灌溉。五台又富煤炭，东冶商家经营煤炭生意者不少。如徐松龛诗有《驮炭道》，就是当时的写照。

之说。[①] 徐家一直以力耕为业，到七世时，人丁有百余口，七世祖徐镛入学为岁贡生，任武乡教谕、定陶王府教授，由此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曾祖为县邑庠生，而长子徐敬儒则为乾隆乙卯科乡试举人，大挑为永定河南岸同知、九江府同知。由此徐家正式步入仕宦人家。

徐润第为徐家迁入建安村的第十四世，乾隆乙卯科进士，由内阁中书迁储运仓兼中仓、海运仓监督、施南府同知。[②] 在充任粮仓监督期间，徐广轩先生剪除积弊。己巳年（1809）漕运仓库发生“梭米霉变”之案，清廷震怒，各仓场监督“皆革职处分”，唯独徐润第先生所督察储济仓米干净，独无处分。[③] 之后，通州中西两仓白米案又发，仓场因为徐润第先生廉明，故而让他兼任中仓事。后任施南府同知，淘汰胥吏近八百人，并在施南府设立乡社，设立社长，防止盗匪抢掠。1814 年，徐润第先生辞职，往武昌佐谭光祥幕府。1815 年好友谭光祥去世，润第先生心灰意冷更绝意仕途。1820 年，徐润第先生由京返里，设帐故里，开始了多年的砚田生涯。

徐润第先生“治陆王之学，特精于《易》，并特阐扬傅青主先生之学识”[④]。徐润第先生之好陆王，其学术渊源，从现有资料好像还难以证实。根据常赞春《山西献征》的说法，徐润第先生入学邑庠时，王秉韬为五台县令，“好讲学，先生从之游，学益进”[⑤]。徐继畬也说：“先君子受学于三韩王含溪先生，从游最久。”[⑥] 王秉韬《清史稿》有传，评价他“性方正，不沽名”[⑦]，但没有谈及王秉韬的学术。1795 年徐润第先生中进士，房师为太湖李荫桓（长森）[⑧]，入京供职后，内务府大臣佶山延请教其子，即后来的内大臣阿灵阿（子实甫）。[⑨] 佶山父子与徐润第的师友关系一直维系，到 1820 年徐润第去职后回京，仍然下榻阿灵阿家中。在京期间，与徐润第同官定交者有高兰墅（鹗）、桂香岩（龄）、杨启庭，讲学读书之

① 这里的镇就是指东冶镇，村指阎锡山故乡河边村。

②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发行，第 3 页。

③ 常赞春：《山西献征》第 5 卷，台湾山西文献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版，第21 页。

④ 同上书，第 3 页。

⑤ 同上书，第 20 页。

⑥ 王秉韬为汉军旗人。《徐继畬集》（一），第 598 页。

⑦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1367 页。

⑧ 查杜联喆等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没有关于李荫桓的资料。

⑨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97 年版。《清史稿》有两个阿灵阿，此阿灵阿当为咸丰朝卒于刑部尚书的大臣。但《清史稿》没有专传。

友有南丰谭兰楣、山左徐郁亭。

1820年十月，徐润第回故里，最先设教于东冶镇。1822年徐润第设教于晋阳（太原），与张静生舍人讲学，作《中庸私解》、《逍遥游解》，读张舍人所叙傅青主书，作杂言多篇。① 1823年徐润第设教于崞县（现在原平县）之北社。1826年，徐润第设教于介休胡龙，1827年设教于介休贾村，同年九月卒于贾村。徐润第先生回籍设教，门生可谓遍及晋北，"先生在籍除设法教导本族弟子如侄孙实甫、耕田外，邑人亦友亦弟子或随人馆，所知者王丕显，道光五年解元，谢瑚、赵盘文、杨安民、王瑞琳（两人皆道光十五年举人）、刘贡西（道光十七年举人）。"② 除上述弟子外，查《敦艮斋遗书》"校字及门钞辑姓名"③，徐润第先生的弟子有：

满洲阿灵阿　介休张之翰　光州赵珍麟　光州王文鼎　光州王文晋　阳曲王万昌

阳曲张廷铨　阳曲张庚泰　阳曲李甸　阳曲冯瑶　太谷柳彬　介休张雨田

介休郭永锡　介休白世馨　介休侯步余　定襄薄懋昭　定襄梁契孔　定襄薄承砚

崞县李楷亭　崞县李达人　崞县续新德　崞县李学闵　五台刘升瑞　五台刘升鉴

五台张志贤　五台史兆麟　五台李思白　五台李维清　五台胡宗绪　五台赵湘芳

五台贾登龙　五台韩昶　五台贾登瀛　五台赵新国

由学生的籍贯可以看出，徐润第先生的教育影响主要在忻州、太原和介休一带，"诸生请业之余，先君子辄为讲授儒学宗旨，证以易象"④。所以，徐润第先生的阳明心学也随之传播。

二　敦艮斋心学对徐继畬学术和行为的影响

徐继畬和林则徐、魏源一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徐润第：《敦艮斋遗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14页。
④ 同上书，第16页。

分子。有学者将徐继畬归类“经世学派”[①]，“经世学派”本就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所谓经世学派的标准，无非是看士大夫是否关心“庙堂朝野”、“百姓日用”。晚清很少有士大夫能皓首穷经而不问国是者。与其简单地给历史人物贴一个“经世派”的标签，不如深入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从而更有说服力。

徐继畬从少年起即随其父启蒙入学，其间因其父忙于仕途，合少分多。下面根据方闻先生的《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辑出父子之间的交往情况。

乾隆六十年（1795）徐润第先生中进士，这一年徐继畬出生。1801年，徐继畬7岁时随母入京，同年因徐润第母亲病逝回家守制。1804年徐润第回京，补舍人转内阁典籍，此为闲职。次年，续夫人挈徐继畬入京，开始随父亲在京读书。直到1811年，徐润第先生被选为施南府同知为止，徐继畬一直随父亲在京读书。当时徐继畬与王月潭子王秋宝、王万昌一起读书，始习八股文，徐润第先生批读课文，王月潭负责讲经义。[②] 1812年，徐继畬入县学，次年山西乡试第四名中第，可谓少年科甲春风得意。1816年徐润第先生辞职后被河南光州知州王瑶峰延入幕府，同年冬徐继畬往光州依父，一直到1819年。1820年后，徐润第先生回乡讲学，徐继畬入其叔父幕府，至此徐继畬的“庭训”生活结束。道光六年（1836）徐继畬中丙午科进士，同年九月，徐润第先生卒。前后累计，徐氏父子在一起大概度过11年的时间，徐润第先生一方面教授八股制义，一方面濡染心学，修身养性。当然徐氏父子之间的沟通，不仅庭训的耳提面命，书信也是重要的手段，值得学者注意。[③]

《论继畬书》是徐润第先生在壬申年（1812）给其子徐继畬的回信。从信中可以了解到徐继畬向其父请教的几个问题：关于自省的问题，关于寡欲的问题，关于保身的问题，关于为人的问题，关于应酬的问题，关于涵养的问题，等等。

信的一开始徐润第谈及父子别离之情以及对好友寿山之死的感叹：“一室中人财分飞化为乌有，当日之花团锦簇，恍如一梦。”宦海沉浮、人

① 冯祖贻：《徐继畬属于什么派》，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8页。

②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页。

③ 徐氏父子间的书信见《敦艮斋遗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17—846页。

事苍茫使得徐润第有很浓的出世念头，他说："我自水难以后，颇有醒悟，去了许多执滞妄想，佛氏之言解脱。"① 这也是以后徐润第急流勇退的重要思想原因。

对于徐继畬的问题，徐润第分成几个层次来回答。

首先他告诉徐继畬心术人品是文章功名之本，"尔既应试，自然望得。然勤读经史，体认义理"②，他认为近世以来，世人以为博取功名为学之本，可谓"大迷"，本末颠倒。因为功名是否取得半由"命数"，而自修则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不得功名，但"于嗣续之道已暗自潜滋长，其为家运灵长之福"。因为科举考试的名额限制，功名能否取得确实很难把握，徐继畬将之归为不可知的"命数"，很容易理解。

然后徐润第开始具体回答徐继畬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自省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自省"要坚持"恒"、"忍"两个字。关于如何寡欲的问题，徐润第认为"人心属火，不能无所寄"，寄托于粪草则臭气冲天，寄托于檀香炉则香气满室。要做到程子的"整齐严肃"则自然心就有所寄托了，平时要在威仪上著功夫"日用间正衣冠，尊瞻视，步趋坐卧有度，笑语唯诺有常体，土地席床打扫干净，书卷笔架摆列端方，所谓直内方外……"③ 后人描述徐继畬的仪态"仪冠甚伟，风度端宁"④，与其父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关于保身的问题，保身一在"谨疾其义易明"，一在"涉世其端难知"。保全在于体会"几"这个微妙的征兆。必须沉静如石才能做到察"几"。不要犯智小谋大、力小任重、位卑谋尊的事情。关于为人之道，为人要"抱此一片慈祥恻坦之心"，徐润第在这里痛斥所谓违背人心的"义"（这里是权宜的意思）。为人要为大人，大人不是富贵崇高、矜气谋人之意，而是指顺养自然之性的意思。关于应酬，一是文貌谦和，一是言语诚实。另外，就是徐润第对于"含养"的发挥，他用离、坎的周易理论，论证事物内部此消彼长的关系。用八卦的坤象解释"含"的意义。在另一封家信里，徐润第先生对前一封信又作了补充。他说："六合茫茫、纷纷攘攘皆苍生也。畬其中之一耳。世有世运，

① 《敦艮斋遗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21页。水难，指徐润第1811年选湖北施南府同知，六月经武昌买舟而上，至巴东猝遇风暴，几死。

② 《敦艮斋遗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21页。

③ 同上书，第824页。

④ 常赞春：《山西献征》第1卷，台湾山西文献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版，第29页。

家有家运，身有身运。太仓一粒何所恃？”充满了悲观顺世的色彩。他讲人要去私欲，必须先“虚其心”。而虚的境界是“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其道光明也。”①

当然徐润第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思想。如对科举取士一定程度的批评。他有《听谭兰楣讲中字有省歌以记之寄家塾》诗，说“道德一降为功名，功名再降为富贵。工文字为学之成，搏科甲为志之遂。此是俗儒大规模，润也少小随成例”。告诉徐继畬“读书非无花生笔，万法归一一是心”。另外就是对“女子未嫁以死殉”的批评。② 他认为女子还没有和订婚的丈夫举行婚礼，因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丈夫。上古时候，订婚的双方都可以悔婚，为什么要求女子未嫁而殉呢？从这里可以看到徐润第很浓的人本主义色彩。

总之，徐润第的学术思想大概有几个特征：其一，徐润第学术属于阳明心学，说理则用《周易》的卦象与心学之间互证。其二，徐润第思想中有很浓的出世悲观思想。其三，受佛教思想，如因果报应、福田暗滋的影响。

徐继畬亲受父亲濡染 11 年时间，敦艮斋心学自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徐润第先生思想中有很浓的佛教意味，徐继畬自己就说：“生平不喜道家之说，其书荒诞不经。佛氏教门之书，称为相宗，驱神役鬼，幻杳无凭，付之一笑；宗门之书，称为性宗，即禅教也，《楞伽》、《指月》中多清悟之语，亦颇喜之。”③ 但个人的学术长成，除了家训师友之外，当时代的风气、个人的品质爱好亦有很大的作用。嘉道时期的名士龚自珍，其祖父段玉裁为小学名家，但龚自珍却好公羊④；曾国藩宦京师时，与倭仁同入唐鉴师门习理学，国是丛脞，曾国藩后期以洋务为业。⑤ 道咸时期，乾嘉学派开始走向低潮，边疆地理学方兴未艾，徐继畬无疑也受到了边疆考据学的影响。1827 年九月徐润第先生病逝，徐继畬丁忧在籍，1828 年介休绅士礼聘徐继畬承其父之教职，设帐介休。也在这一年，徐继畬作《尧都

---

① 徐润第：《敦艮斋遗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847 页。
② 同上书，第 891 页。
③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1 页。
④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3428 页。
⑤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1907、11735 页。

辩》、《晋国初封考一》、《晋国初封考二》[1]，开始将兴趣转向史地学。就现有资料看，徐继畬与当时边疆史地学重镇的张穆也有来往，在《致张石舟书》中，徐继畬表达了对张穆的尊重，以不能送达《瀛环志略》而表为憾事。[2] 徐继畬的谱牒学和方志学的思想也颇有客观处。如他在《介休冀氏族谱引》中，要求修谱牒要实事求是，反对“凿空伪纂，以自证其先人，是可忍孰不可忍!”[3] 其作的《五台新志》，山西巡抚曾国荃称赞为“综核简明，善精文瞻，诚著述家之准绳也”。晚清方志学大家杨笃评价说“质朴简明，不屑铺张粉饰，诚古法也”[4]。而且，从徐继畬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徐氏似乎受到颜李“事功学派”的影响[5]，如他作的《又不为斋诗集序》，文后自注曰：学李恕谷文体，自记。[6] 在《诰封一品夫人周母陈太夫人九十寿序》中，引用李塨的表述等等。[7] 总之，与其父的学术思想相比，徐继畬的学术思想无疑要入世和积极得多。当其父学术的影子还能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下文条分缕析徐继畬的学术思想。

其一，基于其父心学的道德立身观

徐润第的道德立身观对徐继畬的影响极深。徐继畬一生最大的挫折就是闽抚任上的“神光寺事件”，直到晚年每一思此就“泣血椎心”、“死不瞑目”。处理“神光寺事件”的徐继畬受到本地士绅、京师闽籍翰詹科道的重重压力，尤其是在籍的名满天下的林则徐的压力。但他能顶住压力，有理有节地和外国传教士打交道，无疑和他的理学修养有很大关系。徐继畬说他自己“性戆愚，不谙世路”，“性情缓懦，赴机不敏，顷在闽中办夷务，以此获咎”，“学术疏拙，办事不合时宜”[8]。只有“性戆愚、不合时宜”，才能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采取韬光养晦的方法，防止与外人引起直接的冲突，保持和局，颇具理性精神。晚年时，徐继畬说“回首平生，

---

①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3—590 页。

② 同上书，第 716 页。

③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600 页。

④ 同上书，第 319 页。

⑤ 颜元和李塨清初提倡的实用学派。这一学派在清代影响不大，直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力为颜李弘扬，世人才知这一学派。根据现有资料很难判断徐继畬受事功学派的影响多大，但徐继畬看过李塨的著作而且还极力模仿确实是事实。

⑥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8 页。

⑦ 同上书，第 626 页。

⑧ 同上书，第 664—665 页。

一钱不值，惟‘名节’二字留以盖棺，不敢再有玷污，究竟亦不过为一‘自了汉’而已”①。遵从其父亲的训导，徐继畬出为封疆大吏，入为京卿，却为官清廉，“不名一文”，甚至因为无钱向朝廷捐输而向按察使求情。② 他自道自己的情况：任外官十余年，所任都是苦缺，办公以外，家中没有置办田产。放四川主考，才得数千报酬，“归田后始得苫盖数椽，为栖身之地，否则并此无之”③。宦囊羞涩也是徐继畬不得不以窳弱之体设帐教书，养家糊口的重要原因，徐继畬在多封书信中有此表达。徐继畬设帐多在晋商发达的晋中，但“除弟子从学，致送束脩外，从无通融借贷之说。闽中好友间有以绨袍相赠者，亦从无向其借贷”。和当时代的墨吏贪官相比，徐继畬确实是一个讲究名节的君子。

其二，具有工具理性的处事能力和开放的外交观。

可能受颜李事功学派的影响，徐继畬处理政务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这在他的《禁鸦片论》里面能够很完整地体现出来。他认为，应该重治吸食者，避免与“甚强”的英国人直接冲突。他说“审其势之所趋，而徐为之图也”④，具有因时制宜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在徐继畬的身上体现的最为充分的就是他对“神光寺事件”的处理，他认为此时“英夷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⑤。在没有能力和西方相对抗的情况下，最后就是保持和局，以图发展。他对西方人的看法在当时也明显高人一筹，他说：“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其货物耳。”⑥ 道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在全球开拓市场的实情。在《瀛环志略》中，他更称赞华盛顿与西方民主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他朴素的现代精神。

其三，基于儒学的人本主义思想。

像他父亲一样，徐继畬有很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徐广轩反对女子未字而殉，徐继畬比他父亲更为开放。在《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一文中，徐继畬认为妇女“不能守而改醮，亦常情耳，彼固为贤，此亦中人，未为

---

①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1 页。
② 同上书，第 661 页。
③ 同上书，第 662 页。
④ 同上书，第 590 页。
⑤ 同上书，第 705 页。
⑥ 同上书，第 652 页。

不肖也”[①]。在纲常森严的社会，徐继畬的这种议论可谓“异类”，可与戴震的“以纲常杀人”的警句并称。此外徐继畬还认为“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欲其真不欲其伪，欲其节不欲其流”，承认人的正常欲望，而且人的欲望和忠孝对等，圣贤豪杰的事功，大抵不远离人情。徐继畬还从历史上分析了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原因，以为五代之后，世风萎靡，夫妻之间“轻亵已甚”，所以程子有此表述。但“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不应该胶着过去，只要妇女同意，就可以另嫁。另外，本着人本主义的精神，徐继畬对普通劳动大众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的诗《啖糠诗》与《驮炭道》就是这种感情的表露。

其四，重商主义的思想倾向。

徐继畬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五台东冶镇，自然对商人和商业不陌生。其父设帐介休、阳曲等地，亦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徐继畬任职翰林院时，得同乡商人梁问青的资助：“索米长安，出无车，而君假以车，助以薪水，使无困乏。”罢职回乡后，又在榆次设帐，多与晋商富家盘桓。能看到的寿贺序文有：《诰封武翼都尉周公朴斋八十寿序》、《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序》、《侯节母赵太恭人七十寿序》、《侯节母任太宜人五十晋六寿序》、《常母任太宜人六十寿序》、《诰封一品夫人周母陈太夫人九十寿序》等等。徐继畬笔下商人多有识器，行为多为磊落君子。他说：“人生有聪明、有器识，二者往往不能相兼且近似不相涉……器识者根于性分，其器能有所容蓄，其识能有所区限。其人或读书，或竟不读书，而临财能让，遇侮能容，遇事则行止立断，而无所犹豫于其间，士大夫之所不能自足者，其人终身无蹉跌。聪明或绌，而器识独优。”[②] 由此可见他对商人的推崇，在农业为本、鄙视商人的社会环境中，徐继畬的思想可谓超前。

结　语

五台徐氏父子的学术和思想对于山西甚至中国的现代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主持纂修《山西通志》，徐继畬列入“乡贤录”。《瀛环志略》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在中国，尤其在日本，

① 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② 同上书，第620页。

《瀛环志略》先后翻印数次，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则在同治五年（1866）始再次刻印。郭嵩焘远渡重洋，出使英国时，以《瀛环志略》为向导书。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叙述，17 岁时见《瀛环志略》始知万国。梁启超 18 岁时在上海才见到《瀛环志略》，由此知道五大洲各国。晚清进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祥认为："徐继畬先生在道光年间，即主平等外交，接受西洋文明，可谓维新先觉之士。"[①]

徐氏父子对山西近代也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太原起义不遑人后，任山西督军的阎锡山曾说："锡山生长边郡，愚戆成性，髫年入学，窃读乡贤正《瀛环志略》书，每思航海西渡，考察拿破仑、华盛顿之战迹。"[②]辛亥太原首义前后，山西五台，尤其是东冶镇籍的志士仁人人数众多，如阎锡山、赵戴文、赵丕廉、张瑜、王建基、徐翰文、康子韩、徐一清、王庆恩、李自牧、白映斗、赵三成、赵云若、赵涵溪、徐子中等等。按照方闻先生的说法，五台号称贫瘠偏僻小县，而能如此，以当日言，实非易事，推厥原因，则多系直接或间接感受《瀛环志略》及父老乡亲传说徐先生为人之影响，故得风气之先。

（周山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①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27 页。

② 同上书，第 322 页。

近20年来徐继畬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岳谦厚　卫　俊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开放意识或开放观念的先进历史人物之一，《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最早借鉴西方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徐氏本人及其该书均在近现代中国乃至国际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开始，国内外学界同仁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不过，最突出的成就则体现在对徐氏著述——《徐继畬集》的整理出版方面。该项成果从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之时开始，经过20多位人文社科工作者历时6年的资料搜集、分析、研究、校勘、撰写、统编，于1995年7月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文集是迄今为止国内搜集校勘徐氏著述最完备的一个版本，全书共分为4册，第1册包括《瀛环志略》、《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续编》、《文集》、《诗集》、《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五台新志〉手稿》、《徐氏本支叙传》；第2册包括《后汉书批注》、《古诗源批注》、《小题八集批注》、《退密斋选批举隅集》；第3册主要是徐氏奏折；第4册为《题本》。丛书的出版不仅为徐继畬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亦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就在徐氏著述整理过程中，1991年7月首次“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又在山西忻州举行，此次会议共收到30余篇论文，任复兴在《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研究综述》[①]一文中已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主要就此次会议以来或近20年来学界关于徐继畬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以增进学界对目前研究状况的了解，探讨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或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

①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一　徐继畬的近代化思想

徐继畬近代化思想是学界关注的中心议题。郭剑化、杨华在《〈瀛环志略〉近代化思想》① 一文中指出，作为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成果的《瀛环志略》，在向中国人启蒙地球万国一般状况的同时，亦进行着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即认同多元世界并向代表世界先进潮流的西方列强学习，包括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瀛环志略》所蕴涵的这一思想对中国近代化历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张承宗、苏利嫦在《学习与传播先进文化的先驱徐继畬》② 一文中阐述了徐继畬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一位先进人物在积极学习和传播先进文化过程中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会聚其主要思想的《瀛环志略》则是当时国人了解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史地名著。齐虎田、阎相国在《略论徐继畬关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③ 一文中指出：徐继畬在其代表作《瀛环志略》中冲破了"华夷大防"的传统观念，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先进性一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了介绍和评论，含蓄地阐明应效法西方民主政治的自强思想，这一思想比同时代人单纯从物质层面上看问题或偏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的自强思想要高出一筹，对 19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吕耀东在《徐继畬对近代西方列强国家实力的认识》④ 一文中指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对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欧洲列强的实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以世界多元化的视角探讨了欧洲强大的历史及现实原因，并对近代世界格局和中国周边危机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要在应对国际"变局"中知己知彼、自强不息。杨永福的《从徐继畬、郭嵩焘的遭遇谈起》⑤ 则通过徐继畬、郭嵩焘两位文化精英人生遭际的比较，分析了"华夏中心主义"拒斥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及其危害。杨玲的《中国早期铁路信息的传播者——徐继畬》⑥ 与任复兴的《热心引入西方文化的

---

①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②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③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④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2 年 2 期。
⑤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1 期。
⑥ 《世界轨道交通》2007 年第 7 期。

清末巡抚徐继畬》[①] 则从另外两方面阐述了徐继畬的近代化思想，前者着重说明徐继畬是中国描述铁路制造工艺和火车工作原理的第一人，后者则强调徐继畬在引入西方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

有关徐继畬近代化思想的探讨亦常见于一些相关的研究论著中。雷颐的《被延误的现代化》[②] 一书介绍了徐继畬坎坷的人生命运，认为他的这种命运正好预示或反映了清王朝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③] 一书指出，从林则徐到魏源、徐继畬乃至梁廷枏、姚莹，道咸年间中国思想界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是在民族精神的链条上完成了一个必要的环节，是在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进行思想准备，而这一准备工作又是在文化心理的震动中进行的。各位思想精英的种种言论都体现了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文化效应，而中国人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思想注定将从这里开始。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④] 一书则介绍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甘明对徐继畬编撰《瀛环志略》所作出的贡献，认为正是美国传教士推动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得以"外窥"之"牖"，使得他们的著作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了解和观察世界的窗口。而且，传教士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承载者，将对近代思潮的演化和晚清中国现代化事业产生持续的影响。

二 徐继畬的爱国思想

对于徐继畬爱国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很多论文与相关著作从不同角度对其爱国思想进行了阐述。其中，王振铎在《城市研究》连续发表 5 篇文章（即《徐继畬初论》、《再论》、《三论》、《四论》、《五论》）[⑤]，前 3 篇通过徐继畬在对西方的发现与看法上、在近代观念引进与实践上、在近代化蓝图设计与对外交往上的考察，认为他是"东方的伽利略"和近

① 《炎黄春秋》1995 年第 9 期。

② 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大象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⑤ 《城市研究》1994 年第 2 期、1994 年第 6 期、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第 6 期。

代中国“发现”世界的第一人，亦是“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一代宗师”以及晚清初期对外开放的中坚人物。《四论》着重讨论了徐继畬、林则徐爱国思想的差别，认为他们尽管在认识西方及其采取的对策上存在明显对立，但都是爱国主义者，只不过徐的现代成分多些而林的古典成分浓些。过去之所以将徐排除在爱国者行列之外，无非是凡对西方强硬就是爱国、关门亦可搞现代化之类思想的反映。《五论》侧重阐述了徐继畬对晚清时弊揭露与抨击的因果关系，认为其之所以如此乃在于发现了中西问题的实质。李珍梅的《论徐继畬的爱国主义思想》[①] 则主要从禁烟抗英、严参贪官、清廉自持、编纂《瀛环志略》、放眼世界等方面阐述了徐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出他不愧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苏利嫦的《徐继畬——被淹没的近代爱国者》[②] 是将徐继畬与林则徐、魏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他们均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然而，徐继畬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他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摆脱了传统“华夷”观念和传统爱国思想的拘束，走向了近代化道路。又因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悖于传统，因而受到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压制，其著作的价值只能随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深入而为世人逐步认识，所以他是一个被传统爱国主义所淹没的近代爱国主义者。魏文青的《徐继畬思想简论——兼论徐继畬与鸦片战争》[③] 一文主要围绕徐继畬与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展开讨论，着重分析其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对中西思想文化进行的深入比较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代表了时代的精神，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铁牛、吕凤林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徐继畬》[④] 一文主要从《瀛环志略》所表现的观点及徐氏本人重返朝政后的所作所为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破产等三方面阐述徐的历史地位，认为徐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在著作方面，刘贯文的《徐继畬论考》[⑤] 是为推翻徐继畬历史冤案而撰写的专著，是迄今为止国内人文社科研究论著中大胆推翻晚清统治者强加给徐继畬的历史大冤案，还徐继畬“八闽清廉吏，爱国学问家”历史本

---

①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② 《山西档案》2003 年第 1 期。
③ 《理论探索》1999 年第 3 期。
④ 《五台山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⑤ 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

来面目的考证性论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蔡乐索在《拥抱世界——徐继畬》[①] 一书中指出：徐继畬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唤醒沉睡的国人并使他们正确了解变化的世界、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吸取经验教训、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和独立，将全部感情和心血倾注于笔端，向国人展示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徐继畬倡导了认识世界、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知识的潮流，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袁伟时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②] 则从徐继畬处理“神光寺事件”的方法出发对爱国与投降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文化既有精华亦有糟粕，盲目的自我中心和自大心理就是最突出的负面影响。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③] 分析了《瀛环志略》主要的资料来源及其写作特色，指出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而非资料汇编，它叙述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文字简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其人在宦海中的沉浮，其书在社会上的毁誉，典型地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在曲折中蹒跚前行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后人有理由赞成西方人的评价：徐继畬即“东方伽利略”。

三　徐继畬的对外思想

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也许出于对华盛顿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歆慕，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给予美国较多关注，这亦引起了学界浓厚的兴趣。刘纬毅在《徐继畬〈瀛环志略〉和早期中美友谊》[④] 一文中向国人介绍了《瀛环志略》在传播西学方面的作用，尤其侧重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介绍，并对徐继畬在早期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张伟在《盛赞华盛顿的晚清晋儒徐继畬》[⑤] 一文中指出徐继畬是中国“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宾长初在《论徐继畬的欧美观》[⑥] 一文中对徐继畬的欧美观进行了介绍，认为他对西方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突破，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这种突破是相对的，从而在“开眼看世界”和了解

① 蔡乐索：《拥抱世界——徐继畬》，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④ 《沧桑》1999 年第 1 期。
⑤ 《文史月刊》2003 年第 10 期。
⑥ 《晋阳学刊》1996 年第 3 期。

西方时存在某些偏差和失误乃至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不过，他大胆地突破传统观念，介绍西方新知识的贡献不可磨灭。后来，洋务派、维新派注意向西方学习，主张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都受到了徐氏直接或间接的启蒙和影响。有关徐继畬与中美关系的论著主要有梁碧莹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①]，作者着重阐述了徐继畬在其《瀛环志略》中对美国的介绍，称该书不仅是国人认识美国的一扇“窗口”，亦为筹办“夷务”的决策者带来了重要信息。徐继畬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去了解和介绍美国，但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更多依靠“西人之书”和美国人的介绍来获取有关美国的知识。因此，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是狭窄的、表面的和肤浅的，对美国的描述总是尽善尽美，充满溢美之词，这既反映了其对美国各项政策、制度以及各种措施的青睐，亦是其认识局限性的反映。

此外，严冰、陈永祥的《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的西洋观》[②] 一文主要从徐继畬对当时世界地理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看法以及西方国家强弱形势的考察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西洋观，认为他的思想认识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所达到的认识程度的最高峰。郭锦华的《徐继畬：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③] 一文重点介绍了《瀛环志略》，称其为一部研究近代世界地理进而探究世界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的综合性著作，指出此书亦充分体现了徐的开放文化思想。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④] 一书中关于《徐继畬与近代世界》一文主要阐述了徐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及其代表作《瀛环志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四　有关《瀛环志略》的研究

《瀛环志略》是徐继畬的代表作，亦是近代中国人探求外部世界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学界十分重视对《瀛环志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宋大川的《〈瀛环志略〉的特色与历史影响》[⑤] 一文介绍了《瀛环志

① 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③ 《炎黄春秋》2004 年第 4 期。
④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晋阳学刊》2000 年第 2 期。

略》在写作风格和体例上的特色，认为其将中国传统舆地学观念融入到对外国历史地理知识的介绍中，具有史地兼备的特点和风格。同时指出《瀛环志略》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部先进的近代地理学著作，亦在于它曾经作为一部宣扬近代进步思想的教科书走入课堂，被许许多多的学生青年修习和研读。吴雁南在《〈瀛环志略〉浅议——纪念〈瀛环志略〉刊行150周年》① 一文指出，《瀛环志略》不仅仅是一部世界史地著作，亦是徐继畬面向世界及其追寻理想人格和理想世界的结晶。《瀛环志略》一书着力凸现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反抗西方侵略斗争、政治民主、经济进步三大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中国走向近代化富强之路的思想框架，因此说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启蒙思想家。吕耀东在《〈瀛环志略〉反映的近代世界格局》② 一文中指出，徐继畬率先以多元化的全新观念将眼光投向当时主宰世界的欧洲列强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状况，重新确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坐标，同时颂扬了世界范围内反殖民反侵略的史实，为国人确立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光辉风范，表达了徐继畬对国家和民族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冯天瑜在《〈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③ 一文指出，晚清经世派官员徐继畬所撰写的《瀛环志略》厘定了一批对译西洋概念的新语，涉及地理、器物、政治等方面名词，这些名词成为现代新术语的前身，对传播西学作出了较大贡献。田一平的《从〈瀛环志略〉到〈瀛环考略〉》④ 则通过对《瀛环志略》最初稿本《瀛环考略》甲辰稿与《瀛环志略》刻本的比较，认为徐继畬在对世界形势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抛弃了传统“华夷”观念并给予西方民主政治高度评价，尽管他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时往往用儒家大同思想解释，但他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认识和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者。赵庆杰在《徐继畬与〈瀛环志略〉》⑤ 一文指出徐继畬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开眼看世界的探索者，《瀛环志略》所表现的文化思想对中国以后出现的改革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同时对日本和亚洲的进步亦有着不可抹杀的影响。詹灵杰、舒习龙的《〈瀛环志略〉、〈海国

---

① 《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② 《晋阳学刊》2002年第1期。
③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④ 《史林》2001年第3期。
⑤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图志〉比较研究》[1]一文通过探讨《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在编撰背景、体裁、史学思想和学术特色等方面的异同，认为社会思潮对史学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著者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倾向对史书的撰著亦会产生一定影响。《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既有共性又有差异。钟觉民的《试探：魏源为何将〈瀛环志略〉中称颂乔治·华盛顿的重要内容舍而不录?》[2]一文认为魏源为保证所辑资料叙事和观点的基本一致不得不将《瀛环志略》颂扬华盛顿的文字舍去，而其以《合省国志》为本极力推崇美利坚民族却较少推崇华盛顿个人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动因。刘雪河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3]指出《瀛环志略》一书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进步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开始面向世界、放眼观察国际形势、注意研究现实问题，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对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

关于涉及对《瀛环志略》研究的专著主要有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 1840—1949》[4]和李炳泉、邸富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5]，前者指出从思想上看《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后了解西方的启蒙读物，从史学上看是近代研究西方史地的早期著作，在史学体例与史料编撰方法上有一定的革新，与《海国图志》地位相同，反映了经世史学兴起的倾向；后者说明《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它为人们提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地知识，指出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徐继畬因之在近代史学史上占据一席别人无法取代的位置。

五　其他方面

关于徐继畬研究的内容涉及面较广，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史学界对其他方面亦进行了某些研究。如，韩永福的《徐继畬在福建》[6]一文考察了

---

①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

② 《邵阳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③ 《沧桑》1997 年第 1 期。

④ 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 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⑤ 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⑥ 《历史档案》1994 年第 4 期。

徐继畬在福建任职时期的政治活动与思想；赵克诚的《徐继畬与晋商》[1]介绍了徐继畬与晋商的广泛交往与联系；黄俊华的《简析徐继畬的制夷之策：阳示德意，阴为钳制——以神光寺事件为例》[2]评价了徐继畬在处理神光寺事件中所采用的“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策略，指出此策略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既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且只会加强天朝上国的心态；铁建晓的《徐继畬和丁韪良》[3]介绍了徐继畬与丁韪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王宏志、马执斌的《高中历史教材和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4]探讨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写入高中历史教材的原因，即历史教学的需要和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历史地位；金石、邓伊的《中国的清官与贪官》[5]一书指出徐继畬作为封建专制时代的朝廷命官，清廉爱民，从不收受贿赂与馈赠，并以刚直不阿的凛然正气多次与官场腐败恶习进行坚决斗争，这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罕见。

六　总结

综上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学界关于徐继畬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其标志性成果是“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与会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在会后以《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为题结集出版）、美国学者德雷克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一书的翻译刊行以及多卷本《徐继畬集》的出版。综观这一阶段取得的全部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就徐氏在19世纪下半叶“开眼看世界”、徐氏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反侵略斗争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貌似形成一个徐继畬研究“热潮”，其实不然。仔细度量这些成果，真正有分量或有影响的研究性作品鲜见，而简单重复乃至抄袭的现象反倒不少。仅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而言，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深度解析；实证不足，分析浅薄；叙事宏大，判断预设；重主观想象，轻史实解读。基于此情此景，

① 《沧桑》2005年第4期。
②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③ 《五台山研究》2006年第3期。
④ 《历史教学》1999年第4期。
⑤ 金石、邓伊：《中国的清官与贪官》，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



如何将徐继畬研究提升到一种新的水平，或进一步深化对徐继畬的研究，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课题。今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又是《瀛环志略》刊行160周年，借机将徐继畬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新的高度并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传承关系，应该成为学界努力的方向。以笔者之见，今后须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首先，继续发掘与徐继畬相关的历史资料，以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推动该项研究走向细化与深入。历史研究建立于扎实丰厚的史料基础上，将新史料发现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突破口，以之来拓展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历史见解。因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亦是史学得以存续的命脉；史学的创新不仅在于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角度的转换，更在于新史料的发现、整合与利用。任何新论点均须有新的史料作支撑，否则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这是史学研究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其次，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各种社会因素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对徐继畬的历史评价曾经历过两种误区即全面否定与过度褒扬，这两种研究态度或价值取向主要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政治因素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如何摆脱这一桎梏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开展徐继畬研究是今后史学界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同时，更要克服“矫枉过正”的研究倾向，纠缠于诸如“究竟谁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抑或徐继畬?”之类的命题。事实上，在中国骤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情势下，所有关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知识精英都在“开眼看世界”、在寻求应对之策，只不过他们每个人所看到的外部景观或相似或相异而已，并不存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此外，诸如徐继畬究竟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思想家还是中国近代具有开放意识的启蒙家之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探讨。

第三，拓展徐继畬的研究范围。从先前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对徐继畬的研究过程中尚有大量未被涉及的领域。纵向的拓展主要是将徐继畬置诸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把握，将徐继畬研究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对其整个思想体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或符合历史事实的综合性估量。横向的拓展主要是将徐继畬与同时代人物进行细致的多面相的比较研究，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从中揭示这些先进人物命运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基本原因。此外，诸如徐继畬在山西

平遥主持超山书院的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徐继畬的个人关系网络、徐继畬的社会与政治品格、徐继畬家族谱系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总之，对徐继畬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成果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富有创见的作品不多。所以，要想将这样一位重要的近代人物彻底“穷尽”，恐怕需要更多学人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岳谦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卫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徐继畬:从山西到华盛顿

——美国国会图书馆书藏见证中美文化外交史

居　蜜

一　导言

1997 年 5 月 22 日，山西徐继畬学术研究会秘书长任复兴先生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馈赠第 012 号徐继畬先生诞辰 200 周年纪念章、徐继畬墓碑拓片及有关中文著作四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多种版本，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基于本人目前进行的善本珍品数字化及 19 世纪基督教在华项目，对徐继畬的思想、背景及交往有一更深的了解和诠释。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徐继畬不只是一位山西乡绅，而且是思想上带动洋务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前瞻先知。根据充分史料，这篇论文娓娓道来内地和沿海在华传教士的工作和影响。虽然由于语言隔阂和多种误解，19 世纪内地省区有层出不穷的教案，但中国教育、法律、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传教士扮演重要的角色。徐继畬也由此媒介，从山西到华盛顿。

二　搜书源流考

《瀛环志略》道光庚戌年（1850）版本

0/C1826. B688 H85. 1　**史部地理类**

瀛环志略十卷（清）徐继畬　著

清道光三十年红杏山房刻本　八册一函　十行二十五字　左右双边

黑口　黑单鱼尾　版框高 25. 4 厘米　宽 17. 6 厘米（以卷一叶四文字叶计）　全书高 32. 7 厘米　宽 19. 5 厘米　白纸


道光庚戌年鐫

壁星泉先生
劉玉坡先生
鑒定

瀛環志畧

紅杏山房藏板

《瀛环志略》道光庚戌年（1850）版本

书名叶中间题“瀛环志略”，右上题“壁星泉先生，刘玉坡先生鉴定”，左下题“红杏山房藏板”，框上横题“道光庚戌年镌”，即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文开卷为“地球图”，目录前额题“瀛环志略”，下署“五台徐继畬松龛辑著，会稽陈庆偕慈圃、福山鹿泽长春如参订，沁水霍明高蓉生采译”，目录题后题“崞县续新德，堂弟继壎，甥薄于逵校字”。正文前有道光已酉（二十九年，1849）刘韵珂序，道光二十八年（1848）彭蕴章序，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陈庆偕跋，道光二十八年鹿泽长序，凡例，目录。书末题“福省东街口宋钟鸣刻字”。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1826年中进士，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道光皇帝召见，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事宜。从此，他多方接触欧美人士，了解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知识。从1844年到1848年，他用五年之功完成了《瀛环志略》。在《瀛环志略》

一书中，徐继畬清晰而准确地告诉国人，在“大清帝国”之外，地球上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1865年，他被召进京，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同文馆总管。1867年10月21日，他接受了美国政府赠送的华盛顿画像。1869年，他告老还乡，乡居至殁。

卷内钤印有五：“刘氏炳杰”白文方印，“孚丽生道弌号南金丙戌武生”朱文方印，“读未见书如逢良材，读已见书如遇故人”朱文方印，“教人长寿华前醉”朱文方印，“丽生手书”朱文长方印。

《瀛环志略》最早为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福建官署刻本，台湾央图有藏，国会图书馆藏此红杏山房藏板稍后两年，行款题名相同，书末均有署名“福省东街口宋钟鸣刻字”，最为接近原刻，疑原板福建官署后售与红杏山房。此后本书迭经刊印，对中国的戊戌变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康有为说：“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说：“在沪始见《瀛环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所见有以下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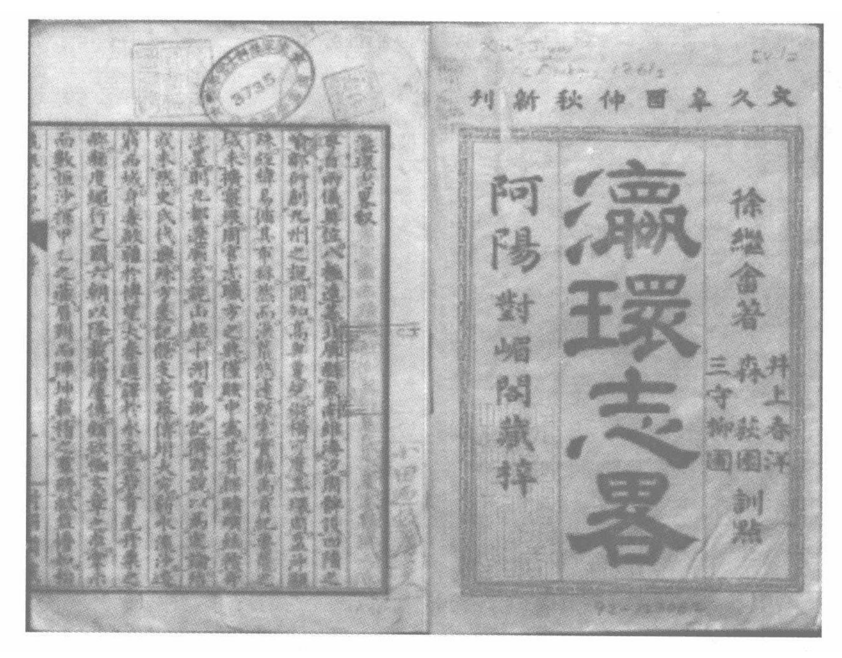
1. 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刻本。
2. 同治十二年（1873）掞云楼刻本。
3. 光绪六年（1880）楚南周鲲刻本。
4. 光绪十年（1884）京都琉璃厂会经堂刊本。
5. 光绪十九年（1893）鸿宝斋石印本。
6.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宝文局石印本。
7.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扫叶山房铅印本。
8. 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校刊本。
9.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有用书斋铅印本。
10.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都博文斋石印本。

1025/C1827. G115 H7818 1863 Orient Japan Cage **史部地理类**

瀛环志略 十卷（清）徐继畬 著

日本文久元年阿阳对嵋阁刻井上春洋等训点本　十册一函　十行二十四字　四周双边　白口　黑单鱼尾　版框高20.1厘米　宽14.0厘米（以卷一叶九文字叶计）　全书高26.0厘米　宽17.5厘米　日本皮纸

书名叶蓝纸，中间题“瀛环志略”，右上题“徐继畬著，井上春洋、



日本刊印的文久辛酉（1861）《瀛环志略》版本

森荻园、三守柳圃训点”，左下题“阿阳对嵋阁藏梓”，框上横题“文久元年辛酉仲秋新刊”，即公元1861年。下书口题“对嵋阁藏”四字。正文开卷为“地球图”，每大洲及重要国家前均有地图。目录前额题“瀛环志略”，下署“五台徐继畬松龛辑著，会稽陈庆偕慈圃、福山鹿泽长春如参订，沁水霍明高蓉生采译”，目录题后题“崞县续新德，堂弟继壎，甥薄于逵校字”。正文前有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刘韵珂序，道光己酉刘鸿翱序，道光二十八年（1848）彭蕴章序，道光二十八年鹿泽长序，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徐继畬自序，目录，凡例。书末有道光戊申陈庆偕跋，末叶右大字题：“对嵋阁藏板”，左上题“卖弘书林”，左下题“京三条通堺町，出云寺文次郎；大阪新斋桥南一丁目，敦贺屋九兵卫；江户芝神明前，内野屋弥平治”。

此书据清道光戊申本翻刻，但行款不尽相同。经井上春洋、森荻园、三守柳圃三位学者训点，地名旁注英文和日文，尤其地图虽地名取自清道光本，但刻印精细许多，卷前世界地图二幅施以彩色，更为清晰醒目。此书早于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对明治维新有启道之功。此本书名叶有

“对嵋阁藏记”朱文长方印，可能是对嵋阁原藏本，另有“陆军士官学校图书印”等。

此版本台湾未见，大陆国家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有藏。1949—1950年入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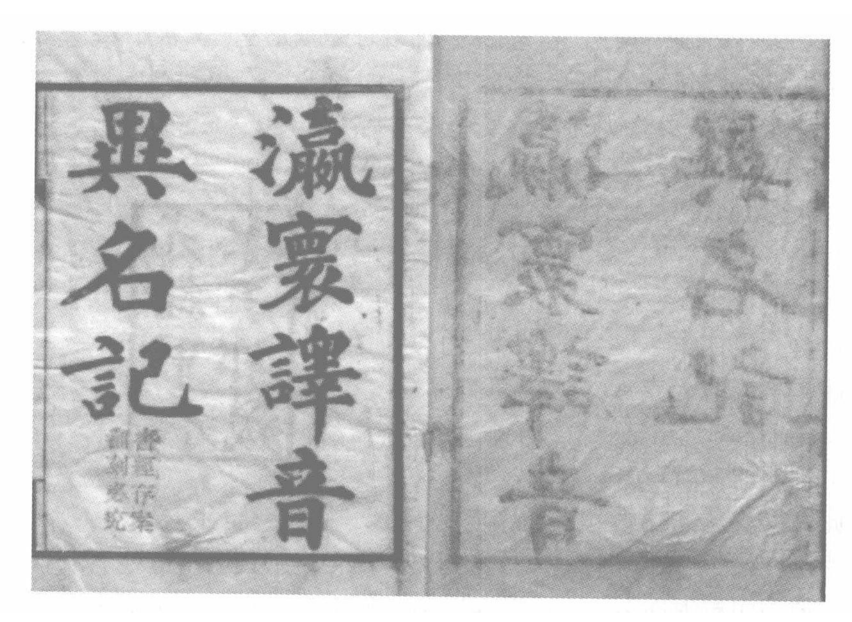
此后，杜宗预著有《瀛寰译音异名记》（编者按：该书取“瀛寰”二字，故从其原貌），对《瀛寰志略》和其他地理书中所录世界各地名进行对比考释，美国国会图书馆亦藏有此书最早光绪三十年鄂城刊本。

0/C1827.B688 T79 **史部地理类**

瀛寰译音异名记 十二卷（清）杜宗预　编

清光绪三十年鄂城刊本　六册一函　十行二十一字　注文双行 四周双边　上下黑口　黑单鱼尾　版框高19.3厘米　宽12.5厘米　全书高25.5厘米　宽15.1厘米　白纸

书名叶题“瀛寰译音异名记”，下钤“书经存案，翻刻必究”朱印；背面牌记题“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刊于鄂城”。正文额题“瀛寰译音异名记卷一”，下署“松滋杜宗预编”。正文前有光绪甲辰杨守敬序，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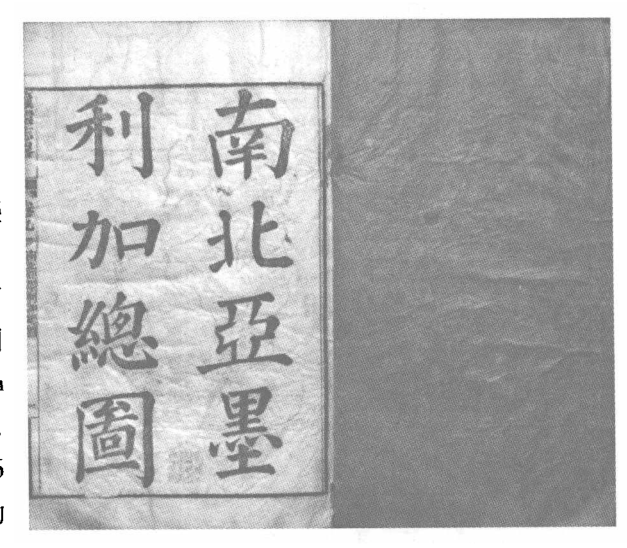
杜宗预编著《瀛寰译音异名记》

杨序云:"今海禁大开,五洲之人麇集于市,于是翻译各国书者汗牛充栋。然粤人所译为粤音;闽人所译为闽音;推之齐楚晋豫,莫不皆然……武丞考之于书,征之于图……莫不汇集比附,归之一致。"

杜宗预为清末地理学者,1908 年与姚晋圻、周从煊等人宣导组织的"湖北史学会"在武昌成立,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历史研究的专业性学术社团。其宗旨是继承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学习西方,尤其是日本的修史经验,利用集体的智慧,分工合作,整理历史资料。

此书台湾央图、大陆国家图书馆均藏相同版本。入藏年日不详。

华盛顿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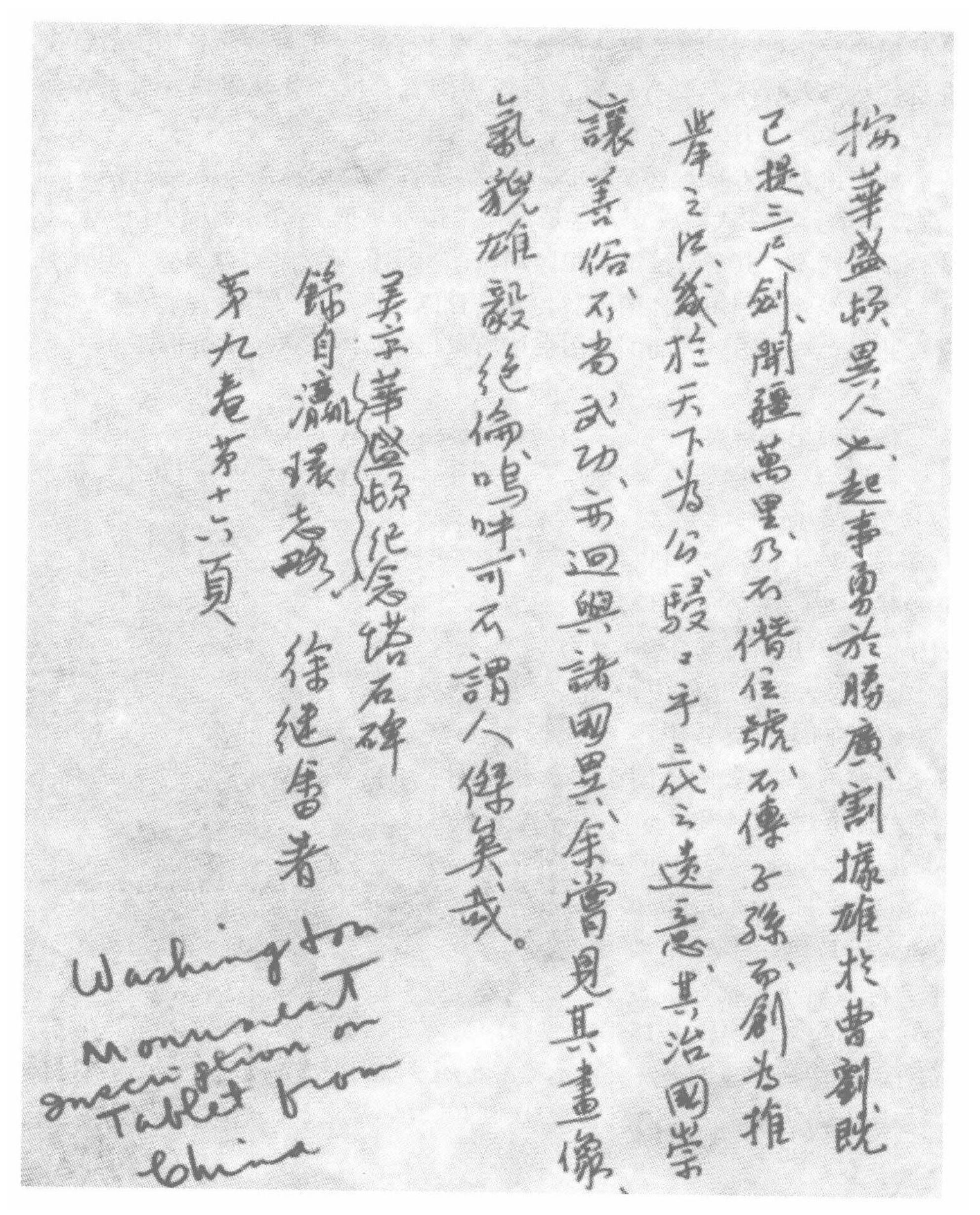


1811 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 年 2 月 22 日—1799 年 12 月 14 日),开始筹建华盛顿纪念碑;建碑过程中,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各国广征纪念物,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 年 4 月 10 日—1916 年 12 月 17 日)积极活动下,得知福建巡抚徐继畬对华盛顿非常了解,于 1853 年镌赠中文碑文。内容除《瀛环志略》所载,尚有"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

胡适和恒慕义

徐继畬的华盛顿纪念碑内镌文,甚受海内外关注。国会图书馆档案内有胡适抄录《瀛环志略》文,恒慕义加英文注。

胡适 1938 年 9 月 17 日至 1942 年 9 月 8 日任中国驻美大使,并于 1943 年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与当时知名汉学家、也是国会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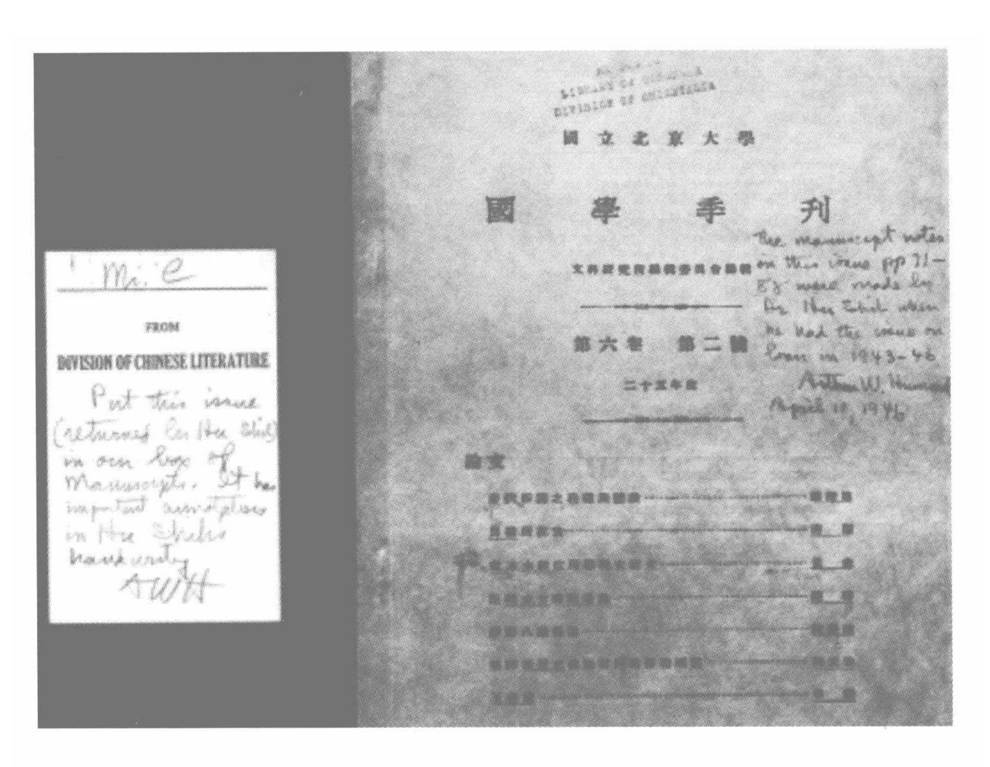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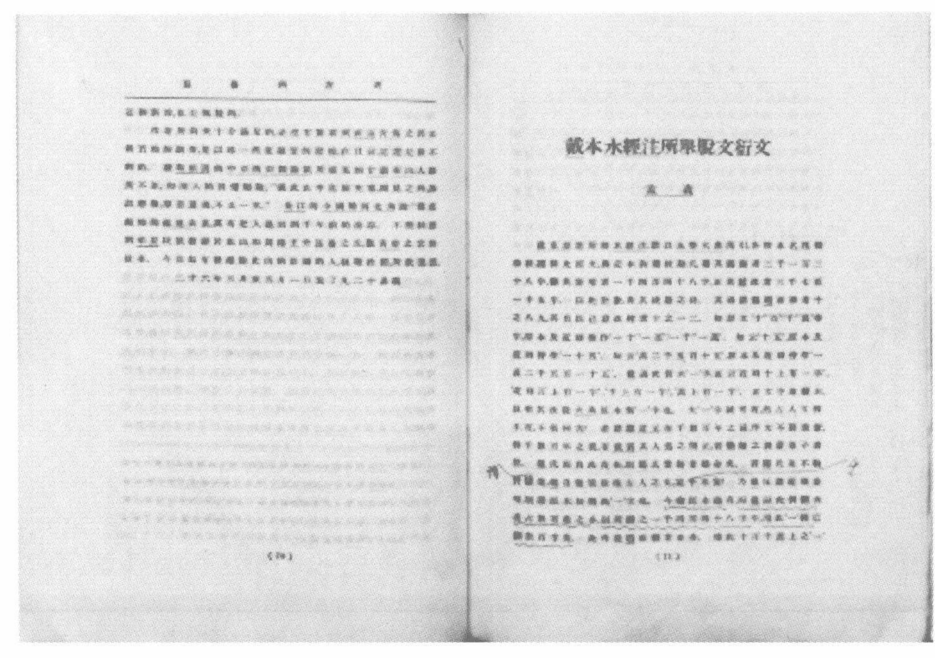
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
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
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
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
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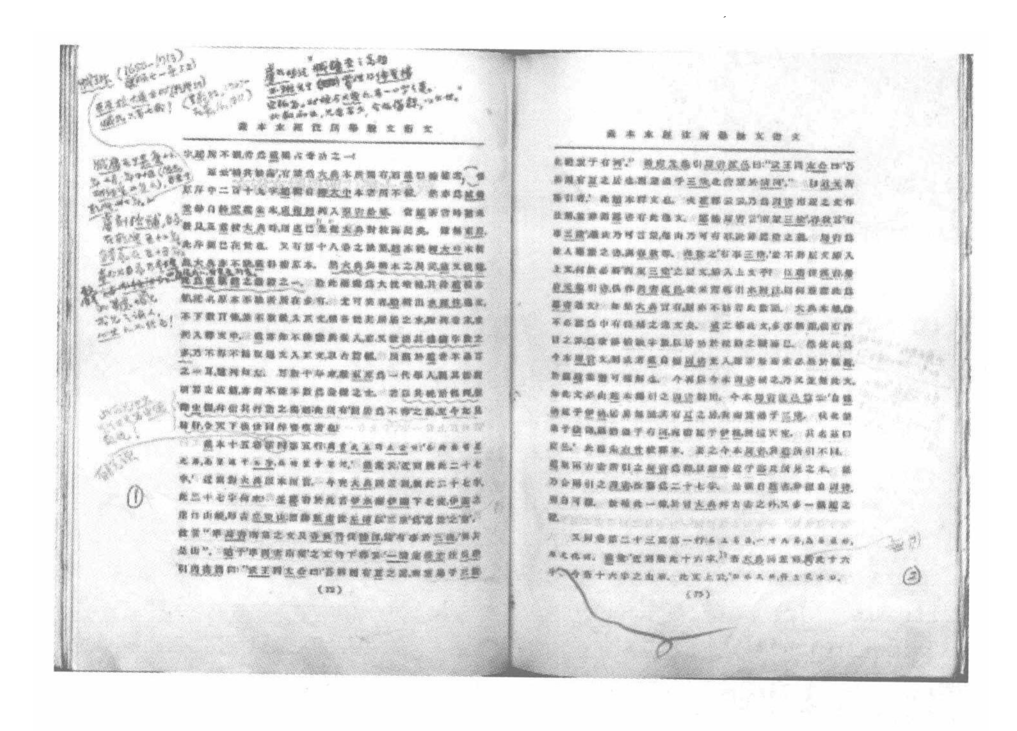
美京華盛頓紀念塔石碑
錄自瀛環志略 徐繼畬著
第九卷第十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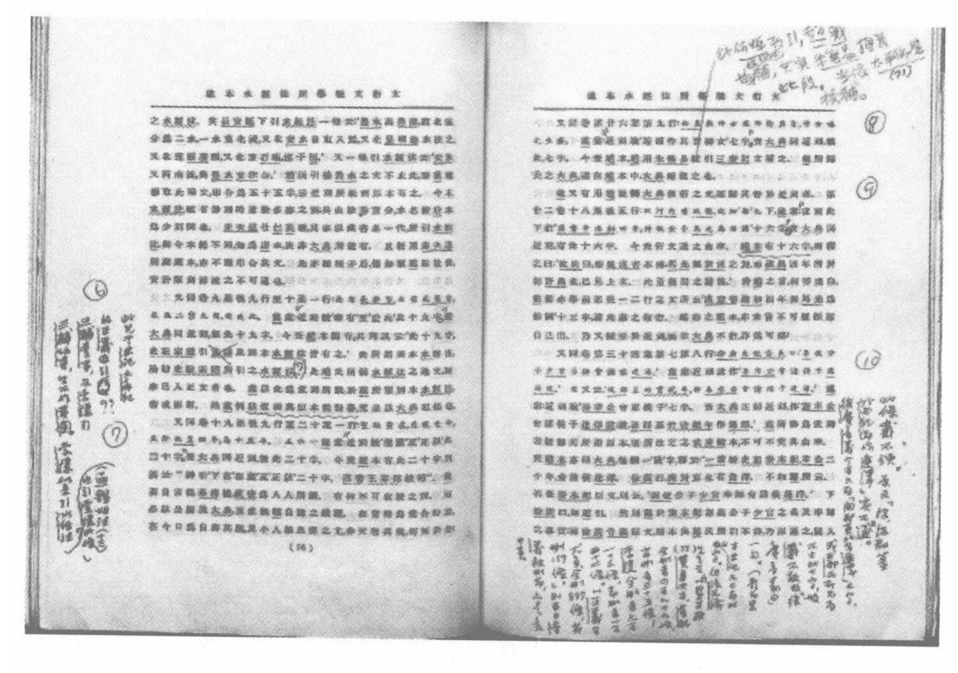
Washington Monument
Inscription on
Tablet from
China

胡适抄录《瀛环志略》文，恒慕义加英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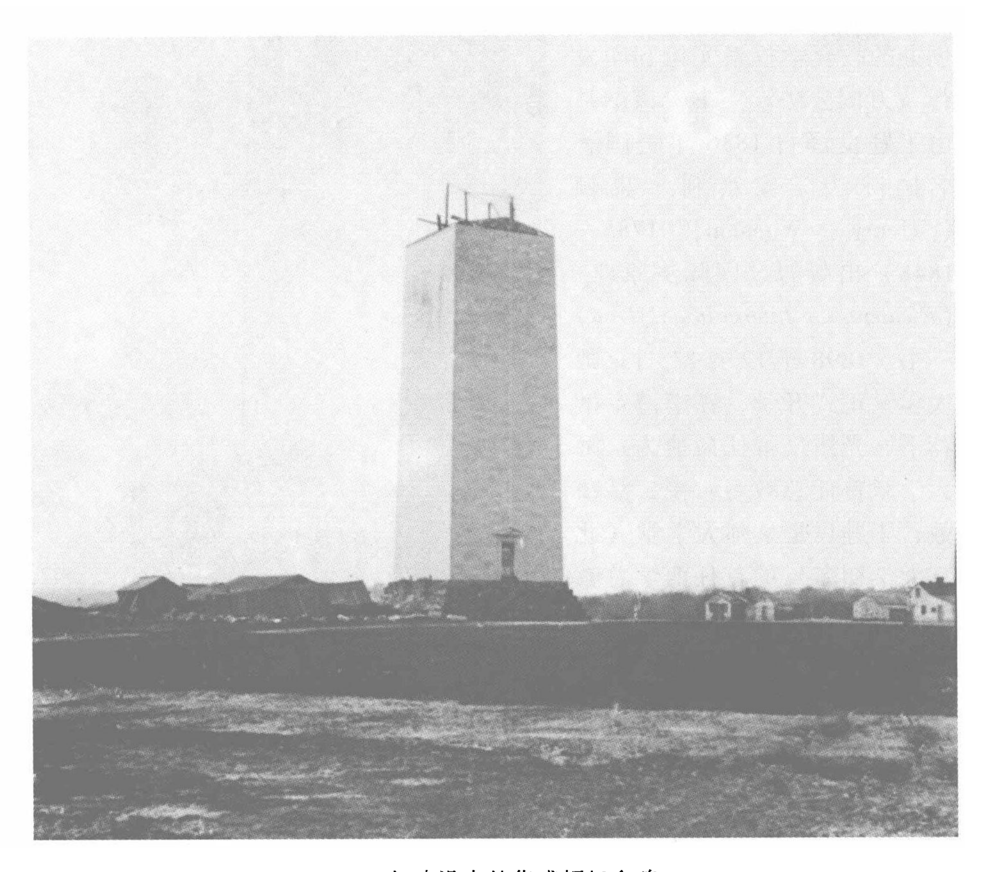

國立北京大學
國學季刊
第六卷 第二號
FROM
DI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交往甚密。在北京大学汉学季刊第六卷第二号，恒慕义注："此书页71—88有批注多处，此期于1943—46由胡适借阅。恒慕义（1946年4月10日）。"另有一条云："此由胡适归还之期刊，应与胡适手稿放在一起，因有重要批注。"所批注文为孟森"戴本（戴东原，戴震）水经注所举脱文衍文"，胡适批注甚为仔细，前人治学之勤，功力之深，令今日学子汗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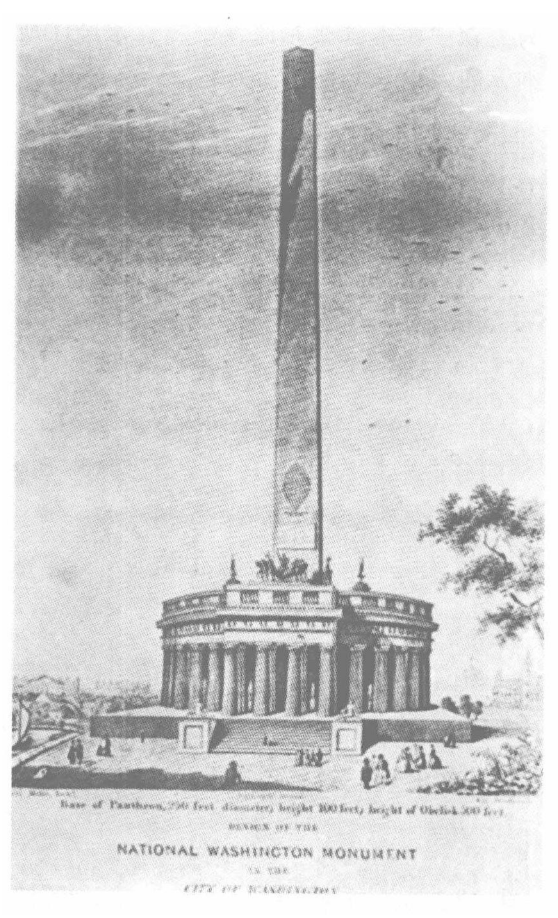


1860年建设中的华盛顿纪念碑

三 美国在华传教士与徐继畬

传教士

丁韪良是美国派至中国的传教士，1864 年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下，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万国公法》一书，该书是由丁韪良译自 1836 年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出版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1898 年 12 月 31 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授二品顶戴，丁韪良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初名）的首任西学总教习，由此可见他通晓中文的程度。



华盛顿纪念碑建筑师罗伯米尔斯（Robert Mills）于 1836 设计的原稿

丁韪良在与张斯桂（徐继畬友）的交往中，得知徐继畬对华盛顿非常了解，曾称赞华盛顿："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推立為國王頓乃爽然謝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仍各部之舊分建為國每國正統領一副統領佐之（副統領有一員者有數員者）以四年為任滿（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眾議之眾皆曰賢則再留四年（八年之後不准再留）否則推其副者為正副或不協人望則別行推擇鄉邑之長各以所推書姓名投匭中畢則啟匭視所推獨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資格退位之統領依然與齊民齒無所異也各國正統領之中又推一總統領專主會盟戰伐之事各國皆聽命其推擇之法與推擇各國統領同亦以四年為任滿再任則八年自華盛頓至今（米利堅立國至今六十餘年）總統領凡九人今在位之總統領[illegible]國所推也初華盛頓既與英人平銷兵罷戰專務農商下令曰自今以往各統領有貪圖鄰國插頭侵削民特與兵構怨者眾共誅之留戰艦二十艘兵萬人而已然[illegible]使各部同心號令齊一故諸大國與之敵睦無敢議侮之者自與英人定盟至今已六十餘年無兵革之事其商船歲來粵東數亞於英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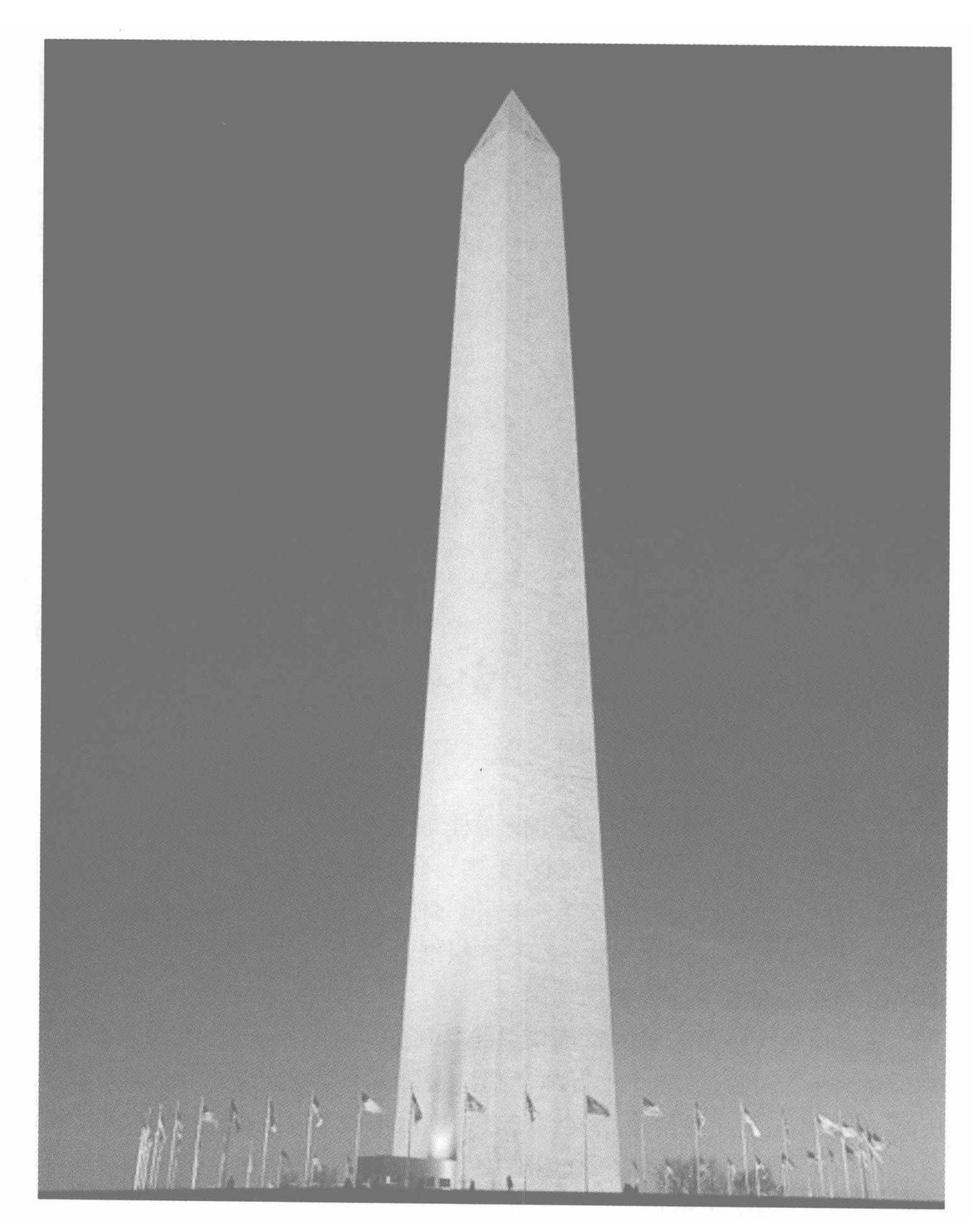
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评介华盛顿的文字

丁韪良购得上等石料，通过张斯桂取得徐继畬文字，制成汉字碑；1853 年此碑代表中国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之后由曾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1855）、美国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于 1862 年将徐继畬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来自中国山西的徐继畬事迹遂传扬美国。

华盛顿纪念碑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中心，这座白色大理石方尖碑，高 555. 55 英尺，重 9. 1 万吨，碑身主要由 190 块纪念石块组成，总共历时 36 年竣工。由徐继畬撰文、代表中国政府致赠美国政府的汉字石碑，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第十级墙壁上，汉字碑呈长方形，高 1. 6 米，宽 1. 2 米，碑文书法工整挺秀，碑石的周边刻有僧侣、游龙、武士和精美的花纹。

1868 年 3 月 29 日，美国《纽约时报》在第 10 版上对《徐继畬与华盛顿纪念碑》作了专题报道，盛赞徐继畬是一位“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家”。徐继畬则对美方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并热情洋溢地作了如下陈述：“先生



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

阁下：我荣幸地答复昨天已细读的阁下的信函。在向我赠送贵国创始人华盛顿画像的场合，您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感其实难副。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的贤德，已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在这一简短的答辞中，我再次对阁下的函件表示谢忱。愿您万事如意。”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获邀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口，而是由当时中国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

155年前，中美之间早就透过来自山西的徐继畲与华盛顿纪念碑结缘，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中美外交的发展，建立了今日硕果丰盛的中美文化交流；155年后，典藏丰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得以借助居蜜博士主持的《中国善本古籍数字化项目》，通过与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合作，共同让这批见证中美外交文化史的宝贵资讯得以重见天日，嘉惠世人。

（居蜜：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研究部主任）

“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会议综述

冯素梅　赵俊明　秦　艳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开放意识的历史人物，《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借鉴西方文化的代表性著作。2008年9月27日、28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纪念徐继畬《瀛环志略》出版160周年”在太原召开。出席会议的5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台湾以及山西的科研院所。这次“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是在已有的徐继畬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今时代，重新审视徐继畬及《瀛环志略》，不仅对徐继畬研究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对我们现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更对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往的徐继畬研究主要涉及徐继畬生平研究，徐继畬与神光寺事件，徐继畬与同时代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关系及比较研究，关于《瀛环志略》写作过程和背景，《瀛环志略》与早期现代化的启蒙关系等方面。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围绕徐继畬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徐继畬与同时代人物比较、《瀛环志略》研究等三方面展开，兼及徐继畬的生平和教育思想等。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就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徐继畬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更加实事求是，并从新的起点审视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瀛环志略》，同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上也有开拓创新。

一　研究内容上进行了拓展和深化

1. 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专家学者独辟蹊径，从不同角度发轫，从细微处入手，以小见大，提示出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深远意义。熊月之研究员《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将体现徐继畬开放意识关键因素之一的华盛顿论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华盛顿论产生及其发展的体系中，强调了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开创性的典范意义，结论颇具权威性；杨国桢教授《被动对外开放与徐继畬的学术转向》从海洋史这个学术领域进行考察研究，指出徐继畬《瀛环志略》的写作成因，徐继畬在鸦片战争中清朝被动对外开放的背景中实现了学术转向。杨国桢先生经过考证与推测后初步断定：《瀛环志略》并非道光皇帝授意撰写。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徐继畬：从山西到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书藏见证中美文化外交史》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瀛环志略》的多种版本及其他相关史料，认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徐继畬不只是一位山西乡绅，而是思想上带动洋务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前瞻先知。刘晓丽研究员《徐继畬"以商制夷"对外策略思想与实践》通过对徐继畬"以商制夷"的发端、形成、实践的深入分析，指出这一开放性的对外策略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2. 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今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高度进一步探讨了徐继畬开放思想的成因，肯定了徐继畬开放思想的启蒙作用，立意高远，意义重大。孙丽萍研究员《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运用宏观考察、微观分析，指出徐继畬的开放思想形成与其所处时代、本人沿海任职的经历的关系，明确指出其思想开放程度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员和其他思想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徐继畬不同时人的思维和方法具有破冰醒世之功。雒春普研究员《开放与传统——徐继畬的二重性》认为徐继畬思想既有"开放"的一面，又有"传统"的一面，具有时代性及其复杂性；冯素梅《给外交以空间——徐继畬开放思想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徐继畬善用折中的方法处理对外关系，给外交一定的空间；郭春梅《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的思想认识与心态》认为《瀛环志略》展现了世界各国真实的社会画面，也表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开放心态。秦艳《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多元文化观》提出《瀛环志略》认同多元的世界

文明，承认了在儒学之外存在的各种宗教也是世界文化的部分，体现了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多元文化观。

3. 徐继畬在教育、外交、商业等其他思想的研究。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主张上，也体现在他的教育、外交、商业等实践活动中，会议全面考察了徐继畬许多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行动，其中新论迭见。高春平研究员《徐继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列举了徐继畬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认为徐继畬的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照搬和延伸，《瀛环志略》中表现出“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教育观。宋丽莉《徐继畬与平遥超山书院》认为徐继畬任职超山书院期间，其开放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当地学子，对平遥的教育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邵雍教授《鸦片战争后徐继畬在福建的对外交往活动》列举了徐继畬在福建处理的八件涉外事务，指出徐继畬战后在福建任职期间试图掌握对外交往的主动权，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镇静为主”，力求“民夷两安”。冀满红、吕霞《革新与图治——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畬》指出徐继畬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兼职同文馆总管，为徐继畬的系列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他的新思维携带着西方文明的影子，因此受到攻击导致失败。林齐模、顾建娣《徐继畬与京师同文馆》认为徐继畬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筚路蓝缕的先驱，同文馆的扩大计划没能如当初的设想来实现，但是徐继畬的努力毕竟为同文馆创造了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可能性。张正明、张舒《徐继畬与晋商》指出徐继畬对于晋商的兴衰、经营之道十分关注，徐继畬认为蒙古地方与内地商贸的开放是晋商兴起的一个因素，并指出社会不靖和捐输是晋商衰败的一个因素。

二　研究视角上发生了转变

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地继承发展中一步步前进，虞和平研究员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提出，这次会议在研究视角上发生了转变，从全球史、概念史、地域史等全新的视角对徐继畬的研究进行了开拓创新。

1. 全球史是现在学术研究中比较前沿、比较新颖的一种视野，近几年全球史的视野在历史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瀛环志略》具有一定的全球史的雏形，中国在160年以前的《瀛环志略》里面已经有了全球史的意识，《瀛环志略》既放弃了中国中心论，更没有西方中心论，而是把世界各国都放在同一个地球层面上考察，全球史的视野对我们

今天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王尚义、张慧芝《从“畿服”到“瀛环”——晚清对世界地理空间认识的转变》从对“畿服”与“瀛环”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指出《瀛环志略》的命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念到近代地理学的转变。

2. 运用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对徐继畬及《瀛环志略》进行全新的探讨，开拓了徐继畬研究的新领域。王先明教授《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环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从“华夷”概念入手，指出在一个完全“华夷”话语的时代，徐继畬特立独行地在《瀛环志略》中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其影响比之于地理知识本身更为持久而深远。

3. 区域史的角度。徐继畬家乡为山西，一生历仕京师、陕西、福建、广西等几个省区，这次会议多位专家学者运用区域史的研究视角对徐继畬在所经之处及有关地区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全面探索和研究，所涉及地域之广前所未有。阎守诚教授《“山西并不闭塞”——从徐继畬谈起》通过介绍其父阎宗临以其中西交通史领域的专长，研究历史上走向和面向世界的山西人的情况；席涵静教授《徐继畬与台湾》运用有关台湾之奏折指出徐氏在福建巡抚任内对台湾的关注；赵俊明助理研究员的《徐继畬与山西地方社会》，从徐继畬做官关注山西地方政务，退职帮助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关注地方商业发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徐继畬对家乡山西的贡献。

三　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创新

历史学研究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改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次会议颠覆了传统的阶级史观和脸谱化人物观，运用了比较法、借鉴法、分析法等方法，以文本为中心，对《瀛环志略》的观点、特色、写作体例进行了深入探讨，将徐继畬的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1. 比较法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通过比较分析使研究深化，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价体系，得出全面的观点。这次会议大量地运用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突出地表现在《瀛环志略》与同时期其他著作的比较，徐继畬和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林则徐、魏源的比较，以及徐继



畬自身前后思想的比较等方面。郑大华研究员《〈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指出《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环志略》以精取胜，《瀛环志略》之长在“开眼看世界”，《海国图志》之长在主张“师夷长技”。吴义雄教授《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从西方人的视野中审读《瀛环志略》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瀛环志略》成为西方人探询中国文化的一条路径。

2. 对徐继畬及其著作进行了全方位多方面的立体考察。原馥庭先生《纪念先知先觉的乡贤徐松龛先生》概述了徐继畬的生平，认为徐继畬对中国的维新、革命，对抵抗列强瓜分，对中华民族多次渡过被灭亡的难关而最终由弱变强，影响至深，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徐松荣研究员《重新认识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与“和”——兼评徐继畬的“和”、“战”思想与外交活动》认为评价徐继畬应结合他当时的历史活动才能展现真实的面貌，徐继畬第一个提出“变局论”，并提出备战和戎、平等外交主张，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中的“战”与“和”。

3. 通过对《瀛环志略》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解剖《瀛环志略》的写作风格、写作体例和写作方式的创新和特色，更加突出《瀛环志略》作为当时一部惊世骇俗著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既有深度又见新意。任复兴先生利用自己的收藏优势，对《瀛环志略》的不同版本特别是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进行分析。张海瀛先生《简论〈瀛环志略〉的开拓创新》提出了《瀛环志略》在构架结构、记述内容、编修体例三个方面的开拓创新；宋大川研究员《徐继畬与〈瀛环志略〉》详细阐述了《瀛环志略》在写作风格和体例上的鲜明特点，如中国传统的舆地学观念、史地兼备的著述风格等，指出它是一部宣扬近代进步思想的教科书；殷俊玲教授《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述论》则提出《瀛环志略》是中西文化对峙下中国对西方重新审视的杰作；岳谦厚、卫俊《近20年来徐继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近20年徐继畬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回顾与问题梳理。

这次研讨会对今后的徐继畬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和前景展望，如在发掘新史料、拓展研究范围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倡议成立一个以山西为主，广泛吸纳北京、河南、广东、广西、福建各省学者的全国性的研究会，共同推动徐继畬研究向更高的层次纵深发展。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原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方强，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

辑丘克军，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梁建华，《历史教学》编辑部编审蔡世华，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副编审徐小燕，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邵建博士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徐继畬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综述

尹素敏

关于徐继畬的研究状况，任复兴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研究综述》① 和岳谦厚、卫俊的《近20年来徐继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② 二文，先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本文在参考前该二文的基础上，并检阅该二文未曾注意到的研究成果，侧重对徐继畬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亦称近代化）的研究状况作一专题综述。

徐继畬的近代化思想是学界关注的中心议题，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徐继畬近代化思想的总体考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虞和平的《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一文。他认为，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启蒙运动中，徐继畬以其独有的特点成为“开眼看世界”思潮的代表。徐氏突破华夷观念、欣赏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意识到工商可致国富强。此外，徐氏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指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势，谋求富源是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因；提出了“遵约通商”的抚夷主张。这些观点对中国近代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此外，潘振平的《〈瀛环志略〉研究》③，任复兴的《〈瀛环志略〉及其历史影响》④，郭锦华的《徐继畬：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⑤，郭剑化、杨华的《〈瀛环志略〉近代化思想析》⑥，张承宗、

---

①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汇编》，2008年，太原。

③ 以上二文见《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⑤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⑥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2卷第2期。

苏利嫦的《学习与传播先进文化的先驱徐继畬》① 王振锋的《近代中国"发现"世界的第一人——徐继畬再论》② 等文，分别对徐继畬的近代化思想进行考察，讨论范围和主要观点与虞和平基本相同。吴雁南的《〈瀛环志略〉浅议——纪念〈瀛环志略〉刊行150周年》③ 认为，《瀛环志略》不仅是一部世界史地著作，也是徐继畬面向世界追寻理想人格与理想世界的结晶。该书着力凸现的反抗西方侵略、政治民主、经济进步三大问题构成了近代中国走向近代化富强之路的思想框架。龙夫威的专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④ 认为，徐书以现代化为主旋律，在探索西方强国的本质与剖析中国的悲惨沉沦方面，均超出了客观的地理学范畴，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并为60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变革与维新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⑤ 一书中，《徐继畬与近代世界》一文，阐述了徐继畬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及《志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刘天纯的《徐继畬与近代化——兼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比较》⑥ 一文，对该二书的撰写动机、出版、内容及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加以比较，试图阐明中日两国近代化不同结局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二是关于徐继畬世界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考察。王尚义、张慧芝的《从"畿服"到"瀛寰"：晚清对世界地理空间认识的转变》⑦ 一文认为，《志略》首次提出了"瀛寰"一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从传统"畿服"理论到现代地理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领域的近代化进程。蔡乐苏在《拥抱世界——徐继畬》⑧ 一书中指出：徐继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向国人展示真实的外部世界，倡导认识世界、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知识的潮流。徐士瑚的《放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畬》⑨ 一文，考察了徐继畬的出身、教育和为

---

①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② 《城市研究》，1994 年第 6 期。
③ 《贵州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
④ 任复兴译，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
⑤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⑥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3 卷第 4 期。
⑦ 《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汇编》。
⑧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⑨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官经历，认为徐继畬是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先驱。雷颐的《徐继畬的命运》[①] 认为，徐继畬的种种观点不仅是挑战“皇权神圣”观念，更重要的是，这种挑战标志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即将开始改变，一个启蒙时代已经来临。周振锋的《中国近代世界观的一代宗师——徐继畬三论》[②] 认为，徐继畬实现了对中国中心观、华夷之辨、时代趋势认识上的三大突破，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为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奠定了思想基础。李冬君的《徐继畬的地缘政治新世界》[③] 认为，徐继畬主要从地缘政治视角了解世界，其见识更显深刻。

三是关于徐继畬西方观和推介西方文化的考察。陈绛的《19 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④] 一文，评介了徐继畬及其《志略》在学习西方方面的历史功绩。严冰、陈永祥的《从〈瀛环志略〉看徐继畬的西洋观》[⑤] 一文，从认识世界地理、西方文明、西方国家强弱形势三个方面阐述了徐继畬的西洋观，认为他的认识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所达到的新高度。吕耀东的《徐继畬对近代西方列强国家实力的认识》[⑥] 认为，徐继畬对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是欧洲列强的实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以世界多元化的视角探讨了欧洲强大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并对近代世界格局及中国周边危机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要在应对“国际变局”中知己知彼、自强不息。吕耀东的《〈瀛环志略〉反映的近代世界格局》[⑦] 一文，考察了《志略》对欧洲格局、东南亚危机和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所做的分析，认为徐氏具备了多元化的全新观念。任复兴的《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变》[⑧] 认为，徐继畬从办理福、厦两口对外事务，主张平等外交到同文馆事件中主张大规模的吸收西方文明，为中国的开放和近代化包括外交近代化进行了艰难跋涉。魏文青的《徐继畬思想简论——兼论徐继畬与鸦片战争》[⑨] 认为，徐继畬的政治思想直接因鸦片战争而触发。文章介绍了徐氏对国家民族与鸦片关

① 《经济观察报》，2007 年 11 月 5 日，第 042 版，第 1 页。
② 《城市研究》1994 年第 6 期。
③ 《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7 年（24）。
④ 《学术月刊》，1979 年第 11 期。
⑤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⑥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⑦ 《晋阳学刊》，2002 年第 1 期。
⑧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⑨ 《理论探索》，1999 年第 3 期。

系的论述、徐氏对中西、中英思想文化的相异点及中西尤其是中英冲突的实质所做的分析，认为徐氏提出的“师夷”观点是古代会通文化精神在近代的新表现。

四是关于徐继畬推介西方民主制度的考察。陈旭麓在《浮想录》① 中指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并非从传统民主观发展而来，而是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介绍西方民主制开始。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② 一书，论述了《志略》在不满封建专制、赞赏西方民主制度方面“透出的新鲜信息”及其社会效果。张其昀的《徐松龛先生年谱序》认为，徐氏实为中国首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异于19世纪各名臣者，在于洞悉列国之情，慨然知时代趋势与我立国之道。《志略》对19世纪中叶世界大势的论述，至今可为蓝本。齐虎田、阎相国的《略论徐继畬关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③ 认为，徐氏关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比同时代人单纯从物质层面上看问题，或偏重学习西方坚船利炮“长技”的自强思想要高出一筹。任复兴的《〈瀛环志略〉及其历史影响》④ 认为，《志略》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思想的介绍，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引进与近代中国民主潮流的开端。李荣的《简论徐继畬的民主主义思想》⑤ 认为，徐继畬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突破华夷观念，突破国人狭小的世界观，大力弘扬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对当时及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王铁牛、吕凤林的《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驱徐继畬》⑥ 一文，考察了徐继畬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认识与任职同文馆的洋务实践，认为徐继畬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驱。

五是关于徐继畬与经世思想和洋务思想的考察。刘学照的《论洋务思想》⑦ 认为，“古今变局”思想最早见于黄钧宰、徐继畬40年代后期的著述，后在洋务运动中形成一种系统的时局观。吴嘉勋的《近代睁眼看世界

---

① 《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④ 《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⑤ 《传承》，2008年第9期。
⑥ 《五台山研究》，2003年第2期。
⑦ 《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又一人——论徐继畬与其〈瀛环志略〉》① 认为，综观徐继畬思想主线，适成为洋务思潮的先驱，其中赞扬民主的部分，被改良派继承和发扬。《志略》有助于知识界的两代人将目光转向西方。宾长初的《论徐继畬的欧美观》② 认为，徐继畬对西方的认识有重大突破，虽然这种突破是相对的，但其突破传统观念，介绍西方新知识的贡献不可磨灭，影响及于其后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冯祖贻的《徐继畬属什么派》③ 一文，将徐继畬的言行与经世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一一对照，认为他是经世派。还考察了徐氏莅闽 13 年的政治活动，全面分析了英人入福州这一事件，并结合《瀛环志略》的内容，认为徐继畬不是投降派。郑大华的《从徐继畬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④ 认为，讨论徐继畬和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须确立几个原则：第一，抵抗侵略是爱国，但盲目排外决不是爱国；第二，对外投降是卖国，但理性外交决不是卖国；第三，对外开放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应有的题中之意。据此而论，徐继畬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袁伟时的《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⑤ 认为，以徐继畬为投降派的看法与人们对开放与爱国、排外与爱国的错误认识密不可分。《瀛环志略》是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的奠基石，是近代中国改革变化思潮的前奏。

六是关于徐继畬思想两重性及其转变的考察。陈存恭的《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⑥ 一文，介绍了徐继畬的生平事略和教育背景，认为徐氏的政治理念在战前以经世之学为特色，属传统的儒家思想，战后触及西方思想，但其儒家的政治观念仍牢不可破。徐继畬对西方认识有重大突破，但也有若干成见。雒春普的《开放与传统——徐继畬的二重性》认为，徐继畬身具二重性，开放的一面表现为他的世界观、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关注以及《格物入门》序和“赠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辩”等；传统的一面表现为，忠君、推崇八股文等。开放与传统的二重性，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与徐继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不无关系。王先明的《从“华夷”到“中西”的话语转变——〈瀛环

---

① 《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② 《晋阳学刊》1996 年第 3 期。
③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④ 《晋阳学刊》，2009 年第 2 期。
⑤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4 期。
⑥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志略〉与近代民主观念的孕育》[1]一文，从“华夷”这一概念入手，指出在一个完全“华夷”话语的时代，徐继畬特立独行地在《瀛环志略》中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其影响比之于地理知识本身更为持久而深远。吴廷桢的《徐继畬——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爱国者》[2]一文，分析了神光寺事件和徐氏在鸦片战争后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某些认识和对策，认为徐继畬战后开始放弃“蛮夷”的传统观念和政策，转取一种审慎的态度，是一种从盲目到理性的现实主义过渡。

徐继畬的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正是清朝由盛转衰和图谋再兴之时，也是由提倡经世致用到推行洋务新政的转变之际，这种时代和国运的转变在徐继畬的身上颇有轨迹可寻。他在任官期间不仅办理了一些中外交涉事务，而且编写了《瀛环志略》一书。在处理中外交涉事务中，他表现了从排外转向容外的思想意识和心态，以及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和能力，并交结了一些外国人士，获得了一些新的世界地理和人文知识。1867年出任同文馆总管事务大臣之后，他可以说已进入洋务运动的行列，成为洋务派中的一员，为同文馆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也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主张。与同时代的其他经世派、洋务派人物相比较，他可以说是一个经历从经世向洋务转变全过程的典型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经世派的特征，也有洋务派的属性，又有转变的历程。因此，以徐继畬为典型，考察经世派向洋务派的转变，并进而考察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也是今后的研究有待开拓和深入的一个重要问题。

（尹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

① 以上二文见《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汇编》。
②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跋

用开放的心态研究徐继畬

郭裕怀

在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召开了“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这个严肃的学术会上，听取了很多好的发言，新的学术观点，深受启发。我对徐继畬所知甚少，只能谈点个人的看法和想法。

一 用开放的心态研究徐继畬

开放的心态是徐继畬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果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也就不会有《瀛环志略》这样的醒世传世之作，不会有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中国人评价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赞美民主政治的振聋发聩之语。徐继畬的这种开放的心态，在闭关锁国的晚清时代，在大批占据主流地位的抱残守缺的士大夫的重重包围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现在研究徐继畬，就应该从这里入手，而且应该同样抱有开放的心态，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用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眼光，用放眼世界、包容万物的胸怀，去探讨、吸取其有利于当代改革开放的养分。

徐继畬的开放心态与其爱国情怀是互为表里的。他是晚清非常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全球发展大势，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浪潮和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苦难现实，他的忧患意识和急切发愤的自强心态，十分感人。我们在徐继畬身上看到的是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绝不可能具有他那么宽

广的心胸和远见的卓识。

二　给予徐继畬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徐继畬深谙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在比较中西方各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积极思考，系统地提出了处理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务实观点和建议。他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睿智的思想家。对他的先驱作用和启蒙意义要有足够的估计，给予充分的肯定。徐继畬寻求真理的胆识、勇气和信心是超越常人的，他是一位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瀛环志略》是徐继畬经邦治国的传世力作，是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丰碑。作者撰写《瀛环志略》"历时五个寒暑，未尝一日辍也"。开放的胸怀着眼于大势。这是应该重点关注的，而且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去研究《瀛环志略》。

研究徐继畬及其著作，还要重视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日本等国的学者、官员的研究成果，要充分利用各国特别是美国费正清教授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资料。

三　一点建议

我们应下决心把徐继畬搬上银幕，让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活起来，杰出思想家的思想活起来，发挥其启迪和典范的作用。应该像维辰同志抓《立秋》、《一把酸枣》、《乔家大院》、《白银谷》影视作品那样，用那样的力度去办好这件事。建民同志高度重视此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徐继畬是我们山西的骄傲，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办，请谁去办？这就叫责无旁贷，舍我其谁！

王岐山同志说："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谁封闭谁落后。"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开放。通过影视作品宣传徐继畬的开放心态，这正是我们山西特有的大题目，好题目。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角度说，也需要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品、代表人物宣传出去。拍这样的文化片，一要请高手写本子，二要

有国际视野，争取国际影视界的合作。多做这样的工作，才能以开放促改革，全方位的开放可以为改革提供动力和活力。

认识世界大势很重要，认识自己的现状同样重要，相比较，找差异，重结合，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也正是我们的前辈徐继畬一生致力所在。

（郭裕怀：原山西省政协主席）

后　记

——兼考《瀛环(寰)志略》之书名

孙丽萍

一

伟人自有其思想的独特与品德的魅力。徐继畬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最早几位倡导对外开放、倡导客观认识世界的先驱人物之一。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字健男，号松龛。自幼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道光六年（182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年（1830）授翰林院编修，继任陕西监察御使、广西浔州知府等职。道光十七年（1837）起，历任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擢升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在巡抚任上四年有余，曾两度短暂署理闽浙总督。

鸦片战争期间，徐继畬率部在漳州边城积极筹备，抵御入侵。1840年鸦片战争后，他对中外大势开始了积极的思考与判断，利用在沿海地区与外国人频繁接触的便利条件，发挥其扎实深厚的史地学考证优势，前后花费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客观全面介绍世界各国地理、人文、政治、经济状况并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启迪国民开放意识的启蒙著作《瀛环志略》。

道光二十八年（1848）首次刊刻出版《瀛环志略》，此后的半个世纪，该著作先后刊印十余版次，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以及历史人物如郭嵩涛、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近代外交家、思想家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徐继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自由贸易的热情赞誉以及他提倡的缓和外交策略，遭遇大批在朝官员的不满甚至抨击，弹劾徐继畬“大张夷情”的奏折接二连三送达咸丰皇帝的文案，徐继畬成为中国近代

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早倡导思想开放和客观认识世界的先驱人物，同时也成为晚清封建政治的牺牲品。

咸丰元年（1851）三月，徐继畬因处理两名英国人入住福州神光寺事件遭遇朝野上下激烈批评，朝廷以其在任时有犯人脱逃为由将其降职，回京任太仆寺少卿。次年，徐继畬被削职为民，回乡督办团练，防堵北上的太平军。咸丰六年（1856），徐继畬出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致力于教授课读与赋诗作文长达七八年，其学问和人品影响了众多的三晋学子。同治二年（1863），徐继畬被再次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治五年（1866），徐继畬出任京师同文馆大臣。年逾古稀的徐继畬以其道德人品、思想学问影响着中国学界政界。同治八年（1869）三月，徐继畬告老还乡，四年后这位以开放思想见长、积极回应现代文明、对中国近代发展进程有破冰之功的人物终老五台山东冶镇。

二

编辑论文的过程中，苦于书名用“环”还是“寰”的两难问题。如果用“寰”，似乎有违著作者的初衷；如果用“环”，又与不少著作者的意愿相拂。一时难以抉择，所以在本论文集中，暂且依照文章作者的选择，仅限于每篇文章中书名的统一。以后能不能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将书名划一，也是我在研讨会期间和会后思考的一个问题。

究竟用《瀛环志略》还是《瀛寰志略》更合理？多年来未有定论，似乎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有时仅凭个人喜好和感觉进行把握。但是，在一本论文集中，出现一个同音字的两种写法，就需要在此进行补充说明。

根据现存的版本资料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研究部主任居蜜博士提交的论文《徐继畬：从山西到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书藏见证中美文化外交史》（收入本论文集），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徐继畬在世的时候，书名冠以《瀛环志略》。在徐继畬的故居五台县东冶镇的徐继畬纪念馆，展出该著作的不同版本，其中就有最早的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刻本，有日本文久辛酉（公元 1861 年，清咸丰十一年）对嵋阁新刊刻本，有同治五年（丙寅，1866 年）总理衙门的刻本，几种版本均冠名《瀛环志略》（见书前照片）。居蜜博士的文章列举了道光三十年

（庚戌）的刻本（见居蜜论文图片）等几种版本，书名均为《瀛环志略》。居蜜在文章中还附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档案胡适抄录徐继畬评价华盛顿的影印文本，时间大约在1943—1946年，书名亦抄为《瀛环志略》。胡适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毕生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先生在取字用字的时候也应该会有一定之规。

那么，以“瀛寰”命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有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由清末地理学家杜宗预编著的《瀛寰译音异名记》，用了《瀛寰志略》的书名，并与其他的地理著作所录世界各地地名进行对比考释。杜宗预的《瀛寰译音异名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均有藏本。

《瀛寰译音异名记》的序文为杨守敬作。杨守敬的序文称：“今海禁大开，五洲之人麇集于市，于是翻译各国书者汗牛充栋。……武丞考之于书，征之于图……莫不汇集比附，归之一致。”杨守敬是清末民初极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1880—1884）曾任驻日钦使随员，在日本期间，大量购回古籍汉书，得书数万卷“遂盈筐箧”，驰名中外。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等教职。宣统元年（1909）举为清朝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杨守敬的影响与杜宗预著作使“瀛环”转为“瀛寰”的可能性目前不能排除。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民国以后，关于徐继畬著作的书名一些人选取了《瀛寰志略》。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与论文，选用“瀛寰”的有之，选用“瀛环”的更不在少数，因此造成了“瀛环”与“瀛寰”的通用和混用，甚至不少学者专家也难以辨清。从字面意思看，“瀛寰”的书面语为世界的意思，与徐继畬著作的内容当然也贴切；众所周知的是，“环球”一词专指世界、全球，且与原著书名没有丝毫歧义。因此，如果从严格的版本学意义上讲，我以为还是应该尊重原创者的首选之功，用《瀛环志略》更为妥帖。

三

在以弗所人的作品中有一句箴言：不断想着以前时代的某一个有德之

人。一代伟人的开放思想从夜幕中划过，犹如流星闪耀着一道夺目绚丽的长长光亮。

2008 年，距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问世 160 周年，也正值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问世 160 周年，恰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 30 周年。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实践活动再次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较大关注。

2008 年 9 月下旬，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方主办了“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出席此次专题学术会议的专家学者 50 余人，分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台湾以及山西的科研院所。主办方的主要领导出席并参加了研讨。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徐继畬的开放思想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挖掘和发现了一些相关的史料；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后，重新审视徐继畬及其思想与实践活动，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化拓展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为我们客观认识历史人物与世界事物开辟了新的思维模式。可以说，这次研讨会是 21 世纪国内外关于徐继畬研究的第一次盛会。探讨徐继畬的生平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对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徐继畬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情怀，以及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创新思维，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穿越时空的目光：徐继畬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一书，成为近十年来徐继畬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我们知道，与这位历史人物对中国开放思想的启蒙、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比较而言，我们的研究依然还有很多欠缺，尤其是这位思想家的影响力至今还没有回归其应该有的历史地位，作为研究者来说，我辈难脱其责。好在今日依然有许多人还关注这位来自佛教圣地五台山、成就于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且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历史人物。太原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申维辰书记等人对徐继畬的宣传积极推动，太原市漪汾公园里矗立起一尊精美传神的徐继畬青铜立像，让这位时人难与比肩的思想家的灵魂在蓝天绿树青草的环映中展现独特的魅力和长久的影响。

此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们感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徐继畬生平思想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是他们的研究和积累，使得我们今天的研究有

了较好的基础；感谢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特别是受邀的各位专家学者同好为此次研讨会撰写了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使得本次研讨会上精彩纷呈，争鸣迭现；还要对给予此项研究活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并且积极参与的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高建民，山西省政协原主席郭裕怀，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学文，山西省委宣传部原部务委员卢渝，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侯秀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李留澜，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海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台湾《山西文献》出版社发行人原馥庭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张小颐女士，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全体同仁对徐继畬研究的热心认真工作成为此次学术活动的有力支撑。相信本书面世将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有所启示，将对进一步解放思想能有所推进。书中疏漏、不妥与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专家学者与领导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科学发展，前景光明。

2009 年 6 月